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 祝庭勋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祝庭勋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祝庭勋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2
ISBN 978 - 7 - 5073 - 2234 - 7
I. 李… II. 祝… III. 李德生(1916～)－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433 号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著 者/祝庭勋

策 划/沈永权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编辑部电话/63095932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680 × 960mm 16 开 27 印张 32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978-7-5073-2234-7 定价：5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引子：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1)
一、萧望东笑问李德生，你是怎样从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当中“混”过来的？	(9)
二、毛泽东急调十二军，周恩来召见李德生	(14)
三、平息淮南武斗，毛泽东邀外宾参观	(30)
四、紧张、紧凑的“三部曲”	(45)
五、整芜湖	(60)
六、毛泽东为什么选中李德生	(78)
七、“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长到了军部”	(88)
八、谢富治说，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不合适。	
毛泽东说，你就合适？	(111)
九、既不批总政“阎王店”，也不叫“新总政”	(119)
十、林彪说：“找个‘丘八’管秀才”	(127)
十一、“没有‘五一六’，你抓什么‘五一六’？”	(136)
十二、毛泽东说，你向他们要，一次不给，再要	
第二次	(139)
十三、毛泽东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但指出，	
除李德生外	(154)
十四、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到北京军区去，	
担任司令员	(160)
十五、“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	(175)
十六、毛泽东交代李德生，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市郊	(181)
十七、坐镇空军：监视256，迫降直升机	(193)

十八、鲁珉求见，交代谋害毛泽东的计划	(213)
十九、缴获林彪“手令”和《“571工程”纪要》	(228)
二十、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交锋	(239)
二十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	(248)
二十二、解决好“重灾区”的问题	(259)
二十三、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	(276)
二十四、毛泽东派李德生到南京，劝许世友 “少喝酒”	(294)
二十五、江青“拜年”	(304)
二十六、当选党中央副主席	(309)
二十七、“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320)
二十八、解决八一厂的问题，与江青正面交锋	(325)
二十九、解决解放军报社的问题，再掀波澜	(345)
三十、毛泽东说：“你是唱李铁梅的……你是 陪绑的。”	(359)
三十一、江青“放火烧荒”	(371)
三十二、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391)
三十三、在逆境中奋斗	(408)
三十四、乱云飞渡	(417)
后记	(427)

引子：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一位老红军、解放军陆军几十位军长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

李德生于1969年7月到中央工作后，直接经历了我们党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但是他没有被卷到两个集团中去。在他被中央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后十几天，林彪诡称，是他“找个‘丘八’管秀才”，他不为所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批评林彪集团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错误时，指出“除李德生外”。当他工作颇有成绩，江青打电话向他“拜年”，他居然不予置理，没有回电话。在党的十大之后，对于批林批孔运动，他没有盲目附和，并且在总政治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多次受到江青的责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人们每每为此称奇，弄不清在十年动乱期间，一位从外地到中央工作的解放军军级干部，为什么如此稳重，如此大义凛然，有如此坚定的政治立场。

本书讲的就是李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故事，也可以

说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在开讲以前，我们先讲几则他历史上的传奇故事，作为铺垫。其目的是用以说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表现，不是偶然的。



李德生上将

李德生参加红军时，就有个故事，可以说明他的过人机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根据地陆续建立，穷苦人家寻求解放，大人、孩子争着当红军。红军征战不断，也需要大批补充新战士。于是，一批又一批新战士源源涌入部队。李德生出生在鄂豫皖苏区大别山腹地。1928年，他的家乡柴山堡地区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解放了。贫农出身的放牛娃、只有12岁的李德生，热情拥护革命，被群众推选当了儿童团团长。他常常

为红军送信、带路，红军的威武、团结、勇敢，让他羡慕得不得了，他争着嚷着要当红军。乡苏维埃干部舍不得放他；红军嫌他年龄小，不愿意要。

有一天，乡里来了一位红军营长，李德生又请共青团支部书记帮忙说情。那位营长看他个子小，决心大，不忍心一下子拒绝，仔细端详他一阵后，指着带来的通信员说：“你跟他赛跑吧，你要是赢了，我就带你走。”李德生成天放牛，满山奔跑惯了，哪在乎赛跑。通信员也年轻气盛，把枪放下，要同李德生比个高低，只是身上挎着子弹袋，影响速度，居然被李德生拉下了。

营长也是有心人，他事先已经想了两个测试题，他问李德生：“你跑的时候，路上听到什么了？”李德生愣了一下，回答说：“有敲东西的声音。”营长又追问：“敲几下？”李德生有把握地说：“敲三下。”营长在他们赛跑时确实敲了三下木棒。营长又问：“路上看到什么了？”李德生答：“看到路中间有两个字。”营长又追问：“什么字？”李德生读过半年私塾，认得一些字，不慌不忙地答道：“是‘红军’吧。”

营长连发四问，考不倒李德生，不由得打心里高兴。大声道：“好样的！”

乡苏维埃主席也高兴地说：“合格了。”

于是，这位被认为勇敢、机敏、细心，还不到14岁的儿童团团长，当上了红军战士，而且还是相当现在特种兵的传令兵、交通队员。在红军时期，这个“兵种”是与普通战斗员不一样的。他们总是执行艰巨的任务，往往在战斗关键时刻，起着特殊作用。

再讲一个西征途中巧侦察、保证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包围的故事。



红军时期，徐向前在西征途中表扬了战士李德生。55年后，1987年11月8日，李德生祝贺徐向前元帅86岁寿辰。

1932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征，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全军从敌人夹缝里向西挺进。在陕南户县一带，全军分前后两个梯队西行，李德生所在的十一师三十二团行进在两个梯队之间，当李德生和另一位战士奉命到彷徨镇寻找向导时，突然看到镇子外边，有几个老乡神色慌张。细致的李德生察觉情况异常，在隐蔽自己的同时，侦察到国民党军小部队已经冲进镇子，而镇东南山上，更有大批敌军成散兵阵线展开，企图占领彷徨镇，把我军拦腰截断，分割歼灭。情况异常紧急，不能再找向导了，李德生当机立断，让另一位战士向前跑，通知前面的部队，自己迅速赶回报告团长。团长孙玉清立即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把敌人压缩在狭小地域里面。这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第二梯队赶到，在他们的指挥下，反而把敌人分割包围，歼敌数百人，缴枪300余支，化险为

夷。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听了团长汇报战况后，特意表扬了机动灵活的战士李德生。

再讲讲李德生被错误开除党籍、撤销班长职务后三过草地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忠诚党的事业，忍辱负重，不顾个人得失的优良品德。

1935年6月，李德生被张国焘派来的政治委员强行开除党籍，从班长降为一个普通战士。在三过草地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缺少粮食。他强忍饥饿，节省自己的口粮，到大家没有干粮时，拿出来给全班熬糊糊吃；行军时，他帮助战友背枪、背子弹带；休息的时候，他坐在全班最外边，给战友挡风。他依然恪守一个党员、班长的责任。1935年9月，右路军南下第二次过草地，十师在旧城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同马步芳的队伍打了几天几夜，被敌人包围了，形势很危急。师长陈锡联毫不犹豫地派李德生和另两位战友出去找援兵。三人机智地突出重围，搬来救兵，才使十师和主力部队重新会合，解除了困境。直到1983年，我访问陈锡联，他依然记忆清晰地讲起此事的许多细节。

李德生当指挥员后，故事也很多。这里只讲他在上甘岭战役中研究改进战术，大量歼敌的故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在十二军当师长、副军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战。在金城防御一年、取得歼敌1.9万人的胜利之后，李德生又接到担任五圣山战斗指挥所指挥员的任务。从上甘岭战役的第二阶段起，他带领十二军6个团的部队参战。为了减少我军伤亡，他多次到前沿勘察，结合金城作战经验，先后解决了几个难题：（1）兵力配备实行“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一个阵地上一个组只要两三个同敌人周旋，但是手雷、火箭筒增加

配备，使火力加强，歼敌增多，我军伤亡减少。（2）弹药运输，改远程人力背运为50米一站，每站挖了猫儿洞，分段交替前进，既保持运输队体力，又加快了运输速度。（3）吃饭问题，改变以连队为伙食单位的做法，团部设立大伙房，大批蒸包子，分成小包装，运送前沿；后方办流水席。（4）组织工兵夜晚去修筑一线野战工事，既保证前沿工事坚固，又使一线战士精力旺盛，打击敌人。（5）把通向前沿的电话线埋在堑壕半腰，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这几条措施，件件关乎到更好地保存自己、大量歼灭敌人。由于他和部队官兵的创造，在参加上甘岭战役第二、三阶段作战中，激战40多天，十二军以小的代价，取得歼敌1.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52年10月，李德生（左）在上甘岭战役的前沿指挥所内。
(孟昭瑞供稿)

上面的几个故事，作为“开篇”吧。而更使人称奇的故事，莫过于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李德生以一位军长的身份，领导安徽省全省驻军参加“三支两军”。由于迅速稳定了安徽省的混乱局面，并且在实现大联合、解放干部方面的突出成绩，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69年和1973年党的九大、十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从1969年7月28日，到1973年12月26日，他在中央工作了4年又151天。除了继续担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外，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动乱的10年，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艰难曲折斗争的10年。在那是非颠倒的非常时期，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群众，先后被打倒、靠边站，下到农村，进了“牛棚”，只能以特殊的方式，坚持斗争。而继续工作的人们，坚持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是极其艰难困苦的。

不少人感到奇怪，李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后来又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他到中央工作前，对于中央的工作特点和规律毫不知晓，对于中央领导人从无接触，对于中央的斗争情况更是无从想象。在到中央工作后，在林彪、江青集团肆虐的时候，他居然没有被卷进去。

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在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得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做出的“除李德生外”和“李德生一身清”的评价，真的像不少人讲的，是有着传奇色彩了。

要说奇也不奇。有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认为，李德生是靠着坚强的党性、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是一位“拉拢吹捧不能淫、打击陷害不能屈、官场浮沉不能移”，正直、厚道、朴

实、正派的共产党员。

笔者在 1969 年底，从沈阳军区政治部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处副处长，后来又在李德生身边做了三年秘书工作。许多事情，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我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告诉读者，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李德生。

一、萧望东笑问李德生，你是怎样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当中“混”过来的？

人们对李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好奇，不仅仅有普通的干部和群众，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因为不甚了解情况而难解其中之谜。

曾经担任过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萧望东中将就是其中的一位。

萧望东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时候，李德生是十二军军长。萧望东作为政治委员，很注意了解部属，同样了解李德生。他知道，李德生出生在大别山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丧母，给人家放牛为生。1930年2月，不到14岁就参加了红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担任过7年战士，尔后从排长到军长，担任过各级主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革命战争中，他能攻善守，打过许多大仗、恶仗，负过六次伤，立过多次战功。在刘邓大军中，他带的部队，是经常用来完成艰巨任务的尖刀、拳头，常常出奇制胜，素有盛名。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作战间隙中学习理论、文化，思想、理论水平都有提高。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1955年担任十二军军长，1957年底进入我军最高军事学府高等

军事学院学习两年半。回部队后，硬是在连队蹲点一年，总结了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解决了和平时期军队通过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大难题。郭兴福教学法先在南京军区推广，后来又在全军推广。萧望东觉得，作为军级指挥员，李德生能打仗、能治军，在领导班子里很顾大局，很讲团结，作为一位陆军军长，是值得称道的。

就是这样一位军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点将，调到中央工作，先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在全军的军一级指挥员中，是绝无仅有的。李德生在军队中的经历，还不好和林彪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他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也不好和“四人帮”那帮耍笔杆子的黑秀才比。然而他与那些人共事多年，先后经历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艰苦斗争，竟然一尘不染。在林彪密谋反革命政变的关键时刻，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直面交锋，大义凛然。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一位军级指挥员，突然到中央工作，中央的领导人不熟悉，中央的历史情况不熟悉，中央的现状不熟悉，就连中央的工作方式方法也不熟悉。工作中遇到难题，可想而知。在复杂的斗争中，不可能像在下面工作，事事有上级指点，而是要靠自己的党性、悟性，去应对各种难题。萧望东认为李德生这一段经历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研究，值得总结，值得人们，尤其是做领导工作的人们借鉴。

萧望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有切身体会，或者说有切肤之痛。

这位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将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担任过从连队到大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国

家文化部改组，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文化部领导同志“下台”，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萧望东，被中央指名调到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后来又被任命为代部长。人是调来了，但他很难理解毛泽东对于文化部不管文化的批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按照党对文化工作的一贯方针、原则办事情，结果行不通，同样受到种种批评和刁难。“文化大革命”开始，矛头首先指向“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是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文化大革命”居然是大革文化的命！文化部老的领导被“打倒”了，他虽然到任不久，没有被“打倒”，也受尽冲击。到了1967年上半年，他同国务院一些部长们先后被周恩来接到中南海“避难”，才少受批斗之苦。直到林彪事件之后，1972年，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有了新的批示，他才回到军队，到济南军区担任政治委员。与萧望东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过种种冲击。因此，萧望东不由得想到李德生，在与林彪集团斗争，与“四人帮”斗争中，他是怎么闯过来的？

萧望东终于有了一次机会。那是在1977年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萧望东向李德生提出自己的疑问。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召开大量会议，解决各方面的问题。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以大刀阔斧的气魄，抓拨乱反正的工作。12月，在京西宾馆出席召开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提出全面解决军队建设方面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次会议“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

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历史地全面地看李德生，“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也要看他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的表现。有的人

先是跟着林彪，后来又跟着‘四人帮’干坏事、犯错误，这也是历史嘛！我们军队的老同志很多，总的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朴实、正派。当然现在也有少数人有点变罗。”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到会同志的拥护，引起大家的共鸣。在这种气氛下，萧望东终于有机会向李德生当面提出问题了。

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京西宾馆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坐落在北京西郊（现在已经成了市区了），13层高楼共拥有400套宽敞的客房，有一座可容纳近千人的礼堂，有20多间会议室，大的可坐200多人，小的也可以容纳20多人，还有通信、餐厅等各种服务设施。它自成院落，警卫严密，保密条件好，很适合召开大中规模的重要会议。不仅军队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常在这里召开。“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外地负责同志，被中央调来北京，为防止造反派的揪斗，多住在这里。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一些高级干部从被监禁的地方，回到北京，等待落实政策，也都先到京西宾馆暂住。可以说，京西宾馆，从建成起，就是我们党和军队一些重要历史的“见证”。粉碎“四人帮”后，老同志们重住京西宾馆，又是一番心情，不免感慨万千。

京西宾馆院内，有一片树木婆娑的小花园。住宾馆的客人，早晚常常在这里散步。此时，人们心情舒畅，一早一晚，散步的人络绎不绝。

一次散步的时候，萧望东和李德生走到一起，二人谈笑一阵，萧望东引入正题。他先是谈到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同经历，接着讲到会议讨论中人们常常谈到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朴实、正派的同志，许多人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了；继续工作的人，一点错误没有，很困难，很不容易。尤其从下边调到中央工作，对于中央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都不了解，许多复杂的难

题，很难作出判断，容易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果有了私心，就更危险了。萧望东在国家文化部尚有体会，在中央工作岂不更难。

谈到这里，作为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萧望东以政治家的特有幽默，风趣地笑问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你呀，你是怎样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间‘混’过来的呀？”他不讲怎么“闯”过来，而是用了一个“混”字，想引起李德生的话题。

李德生对这位年长自己6岁的老领导，素来尊重，没有想到他在这样轻松的场合，以轻松的口吻，提出这么严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人们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李德生一生从来没有讲自己功绩、诉自己委屈的习惯。对于这位老领导，他报以灿烂一笑，以他独有的朴实无华，回答了一句很幽默的话：“可不是混过来的，也混不过来啊！”引得二人哈哈大笑。

萧望东熟知李德生的性格，他虽然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是他几年经历的绝妙概括。萧望东不再追问，他在回味这句话背后的酸甜苦辣。

这句话，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读李德生“文化大革命”之谜。那么复杂的经历，只讲了一句话，反映了他一贯不宣扬自己，不锋芒毕露，谦虚待人，谨慎处事的特色。这种朴实的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无形中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而这一句话的内容，又反映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态度，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无论大事小事，他是严肃认真的，坚持原则的，不随风摇摆，不以势凌人。应当说，他不是“混”过来的，而是一身正气“走”过来，坚贞不屈“闯”过来的。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进入李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传奇般的故事的正传了。

二、毛泽东急调十二军，周恩来 召见李德生

1967年7月，即“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李德生奉毛泽东和党中央之命，领导十二军和安徽驻军参加安徽的“三支两军”。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正式展开的。

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发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毛泽东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作了十分严重的估计。他担心在中国会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1965年10月，他就提出，“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他还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这样一个错误估计出发，他决定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于是，他发动了所谓“风雷磅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甚至歌颂这是“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这场“大革命”，几乎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上自党和国家

领导人，下到各级干部、各界人士和几亿人民群众。群众里面，有的造反，有的“保皇”，有的逍遥；而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受尽迫害，或者长期靠边站。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10年间，人人都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扮演各自的角色。

至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在1966年8月5日，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斗争首先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展开，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有了很大变动。党的八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等先后被“打倒”，有的被迫害致死。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仍然留在中央政治局或新选进政治局的，有几位老同志，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实际上他们并不参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陈毅、李富春，虽然保留中央委员，却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实际上是“靠边站”了。仍然留在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等，困难重重。他们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的精神和“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的高超斗争艺术，运用毛泽东许多纠正“文化大革命”具体错误的主张，抵制极左思潮，处理复杂问题，与林彪、江青集团巧妙地进行斗争，力求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反复冲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许多工厂停产半停产；所有的学校“停课闹革命”；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争当“革命左派”，争“以我为核心”，争着“夺权”。一时间，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横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日益升温，武斗

现象十分普遍。对人们造成的伤害，给党和国家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

到了 1967 年 1 月，张春桥、姚文元操纵王洪文组织的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随后，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就出现了。各地群众组织在“夺权”中越发争得不可开交，很快形成两大派或者三大派，派性斗争造成尖锐对立。“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够用了，发展为大闹派性，大打出手，由棍棒刀斧的冷兵器，发展到抢夺部队枪支火炮的热兵器。“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为一场“武化大革命”。这种状况，毛泽东本人也承认，“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毛泽东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只搞一年，由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已经收不了场了。

各地的党委、政府瘫痪、半瘫痪了，中央不得不派解放军出来，应付当时的混乱局面。到 1967 年 3 月，仅在华东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就有浙江、江苏、安徽三个省。

浙江省的军事管制，是由浙江省军区和当地驻军负责的；江苏省是由南京军区直接负责。而安徽省，则是由南京军区先后派两位副司令员去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统一驻地海陆空三军的领导。

要说驻地军队，奉中央之命介入“文化大革命”，安徽省是头一家。

1967 年 1 月 21 日，安徽省造反派在上海“夺权”得逞的蛊惑下，要召开 15 万到 20 万人的大会，要求军队派部队警卫会场秩序，说是“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当时，军队没有介入

地方“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南京军区党委不敢拖延，立即向党中央发出紧急请示报告。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1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后，毛泽东解释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紧接着，毛泽东又要求军队支持工业、支持农业，对学生实行军事训练，对一些部门、单位实行军事管制。于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任务，统称“三支两军”。可以说，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从安徽发轫的。可是，军队“支左”也好，实行军事管制也好，都没能够改变安徽的混乱局面。

安徽省的一派群众组织，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省政府的权。夺权没有得到中央承认。于是，一派说夺权好得很，另一派说夺权好个屁。一派简称“好派”，另一派简称“屁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为争“左派”，为争“夺权”的是非，争吵不休，武斗不断升级。

安徽是华东重要能源煤炭的生产基地，又是扼守长江航运、津浦铁路的咽喉之地。那里的武斗规模，在全国武斗严重的省份中名列前茅。武斗影响了工农业生产，淮南煤矿生产停顿，波及华东数省市，各地频频向国务院告急。尽管1967年3月27日、4月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了两个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制订了五条有关群众组织的政策性规定，然而由于形势的恶劣发展，群众组织依然对立，特别是受到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影响，形势更趋严峻。

当时南京军区野战部队，有驻在浙江的，有驻在苏南的，而驻

江苏北部地区的十二军，当地局势比较稳定。7月下旬，在上海的毛泽东亲自决定，立即调十二军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并且交代在北京的周恩来，直接向十二军布置任务。

1967年7月28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通知南京军区，紧急通知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到北京受领任务。南京军区电话打到苏北淮阴十二军军部，要求李德生军长第二天中午赶到盐城空军机场，北京将有专机来接。

李德生接到这个显然不比寻常的电话通知，很感突然。他当了十二年军长、军党委书记，一般情况下，有重要任务，就是军区机关打个电话，再重要一点，也是军区分管的领导同志打来电话。军委、总部很少向军级机关直接部署任务。而现在，中央直接要他到北京受领任务，显得很不寻常。他当即向军党委常委通报，要求大家有接受新任务的准备。他听说过，抗美援朝时，毛泽东曾经找一些即将入朝作战的军长当面交代任务。“文化大革命”以来，似乎还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究竟是什么任务呢？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中央规定，可以带一名工作人员，是带司令部的参谋，还是带政治部的干事？从当前形势来看，与“文化大革命”关系很大。他要求政治部派一位干部随同他一起到北京去。

有人问，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李德生在做什么呢？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样的思想准备，有什么经验吗？这里介绍两个情况：

先讲“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作为十二军军长、党委书记，李德生领导部队在江苏省淮阴、盐城地区逐步介入了当地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按照军区的统一要求，派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到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军训。部队驻在苏北已经6年了，在帮

助群众生产、抢险救灾、组织军民联防、训练民兵中，李德生对地方干部比较熟悉，军部驻在淮阴地区清江市，对清江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的历史和现状更是熟悉。李德生认为，群众对市委、市政府提意见，军队不好干预。群众组织批斗市委书记江希缇，他和军党委的领导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么多年，江书记作为领导干部，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运动来了，群众批评，也是应该的。但是不管怎样，都要按党的政策办事。所以每次批判大会之后，他都指示部队把江书记带回军部招待所保护起来。为了防止市委、市政府的机要部门受到冲击，李德生指派部队加以警卫；群众组织打派仗，游行示威，很少动用冷兵器。苏北交通不便，外地来串联的学生不多，局势还是相对稳定一些。

再讲一讲李德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曾经按照中央和军队的统一要求，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即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他亲自带工作队到江苏省淮阴专区清江市杨庄公社唐庄生产队蹲点。“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运动是解决四清四不清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完全一样。但是李德生没有作为框框束缚手脚。他经过反复调查，对农村贫困的现状大感意外。他向工作队的同志们说，你们看，这么小的一个穷村子，很多人家靠吃红薯藤和野菜充饥度日，全家只有一床被子，有的人家，一床被子都没有，晚上钻进稻草窝里挨冻。老百姓穷，干部也穷，队长家里也不怎么样，哪个干部像“走资派”？没有“走资派”，不要非抓出个“走资派”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这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身接触到的。共产党干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这个非抓不可。文件不是讲了，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吗，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也有“要看是

增产还是减产”吗？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让群众把肚子吃饱。有的工作队员说，这里的农民吃红薯习惯了。李德生说，我小时候也吃红薯，可是有了大米白面，还不是照样喜欢吃。社教工作队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上，这既符合实际，也不违背文件精神。李德生带领工作队成员到地里去，和农民一起深挖地，积肥料，改良土壤。过去地里缺肥，有一块地 30 亩，只打千把斤粮食。工作队组织全村劳力，把村里几十年没有干过的水塘抽干，罱塘泥挑到地里，改旱地为水田，当年水稻亩产达到 1200 斤。还组织农民种棉花，种蔬菜，当年就解决了全村男女老少的棉衣棉被问题，解决了买日用品的零花钱问题。8 个月后，工作队离开唐庄，人们依依不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到唐庄煽动群众揪工作队，说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百姓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资反路线”，但是谁要揪我们的工作队，我们就用扁担同他拼。

这就是他实事求是地处理运动中复杂问题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准备。

回过头来说 7 月 29 日上午，李德生带了政治部秘书处长，赶到盐城空军机场。只见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经到了机场，他也是接到通知，从合肥赶来，同机前往北京的。一架专机专门接住在两个省的两位军队领导干部，这就使李德生大体想到即将受领的任务了。

空军伊尔 14 飞机，从盐城机场腾空而起。机上只有四位乘客。李德生利用飞行期间，和严光谈起了安徽的情况。严光介绍说，安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等领导同志，几乎都被“打倒”了；两派群众为了夺权，争得势不两立，武斗不断升级；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形势很严峻。有的群众组织认为，

省军区、军管会有倾向性，不再听军管会的招呼，因而军管会很难控制局面。听了介绍，李德生不由得同安徽的同志一起为形势的严峻而担心。

飞行一个多小时，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中央办公厅已经派人来迎接。他们下了飞机，乘汽车进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德生还是第一次进京。过去，他多次到过北京，并且在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多。他印象里的北京，是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心脏，是全国人民向往的神圣的地方。现在，他从汽车里看马路两旁的情景，没有想到竟然这么乱糟糟的。

此时，正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四天前，7月25日，在林彪、江青策划下，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所谓欢迎王力“胜利”归来大会。一路上，李德生只见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和造反派的旗帜，一辆辆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狂喊着“打倒陈再道”，“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中南海高墙外面，搭着大大小小的帐篷，有各式各样的“揪刘（少奇）指挥部”。看到北京这种场面，他体会到严光的忧心忡忡，也越发增加了对运动的“不理解”。

李德生熟悉淮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觉得有许多过火的地方。他以为，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形势会比淮阴好些。不料看到情况居然比淮阴还要乱，颇感意外。尤其想不到的是党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已经是红卫兵“兵临城下”了。到了京西宾馆，只见喊着“打倒陈再道”的大卡车，围着宾馆转圈。李德生在淮阴虽然也看到造反派游行，“声援”武汉造反派，但比起北京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哪里知道，这是林彪、江青借此机会“做大文章”，诬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是所谓“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他们同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企图



1938年，李德生（中）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特务连连长。他曾率连队在响堂铺伏击战中痛打日军运输车队，炸毁第一辆汽车，同敌人展开肉搏。

达到在军内清除异己力量的目的。正是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肆无忌惮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的流血武斗升级，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李德生、严光到了京西宾馆，各自住下，吃过晚饭，按时赶到人民大会堂。只见周恩来正在北大厅和一些人谈话。周恩来见他们

来到，同二人握手后，热情地说：“你们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谈吧。”

李德生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只见约 20 张沙发摆成一圈，茶几上摆有铅笔白纸。一切一丝不苟，一切井然有序，和大街上乱哄哄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李德生见到已经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是认识的。他和严光向他们敬礼致敬，相互握手。周恩来又介绍在座的一人说：“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同志。”李德生只知道他是中央文革的笔杆子，写过许多大批判文章，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却未见过其人。李德生打量此人，只见他 40 岁光景，头顶微秃，面无表情。

大家就座后，周恩来开门见山，扼要地介绍了安徽形势。

他说，安徽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的影响下，1月 26 日，少数群众组织夺了省委的权。但是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没有批准这个夺权行动。3月 27 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钩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后来钱钩同志身体不好，又由副司令员廖容标同志主持军管会的工作。但是，围绕夺权，一部分群众组织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部分群众组织反对“一·二六”夺权，认为夺权好个屁。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在全省串连，形成了全省范围内的两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中央 3 月 27 日的决定，要求在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班子，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做法。4月 1 日，中央又就安徽问题作出五条决定，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

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可是近来安徽的武斗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李德生听了，马上想到，这些情况，应当说严光是了解的。显然，周恩来主要是讲给自己听的。果然，周恩来对李德生说，详细情况，严光同志很熟悉，他可以向你介绍。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党中央决定，十二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这紧急时刻，派十二军到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李德生第一次面对面地聆听周恩来交代任务。他望着周恩来略为消瘦的面庞，目光依然炯炯有神。他哪里知道，此时的周恩来，正处在极为困难的境地。他要及时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对江青等的极左主张要尽可能地加以遏制，恰当地提出避免因动乱造成更大损失的意见，力求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2天前，毛泽东到南方视察，第一站到武汉，周恩来4天内两次飞赴武汉，安排毛泽东的住地安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回北京后，连续处理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地的问题，以及大量的内政外交事务。就在29日当天，清华大学造反派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抢走大批机密文件。周恩来亲自处理，指示进入徐向前家的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帅及其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抢走的东西全部追回。刚才，他还和有关人员开讨论武汉问题。

周恩来说：华东几省，斗争总是反反复复，现在毛主席决定调十二军到安徽，野战部队的同志与造反派不同，把大家的思想工作做好了，他们是会贯彻中央的正确意见的。他希望十二军部队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李德生边听边做记录，前面的话，他记了要点，最后这一句，他认认真真地记了 22 个大字：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周恩来请李富春副总理讲话。

李富春着重谈了安徽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安徽省有 3000 多万人口，是农业大省，工业比重也很大。淮南的煤，是华东，特别是上海工业生产和电力的命脉。合肥、马鞍山产钢铁，铜陵产铜，都是工业原料的重要生产基地。现在武斗升级，工厂停产，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去打派仗，搞武斗，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十二军到安徽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制止武斗，让工人回到生产第一线，尽快恢复生产。

周恩来又请杨成武代总长讲话。

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刚刚回到北京。他从兵力部署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包括部队开进顺序，进驻区域，携带哪些武器装备，组织好留守处，看管好营房和留下的重型武器装备，管理好家属子女，继续抓好农副业生产。并且指出，十二军到达安徽后，所有驻皖各军兵种部队和省军区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统归十二军领导，安徽省军区的两个独立师也归十二军指挥。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

周恩来插话说：“李德生同志，十二军的‘三支两军’情况，今后不必经过南京军区转，可以直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你们遇到什么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的，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这一条对于李德生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后来，他在安徽遇到棘手的重大问题，都是直接电话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每次都及时作出明确指示。

杨成武最后强调，十二军到安徽后，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内军外的团结。

有意思的是那位显赫一时的姚文元，虽然参加了会议，在周恩来请他发言时，却貌似谦恭，始终一言未发。这个以写文章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的刀笔吏，为人阴险得很。几个月前，他曾经借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讲话的机会，影射周恩来“折中、公允、调和”。听了周恩来对安徽工作的指示，他是怎么想的，是否又要做什么鬼事？李德生第一次看到这位“文痞”，当时印象不深。知道他的为人阴险，更是后来的事了。

考虑问题周到的周恩来又问李德生：“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德生心想，尽管对于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会遇到许多一时难以想象的问题，然而中央领导同志已经讲得很全面，很具体了，我们还没有去实践，很难提出切合实际的问题。想到这里，他回答说：“我们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用一周时间，完成准备工作。”

李德生提出了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他请示说：“我们十二军原来担负的苏北海防任务是不是继续担任？部队开赴安徽，苏北有了情况怎么办？”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周恩来郑重地说：“仗，恐怕十年内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请杨成武同志同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负，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听到周恩来的明确指示，李德生心中踏实

了。“大仗打不起来，一般情况，可以交给民兵去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自从十二军到苏北后，6年里，每次部队组织沿海防御演习，李德生都要求司令部组织民兵参加，并且在防御预案里面，把一些次要方向的小规模的“战斗任务”，交给当地武装部，组织民兵连、民兵营担任。拥政爱民、军民联防，在李德生的军事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943年，他担任太行二分区三十团团长时，军政军民关系搞得好，团里有一个连队，就是以英勇杀敌、爱护群众的团政治委员名字命名的，叫“马定夫爱民模范连”。十二军进驻苏北后，军民联防比较落实，出现第一〇四团二连军民联防模范连队，多次受到军区和总部的表扬和推广经验。对于民兵的实战能力，部队的同志心中有底。李德生很高兴的是，中央有了这个明确指示，十二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就减少了后顾之忧。

会议开得很紧凑，大约一个小时，会见结束。周恩来握着李德生的手叮嘱说：“十二军的任务，紧迫，繁重！”

周恩来的交代，对于李德生在安徽的“三支两军”，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李德生回到京西宾馆，请严光详细介绍安徽情况。严光说，驻安徽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有的遇到挫折，有的有错误，最大的问题是刚介入时对于群众组织多少有了倾向性。一开始形成的印象，在群众中很难改变，以至于现在很难做群众工作。从军队来说，关键是怎样按周总理的指示，把驻皖的陆军、海军、空军、二炮和一些总部所属部队，统统团结起来，思想认识一致，共同搞好“三支两军”。

战争年代，李德生接受任务后，就会处于一种精神高度亢奋的状态，常常夜以继日地琢磨上级的作战命令，研究敌情，勘察地形，思考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而“三支两军”不同于作战，安徽的武斗，在全国都有名气，党中央5天之内，连续两次发出决

定，也是全国仅有，可见解决安徽问题的难度。他也听说，有些“三支两军”部队支左期间，有了倾向性，不得不多次检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十二军到安徽“三支两军”，究竟应该从何下手？

李德生反复阅读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觉得是我们党的宗旨、理论的具体化，容易接受和理解。给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周恩来反复强调制止武斗，而对于武斗的两派，没有说谁是“左派群众组织”，应当支持谁；对于夺权问题，没有提打倒谁。李德生知道，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烈士的儿子，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文化大革命”一来，不知道怎么会成为安徽省“斗争”的重点，成了安徽省“头号的走资派”。但是周恩来讲话中没有提到他的问题，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应当按照这个思路来处理好安徽的问题。于是，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豁然形成：把问题“倒过来解决”。你打倒“当权派”，夺权，分派，武斗；我们倒过来，反其道而行之；“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先全力制止武斗，釜底抽薪，控制局势；再做群众工作，实现大联合；再把干部解放出来，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这样做，是符合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的。

第二天，7月30日清早，中央派专机送他们回部队。此时，李德生已经考虑好了解决安徽问题的基本路子，有了到安徽“三支两军”的通盘设想和总体部署。

回到淮阴，李德生同政治委员张文碧商量后，立即召开十二军党委常委会，传达讨论周恩来指示精神，讲了自己的体会，提出了到安徽的工作基本思路；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传达任务，部署行动计划；收拢部队，作思想动员和行动准备。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保持着高度集中统一、上下团结一致的十二

军，通过传达讨论，从军党委到各支部，很快形成了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不到一周时间，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了各项准备。按照三十四师进驻皖北，三十五师进驻皖南，三十六师随军部进驻省会合肥及其周边地区的部署，分别乘车开赴安徽。

三、平息淮南武斗，毛泽东邀外宾参观

1967年8月6日起，十二军部队按计划通过公路、铁路，从苏北向安徽开进。而李德生带了一个小班子，已经提前3天，进到合肥，住在安徽省军区招待所内。

李德生到了合肥，果然感到气氛紧张、严峻。确实如同周恩来总理讲的，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箭在弦上。两派群众组织的大喇叭成天广播，互相攻击；有些高楼，窗户上垒上沙袋，成了武斗据点；街上人烟稀少，老百姓没有人敢在街上闲逛。

十二军部队进入安徽，遇到的头一件事，就是面对一触即发的大武斗。

部队遇到的第一波是，两派群众组织的文明“欢迎”。

8月7日，十二军军部一进合肥市区，就见到满街红红绿绿的标语：“欢迎六四〇八部队（十二军的代号）来安徽支左！”“拥护六四〇八部队对我们的支持！”下面落款是哪一派都有。原来十二军到安徽支左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各派都希望得到新来部队的支持，都贴出大标语。

那个时候，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的态度，军队的支持，是所有群众组织都极为重视的大事。群众组织又有一个倾向，你军队支

持我，我就拥护你；你不支持我，我就冲击你，让你犯错误，然后告你的状，甚至想尽办法把你赶跑。处在这一特殊地位，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要做到没有倾向性，而且每一个指战员都能够完全一致，是非常困难的。稍有偏差，就会出差错，犯错误。当时安徽的群众组织，有的和驻军关系好一点，希望新来的部队支持他们；有的和驻军有点矛盾，希望改变局面，得到新来部队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群众组织，竟然没有“分歧”，出现满街内容一致的标语。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

随李德生进入合肥的干部议论说：这“一致欢迎”的后面是什么文章啊？有的开玩笑说：他们“一致欢迎”，我们就一致支持嘛！

李德生听到议论，给大家说：“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啊！”

李德生的讲话，总是这么简洁明了，希望提醒大家关注“完全一致”背后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工作。

部队遇到的第二波是，两派都强烈要求部队支持“揪凶手”，实际上是要求军队支持我这一派，压制对方那一派。

先头人员炮兵室副主任王灿章、作训处参谋刘亨鎔，刚到合肥市省军管会门口，就见人山人海。一边是遍地花圈，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音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说是自己一派的人被对方打死了，要求军管会“揪出凶手，还我战友”。另一边的大喇叭则揭发对方挑起武斗，打伤群众，要求军管会出面，揪出“黑后台”。高音喇叭大打“宣传仗”，吵得附近居民不得安宁，但它预示着武斗的前奏。两派势均力敌，双方都要求军管会支持，实际上是看新来的执行军管任务的部队，你究竟支持谁，你对两派分歧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否则，引起武斗，你们也有责任。王、刘二人将情况报告李德生。李德生认为，这是合肥两派群众组织给十二军出

的第一道试卷。这时候，如果马上轻易表态，甚至有倾向性，就有可能陷到派性里面去。李德生提醒先头人员，一定要沉得住气，不要马上表态，不要具体回答问题。

由于部队对他们的“揪凶手”、“揪黑后台”的无理要求没有置理，双方只好匆匆收场了。

部队遇到的第三波是“大轴戏”，一个大规模的武斗现场。造反派看到新来的部队不表态，就打给你看看！

当军部指挥所先头设营的车辆，刚到合肥市南郊。车队突然停了下来，前面通报：造反派岗哨挡住大路，说是前面正在武斗，不让通行，“免得打了解放军！”原来满街大标语，是文的方式的“欢迎”；这里是两派武斗队，隔着大道两厢武装对峙，是以全武行来“夹道欢迎”。

指挥所用报话机报告李德生。李德生早已料到进军合肥，不会顺顺当当、平平稳稳，没有想到部队还没有进城，就遇到这么一个“入城式”。

挑起武斗和制止武斗的严峻斗争，摆在十二军面前。

李德生很清楚，对群众组织表态，不能着急；但对于制止武斗，却决不能迟疑。你退缩了，或者有倾向性了，都会失去一部分群众，以后的工作就难做了。战争年代讲初战必胜，“三支两军”的第一着棋也绝对不能输，否则，后面工作的难度将大大增加。李德生以指挥战斗的方式，下达了命令，让参谋通知部队，按原计划迅速前进。并且指示部队，一定要整齐、威武，保持分列式的队形，直插两派武斗群众中间；同时要人人开口，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以正确的宣传和严肃的军威，形成一种气势，来制止武斗。前进中，一定要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决不开枪，不带倾向性，不纠缠两派的具体是非。

部队接到命令，迅速跳下卡车，一队队整齐的队伍，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穿过两派对峙的大路，阔步前进。正在对骂的两派群众，还从来没有见过野战部队这副气势，武斗队员也惊诧地把枪撂在一边，观看起来。霎时间，部队隔断了剑拔弩张的两派武斗群众，迫使双方偃旗息鼓。合肥群众得出一个“六四〇八部队不怕武斗，六四〇八部队不支持武斗”的第一印象。

顺利通过全武行夹道欢迎的城郊，十二军部队即将进入合肥市区。被武斗扰得寝食不安的合肥百姓，自然高兴。他们对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候，得知解放军大部队即将进城，人人翘首以待。开始听说部队被武斗的造反派挡在城外，人心忧虑。没有想到六四〇八部队这么快就刹住武斗气焰，这么快就开进城里。消息传来，成千上万群众自发涌上街头，热烈鼓掌欢迎，有的放起挂挂鞭炮。市区热闹地段长江路上，鞭炮燃放后的纸屑，铺了满地。战士们看到这个动人场面，感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制止武斗的责任感和信心大增。先头进入市区的参谋们看到这一场面，也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欢迎！

第一天的武斗场面，是个“下马威”，但没有吓唬住十二军，武斗头头们于心不甘。第二天，8月8日傍晚，两派武斗队又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展开更大规模的武斗。如果说头一天，双方只是剑拔弩张，蓄势待发，今天可是动的真枪真刀，直接交火了。一时间，冷热兵器齐上阵，乒乒乓乓，子弹横飞。造反派还将几个大油桶灌满汽油，推到大楼下面，准备随时点燃。消息传来，李德生决定，立即派出几十名机关干部和三个建制连队，火速赶到武斗现场，去宣传群众，制止武斗。他特意交代：告诉干部，不要以为有枪声就是打仗。这不是打仗，这是做群众工作，是在枪炮声中做群众工作！

指挥员制止武斗的决心硬，派去的干部战士行动更不含糊。只见他们冒着流弹袭击的危险，齐声高呼制止武斗的口号，直插到两派武斗阵地的中间。武斗双方都没有想到解放军战士们如此勇敢，不得不停止射击。大家都明白，现在开枪打伤了解放军战士，被对方抓住，可就输了理了，“响当当造反派”的帽子就戴不成了，夺权就要丢分，谁也不敢再开枪。造反派略一迟疑，部队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主动出击，来个迅雷不及掩耳，迅速冲上对峙的双方大楼，拆毁两派武斗队用桌椅板凳、沙包石块垒起的武斗工事，收缴双方冷热武器，救出困守在大楼里的学生。部队在拆毁工事的同时，带队的干部进入武斗指挥部，对武斗骨干展开宣传教育工作；战士们也向武斗队员们做思想工作。指战员们宣传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凌晨，终于彻底平息了这场武斗。

安徽各地的两派组织，都是和省会合肥有联系的，甚至是听合肥造反派总部指挥的。十二军在合肥制止武斗的第一仗成功了，消息很快传遍全省各地。军部同时向各师团通报合肥制止武斗的经验。随后，部队在安徽各地都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勇敢的行动和热情的宣传，制止了多起大小武斗。

在平息各次武斗中，十二军有三位同志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记载在陆军十二军军史里面：吴金余、刘必云、倪美芝。还有不少同志负了伤。这是这场“全面内战”中，十二军付出的血的代价！

烈士家属来队，李德生指示政治部做好抚恤工作。他心情沉痛地讲，他们是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应当同作战牺牲的烈士一样看待。

安徽武斗的热点，除了合肥，北有淮南，南有芜湖。下面先介

绍十二军在淮南制止造反派出动火车搞武斗的情形。

淮南市是华东煤炭基地。煤矿的工人，大多是附近的农民。但是里面也有少数游手好闲之徒，乘“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以“造反”、“夺权”的名义，搞起打、砸、抢，为非作歹，谋取私利。矿山的各种工具，都被他们拿来作为武斗的冷兵器。因此，那里的武斗组织很有名气，武斗的规模也大。他们不仅在本地大打出手，还到合肥等地“出击”。武斗队的一个头头叫张家祥，经常开着火车出去武斗，曾经到炉桥的拖拉机厂，抢走制造拖拉机的原材料白金20公斤。淮南武斗的混乱局面，使工人无心生产，造成煤矿停工、减产。李德生专门对三十四师领导同志交代，你们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第一位的是迅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不仅仅是安徽的大事，也是党中央关心的大事。它关乎着华东生产形势的大局。

三十四师到达淮南市后，严厉制止武斗。但是造反派拒绝交出武器，连续冲击三十四师师部。他们的意图是，把事态闹大，给部队点厉害看看，逼你支持我夺权。他们再次策划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三十四师部队劝阻无效，紧急报告了军部。

十二军党委立即开会研究，大家提出各种办法。李德生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坚决制止武斗队离开淮南，决不能把武斗的风潮闹到外地。我看，必要时，组织部队坐在火车轨道上，阻止火车开出。有人担心，这样做不是“卧轨”吗？李德生说，说是“卧轨”也可以。他们采取蛮办法，我们也要有一股子狠劲，显示我们制止武斗的决心，他们是狠不过我们的！第一他们不会得到群众支持，心里会发虚；第二他们总是想得到解放军的“支持”，事情不敢做绝。我们是为了贯彻中央精神，制止武斗，道理充分得很。我们硬了，他们就会软下来。“三支两军”，解放军上了第一线，我们不坚定，局面怎么扭转？在危急关头，应当像战争年代那样，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要不然，我们的任务怎么完成？

“卧轨！”三十四师接到命令，向指战员们传达了李德生的指示。部队同志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整齐齐躺在火车前进方向的轨道上。造成了强大的声势。有些群众听说了，胆子大的，跑到车站来观看，人群越聚越多。火车司机看到路轨上躺着解放军，路边上有愤怒的老百姓，被这种气势镇住了，不敢开动机车。造反派头头一看，火车出动，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多群众面前，压死压伤大批解放军，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负责现场指挥的武斗队第二号人物徐某不敢干了，只好下令撤兵。武斗队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这时，三十四师乘势大做武斗队员的思想工作，又按照军党委的指示，到矿区、到农村，耐心做矿工家属的工作，动员他们把参加武斗队的家人劝说回来。在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武斗队开始动摇了，不长时间，第二号头头带上 20 公斤白金，跑到合肥，向军管会坦白交代。淮南煤矿的武斗队终于瓦解散伙，武斗的硝烟随之烟消云散。

淮南市的形势得到控制后，三十四师领导干部、机关干部带着部队下到煤矿掌子面，和煤矿工人一起，展开夺煤大战。在夺煤大战中，战士汪福林，为了抢救一名矿工，不幸牺牲。部队边支援恢复生产，边做宣传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工人群众里面的积极分子发动起来了，生产迅速得到恢复。淮南局面有了明显改观。

再说皖南的芜湖市，市内有所规模很大的芜湖造船厂，它担负着为海军建造导弹快艇的重要任务。1958 年 9 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经到造船厂参观。这就更增加了这个厂在安徽、在全国的知名度。芜湖的群众组织都把能够控制芜湖造船厂，作为进入省、市革委会的筹码。

“文化大革命”初期，芜湖市两派群众组织因“夺权”发生过

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伤亡很大，有的被打得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串连去了，有的抬着尸体到省里告状，从此两派结成“冤家”，对立情绪极为严重。芜湖市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曾经被中央调到北京谈判，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三十五师进驻芜湖后，他们坚决制止武斗，强制群众组织必须交出抢夺的部队武器，但是遇到不小的阻力。李德生要求三十五师将思想工作同依法处理结合起来，特别要做好芜湖造船厂群众的思想工作，芜湖形势有所好转。

前面说到三十四师官兵在淮南市制止武斗，用了“卧轨”的办法，遏制了造反派的武斗气焰，还有一个三十五师在皖南屯溪市（今黄山市）“卧路”的故事。屯溪没有铁路，武斗组织要开着大卡车出去武斗。三十五师运用军部介绍的淮南经验，同样组织部队高喊口号，整队横卧在公路上，阻止汽车开动。造反派不敢贸然开车强行通过，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三三两两下得车来，跑在战士耳边放枪，企图把战士们吓跑。不料战士们不为所动，这一手并不灵光。造反派发怒，动手打战士，战士们无一人还手，依然横卧在公路上。这边枪声大作，引起不少群众前来围观。在众多愤怒群众面前，造反派不敢耍蛮，只好把武斗车辆掉转头开回去了。

李德生指挥制止武斗，有“硬”的一手，更有“软”的一手。这就是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李德生深知，部队穿越两派交火的武斗地带，“卧轨”，“卧路”，这些都是应急之举，虽是一着险棋，却不是治本的办法；或者说只能是制止武斗的开篇之作，不是正文。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靠思想政治工作。他广泛运用报纸、广播等宣传工具，以及派出大批干部战士，直接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更要求军队的

各级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做各派头头的思想工作。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这么做。

在到达安徽不满一个月的时间里，李德生先后十多次到两派群众组织的总部去，做这些总部头头和武斗队头头的思想教育工作。那段时间里，李德生常常轻车简从，穿过插着匕首，别着手枪，挎着手榴弹，拿着大刀长矛的武斗队员，找群众组织总部和武斗队头头们谈话。他反复对他们说：“你们认为干部都是走资派，别的群众组织都是保守派，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是这样吗？这么一来，除了你们，天下还有好人吗？这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夺国民党的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你们只靠少部分人是夺不了权的，夺了权也代表不了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大革命不是打派仗，群众组织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不管你们怎么说，武斗都是错误的。”那些头头们看到一位军长，一位老红军，这么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又讲得入情人理，不少人被感动、被说服了。有那么几个“造反”精神特强的人，即使心有不甘，也不敢当众表露出来。

各个部队每天都必须汇报宣传群众的具体情况，军部及时给以指导。时间不长，造反派组织和武斗队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李德生做思想工作，态度鲜明，平易近人，语言朴实，以理服人，很快能得到人们的信服。他常说，不管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在搞武斗这个问题上，你们谁都占不住理。这就从思想上消除了武斗的基础。在分别做思想工作之后，李德生不失时机地决定，把各派头头召集到一起，专门谈制止武斗的问题。一方面进一步表明十二军对制止武斗的态度和决心；另一方面要求各派对停止武斗，面对面地表明态度和作出保证，起到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作用。

各派头头听说李军长请，都觉得挺有面子，谁也不能不来。也有的担心，李军长是不是摆“鸿门宴”哪？由于各派组织的头头都来参加，也由于有人心里揣着个“小兔子”，所以，座谈会开头的气氛真有点紧张。你看这些头头们进了会议室，一个个撸着袖子，抡着胳膊，戴着“红卫兵”或者什么造反组织的袖标。时值盛夏，大家忽扇着扇子，瞪着眼睛，真有点张牙舞爪的样子。在各派头头到齐后，李德生笑眯眯地到场。不少人，他见过的，都可以叫上名字，有的也知道他们所在的学校，像是老熟人。没有见过的，他逐一询问他们的姓名，是学生，工人，还是什么职业？是哪里人？李德生极强的记忆力，亲和的态度，使得人们感到亲切，气氛得到缓和。

谈到籍贯时，有的说自己是合肥人，有的说是安庆人。李德生笑着说：“18年前，我们这个部队，就是从安庆的枞阳打过长江的。我们一个师追击20天，打到浙江的义乌、东阳，解放了16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多人。我们解放义乌的时候，为了抢时间，是坐着火车追击的，一下子俘虏敌人1500多人。”他开玩笑说：“那才是真正的‘武斗’呢。”他说：“那个武斗是对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是对敌人。至于对人民，对自己的阶级弟兄，怎么能搞武斗呢？怎么能开着火车、汽车搞武斗呢？”头头们理屈，无言以对。

有的人回答说：我是金寨人。李德生说：“你们知道吗，金寨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他借题发挥：“人们都说安徽人能打仗。凤阳出了个朱元璋，朱元璋靠打仗当了皇帝，可是他不是为了人民，所以‘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啊！金寨人能打仗，他们参加红军，为人民打了天下，至今还有不少同志，在人民军队里保卫人民的江山。我们总不能像朱皇帝，搞武斗为了自己当‘皇帝’，让老百姓受苦。”



1949年3月，李德生任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4月在渡江战役中，指挥全师在安徽枞阳渡江，20天攻克皖浙两省16座城市，歼敌2万多人。这是李德生（前左二）在渡江前部署作战任务。1967年，他向安徽群众做思想工作时讲了这个故事。

李德生担任领导职务多年，很少作长篇报告，不会讲干巴巴的“道理”。这几句“家常话”和朴素的道理，使造反派头头们心悦诚服；本来气氛紧张的“群英会”，变成了以诚相待的“恳谈会”，各派都表明了停止武斗的态度。后来，群众组织的人们都愿意听李军长讲话，只要听说李军长召集会议，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

李德生制止武斗的两手，紧密结合，交替使用。在开展宣传工作、制止了大规模武斗之后，李德生要求各地部队，在继续开展思想工作的同时，采取几个重大行动：一是派小分队乘势进驻各个城

市的制高点，不再让这些地方再被武斗队利用，以控制局面，防止再次发生大型武斗；二是派出小分队，驻在交通要道，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小型的、突发的武斗；三是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防止武斗人员、武斗车辆外出或者搞串联活动。这几条强制性的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得制止武斗落到实处，全省的形势基本得到控制，并且很快好转。

在制止武斗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及时给李德生指示。

1967年9月，李德生正在北京汇报工作。9月5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命令指出，对于违犯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并且规定，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

当天，周恩来接见李德生，当面向他讲述了“九五命令”。周恩来要求十二军在安徽一定要制止武斗和夺枪行为，建立革命秩序。周恩来专门嘱咐：军队执行“九五命令”时要慎重，不要出问题。处理群众组织冲击部队的事件，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绝不能草率从事。必要时的自卫反击，特别是开枪，要报军以上机关批准。收缴群众手中的武器时，不要轻易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

李德生回京西宾馆，一路上看到社会秩序比起一个多月前好了一些，但是京西宾馆里仍然住了不少各地来京，等着解决问题的领导同志和群众组织代表，这说明，全国的形势还是不稳定的。党中央现在发布“九五命令”，就是要力求稳定形势，纠正“左”的倾向。但是周恩来提醒，执行中要特别慎重，这是极端重要的。

李德生回到安徽，和党委同志一起，研究如何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贯彻执行“九五命令”。大家认为，尽管一个月来遇到一些群众组织多次冲击，但是从安徽的形势看，目前还不到非动用武力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九五命令”，引导群众自觉执行中央命令；部队不能因为有了“九五命令”，在做群众工作时，就可以粗心大意，还是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遇到群众组织武斗、冲击部队的时候，千万不能擅自鸣枪；各级领导干部要上第一线，直接同群众见面。至于鸣枪警告，逮捕坏头头，都必须报告军党委批准。李德生还特别强调，部队不怕流血牺牲制止武斗，这是一种过硬；能不能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做好群众的工作，也是一种过硬。一定要严格要求，作到令行禁止。

依据“九五命令”，十二军收缴了造反派大批武器，有的造反派不服，连续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打伤了十二军的干部，部队反复劝说无效。李德生觉得是否动用兵力，如何掌握时机，没有把握。1967年11月28日，他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当即批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967年12月初，芜湖四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他们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武器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工作。12月10日，李德生报告后，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军管会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总是强调先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对于安徽将政治思想工作同依法处理结合起来，起到重大指导作用。把思想工作贯穿在制止武斗的全过程，把强行制止武斗同细致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是十二军进入安徽制止武斗的一大特点。

军党委还作了一个决定，以军管会名义，大量翻印“九五命令”，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怎么才能使宣传声势大、效果好呢？李德生采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措施。

李德生主持省军管会开会研究确定，部队的宣传车要上街，同时要动员各派群众组织的宣传车交替上街。这样做，不仅从早到晚都有宣传车上街流动宣传，造成更大的声势；而且让群众看到，军队和各个群众组织都是一个声音，都是宣传、拥护“九五命令”的。这样做，宣传的作用就大了，监督的力量也大了。谁要口是行非，就输了理，输了群众。与此同时，部队派出大批武器收缴小分队，边宣传，边收缴，对于拒绝上缴的，在宣传的基础上强制收缴。有了强大的宣传声势，谁也不敢公开拒绝部队收缴武器。经过大量工作，安徽省在1967年9、10、11月三个月内，收缴各种枪支29 876支，火炮290门，各种车辆51台，还有大量弹药和冷兵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九五命令”宣传后几天内收缴的。群众组织还自行揭发指挥武斗的坏头头，把他们送到军管会看守。没有头头，没有武器，喧嚣一时席卷全省的武斗，迅速被遏制住了。

安徽省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将有关情况登载后，9月13日，毛泽东亲自批转全国。这时，距十二军进入安徽只有37天。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特

意请努马扎莱到安徽省淮南煤矿参观。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努马扎莱到了淮南。努马扎莱看到了淮南怎么分成两派，怎么制止武斗的，又怎么实现大联合的，他还下到矿井，看到了煤矿正常生产的情况。

四、紧张、紧凑的“三部曲”

李德生带领十二军进入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30多天遏制了武斗，40多天实现各派“大联合”，接着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前后8个多月，成立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在李德生领导下，“制武斗、大联合、三结合”这三部曲，一环紧扣一环，进展顺利，发展健康，演绎得有声有色。

贯穿这“三部曲”的，是高举团结的旗帜去做思想工作。

团结，首先从军队做起。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很自觉，很认真的，也是有他几十年实践基础的。战争年代，李德生领导的部队，从来不允许与友邻部队争俘虏、争战功。比如说，十二军的主力部队在李德生的率领下，参加了朝鲜上甘岭战役的第二、三阶段，歼敌1.1万多人，大约占整个战役歼敌总数的44%。可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十二军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军里有人有意见。李德生当时向大家说，都是志愿军的战绩，大家英勇奋斗的成绩是跑不了的，制止了不利团结的议论。

十二军到安徽参加“三支两军”前，李德生给大家讲，安徽有省军区、二炮一个基地这样两个军级单位，其中省军区就有两个师的部队，还有总部、海军、空军和南京军区的师、团级单位和部队，他们在安徽的时间长，情况熟。我们的工作要做好，离不开他

们，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做好工作。李德生很清楚，驻皖的军级、师级机关、部队，在参加前一段“三支两军”中，有的多少有点倾向性。很快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当由十二军来讲。而要尊重他们，重视他们前一段工作的成果，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1967年8月初，李德生先期到达合肥的时候，安徽省军区派副司令员邬兰亭出面接待。邬兰亭也是一位1930年参加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两位老熟人见面，邬兰亭却说：“我们省军区的同志欢迎十二军到安徽来，以后我们会随时向你们汇报，一切听你们的。”李德生听到这位老战友的话，敏感地意识到，十二军到安徽制止武斗，促进群众组织的联合，首先是安徽驻军要做到“大联合”，从思想上提高大家搞好团结的自觉性，从组织上保证团结的实现和巩固。他对邬兰亭诚恳地说：“我们十二军刚来，情况不熟，今后的工作，是在你们的基础上开展的，只能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团结起来，继续做好。”

李德生知道，安徽省军区的老同志不少。第二天，李德生亲自登门，看望安徽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他又请来驻皖部队的领导同志开会，到会的有第二炮兵某基地的司令员廖成美，还有各师、团级单位的领导同志。李德生坦诚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十二军到安徽来，我们实际上是二梯队。前一阶段，安徽省军区和驻皖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是在没有经验的困难条件下急促上阵的，也是做出贡献的。我们来了以后，从我开始，要向安徽省军区和所有驻皖部队学习。”李德生请每个单位派一位领导同志参加省“三支两军”的领导小组，同时派机关干部，参加军管会和“三支两军”办公室的工作。李德生的诚恳态度，把驻皖部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都很齐心、很认真地参加军管会和“三支两军”工作。

在军管会机关各个组，大体是参照各自在军队里的职务来任命负责人，谁的职务高谁当组长。有的组是十二军的同志任组长，有的组是省军区或者其他驻军部队的同志任组长。有人议论，谁谁谁过去是倾向某个造反派的。李德生听到后，严肃地批评说：“就你正确啊！他们那是过去的事了。他们会懂得，再有倾向性，做工作就没有威信了。你要是那个时候来工作，可能倾向性更厉害。现在你要是这么看人家，以正确自居，你的工作也就没有威信了。”

十二军刚到的第二天，8月8日，合肥市发生武斗，部队不熟悉市区道路，省军区的同志没有及时引路，机关有的干部认为省军区配合不够，有人啧有烦言。李德生听到了，特地在会上严肃指出：“省军区是在运动开始、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工作的，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家，他们毫无经验，有些什么缺点，不足为奇。我们要是那个时候介入，会不会也那么做？这些教训，要由他们自己来总结。人家有难处，我们要体谅。以后谁也不准背后议论。”

李德生把召开安徽驻军领导同志会议的情况和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对十二军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并且向李德生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地制止武斗，稳定局势。

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做好军队各个部队之间团结工作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他又及时组织十二军和省军区的机关干部开联席会，交流经验和意见。事后，十二军参谋长、“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林有声，专门召开十二军机关干部会议，一再提醒大家要尊重省军区的同志。省军区机关一些同志，原来觉得自己有“错误”，中央派十二军来了，脸上很不光彩。由于十二军及时做工作，严格

要求，领导做出样子，从上到下都尊重省军区的同志，不久，一些同志对十二军的戒备心理解除了。由驻皖各部队组成的军管会里，只见身穿陆、海、空军服装的同志，一起工作，遇到问题，共同讨论，思想认识统一后，分头行动。这样做，从内部讲，做到团结一致，心情愉快，关系融洽；对于做各派群众工作来说，口径一致，态度一致，谁也挑不出毛病，钻不到空子。

“三部曲”有关制止武斗的主要情况，上面一节已经讲过。下面着重介绍促进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即由军队代表、地方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的情况。

把已经严重对立的两派团结起来，实现群众组织大联合，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首先是从做各派群众组织、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团结工作做起的。李德生的做法是：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

十二军部队进入安徽，既面临着制止武斗的严重考验，也面临着复杂的“文斗”的考验。各个群众组织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施展各种伎俩，试探十二军对自己这一派的态度，有的不惜挑拨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关系，有的故意制造事端，逼着部队表态，企图达到要军队支持他们的目的。这是因为安徽驻军刚刚介入“文化大革命”，是按照“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办事的。对待群众组织，总会想到哪一派是左派，哪一派是右派？哪一派是“革命派”，哪一派是“保守派”？应当坚决支持哪一派、不支持哪一派。担心搞不好，会成为“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思想影响下，部队支左初期，很难避免有倾向性，也就很难对各派群众组织做到“一碗水端平”。十二军到安徽，群众组织都担心他们会支持对立面，都要争取十二军支持自己一派，部队同

志的一言一行，都会作为支持或不支持他们的“证明”。李德生一再要求十二军部队，我们就是不能那样做，不能给他们造成这个印象。如果出现那样局面，我们就真的会犯“方向路线错误”了。

怎么做到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就是不笼统地表示支持哪一派，而是不管哪一派，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而且要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表明这个态度。

李德生带头去实践这一主张。他亲自到各派组织的总部去，到每一派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中去。群众组织中，有人认为十二军是支持对立面的，见到李德生到来，拉出大辩论的架势，接二连三地追问：你们对安徽省的夺权怎么看？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们？你们为什么支持对立面，把屁股坐在他们那一边？李德生对这些挑衅性的责问，总是笑眯眯地耐心听着，不马上反驳，然后加以耐心地说服。他严肃而诚恳地说：我们十二军和安徽所有驻军，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于所有群众组织，一视同仁。做得对的，我们就支持；做错了的，我们都批评。希望你们看我们的行动，不要先做结论。有的群众组织认为十二军来安徽对他们有利，当着李德生的面，极力颂扬六四〇八部队，说六四〇八部队支左好得很，是支持我们的。李德生冷静地说，我们有那么好吗？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做工作难免有缺点，我们有了缺点，欢迎你们批评；你们有缺点，我们也会不客气地批评你们。我们不会无原则地支持哪一派。我们对哪一派都一样，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批评也是支持。

李德生轮流到两派去谈话，两派都找不到部队有“倾向性”的空子。

为了加强同群众组织的联系，李德生派出强有力的联络组，分别常住两派群众组织总部，负责联系和协调。开始，头头们认为是十二军派人监视他们，很有抵触。联络组成员同他们谈心，给他们

具体帮助。当两派学生因为武斗，学校一时缺粮，部队很快送来食品，而且一视同仁，送米都给米，送鱼都给鱼，按照人数多少，数量、质量都一样，没有亲疏之分。群众组织有的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的事情，是很难保密的。当他们知道十二军、军管会对双方都一样，对军队“三支两军”的认识也开始有了变化。

在同群众组织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后，军管会领导和李德生决定，从能量很大的两派众多小报抓起，要求驻两派群众组织的联络员启发和帮助他们，劝他们停办各派小报，由双方共同创办一份大联合的报纸。

小报是打派仗的工具，当时小报满天飞，在挑起武斗、制造派性方面，煽动性很大。要他们停办小报，是遏止派性的釜底抽薪，是挖了派性的根。这个工作是很难做的。李德生要求以最有效的方法，最诚恳的态度，把它做好。联络组的同志夜以继日，耐心做说服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做通了以后，功效立显。形形色色的小报停刊，新的报纸创办了。在这张报纸上，争论少了，互相对骂的内容没有了，团结、联合的内容多了。原来打派仗的小报，变成了促进大联合的有力宣传工具。

群众组织中出现违法事件，是难以避免的，处理不好，往往成为武斗的导火索，或者是冲击军队的借口。它是群众组织团结的大敌。

李德生很重视处理好这类事件。他要求，处理违法事件，统统坚持“对事不对派”。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合肥市连续发生几起造反派的纠纷和违法活动。有互相抓人的，这时，不管是哪一派，部队都毫不客气地批评警告，直至让他们把抓的人放出来为止。有开枪打死游行群众的，对此，不管是哪一派，部队都强令他们交出开枪者，交军管会依法处理。处理时，通知两派都派人到场，公开

作出公正的结论，使两派都挑不出毛病，并且要求他们回去向群众传达。

有一次，一派反映，另一派夜间巡逻时，抓了他们七八个人，其中还有女学生，要求部队让他们放人，如果不放人，就要报复，也要抓人。李德生要求联络组阻止这一派的报复行为，同时指示驻在另一派的联络组立即查明情况。开始，肇事的一方矢口否认，由于联络组已经住了一段时间，情况熟了，很快调查证实，他们确实抓了人，并且了解到关押的地点。李德生随即派出几名经常同造反派打交道的得力干部，带着医生，到关押地点救出被抓学生，同时严厉警告抓人的这一派。

不久，有一派游行时，队伍里有一个人被另一派开枪打死。顿时矛盾激化，李德生要求联络组严肃追查。在确凿证据面前，开枪的这一派群众组织不得不自己抓起凶手，亲自将他押送到公安部门。

正确和公开处理两派发生的纠纷和违法事件，这样做的结果，两派都心服口服，群众更是交口称赞，说是十二军对事不对派，把“一碗水端平”，“端得滴水不洒”。

对促进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思想宣传工作，有了初步成效；李德生适时地提议办起“万人学习班”，从而大大加快了安徽大联合、“三结合”的步伐。这在当时的安徽，也是一件大新闻，有人说是促进联合、解放干部的大手笔。

先是组织全省的群众组织骨干办学习班。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着。把各派大大小小的头头集中起来，从积极方面说，可以让他们较快地提高、统一认识；从另一方面说，就使得群众组织闹派性、搞武斗，变成“群龙无首”。头头们听说要让他们进学习班，感到这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好事，也就没有话说，都来参加了。学习

班里上大课提高认识，开小会解决具体矛盾，人们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

接着，李德生又和军管会的同志研究决定，把全省地、县以上靠边站的干部集中起来，举办干部学习班。李德生和军管会的主要领导在研究的时候，回忆起去年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曾经要求到会的领导干部在群众面前，不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十六条中也指出，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因此，办干部学习班，就是要按照这个精神，解放干部，以便实现“三结合”。李德生向干部们说，我们在解放后，工作了十几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嘛，做个检讨，什么也不会损失，而只会得到群众谅解。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问题。当然，那个时候干部的学习班，还要求干部通过学习，认识错误，检查错误，还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两个学习班学员上万人，在安徽，是有名的“万人学习班”。李德生有意识地把两个学习班结合起来。干部学习班，起到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目的。干部学习后，还要到群众组织的学习班上做检查，接受群众批评，以求取得群众的谅解；群众学习班，群众组织头头学习后，认识提高了，也要检验对干部问题是不是有了正确的认识。两个学习班相辅相成，思想统一了，解放干部也就容易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学习班，不仅仅是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的学习班，而且又是消除干部和群众之间隔阂、解放干部的学习班。

地方干部到群众组织学习班作检查，当时不能不走这一步。但是军管会向群众组织约法三章：一、不管是哪派群众组织批判干部，都必须事先报告，批准后由军管会派人参加；二、批判会不能超过3个小时，群众与批判对象距离不能少于3米，被批判对象，应当有座位坐、有水喝；三、批判会后，任何群众组织不得扣留被

批判的干部，由部队派来的战士护送他们上车，回学习班驻地。很久以后，有造反派成员醒悟说，这是给我们像野马样的“造反精神”，带上了“笼头”。

两个学习班都由军管会负责领导。干部学习班的学员主要是省、市的厅、部长以上干部，他们全部集中在合肥市江淮旅社，每人一个房间，提高伙食标准，允许家属送东西，使他们免受皮肉饥饿之苦。至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中央直接过问的领导干部，群众组织召开批判大会后，同样由军管会负责，把李葆华接到省委党校，派战士加以保护，不让群众组织派人接触。对此，在粉碎“四人帮”后，李葆华专门看望李德生，表示感谢说：“‘文化大革命’我在安徽的时候，是你们保护了我啊！”

两个学习班，相互促进。省里举办的学习班，又同地、县举办的学习班适时沟通，形成了强大的大联合、“三结合”的声势。不到两个月，群众组织大联合水到渠成，领导干部也基本得到解放。

十二军到安徽一个多月，大联合形势已经形成。1967年9月19日，两派达成协议，成立安徽省大联合委员会。李德生认为，只有学习班知道大联合、拥护大联合还不行，还必须让各派群众都知道，让全省人民都知道，使大联合得到群众的监督，才能巩固已有的成绩，防止出现新的反复。军管会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多次谈心、商量，最后在大联合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上，同两派群众组织商定，由两派群众组织共同组织一次两派群众联合大游行。两派头头听了，都很高兴，认为这是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提高自己组织声望的好机会，都决心组织好。

游行叫什么名称？头头们众说纷纭，最后统一为“拥军爱民大游行”，认为这符合8月25日中央《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

号召》精神。

游行怎么组织？有许多方案，最后有两种意见：一是两派群众各分四路纵队，中间由部队组成两路纵队，总共十路纵队，沿合肥市主要街道游行；另一个方案是两派群众各四路，并肩携手，成八路纵队游行，部队不参加游行，而是处于机动位置，准备应付突然情况。权衡利弊，大家认为，前一个方案，有点军管的味道，容易冲淡大联合的声势；后一个方案，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做到，而且体现大联合的精神，体现军队对群众的信任。“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林有声支持这一方案，并且报告正在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李德生。李德生很高兴地答复，同意采取后一方案。

游行人数怎么分配？最后确定，双方各出 10 万人，一共 20 万人。

游行的时间，一致商定在 9 月 20 日上午。

双方还商定了组织指挥、大会口号等具体事项。

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显示自己的实力和水平，都很认真、紧张、过细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9 月 20 日上午，两派群众各 10 万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举行庆祝大联合委员会成立的拥军爱民大游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上街游行是司空见惯的事，开始还有人观看，到了 1967 年春季，武斗盛行以后，各派游行队伍常有武装护卫，有的拿着长矛棍棒，有的扛着步枪、机枪，有的叼着匕首站在大卡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大打出手，伤及无辜，人们惟恐避之不及，也就很少有人观看了。

于今，两派 20 万人敲锣打鼓，彩旗招展，徒步游行，双方手牵手，笑容满面，重新把人们吸引到道路两旁观看。有人点燃鞭炮，以示祝贺。第二天，《安徽日报》出了特刊，整版刊登了大联合游行的新闻和图片，引起很大轰动。周恩来知道后，专门要求安

徽省军管会将这一天的《安徽日报》特刊加印 20 万份，派专人送到北京，由中央转给一些省、市、自治区，推广安徽的经验。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此时正在安徽省六安市山区的军区三线指挥所。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拍巴掌赞叹说：“这个李德生，真会搞，把两派的这么多人弄到一起游行，亏他想得出来！”李德生就是这样，只要他认准的一件大事，他不只是一环套一环，一抓到底，而且要抓得有声有色。

许世友当即打电话给李德生说：“我要到你那里看看！”

不几天，中央通知许世友到北京参加国庆 18 周年活动，专机将停在蚌埠机场。许世友本来可从六安直接坐汽车到蚌埠的，但他特意绕道合肥。李德生得知后，专程从合肥前去迎接。二人半路相遇，一同回到合肥。

李德生安排许世友住在省委稻香楼宾馆西小院。这个院落比较安静，毛泽东到安徽视察时，曾经住过这里。许世友有个习惯，他不顺心的时候，头发胡子长了不愿意找理发员剪，常常是自己简单修理一下也就算了。

许世友到了合肥，心情顺畅，他说：“找个理发员来！”理好发，他要李德生陪他上街转转。许、李二人坐上吉普车，沿着合肥主要街道兜了一圈，只见市场熙熙攘攘，一切比较正常，许世友很是高兴。回到稻香楼，李德生问司令员吃什么，许世友食谱不变，把自己带来的公鸡红烧了，取出自己带来的茅台酒。当晚，二人边喝边谈，许世友说：“老李，你们搞得好！我们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之一就是安徽金寨，安徽人是英雄，历史上就能打仗，‘文革’搞武斗也厉害，你们给制服了。你们搞得不错。”

许世友高兴地在合肥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动身到蚌埠飞往北京。

这个时候，摆在十二军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是解放干部。这是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之后，筹备成立由地方干部代表、军队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关键。

军管会在办干部学习班的同时，专门成立了由十二军副政治委员潘启琦负责的解放干部工作小组，负责了解情况，收集资料，研究结论。先前，许多领导干部成了“走资派”。怎么看待这些“走资派”，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李德生想起在唐庄的经验，他对解放干部工作小组的同志说，现在，我们还是应当从实际出发。毛主席讲过多次，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主席的讲话和实际情况，是我们工作的依据。李葆华不是安徽省的第一号走资派吗，可是早在 1966 年底，周恩来曾经专门交代过：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现在，李葆华由“中央专案组”管，安徽无能为力，应当迅速查明安徽省委书记李任之的情况。解放干部工作小组组织力量调查，从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看，尽管李任之的“帽子”不少，实际上，大多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应当说，李任之是既没有历史问题，又没有政治问题的，可以作为省“三结合”的地方干部代表。解放干部工作小组的意见得到军管会领导的一致同意。有了李任之做标杆，其他干部的解放和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就好办多了。

群众组织联合了，大量领导干部解放了，安徽省军管会于 1968 年 4 月 10 日向中央呈送了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4 月 14 日，中央批示同意，并批准由李德生担任省革委会主任。

1968 年 4 月 20 日，也就是十二军到安徽 8 个月零 12 天，安徽省革委会在合肥市召开了成立大会。

省革委会成立大会之前，李德生特意给许世友司令员打电话，请司令员一定要来参加。许世友很爽快地答复：我一定参加。

在安徽省革委会成立大会上，许世友即席讲话。这位大别山的英雄将领很动感情地说，安徽是鄂豫皖革命老根据地，安徽的人民对革命有贡献，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老将军讲话掷地有声，全场掌声雷动。

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也从北京来到合肥，他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讲话表示祝贺。这个张春桥对许世友在场显得很不自在。他对许世友既心怀嫉恨，又无可奈何，尽在背后使坏，从不当面交锋。但是张春桥不放过机会，散布他的“造反”谬论，他谈了所谓“上海红色风暴夺权经验”后，说：“安徽经过制止武斗，局势稳定了；但根据我的体会，当人们感到社会平静的时候，第二次革命就要开始了。”显然是煽动群众继续闹下去。

大会之后，群众游行，几十万人的队伍，红旗招展，锣鼓齐鸣，口号声声，井然有序。许世友边看边高兴地说，这简直就是部队检阅嘛！

安徽省革委会成立以后，李德生组织很大力量抓经济工作。

李德生在北京受领任务时，周恩来、李富春曾经一再交代，要“抓革命、促生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安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实际情况，也使得他深感抓紧生产对安徽的重要性。如果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李德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实践，使他对此有了更深刻的切身体会。

李德生组织安徽省革委会机关制定了全省经济建设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设想。在淮南、合肥、马鞍山等煤炭、钢铁生产基地，先后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动员大会。军队的同志缺乏做经济工作的经验，他特别重视把解放出来的地方干部，放在经济工作

第一线，让他们组织指挥工农业生产。

在工业方面，省革委会着重抓了淮南、淮北的煤矿，合肥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厂、铜陵铜矿、安徽纺织厂、芜湖造船厂等大型企业的生产；并且组织新建了安庆石油化工厂，填补了安徽没有炼油厂的空白，解决了安徽公路运输车辆和农业机械燃油不足的问题。

在农业方面，李德生组织力量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皖北农业地区交通很不方便，很多地方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煤炭和日用品运不进来。尤其是阜阳地区，农村种地瓜多，农民吃地瓜，吃地瓜藤，烧地瓜藤，喂猪也是地瓜藤。大别山革命老区，由于交通很不方便，水果成熟了，运不出去，烂在树上，变不成钱。农民没有钱买盐、买日用品。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李德生经省革委会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调拨钢轨，省里组织施工力量，很快修建了由阜阳到濉溪 200 多公里的铁路，直通徐州；在皖西，修筑了由霍山到金寨 100 多公里的山区公路，从而改善了皖北农业地区和大别山老区的交通运输落后状况，为发展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李德生到中央工作后，除了经常找安徽的领导同志和有关人员到北京汇报工作以外，他坚持每年回安徽作调查研究。1969 年到北京的当年，11 月，他回安徽一次，检查 1969 年工作计划完成的情况，研究 1970 年的工作安排。1970 年七八月， he 按照中央准备提请四届人大审议的有关国民经济计划的精神，调查研究安徽的经济建设情况。安徽是个农业大省， he 用了 45 天时间，先皖南，后淮北，把全省 73 个市、县的大部分都走遍了。每个市县，着重考察一个先进生产队，一个后进队。到皖西、皖北时，白天走访农户，晚上， he 同县委领导同志商量如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入夜， he 不住宾馆、招待所，而是住在县委办公室里。夏季炎热，那时也没有空调，他在地上铺张凉席，睡个囫囵觉。每到一处，都鼓励大

家理直气壮地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交通运输状况。他提出“抓淮北，促江南”，组织领导干部带队，抓了20多个农村后进生产队，通过蹲点帮助，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直到改变面貌。

李德生担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5年，经过努力，使安徽尽量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安徽的工农业生产，除1967、1968年生产有所下降外，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增加10%。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村所有制没有改变，并且有一段时间还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条件下取得的成绩。

五、整 芜 湖

李德生在安徽制止武斗，有一个传遍全国的故事，叫做：整芜湖。

芜湖武斗的规模，在全国颇有名气。李德生在制止芜湖武斗时，亲自深入武斗据点，同武斗队的头头们面对面地交锋，镇住了头头，说服了群众，遏制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芜湖武斗被有效制止之后，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十二军党委向党中央写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由于毛泽东的推荐，1968年8月4日，党中央以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毛泽东为什么看重处理芜湖问题的报告？请看一下当时的全国形势。1968年夏天，多数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是，某些地区和一些边远地区，武斗仍在继续，有的甚至不断加剧。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五六月份，广西一些地区，武斗发展到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抢夺军队武器装备，杀伤军队人员的地步，中央不得不于7月3日，发布布告，作了极其严厉的规定，加以制止。在西北的陕西，同样发生抢劫银行、商店、车船，中断铁路交通，抢夺军队武器装备等类似行为，中央又于7月24日发出布告。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七三”、“七二四”布告。7月

28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出面，找北京市大学造反派头头，所谓“五大领袖”，专门谈制止大学武斗问题。他说：“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也就是在这之前，李德生于6月份到芜湖制止武斗，没有动一枪一弹，取得成功，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他的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通知，转发了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的报告。重申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后来，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次称赞“芜湖整得不错嘛”。由此，芜湖制止武斗闻名全国了。

芜湖市地处安徽南部，扼守长江咽喉要道，有冶金、机械、电力、造船、化工、纺织、食品等工业，是与合肥、蚌埠齐名的安徽省第三大城市。

本来，安徽省制止武斗已经取得明显成绩，1968年4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可是，芜湖市的形势却出现了反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从大的背景来说，有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的影响。这个事件，是林彪、江青联手策动的。林彪对代总参谋长杨成武1967年夏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后，叶群问杨成武有关毛泽东讲话的内容，“讲没讲过林总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说，毛泽东没有讲过。林彪很不满意，说

是“杨成武封锁我，不向我汇报。”1968年3月初，江青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担负查找任务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钓鱼台江青那里说明情况时，被江青诬陷为“武装冲击钓鱼台”。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再次得罪江青。林、江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1968年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林彪、江青发表了蛊惑人心的讲话。陈伯达甚至说打倒杨、余、傅，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回合”。康生指着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荣臻）、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接着，在全国范围，展开所谓反右倾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由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这就在全国范围内，继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各地的解放军部队。

从芜湖市的具体情况来说，因为当时芜湖市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得不那么成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给他们留了几名委员名额，没有定下具体人选，打算由三十五师继续做工作，准备等条件成熟之后再补。

省革委会成立后，芜湖专区和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省、市、地革委会的成立，那些没有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不满情绪和争权的欲望恶性膨胀。他们频频活动，派性严重的人四下煽动，两派群众对立情绪被重新挑动起来。有的人借着林彪、江青策划的所谓“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机会，把矛头指向驻军。市革委会和三十五师一时无法控制局势。

1968年6月26日，几百人冲击部队领导机关；27日，到处抢枪，占领制高点，两派分别包围部队；28日，打死军队司机1人；29日，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接着，他们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某单位，抢走机密海图；另有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

抢走和砸毁汽车 34 辆，部队干部战士 1300 多人被打，其中 200 多人被打伤。驻芜湖部队几乎大小单位都遭到砸抢。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天，6月 26 日，三十五师向军部作了报告，李德生当即指示部队一定要沉着应付，不要开枪，只要不开枪，部队就主动；同时派十二军参谋长兼“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林有声，从合肥带工作组立即赶到芜湖做工作。

芜湖的造反派根本不听劝阻，并且越闹越厉害。他们的意图是，就是要惊动省革委会，就是要惊动李德生。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在省、市革委会里面争到席位。

在派出林有声到芜湖的同时，省革委会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分析芜湖形势，研究解决办法。有的提出，再派革委会领导成员去做工作；有的提出增加部队，按照“九五命令”办事；有的提出采取强硬手段，抓几个煽动闹事的头头。李德生仔细听取大家发言，权衡利弊后说：现时芜湖闹得很凶，为什么闹事，说穿了就是要进革委会，要权，看来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市革委会讲话，已经很难起作用，驻军也很难解决矛盾。芜湖虽是局部，却是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过去，北有淮南，南有芜湖，都是武斗出了名的。现在，合肥、淮南形势稳定了，一些群众组织头头就看着芜湖。你芜湖的头头没有进革委会可以闹事，我没有进革委会，也可以闹事。芜湖问题解决不好，必将波及全省。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军区机关也接到报告，他们打来电话，建议十二军考虑，三十五师部队是不是暂时撤出芜湖市，缓和一下芜湖局势。

李德生问到会的同志，解决芜湖问题，是让驻军部队按照“九五命令”，采取武力解决问题？还是撤出部队，争取造反派的合作？大家讨论，觉得这两种办法虽然各有利弊，却都不是好方

法。议论来议论去，认为应当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指示，依靠部队干部、战士，首先把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到家，争取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要做群众工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非得省里领导同志出面不可。

这时，省革委会刚刚成立两个多月，大量工作摆在面前，主要领导同志怎么能有空，很多革委会成员主动要求前去处理。

李德生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十分肯定地说：“他们闹得这么起劲，就是要争在革委会里的席位。它的矛头是对着省革委会来的，对着李德生来的，看你敢不敢来芜湖，这个意图很明显。我看还是我去好！现在省里的工作，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等几位副主任都在，都可以商量处理，我离得开；要讲谁去比较好，我是省革委会主任，当然是我去好一些。他们不就是想要我去吗，他们就是认为如果我去不了，他们就可以提高条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都应当去，我去有利！我看大家不要争了。”

十二军的同志都了解，打仗的时候，李德生总是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最关键的第一线，要想劝阻他，是不可能的。大家议论说，芜湖武斗已经开始动枪动炮了，子弹不长眼睛，局势太乱，很不安全，建议多带一些警卫人员去。

李德生轻松地笑道：“他们还能把我吃了！”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他总是用一句简明的话，做出结论。

李德生说，警卫人员不要多带，省革委会机关去几位工作人员就可以了。但是要带上几位结合进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锻炼他们，考验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会后，李德生专门给许世友司令员打电话，报告芜湖情况，省革委会讨论的意见。他说，按照军区机关同志的意见，如果三十五师撤出了，芜湖的形势会更严重，发展下去很难逆转。李德生很少对领导机关的要求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少有的一次。

许世友听了李德生的意见，爽快地答复说，你的意见对，你去好。就照你们研究的方案办，军区机关叫三十五师撤出芜湖是乱弹琴。

出发前，李德生找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说：“省革委会决定，请你们一起到芜湖去，是要你们去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把武斗刹住。你们过去同他们之间联系比较多，有这个有利条件。你们现在已经进了革委会，就不再是哪一派的代表了。你们只能站在全局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不能站在派性的立场。可要警惕，不要做任何煽动派性的工作。这是你们参加革委会后，第一次站在全省的立场做工作，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几位群众组织代表能够随同李德生参加这种活动，觉得领导信任他们，是很光荣的事，都表示要按照革委会的要求，做好工作，接受考验。

6月27日，李德生和省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革委会几位工作人员，分乘三辆吉普车，前往芜湖。

李德生一行到了芜湖，进了三十五师师部，立即听取了三十五师政委兼芜湖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等领导同志的汇报。

李德生问：“现在情况究竟怎么样？”

于永贤说：“现在两派对立，部队讲话不灵。”

李德生问：“你们做群众工作，两派群众的真实思想怎么样？”

于永贤认为，两派群众组织里的多数群众，对于一些头头争权夺利的情况认识不清，总认为驻军和革委会对他们这一派有偏见，这个思想疙瘩还没有完全解开。

李德生说，这就是说，还不到不得已动用强制措施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分头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争取广大

群众，使得极少数挑动事端的人孤立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群众组织的头头，也要分别做艰苦的工作，把他们里的多数争取过来，这样才能起到改变局面的作用。对于抢枪冲击部队的事，在群众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之前，先不急于处理。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了，他们如果仍然执迷不悟的话，就坚决按照“九五命令”办事，对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

第二天，李德生和三十五师政治委员于永贤，一起找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谈话，听他们介绍情况和谈他们自己的看法，对他们的错误，做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分工带来的群众组织代表，到两派的骨干和群众中去做工作。

李德生带工作组到芜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市。有的群众组织看到省革委会对制止武斗、批判派性决心很大，活动有所收敛；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引起李德生的注意，反而越发活跃起来，继续冲击海军、空军的技术单位。

全市一个最为好斗的群众组织，特意通过大喇叭广播：“欢迎李军长到芜湖来，欢迎李军长亲自接见我们！”而且“请李军长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同行”。几处大喇叭同时广播，把市民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成了全市一条特大新闻。这个组织自认为敢于向省革委会挑战，也很得意。

省、市革委会的同志听了广播，许多人非常震怒，有的说：“这简直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有的认为，按照他们的表现，应当考虑给他们定性。三十五师的同志则认为，这可能是个圈套，军长不能去，更不能一个人去。这个组织武斗出了名，军长一个人去，无异投身虎口，轻则被当人质扣押，重则有生命危险，万一出现差错，谁能负这个责任？

李德生听了大家意见，冷静地分析道：“现在稳定安徽形势的焦点在芜湖，芜湖的焦点在这个群众组织的动向。其他各派群众组

织都在睁大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究竟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解决问题。我看，这个群众组织的问题解决了，整个形势就会改观。他们叫板要我去，宣传得那么凶，以为我不敢去，不能去。这样他们就得意了。其实他们恰恰错了，我为什么不敢去，为什么不能去？”

三十五师的同志担心地说：“现在武斗没有停，时不时有流弹到处飞；而且那一派当中有个别亡命之徒，您的安全难以保证。”

李德生说：“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我想，他们之所以要求我去，总想解决什么问题吧，把我伤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看，他们不敢随便加害于我，他们也要考虑那样做可能引起的后果。”

李德生极而言之地讲：“退一万步讲，即使把我打死了，坏人就彻底暴露了，问题就能解决了。”

李德生缓和一下口气说：“同志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就我一个人去，单刀赴会嘛！”

于永贤和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领导干部，都知道李德生举重若轻的作风和他所说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含义。大家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团长的李德生，化装进入侵华日军据点侦察的故事。

我们不妨回述一下。

那是在1943年9月，新十旅旅长兼太行二分区司令员曾绍山，向太行军区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请示，请求将主力部队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营营长李德生，调到太行二分区，担任三十团团长，改变那里兵力薄弱的局面。二分区所在的山西和顺、昔阳一带，日伪的势力很强，据点林立。经过日军反复扫荡，革命根据地只有十几个村庄了。三十团是新组建不久的小团，李德生到任后，大力加强

部队的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不到两年，多次主动出击，拔除了多个敌人据点，到1945年年初，二分区范围内仍然残存的据点，就是马坊日军中队的一个大据点了。

马坊地处山西和顺、寿阳、昔阳三县交界处，是二分区6个县的中心。日军在北马坊后面一个山岗上，用了两年多时间，修建了一座椭圆形城堡，严密控制经过马坊的寿（阳）昔（阳）公路，是楔入二分区腹地的一块毒瘤。城堡占地两千平方米，分地面、地下、碉楼三层，能容纳一个中队200多人驻守。

城堡修成后，日军特务头子清水利一领导的“晋东部”，带一个中队日军驻守，指挥6个县的特务工作。他们在各村建立“维持会”，“强化治安”，向群众强征粮草，逮捕、审讯抗日军民，先后有上千抗日军民惨死在这个据点里。在城堡的外边，清水利一网罗汉奸叛徒、地痞流氓组成伪军小队，修了两排窑洞居住，作为他的外围防御阵地。

军分区领导曾经派地下党员打入马坊据点，组织部队两次攻打马坊，都因为城堡坚固，火力很强，而我军没有重武器，强攻很难奏效。

李德生研究了前两次失败的原因，设想了用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新的攻打方案，再次向分区领导要求攻打马坊。为了了解马坊据点内部的敌情、地形，李德生郑重向军分区领导请求，要亲自化装进据点侦察。分区政治部主任穰明德开始不同意，他说：“一个团长进日军据点，太危险了。就是报到师里（指一二九师），也不会同意。”

李德生向穰明德主任分析了化装侦察的有利条件。他说：“敌人怕八路军侦察员潜入，城堡检查确实很严。比如，他们要看进入城堡的民工，额头有没有戴军帽的痕迹，我已经几个月不戴军帽，头上没有印痕；敌人要看民工的双手，八路军握枪，手掌没有茧

子，农民拿锄，有手茧，这是他们区别民工和八路军的方法，我经常和搞生产的战士一起下地，双手早已磨起老茧；我还学得几句山西话，冒充当地农户，一定不会露馅。”

一个严冬的清晨，李德生化装后，背着柳条筐，里面装上10多斤土豆，挎着柳条篮，篮子里面有热腾腾的大饼，带着早已化装好的二连连长刘德树，排长杨腊冬、张慕堂，班长罗西文、苟玉喜，侦察员杨丕刚，装扮成送粮食的农民，巧妙地骗过日军岗哨，进入据点。他们把整个城堡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的火力配置、地道壕沟、通信设施等等，统统看清楚了。回来后，李德生从全团抽调82名精干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除了随身武器外，用破袭铁路的铁轨，打了80多把大刀。李德生和突击队员一起，每天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

1945年3月4日下午，天空飘起鹅毛大雪。夜晚10时，突击队到达马坊，进入城堡东南几间废窑洞里隐蔽起来。5日，天还没亮，住在城堡外边的伙夫，起床到城堡里做饭，伙夫刘占才按照预先约定，发出信号。咣当一声，突击队应声而起，兵分四路冲向城堡大门，连劈两个哨兵，又冲进卫兵室；向院内连甩几十个手榴弹，炸倒院内敌军；冲进炮楼，夺到一挺重机枪；先后炸毁电台、占领了信鸽棚、马厩、水机房、炊事房。

战斗正在激烈时，从寨墙上跳下日军小队长铃木，举着战刀，向李德生劈来，李德生举起刚刚缴获的日本战刀，回手应战。日军哪里是李德生的对手，只得夺门而逃，被外边的侦察员活捉。

下午1时，战斗结束，共打死日军30余人，活捉铃木等8人。拔除了晋东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大钉子。3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新闻《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同时配发社论，赞扬“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



李德生单身进入造反派的武斗据点做工作，使许多老同志想起他任三十团团长时于1945年3月化装进入日军碉堡侦察的故事。这是李德生（第四排右三）在马坊战斗后，调任七六九团团长时与机关同志合影。

于永贤等领导同志很清楚，打马坊，是同凶残的敌人斗争，李德生都敢于、善于勇敢机智地化装侦察，同敌人拼刺刀；现在是到造反派的据点里面，虽然有某些对抗的意味，但它毕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凭军长的勇敢、智慧，应付这种局面，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会上大家终于同意李德生的意见，并且进一步讨论了李德生进入据点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做好了各种应对的预案，包括向群众宣传李德生同群众组织做工作的情况，都由于永贤一一作了布置。

会后，李德生带了作训参谋苏语和警卫员王楚林，乘一辆吉普

车。革委会几个干部，乘坐另一辆吉普车跟在后面。两辆吉普车穿过人烟稀少的大街，耳边时时传来几声冷枪，不久来到武斗组织总部的据点。

芜湖市区的大街上，此时行人不多，车辆更少，可是人们早就关注着造反派要李德生会见的广播，躲在家里，听着街上的动静，互相传播着消息。看到军队的吉普车出动，人们紧张的心都悬起来了。

造反派的据点，是芜湖电校的大楼。“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停课，教学楼被造反派武斗队占据。李德生到了电校的楼前，下得车来，只见一座二层楼房，墙壁上有不少弹痕。一楼的门窗统统用沙袋垒得严严实实，沙袋间留着射孔，里面架着机枪、步枪。李德生调侃说，还真有点打巷战的味道嘛。

二楼窗户也被沙袋砌满了，只留有一个窗口，伸出一架竹梯，通向楼外。有人进出，竹梯放下楼来；没有人出入，竹梯就收上去了。所谓竹梯，其实就是两根长长的竹竿，用几根木棍横着绑在中间。木棍之间，又用麻绳绑了一道又一道，就成了一级级的软梯了，人们爬楼，脚下有硬有软。攀登这个梯子，还真得有点“功夫”才行。

李德生叫王楚林向楼上喊话。王楚林大声叫道：“楼上的听着，我们的李军长来了，你们快点把梯子放下来。”

那些指挥武斗的头头满以为他们提的条件，革委会是不会答应的，不过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也可以向群众、向另一派炫耀。如今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几个人探出头来一看，果然是李军长来了，而且只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只带着一个警卫员。几个头头慌里慌张，连叫：“放下梯子，放下梯子。”荷枪的武斗队队员手忙脚乱，把梯子从窗口顺下来。

看到梯子放下来，作训参谋苏语争着说要让他先上。李德生制

止说，你上去被他们发现不是我，说不定反而有危险，你不要争了。

6月底的江南，天气炎热，李德生身穿一套单军装，脚蹬布条编制的草鞋，沿着竹梯，矫健地登上窗口。大白天，楼里却黑咕隆咚，武斗队的人连忙打着电筒，迎接李德生。后面的警卫员王楚林护卫着，一起进了二楼。

李德生来了，武斗队众人毫无准备，心中发虚，一时反而没有话说。李德生在他们送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不客气地批评说：“你们要求我来，我来了。我来是要批评你们的。你们抢枪、搞武斗，一是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二是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严重脱离群众，群众组织脱离群众，这样下去，你们就越来越孤立了。中央的‘九五命令’你们都知道了，那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先给你们讲清道理，如果你们不按党中央的命令办事，再这样下去，你们的前景很不好啊。这个后果，我也要先给你们讲清楚。”

众头头里面不少是搞“武化大革命”起家的，满脑子是“冲，冲，冲”，“打，打，打”，“权，权，权”。向来是别人怕他们，他们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没有想到李德生不买他们这一套，而是义正词严地批评他们。造反派头头顿时气不足、理不壮。又听李德生强调“九五命令”，自觉理亏，只能争辩道：“是三十五师支左有偏向，使我们受压。”“他们不支持左派，支持保守派。”

李德生严肃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怎么还说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你们没有学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应当说，安徽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组织，做得对的我们就表扬，做得不对的我们就批评，毫不含糊，毫不客气。我们解放军几十年来的传统，就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你们说相信解放军，首先要相信解放军对群众的基本态

度。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李德生环视四周，关切地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本来是很宽敞的教室，现在连个空气也不透，光线也不透，到处乱糟糟，有楼梯不敢用，跳窗户爬墙，多么不光明正大。这么热天，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李德生的关心，使造反派觉得气氛得到缓和。

李德生接着对那些头头讲：“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你们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如果部队有缺点，你们提得对，我们可以改正。你们哪里来的权力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对于你们的错误，我们也是先批评教育，你们一定要交出武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至于你们提的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提得对的，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来，造反派大肆宣传请李德生来，不过是虚张声势，压根没有想到李德生会来，更没有想到李德生来后谈什么。听完李德生一通讲话，他们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完全陷入理屈词穷、十分被动的状态。

李德生成为大楼里的中心人物。

一位红军出身的军长、省革委会主任，竟然来到这个破烂脏乱的据点，不少人没有想到。只见他威武而又亲和，义正词严而又态度和蔼，许多人思想受到触动。一些武斗队队员想，头头们不是说李德生不会来吗，不是说十二军要消灭我们造反派吗，现在李德生来了，他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嘛！很快，武斗队的纪律也不顾了，头头们的脸色也不看了，先后离开各自的“岗位”，围到李德生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武斗队员们憋在大楼里好久了，外边的情况知道的不多。听到李德生讲话，觉得非常新鲜，非常亲切。有的认为讲得有道理，连连点头；有的对过去所作所为，有所悔悟，低下了头。过了一会，低头、点头的人增多了，满不在乎的人少了。原来一些挥舞枪支的人，更是自觉理亏，悄悄地把枪放到一边。李德生看到后笑着说：

“知错就改，改了就好嘛。”

武斗据点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谈话会。有些人激动地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许多人表示，要把抢来的枪支交还部队。气氛逐渐缓和下来，有的竟然要求李军长讲讲红军战斗的故事。

时隔很久之后，有的当事人评说这次会见，说当时被一种极左的错误思潮迷了窍，连一些革命的基本知识都不懂，一门心思思想夺权、掌权，自认为是最早造反的，在革委会里应当占有更多更好的席位，非要争个上下高低不可。没有想到像李军长那样的领导干部，亲自和我们谈心，讲得那么实在，那么推心置腹。大家都被折服了，头头们煽动性的讲话一下子就不灵了。

一个小时的谈话，峰回路转，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头头们不知道怎么显示他们的转变，就请李德生参观他们的据点。李德生顺水推舟，边看边批评说：“你们看看，你们把个好端端的教学楼搞成什么样子，这样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吗？你们自己在这样环境里生活，过得舒服吗，能持久吗？”“你们看看外边，武斗造成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市场冷落了，老百姓没法正常生活，大家对你们的意见大得很呢，你们的家长也不高兴，后果多么严重啊！”“我建议你们，在哪里摔跤，就在哪里爬起来。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头头们不再申辩，连连点头称是。

李德生要离开了，楼上的人都自动集合起来送李德生下楼，有的再次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

有人形容，李德生进武斗据点如入虎穴，造反派如临大敌；李德生出据点如离家门，造反派如送亲人。第二天，这派组织果然开始交枪。李德生交代三十五师，要趁热打铁，继续做思想工作，防止反复。他要求三十五师组织力量，仔细调查了解指挥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弄清真相。他说，不要认为现在的形势好转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真正的策划者，他们不一定在武斗现场，不一定在武斗

据点，应当调查清楚，再研究如何处理，要把武斗的根子刨掉。

接连两天，李德生同芜湖市革委会和驻军领导同志，分头走遍了芜湖两派主要武斗据点，同一队队佩刀带枪的群众组织头头、武斗骨干谈话，宣传政策，批评错误。越是那些武斗气势盛的人，他越是严肃批评，晓之以理。

有一次，李德生在行车途中，正遇到两派武斗，流弹飞舞，随行的同志建议绕道走。李德生提醒他们，在这种时候，最需要我去，必须把武斗风刹住。他在汽车开到武斗现场后，让警卫员打开吉普车的帆布篷，从座位上站起来，接过手提喇叭，命令两派停止武斗。两派头头都没想到李军长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出现，更没有想到会在武斗现场讲话，不由得都停止了射击，人们逐渐向吉普车四周走过来，李德生再次向他们讲解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道理。一场武斗嘎然而止。

1946年7月，李德生任晋冀鲁豫军区六纵队十七旅旅长。8月，在出击陇海路战役中攻克兰封，歼灭大量敌人，并缴获敌11辆坦克，是我军首次缴获敌坦克。这是他在1948年参加襄樊战役后留影。



李德生的活动情况和讲话内容，迅速在芜湖人民群众中传播，搞武斗的谬论越来越没有市场，正气伸张，邪气下降。李德生以他的声望、他的果敢、他的智慧、他的宣传魅力，团结了军队和地方干部，团结了群众，压服了邪气，迅速扭转了芜湖的混乱局面。

6月30日，李德生回到合肥，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和十二军党委会，介绍芜湖事件详细情况。

据调查证明，芜湖事件是由少数几个人操纵策划的，他们分别指挥两派协同行动，把矛头指向军队。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把部队的枪抢光，解除部队武装；第二步，抢砸部队车辆，使部队失去机动能力；第三步，破坏通信器材，使部队失去联络和指挥能力。最终把部队赶出芜湖，使芜湖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他们另行成立革委会。李德生提出，我们应当在群众觉醒之后，揭露事件真相。

6月30日当天，省革委会召开紧急常委扩大会，各地市、各师以上部队、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来参加。革委会向大家介绍芜湖事件真相，发动各地、各组织都声讨这一事件。同时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等五个地区抽调人员，组成强大的军、地、群宣传队，派到芜湖，在芜湖市革委会领导下，宣传群众，帮助参加武斗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于武斗中故意伤害群众，负有人命的，在证据确凿后，交公安机关查处。

由于舆论宣传和必要的法制措施相结合，打击面极小，震撼力极大。于是，各派群众组织纷纷揭发事件真相，解散专业武斗队，自动上缴武器，平毁工事，检举坏人，一些跟着犯错误的人很快觉醒过来。

只用10多天时间，到7月中旬，芜湖市邮电、交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十二军未动一枪一弹，使芜湖危机度过去了。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向中央写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

毛泽东看到后，指示印发中央文件，于8月4日转发全国。

李德生“整芜湖”，并不仅仅抓住制止武斗这一关键环节，他对芜湖的事情一直抓住不放。先是派出有力的工作组进驻芜湖造船厂，把造成7条人命的事件追查清楚，移交省公安厅，请有经验的老的公检法人员来依法处理，使造船厂的形势有了根本好转。接着紧紧抓住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生活这样一些大事，采取了具体措施。对于影响全市社会秩序和生产的芜湖造船厂，更是抓住不放，特地派出得力干部，去具体帮助，使工厂生产逐步恢复，到1970年，造船厂造出三艘新艇下水。

六、毛泽东为什么选中李德生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作政治报告，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所谓的九大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还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25位成员里面，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人中，只有12人继续当选。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然而，作为解放军一位军长，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不久，7月下旬，李德生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成为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同时，仍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变动，非常引人注目。

李德生到中央工作，是毛泽东提名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调李德生到中央工作？毛泽东又是怎样考察李德生的？

首先我们看看当时的形势和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他支持的1967年上海“一

月夺权”之后，造成群众组织山头林立，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派性武斗层出不穷。这些，是毛泽东原来没有预料到的。1967年12月，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并且指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强调不准武斗，并且关心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的问题。我们从毛泽东1967年外出视察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1967年7月14日至9月23日，毛泽东到华北、中南、华东视察，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就“文化大革命”发表了许多看法，尽管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尽管他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但是他确实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措施，做“引导”工作，实际上是在纠正某些“左”的具体错误。

毛泽东强调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强调“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提出从中央到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轮训干部。他认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巩固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还强调“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武斗”。毛泽东同时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当时出现的“左”的偏向，很有针对性。

毛泽东出外视察的讲话，是1967年10月7日由中共中央整理转发的。在这以前，十二军、李德生都不可能知道。

毛泽东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于1967年7月21日乘飞机到上海。安徽武斗形势严重的时候，他同意调十二军到安徽，但

是他不可能预见到十二军的工作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而十二军从8月7日到安徽，30多天，就取得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明显成绩。40多天，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9月20日，举行两派20万人大游行。接着，十二军又举办造反派头头和省地市领导干部万人学习班，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二军在安徽的活动，通过十二军的报告，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断送到中央。十二军的报告，两次被中央转发。显然，十二军的许多做法，特别是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符合毛泽东讲话中有关纠正“左”的具体错误的精神，它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李德生在安徽，是在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扭转混乱局面的工作中，取得了“制乱求治”的成效，因而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也可以说，尽管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李德生的许多做法，恰恰是符合毛泽东纠正具体错误的思想的。尽管李德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在当时，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从总体上、理论上认识其错误，但他从党的一贯的基本理论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稳定形势、保护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并且按照周恩来亲自向他下达的部署，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实事求是地处理安徽面临的各种矛盾，因而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具体错误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概正是在这些方面的成绩，被毛泽东看中。

毛泽东选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单从李德生在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成绩，不是单看文字报告就确定的。他从许多方面调查情况，多次当面考察。了解了李德生的历史、年龄、身体、

文化知识等许多方面，乃至从更多层面思考的。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过，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

我们只是看一下，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两次当面考察李德生的情况。

第一次是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

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人员组成和编组、会议开法。当时宣布的会议议程是：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党章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的编组名单。当他念到华东组列席的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道：“哪个叫李德生？”这是因为毛泽东虽然在多次文字报告中，熟悉了十二军在安徽“三支两军”的情况，却未见其人。

周恩来在1967年7月，向李德生交代十二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时，见到李德生，后来又见过几次。他当即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他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

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也有点奇怪，毛泽东为什么对一位列席人员、一位军长感兴趣，不由得回过头来看，李德生是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当着众多与会人员，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毛泽东这样亲切地询问到会同志，使人们想起战争年代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亲密关系。毛泽东确实不认识李德生，而李德生当然认识毛泽东，并且从红军时期起，他多次在各种场合见过毛泽东。他对于毛泽东的点名，也感到有点意外。

这次会议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围攻老同志，通过开除刘少

奇党籍的决议，是后来的事。在会议开幕的时候，气氛还不是那么紧张，毛泽东的风趣，引起了一阵阵笑声。

“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毛泽东再次发问。

“我是河南省新县人。”李德生大声回答。

周恩来记忆力过人，他加了一句：“新县是四方面军的根据地，那么说，你跟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许世友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参加这次会议时被递补为中央委员，是正式与会人员，坐在李德生前面，马上接上说：“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都是大别山地区的。”

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战将，“惺惺惜惺惺”，能打仗的部下他都爱惜。李德生能打仗，但是战争年代二人不在一起，后来十二军从朝鲜回国，归属南京军区，才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他对这位军长在安徽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很是赞赏。他曾经很豪爽地称赞李德生说，比我干得好。他也和毛泽东谈起过李德生。现在，毛泽东问起李德生，许世友同样高兴。

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李德生回答：“52岁。”

毛泽东转向与会人员，他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是复杂了。”

两个月前，毛泽东亲自确定转发十二军“整芜湖”的报告，芜湖制止武斗的经验，他是了解的。现在，他还要直接听听李德生的看法。又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人们掉转目光，准备听李德生介绍经验。不料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大家以为只是开场白，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讲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阵笑声。

李德生对大家的笑声并不在意，他自信这是十二军“三支两军”最主要的经验。作为一位军事干部，李德生有他独特的本领。战争年代，他善于从纷纭复杂的战局中找到制胜环节，牵敌人的“牛鼻子”；和平时期，无论工作、学习，他都善于抓住要害。一年的“三支两军”，从制止武斗，到大联合、“三结合”，直至成立革命委员会，推动工农业生产，工作千头万绪，要是讲经验教训，该说的太多。在这样场合，怎么能讲得那么多。在众多的斗争环节中，李德生体会最深的是，所有的工作，都不是靠下命令，不是靠要权威，不是靠一支一派压一派，而是靠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靠部队的模范作用。李德生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于是，“大造舆论”这四个字被概括出来了。

李德生的回答，引起了一阵笑声，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引导到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在宣布编组名单的时候，出现毛泽东同列席人员这样大段对话，是很少有的事啊！

毛泽东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谈话，是在 1969 年 4 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德生作为安徽省选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展 3 年以后召开的，它“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大会于 1969 年 4 月 1 日开

幕，24日闭幕。会议选出170名中央委员、109名候补中央委员。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

九大闭幕之后，4月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会前有3天酝酿准备时间，大会秘书处给各组发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名单。

李德生在京西宾馆房间里，接到中央印发的候选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原八大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人，只有12人继续被提名，也就是说留在中央政治局的老一代革命家不多了。新提名进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中，情况很复杂。有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成员，也有省、市领导干部、军队大军区的领导同志。李德生只是一位军长，当时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接到名单，先看到许多老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名单上，而看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时，猛地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这份名单里，脑子轰了一下，感到十分突然。他坐在沙发上思索良久，重新取回名单，看到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中，有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其他许多大军区的领导同志并没有进政治局，而自己作为军长，却列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里，这简直太出乎意外了。

李德生知道，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司令员，都是四方面军的军长、师长，是他的老上级，他们的资历、战绩、各方面的水平，都是值得钦佩的。政治局里面的军队干部，也仅有他们两位是四方面军的老同志。

李德生敬重陈锡联。他在红军时期当战士、班长的时候，陈锡联是团长、师长；他当排长、连长、营长时，陈锡联任团长、旅长；后来，陈锡联任三纵队司令员，他任三纵七旅十九团团长；陈锡联任三兵团司令员，他任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陈锡联指挥作战，英勇顽强，多谋善断，对待同志，宽宏大量，李德生印象极

深。陈锡联也很了解李德生，器重李德生，在红四方面军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三过草地时，陈锡联带一个团遭到敌军重重围困，是他派出李德生、曾绍山和一位外号“川夹子”的战士，突出重围，搬来救兵。而这时，李德生被张国焘派来的师政治委员错误地开除党籍，由班长撤职为战士，深受委屈，但依然忠贞勇猛，出色地完成任务。

李德生与许世友司令员，同是河南新县人，同是四方面军的。但是很长时间，李德生熟知许世友，而许世友并不熟悉李德生。李德生儿时在家放牛，就听说许世友“许和尚”身手非凡。李德生14岁参军，而25岁的许世友已经参加革命4年，是四方面军的团长，后来是师长、军长了。许世友传奇式的战斗故事，在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广为流传，令李德生非常钦佩。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到了山东开辟根据地，李德生在太行转战，二人不在一起。直到朝鲜停战以后，1954年4月，十二军从朝鲜回国，归属南京军区，驻在浙江金华一带，许世友才开始了解这位老乡。许世友曾经听副司令员王近山讲过，他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司令员时，手下的三位旅长，各有千秋，而十七旅旅长李德生的特点是，有勇有谋，善于攻坚、阻击，常打胜仗，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李德生认为，许世友、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他是佩服的、拥护的；自己只有一个军的领导经验，一个省“三支两军”的经验，不熟悉大区，更不熟悉中央，怎么能够当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呢，怎么能担当起这么大的重任呢。这个话找谁说？他想了又想，起身去找陈锡联。他恳切地说：“陈司令，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水平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请你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一下，不要选我。”

陈锡联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慎重研究过，要交给全会选举的，我怎么能去替你说这个话呢。”

李德生又去找许世友，说：“司令，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我很同意。但要我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候选人，很不适合。军长进政治局，我没有那个水平啊。再说，南京军区有你进政治局，就不要再增加一个候补委员了。”许世友和陈锡联一样，回绝他说：“中央提名的名单，我怎么能去提反对意见！”

李德生心中十分不安。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在念到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

李德生摘下军帽，露出一头浓密乌黑的寸发，宽宽的额头，微微谢顶。他端庄地面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泽东看到这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负过6次伤的老红军战士，正值壮年，体魄魁梧，红光满面，风华正茂，当时年已76岁的毛泽东不禁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

“啊，53岁，53岁！”比李德生年长23岁的毛泽东，接连重複几遍。

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之后，许世友回到南京，陈锡联回到沈阳，李德生回到安徽。李德生看到许世友、陈锡联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了，仍然回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工作；自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工作，理所当然，心里也就稍稍平定了下来。

李德生回到合肥，组织传达九大精神。他在北京时，就对毛泽东一次讲话十分在意。当时对他触动的有两点：一是提到军队要谨

慎；另一个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在十二军党委会上，李德生提出，部队的同志两年来很辛苦，确实要防止骄傲。成立革委会后，有些军队人员对地方同志不尊重，对老百姓不耐心了。他说，我们懂得地方工作吗，懂得工农业生产吗，不懂嘛。如果说地方同志过去 17 年工作中有缺点，现在我们参加革委会工作，如果不谨慎，也一定会犯大错误。他建议，要特别强调军队干部向地方干部学习，向群众学习。

在省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李德生说，在解放干部和清理阶级队伍中，总是容易产生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这种倾向是不符合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的；在抓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还有忽视生产的问题，这也是容易产生的另一种倾向。

安徽省虽然是个农业大省，但是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依然很苦。成立革委会后，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管，钱、粮总是显得很紧张。李德生常向工作人员讲，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啊！不抓生产，没有粮食，老百姓吃什么？这就是我们应当注意防止的另一种倾向。

七、“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长到了军部”

党的九大之后，李德生回到安徽，传达了九大会议精神，开始全力抓省里的工作。过了两个多月，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主持召开安徽省党的核心小组会议，研究一些地区的形势。秘书急匆匆进来，轻声对他说：“总理的电话。”

自从十二军进入安徽，重大问题，李德生总是直接给周恩来或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请示报告。因为周恩来嘱咐过，十二军到安徽后，遇到重大问题，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

党的九大刚开过，周恩来亲自来电话，一定是有重大事情。

李德生示意大家等一等，大步走回办公室。电话那边，没有经过接线员或秘书的接转，直接传来熟悉的周恩来苏北口音。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件大事，感到太突然了。战争年代，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遇到的突然事情很多，他都能够沉着应对；可怎么也比不了这个电话啊！一瞬间，脑子里转了十万八千里。可也就是这一瞬间，他镇静下来了。他诚挚地向周恩来请求：“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工作，经验不多，水平不高，

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建议中央考虑，我是不是仍然在安徽工作好一些。”

周恩来亲切地说：“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安排一下工作，尽快到北京来。”接着，周恩来又叮嘱一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他们会安排飞机去接你。”

李德生听得出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作为一个军人，对于上级命令，应当无条件执行。自己已经申述了意见，而中央已经决定，就不能再讲价钱，再有任何的个人考虑了。他想，天大的困难，总不是不可逾越的。还有党，有群众嘛。他不能再推脱，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尽快安排好工作，然后给中央办公厅报告。”

李德生回到会议室，他镇定下来，要求将没有到会的省革委会领导同志全部请来。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急速地思考着工作安排。等人到齐后，他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对近期的工作一一做了交代，希望大家按照原有的分工，抓紧做好各项工作。

安徽的领导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大家都觉得非常光彩。有人建议，大家在一起吃顿饭，表示欢送。李德生摆摆手说：“不好，不好，我也是不回来，送什么行啊！”

7月28日上午，吃罢早饭，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聚集在办公楼前院子里，准备一起到机场去，为李德生送行。李德生向大家说：“就到这里为止了。大家工作都很忙，都不要送，都不要送。”他同众人一一握手告别，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来到合肥机场，乘上中央派来的伊尔14飞机，直飞北京。

专机起飞，一路晴空。到了华北地区，突然遇上盛夏的雷雨，机组的同志驾驶飞机在云层中穿行，避让雷电，飞机上下颠簸。看来到北京的行程并不平稳。

战争年代，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指挥员全神贯注，对于身边的枪炮声往往全然不顾。此时，李德生在沉思着进京后的一切，对于飞机的状态，也浑然不觉。直到飞机安全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李德生才恢复一贯的沉毅神态，走到前舱，向机组同志道谢后，走下飞机。

中央办公厅接机的同志，把李德生接到京西宾馆，住在九楼西边的大套间。套间里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两个卫生间。会客室兼办公室很宽大，有一个大的写字台，一套沙发和茶几；会客室南边是带卫生间的大卧室；会客室外，有一间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兼卧室，供秘书、警卫参谋使用。房间已经收拾停当，办公桌上安装了中央和军委的保密电话，准备了必要的办公用具。陪同的同志，向秘书交代了同各方面联系的方法和电话号码，向李德生告辞走了。李德生略一洗漱，吃过午饭，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请李德生在下午3点到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将会见他。

当天下午，李德生按时到怀仁堂，只见周恩来坐在那里看文件。周恩来见李德生来了，站起来同他握手，请他坐下。

周恩来亲切地向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来工作，从现在起，你将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除了党的工作以外，还有军队和政府的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觉得主要是在军委工作，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这件事情在九大之后，毛泽东已有考虑。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谈定：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到中央工作。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于6月25日、7月3日，两次书面报告毛泽东，“确定纪、李两人除了参加中

央集体会议、接受临时任务外，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并保留在外省和军队所兼的职务。李德生还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治部工作。”

周恩来找李德生谈话，是想听听他的想法。

李德生是怎么想的呢？从他的一贯作风来看，他是不大愿意干重复的工作的，即使在同样的工作中，总是想研究点新情况，新问题，更想干点新的工作，在研究解决新的矛盾中得到满足，使工作有所作为，有所前进。当时，李德生在安徽近两年了，觉得抓经济建设，抓工农业生产，还只是开了个头，有很多需要研究解决的新问题，使他感到很有兴趣，很有干头。军事工作，周恩来曾经讲过，仗，十年内打不起来。两者比较，他认为和平时期，搞好经济建设，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大事，更有干头。他思忖片刻，郑重地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的事。”他的回答让周恩来感到有点意外。

是啊，李德生从1930年到1969年，在军队工作将近40年了；“三支两军”到安徽，接触地方工作，也就是两年光景，主要的还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军队的工作总是比地方工作要熟悉得多。按一般人的常理，当然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会熟悉一些，顺当一些。然而李德生不是这样，他觉得研究地方工作，研究工农业生产，更有钻头。而且，他看到皖北农民依然过着贫困生活，更加增强了浓郁的阶级责任感。研究经济建设，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他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听了李德生要求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意见后，微微一笑，身体前倾，说：“德生同志，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临时交代的任务以外，还参加军委办事组和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是这两个组的成员，两个方面都参加。同



1972年，李德生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友人。

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领导工作。”

周恩来的话，同样出乎李德生的意外。被调到北京工作，已经使他很有压力，没想到要参加中央党、政、军的全面工作，而且原来的工作都没有免。中央几个方面的工作，尽管只是一个成员，但是这个成员的担子千钧重啊。

周恩来接着说：“担子是重，我们要依靠主席的领导，依靠集体，依靠群众嘛。”周恩来又向他介绍了中央政治局活动的特点和要求，介绍了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大致情况和工作任务，勉励他大胆工作。

周恩来又问李德生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家里有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把家搬到北京来。李德生看到周恩来那么忙，怎么能为这些小事干扰总理呢。他准备起身告辞，向周恩来说：“我从安徽来的时候很仓促，很多事情没有具体交代，整个工作也要部署一下，可不

可以回去几天？”

周恩来来说：“准你一个月的假，回去安排一下，事情办完了，很快就回来。”

李德生回到京西宾馆，各方面已经开始送来文件，秘书也开始接到各方面的电话，李德生开始一点点熟悉情况。

李德生看到这么一会工夫，就送来那么多的文件，想到中央工作范围那么大，头绪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诙谐地向秘书说：“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长到了军部啦！”

“班长到军部”，也是李德生自勉的话。他的目的在于看到差距，承认差距，勉励自己尽快缩小差距。也就是说，要尽快熟悉“军部”这个全局，尽快适应这个全局，尽快做好全局中自己应当做好的工作。他从开头，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高标准。

秘书也说，我连接电话、签收文件，都摸不着门路。李德生说，我们边学习，边工作，边锻炼，边提高吧。刚才总理讲得很亲切，很明确，我们应当有信心，有决心。一定要尽快适应！

就在李德生到北京几天后，周恩来通知李德生，毛泽东要会见他。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单独会见李德生，第一次向李德生交代任务，指导他的学习和工作。

这天下午，李德生随周恩来到了中南海，进入毛泽东的住处。

李德生想起，早在 34 年前的 1935 年，一、四方面军在四川长征路上会师，作为四方面军普通战士的李德生，远远地看到过毛泽东。只是依稀记得毛泽东修长的身材，清癯的面庞，走在一方面军的大队中间。他和许多四方面军战士站在路边，一起敬重地望着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全国解放后，有几次参加全军的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可都是有那么多人，隔那么远。八届

十二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和毛泽东有简短的对话，也是在大会上。现在，毛泽东将单独同他见面，单独同他谈话。毛泽东会谈些什么问题呢？自己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李德生没有想完，已经看到毛泽东身着一身淡黄色半旧的睡衣，正坐在沙发上专注地看书。李德生第一次近看毛泽东。只见他那宽阔的额头，充满智慧的眼神，被阳光晒得黝黑透红的肤色，并不显出已有 76 岁的高龄。

李德生听到周恩来说：“主席，德生同志来了。”

毛泽东把手里的书放在一旁的茶几上，转脸看着走进来的李德生。

李德生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毛泽东，心情难免有点紧张。他迎着毛泽东的目光走上前去，问候道：“主席好！”

毛泽东宽厚的大手，紧紧握了握李德生的手，拍拍一旁的沙发，让李德生坐在他的身边。

毛泽东笑着说：“李德生同志，李一德一生。我也是李德生（得胜）啊！”

李德生当即想起来，全国走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从陕北转战到河北，党中央一支极小的队伍，同敌人千军万马周旋，却指挥着全军向国民党军队的大反攻。为了保密，毛泽东曾经化名为李得胜。他曾经听人说，李得胜谐音的意思是，离（李）开延安，一定得胜利。

李德生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他顺着毛泽东的手势，在毛泽东的身旁落座。他举目环顾一下周围，看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兼书房、兼会客室的房间里，半圈沙发茶几，满墙书柜，有的书里夹着纸条，有的书打开放在桌上，但是看不到成堆的文件。看来，毛泽东是把处理大事和看书学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毛泽东勤奋的学习态度，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斗争经验，使李德生油然起敬。但他不



1973年，李德生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南南方民主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

知道毛泽东将会谈些什么话题，依然感到有点拘谨不安。

毛泽东显然看出李德生不自然的神态。他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茶几上的花镜，戴在脸上试试，很随意地问李德生：“你53岁了，是不是也要戴花镜哪？”

李德生没想到毛泽东询问自己的第一句，竟然是这样一个极轻松的家常话。他居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问了这么一个极普通的问题。于是比较自然地回答说：“看文件、看书都要戴花镜了。”拘谨紧张的心理，开始消除。

毛泽东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可是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

毛泽东没有说是通过谁，见李德生有点茫然，他和周恩来相顾

微笑，接着说：“他们都说你不错。”南京军区向中央介绍过没有呢，据说，许世友司令员在毛泽东询问时，确实向毛泽东介绍过李德生，说他在军事、政治上都比较强。推荐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有许世友一票。显然，毛泽东有很多渠道，来了解干部的情况。

话头打开，毛泽东海阔天空，谈起安徽的历史、地理，谈起凤阳出了朱元璋，谈了八公山草木皆兵，谈到安徽出了陈独秀，接着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周恩来偶尔接过话题，补充几句，或者插话谈谈安徽当前的形势。李德生能够接上话的不多，他只有静听。

李德生多年革命生涯中养成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领导人的面前，他知道的就讲，不知道的决不强不知以为知。有人说他是大智若愚，有人说他是厚道。其实，他就是这样一种实实在在，或者叫做实事求是的风格。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是这样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他确实体会到毛泽东、周恩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深刻的见解，像大海一样。自己就像一个小学生，在听导师讲课，静听犹恐遗漏，哪里有插话的余地。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风格，为他以后在中央工作，正确处理各种问题，起到很好的作用。

毛泽东见李德生在一边不说话，转而问李德生：“现在的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就他知道的安徽情况，扼要地汇报说：“现在正在贯彻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巩固大联合、‘三结合’的成果。下一步我们准备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抓紧改变革命老区和皖北农村的贫困面貌。”

毛泽东问：“你们准备怎么抓？”

李德生说：“现在老区和农业地区比较穷，生产的东西运不出

来，工业品运不进去。我们打算在大别山地区修一条公路，在皖北地区修一条铁路。”

毛泽东很感兴趣，说：“是啊，如果群众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呢。”

毛泽东看出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将领很实在，可惜知识面有局限，但是他不强不知以为知，不随声附和，是很坦诚的人。就问他：“你平常爱读什么书啊？”

李德生回答说：“主席，我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学文化，只是读一些军事理论方面的书。”李德生虽然读书不多，但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书、重要的文件，他会反复阅读，有了新的实践体会，又会对照阅读。

毛泽东抓住这一题目，提醒李德生：“你打了好多仗了，光读军事书籍不行啊，还应该读点历史、文学、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做领导工作，什么都要知道一些嘛。”

毛泽东微笑地问李德生：“你看过《红楼梦》吗？”

李德生确实看过《红楼梦》，那是部队驻军浙江时，越剧《红楼梦》风靡一时，引起他的好奇，找来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阅读起来。他对书中描写的那些显宦人家勾心斗角，穷奢极欲的生活，太隔膜了，而刘姥姥这么一个劳动人民，又极力讨好富人，也使他看了不舒服，加上工作忙，所以一直没有读下去。他如实回答说：“看过。只是抽空跳着看的，没有从头到尾看一遍。”

毛泽东说：“我劝你要读《红楼梦》，要把它当历史来读。我是读了五遍才开讲的。”

李德生听了觉得很新鲜。他想，把文艺作品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确实没有想到过。后来他又多次听毛泽东讲起这一话题，讲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背诵并且讲解“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

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后来，他按照毛泽东的讲解，通读全书，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历史的角度，审视全书，才多少有所领悟。

毛泽东又谈到学习历史。他说：“《通鉴记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你也要看看。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

毛泽东还要求李德生看《天演论》。李德生觉得，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历史，自己的知识确实太少了。我们党早就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自己离知识化还很远哪。后来，李德生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讲秦始皇统一六国，讲汉王刘邦和吕后，讲灌婴和周勃，评说范文澜和郭沫若历史著作的得失。他逐渐体会到毛泽东的“古为今用”，他讲这些典故，是有着具体的或广泛意义上的针对性的。

周恩来适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李德生工作的安排和李德生的意见。

李德生依然摆脱不了深深的负重感，趁着这个机会说：“主席，我感到职务太多了，担子太重了，担心干不下来。我想，安徽省和南京军区（当时李德生已经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的职务是不是可以免掉。”

毛泽东看了李德生一眼，摆摆手说：“不要免，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毛泽东关切地说：“德生同志，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建议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周恩来及时提醒：“德生同志，就按主席的指示，大胆地工作。”

会见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李德生对毛泽东这样高屋建瓴地谈学

习，谈工作，觉得脑子豁然开朗，激动不已。他回顾每次工作调动，上级领导谈话，总是肯定前一段工作成绩，介绍新单位的历史荣誉、工作环境、人员情况，指示他应当怎么做，应当注意什么。尽管有的领导讲得具体一点，有的讲得原则一点，大体都是交任务，提要求。可是今天主席的会见，既不谈具体工作，又不提具体要求。他觉得这样的交代任务，像后来他经常听到毛泽东爱说的一句话，“不唱天，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只讲范围极其广阔的学习问题，是从战略上给他指明方向。

李德生回到京西宾馆，反复回忆毛泽东的谈话。他领悟到，毛泽东是要求他刻苦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历史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只有开拓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才有可能在中央工作。毛泽东为什么不允许他辞去安徽省和南京军区、十二军的职务呢，就是不让自己脱离实际。位置越高，越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下面工作是这样，在中央工作更应该是这样。这应该是毛泽东谆谆教导的良苦用心。

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去缩短“班长”和“军部”的距离；或者说，是努力研究和掌握中央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缩短军长和中央要求的距离。他给自己定下了工作程序：第一是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第二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活动；第三是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活动。特别是要在参加这些活动中，注意学习，多多思考，从而做好工作。

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不仅仅使他学习到中央领导工作的知识，也使他接触到某些难以言传的矛盾。

当时中央政治局的活动比较多，一般是周恩来主持。经常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

姚文元、黄永胜，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叶群、康生、谢富治有时请假。几位老同志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董必武，一般是不参加日常工作的。李德生从参加活动中注意观察、学习。每次开会之前，中央办公厅发给与会人员有关议题和讨论文件，通知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使得与会者有思考、准备的时间。会上，大家发言后，周恩来善于把各种各样的意见加以概括，形成结论。需要向毛泽东、林彪请示报告的，都由他签署意见或者自己写报告送毛泽东、林彪。李德生觉得，参加这样的会议，是学习领导艺术的学校。过去听人说起中央领导艺术的高超，现在有了切身体会。

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会上偶尔会出现某些不和谐的声音。开始，他以为讨论问题，从不统一到统一，是正常的。而且周恩来的综合，将各种不同意见恰当地统一起来了。后来他觉察到军队的几位委员，同原中央文革的几位委员，似乎话里有话，有某些说不出的矛盾。江青出席会议，有时会突然提出很刁钻的问题，同是政治局委员的张春桥，附和江青，虽然是强词夺理，却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撤销了，但是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却经常出奇的一致。他想起张春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后，许世友司令员爱引用群众批评造反派里“秀才”的话说：“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思想一团糟。”他还在后面加上一句：“打起仗来向后跑。”这是许世友对张春桥在军区部队中阳一套、阴一套，煽动极左，很不满意，借以给他的画像。李德生慢慢琢磨到，在中央工作，毕竟同“军部”不一样。许多事情，是没有人给你提示的，只能靠自己去体会。他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他更加谨慎地不轻易发表意见，谈任何意见，都要弄清情况，慎重思考，有根有据。过了半年，在讨论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时，矛盾愈发明显，他的这个态度也更加坚定明确了。

李德生很高兴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更多一点。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与会人员大都是提前两三个小时接到通知。会上，毛泽东会就某一个问题发表看法，有时驰骋千里，有时剖析入微，旁征博引，印证他的看法，充分显示他的知识渊博和思想的不拘一格。人们对他的意见很难提出异议。谈到历史，他所引用的古籍，只有周恩来、康生能应对得来，号称理论家的张春桥，也张口瞠目，坐在一边哑口无言。

毛泽东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醒李德生多读书，并且给他开书目。从《红楼梦》、《通鉴纪事本末》、《天演论》到《汉书》、《史记》、《何典》等等，而且常常谈历史故事，就古论今。“九一三”后，他还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大家讲到秦始皇是怎么破了六国的合纵，逐一灭六国统一中国的；他讲了周勃“敦厚少文”；讲灌婴从一个贩缯者，屡立战功，破韩信、项籍、鲸布，又在尽诛诸吕中，起了特殊作用。后来，江青吹捧吕后、武则天，要做“红都女皇”。不能不使他联想毛泽东屡次讲周勃，更加引起他的深思。

李德生是怎样通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活动，使他进一步熟悉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呢？

李德生之所以热心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如前所述，是出于他对地方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事业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出于他对周恩来的敬重。

对于经济建设，抓生产，抓群众生活，李德生有深切体会。他小时候吃糠咽菜，长征时常饿肚子。20世纪60年代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他当军长，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照样要吃苞米糊糊，吃点豆饼。管理处给主管的军首长建议，打算给军长家里补助

一点粮票，李德生断然谢绝了，硬是一斤粮票也不要。苏北“社教”、安徽“三支两军”，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到农村去，了解生产情况，他更体会到抓生产，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对于稳定局势是多么的重要。“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是他常说的话。现在到中央工作，参与管理全国这个“大家”，如果不熟悉经济，就怕很多问题没有发言权。这个道理应该是一样的。而且，近年来，他对抓经济建设，抓生产，兴趣大增，认为这里面需要学习研究的知识更多更广，大有钻研的广阔天地。

李德生更是希望通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向周恩来学习。他到安徽工作，是周恩来部署的；他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大都是向周恩来电话请示汇报，并且得到明确的符合实际的答复。他敬佩周恩来对各种问题的正确判断和具体指导，表现出老革命家群众观念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国务院业务组由周恩来领导，他想，参加业务组工作，可以得到周恩来更多的直接的教诲和帮助。

国务院业务组是1967年成立的。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混乱局面，国务院许多部门的工作无法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无法落实，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建议，要贯彻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有必要成立一个业务组，负责抓全国各条战线的生产。这个建议得到通过。开始业务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谢富治、杨成武、余秋里、谷牧等，后来批“二月逆流”，一些同志被迫停止工作。李德生参加业务组时，只有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与李德生同时被吸收参加业务组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德生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第一次会议，就从一些“小事”上体会到周恩来的作风。当他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国务院总理会议办公室，给李德生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所坐落在中南海北区的小四合院，北屋是会议室，李德生没想到里面的陈设如此简朴！中间南北

向一张长长的大会议桌，桌子北面是总理的座位，桌子两侧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位置，东西两面是列席会议人员的桌椅。四周墙壁已多年没有粉刷，木柱的油漆也很暗淡，但整个房间非常整洁。此时已值盛夏，送冷风的管道竟然裸露在墙壁上。室内的日历牌也是用木板制成，每天由服务人员在午夜时间准时更换日期。李德生后来听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曾经几次建议对会议室加以维修粉刷，都被周恩来拒绝了。进门两侧墙上，有两块悬挂多年不大的木匾，上面有毛泽东手写体“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它反映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风格和追求。但是，它们也不像外面很多地方挂毛主席语录那样，做得很大很醒目。

李德生坐定后，服务员问他是喝白开水，还是喝茶，他很奇怪。事后才知道，喝开水是免费的，谁要茶叶，需自己付两角钱，取一小包茶叶。如果会议中间，赶上午、晚餐，总理和住在附近的同志回家用餐，少数几个人留下用工作餐，就一起在东厢房的餐厅里围坐一桌，四菜一汤。饭后，由管理人员按购买主副食的实际价格，算出每人应摊的金额和粮票，月底开票结算，不给任何补助。

李德生在安徽工作时，临时住在一栋刚落成的大楼内，他和大家一样，只住一间办公室兼卧室，使用共同的卫生间，吃饭都在一起。当时觉得自己是很简朴的了。和周恩来比，他简直想象不出我们泱泱大国的最高国务议事厅，竟然如此艰苦朴素。比较起来，下面一些军部，大概要比这个“军部”气派多了。

开会研究工作，按照事先确定的议题，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补充一些会议文件之外必要的情况、数字、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周恩来总是抓住问题的症结，提出意见，甚至补充重要数据和情况。李德生自信对于人名、地名、敌情、我情、各项任务、各种数据，记忆力是很强的；对比之下，自己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而周恩来心中却装着全国、全党、全军的大局和数据。会议作出决定，适当

时候要汇报执行情况，要求非常严格，效率很高。工作实践，使李德生更加钦佩国务院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严格认真的精神，钦佩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李德生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不久，周恩来提出，请他协助分管水电部的工作。周恩来对李德生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两件事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件是上天，另一件就是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搞不好，洪涝、干旱，都对农业影响很大，对国计民生影响很大。”

李德生分管水电部后，及时向主持水电部工作的副部长钱正英请教，到水电部召开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座谈会，力求多知道一些全面情况和相关知识。此时，正是葛洲坝工程紧张的筹备时期。毛泽东很重视，强调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周恩来亲自组织实施。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多次和水利部的同志参加设计论证会、实地考察汇报会，广泛听取专家意见，比较利弊得失，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和细节，重大问题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周恩来特别提醒重视水库积沙和坝体与山体结合问题，要求设计中必须解决好。他一再说，要汲取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教训，要防止水库中的蓄水从水坝与山体之间泄漏出来。对于防沙、防漏这两大问题，周恩来多次提到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讨论研究，比较各种方案。周恩来当面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水利工程是同水打交道的，一丝一毫马虎不得，一马虎就要出大乱子。”李德生想，应当力求把容易解决的问题，放在水利部解决，避免周恩来为细小问题浪费精力。

到了1970年年底，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正式提交国务院，12月2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报告毛泽东批准，葛洲坝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尽管设计方案已经通过，周恩来仍不放心，再次强调，整个工程从设计方案到组

织实施，还要有个实践过程，要明确严格的技术鉴定制度和把关责任制度，实施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并且要通过葛洲坝的兴建为今后的水利建设，取得经验。

周恩来还对李德生和钱正英交代：要关心施工人员的吃饭、睡觉、安全，“请德生同志给武汉军区打电话，要他们关心葛洲坝的建设，给予支持。”葛洲坝工程开工后，水电部适时召开汇报会。1972年，水电部主持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汇报会，周恩来亲自参加，和大家一起研究解决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参加这样的实际工作，使李德生具体学习体会到，周恩来处理国计民生大事时的深入细致的作风。

李德生还在通过周恩来交办的两件具体事情中，更加体会到周恩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

1971年5月的一天，李德生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后，周恩来特意把李德生留下，单独对他说：“德生同志，我的一个侄女周秉建，和北京知识青年一起，在内蒙古插队，最近听说已经参军在内蒙古军区。”

周恩来为什么找李德生？此时已是庐山会议以后，在1971年1月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周恩来说：“你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请你和部队打个招呼，让她仍然回到生产队去。我已经和秉建谈过，部队的工作请你给他们讲清楚。”

李德生说：“既然已经穿上军装了，是不是不必离开部队了？”

周恩来说：“我的亲属可以离开农村到部队，广大下乡知识青年怎么办？请你一定要办好这件事。”

隔了两天，李德生又接到邓颖超的电话和信件，告诉这件事的原委。“文化大革命”后不久，还是学生的周秉建从北京到内蒙古

西乌旗吉林郭勒公社二队插队。1970年底部队征兵时，人武部门打算吸收周秉建参军。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知道周恩来对亲属要求很严，问过邓颖超是否同意。邓颖超表示，不同意秉建参军，还是留在农村锻炼；只有当地征兵，她合乎条件时方可以参军。华北会议期间，周恩来还曾经问过郑维山，郑维山回答说已将周秉建退回原地。邓颖超在给李德生的信中写道：事后“将此事告恩来同志，他即要我再打电话告郑，他也不同意周秉建参军，应长期留在农村锻炼，我当即与郑通了电话，周并批评我对郑谈话有漏洞。”



周恩来、邓颖超严格要求自己，使李德生深为感动。这是 80 年代，李德生与夫人曹云莲拜访邓颖超大姐。

李德生看到邓颖超的信，感触极深：总理主管国家大事，对于这样一件小事，一件私事，如此认真严格；邓大姐已经当面讲过了，又写信来说明情况，信中严于责己，确实令人钦佩。李德生

想，我们不仅在工作中要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学习周恩来的做人处事啊。

李德生还接到周恩来的一份批件，那是宋庆龄副主席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出孙中山先生一位老部下，有个女孩子很喜爱文艺，想调到总政直属文艺单位工作。周恩来批示：请德生同志办理。并且注明，宋庆龄同志极少提个人的事，望能予以关照解决，从速办理此事。李德生立即交代总政秘书长通知文工团派专人经办，直到把这个女孩从上海接到北京，安排好了，当面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听了后，让李德生向宋庆龄副主席直接汇报，此事才算圆满。

许多“小事”也令李德生难以忘怀。

周恩来的工作规律是从每天下午起，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上午9点以后。白天、夜晚，他要参加各种会议、会见活动；凌晨以后，才是处理各种文件的时间。在他临睡觉前，都要将必须紧急办理的事，亲自通知有关方面。李德生到北京后，工作习惯也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工作规律有了改变，一般是中午12点起床，下午、晚上参加各种活动，到午夜一两点以后，阅读和处理文件，到早晨五六点钟，办公室朝东的窗户放明，才回去睡觉。我们开玩笑说，真是天天高唱《东方红》。就是这样，有时会在上午八九点钟，办公室一号台的保密电话响起，往往接线员刚刚说“总理的电话”，那边就传来总理的声音：“我是恩来啊。”我们刚说：“德生同志已经回去休息了，是不是把电话转过去。”周恩来却说，不用了，你等他中午起床后，再告诉他今天下午3点以前，办一件什么什么事。周恩来事必躬亲，事事都严谨认真，却又不愿意不必要地耽误别的同志的休息。即使这样的具体通知，都想得如此体贴周到。每

接到这样的电话，李德生听到以后，总是感动不已。

李德生努力学习周恩来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他每天要阅读200多件文件、报告，办理几十件批件，每个批件都要弄清情况。有的报告，写的不清楚，他或者找人调查，或者开座谈会，直到把问题弄清，最后才作出妥善处理。对每一件批件、办件，都建立了严格的经办、催办的登记制度，做到件件有着落。

李德生活动顺序的第三家，是军委办事组。在这里，他又多了一种感受。

党的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几位老帅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仍然是副主席。同时确定设立中央军委办事组，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毛泽东、林彪负责。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最初，在林彪、黄永胜等人提名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草案中，并没有李德生。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军队干部进入政治局并将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只有李德生没有列入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这显然不是疏忽。草案送到毛泽东那里审定，毛泽东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个秘密，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作为林彪结党营私的证明，叶剑英将毛泽东批件原件给李德生看过，李德生这才对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时，处处受到冷遇，恍然大悟。

当时军委办事组有个很小的办事机构，办公、生活都在京西宾馆。为了战备，西山也有办公的地方。所以，军委办事组经常活动的场所是京西宾馆和西山。李德生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活动也比较方便。

然而，军委办事组 10 个成员，经常到会的不过六七个人，主要又是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人们把他们简称为“黄、吴、李、邱”。其他几位，自己所在单位工作忙，往往请假。李德生对于这几位在战争年代担任过兵团级职务，现在又是总部和军种的主要领导干部，是尊重的，觉得他们的阅历、经验比自己多，到中央工作时间也早，希望从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活动中，学习领导全军工作的经验。

军委办事组每周有两三次例会，就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召开。会前一般也通知议题，印发会议讨论文件。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比较起来，就不如国务院业务组那么严谨了。黄永胜或者吴法宪主持会议，先讲他们的意见，也不如国务院那样展开认真讨论。尤其使李德生感到意外的是，在没有固定议题的例会上，又没有重大问题急着处理，黄、吴、李、邱爱摆龙门阵，讲起四野东北战场、平津战役、两广作战；讲起“文化大革命”，邱会作怎样被二医大“揪斗”，吴法宪、李作鹏怎样在空军、海军“挨整”，又怎样组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得到林彪的支持。谈起来往往信马由缰，东拉西扯。有时，他们会提起毛笔，练习书法，旁若无人。这些，都是李德生没有想到的。而黄、吴、李、邱，对这位军长也不那么尊重，重大事项，很少征求他的意见；有什么事情，也只是让他在传批件上跟着画个圈，表示看过了。

1970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李德生按时来到军委办事组会议室，准备参加例会，可是过了 10 多分钟，还是不见人影，正在纳闷，警卫参谋倪瑞丰进来告诉他说，听到黄永胜的警卫员小费讲，今天是黄永胜大儿子结婚，在西山举办婚礼，吴、李、邱都去了。小费还问，你们首长不知道？李德生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李德生在政治上是很敏感而又不露声色的人。开始，他主要感到不习惯。后来，对他们一些做法有所警觉，虽然他并不立即作出反映，但慢慢地和他们保持了距离。

李德生参加中央工作后，从多次活动中，体会到中央在抓经济工作、解放干部和战备工作。尤其是毛泽东针对苏联领导人和军事首脑发出战争威胁言论，多次强调要准备打仗。1969年国庆节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10月18日，刚“疏散”到苏州的林彪，在事先没有向军委主席毛泽东报告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向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林彪这个口授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同时对于指挥班子、战备值班、某些兵器生产等提出具体要求。这个号令全军的紧急指示，却没有通过军委主席。在武昌的毛泽东，第二天才看到这个“急件传阅”的“电话记录”。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不高兴地指示“烧掉！”对于这个“紧急指示”，总参谋部加上“第一个号令”转发全军。这么一件大事，李德生只是听了黄永胜的传达，军委办事组也没有开讨论会，更不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后来，周恩来查询此事，军委办事组开会，批评总参谋部。会上，李德生发言时严肃指出：这件事，你们搞得可不好，这可是组织纪律性问题。

参加几个方面的活动，李德生渐渐体会到，在中央工作，不比“班长到军部”。军部的事情要明白得多，关系要简单得多。在中央工作，一定要弄清各方面的情况，掌握特点和规律。而情况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弄清，规律不是想象的那样容易掌握。只有一要谨慎，二要摸着石头过河，才能比较好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八、谢富治说，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不合适。毛泽东说，你就合适？

李德生 1969 年 7 月 28 日到北京的时候，周恩来同他谈话，已经明确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会议，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并且明确他“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然而，李德生被中央正式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却是在 1970 年 4 月 30 日。也就是说，中间隔了 9 个月。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呢？是个什么谜呢？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集团的成员在中央政治局里占据了相当数量。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已有的权势，还是在互相争夺，在扩展自己的势力。

林彪从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党中央、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元帅后，控制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的野心日益膨胀。起初，中央规定，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和贺龙、聂荣臻三人处理。林彪身体不好，常常借口有病，不做工作。军委的许多日常工作，是由贺龙元帅处理的。贺龙在组织部队加强党的领导，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古田会议决议，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组织全军大比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林彪认为贺龙是

对自己的威胁，十分不满。加之林彪在抗日战争时，曾经私下对贺龙书面表示，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一直怕被贺龙揭发。“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排斥那里的其他领导干部。李作鹏把海军主要领导同志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吴法宪也把空军反对他的领导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贺龙批评了李作鹏、吴法宪。林彪知道后，对吴法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又给李作鹏打电话，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此后又对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军委办公厅的一些人作了布置，让人写诬告信，使贺龙受到莫须有的诬陷。林彪又通过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攻击聂荣臻元帅。“批判”了贺龙、聂荣臻，林彪就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唯一正确”的人了。

在这同时，林彪又进一步在三总部、军兵种里安插亲信，图谋取得实际控制权。当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攻击其他领导同志，自己也受到冲击时，林彪出面保他们，使他们感激涕零，纷纷表示要效忠林彪。1967年5月13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违背周恩来有关首都军队文艺团体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支持一派演出，林彪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宣布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进而通过正式任命，使他们控制了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的领导权。

1968年3月，林彪和江青合谋，制造所谓“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控制了总参谋部的领导权。后来，又提名将吴法宪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任命为副总

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至此，军委有两个总部和海、空军，都可以直接听命于林彪。只有总政治部还没有安插他的人。

谋取对总政治部的实际控制权，林彪觊觎已久。

全国解放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领导全军政治工作，有很大成绩。罗荣桓元帅患病，请求免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由谭政大将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谭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政治工作报告时，竟然没有对林彪说一句赞扬的话。林彪提出理论学习只要学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不要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谭政鲜明地提出“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并且主持制订了院校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的学习大纲。有篇文章《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天才”、“统帅”，要“跟着林总走”，有人建议不宜发表，谭政表示同意，压下了这篇文章。1959年初，谭政在1950年开始的向文化大进军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计划用3到4年时间，普及中等教育，10年内使全军干部达到大学水平，以解决我军“人与技术的矛盾”，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960年9月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突然改变他1959年说的“军队现代化就是数理化”，改变当年1月说的政治工作还好，他很放心，反而指责总政治部抓理论教育、抓文化学习，是“政治工作方向偏了”，无端指责总政治部。当时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解释说，《十年规划》是军委集体讨论过、毛主席审定批准的。林彪听了很不高兴，说：“大家注意啊，吃菜吃心，锣鼓听音呀。”不久，林彪就批评总政治部“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谭政与他“不同心”，“不协力”，对他的指示“雷打不动”。他诬陷谭政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把

谭政连同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总政治部秘书长白文华，打成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排在好几位副主任的后面。

谭政降为副主任后，毛泽东听取了罗瑞卿、萧华的建议，后经党中央讨论，重新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主任多次和副主任、部长交换意见，对于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找答案”，认为不适当。他说：“比如两口子吵架，如何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他也指出：“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同马列主义一样，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他曾经在会上当面向林彪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有毛病，“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半晌不吭声，最后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话还没有说完，林彪竟粗暴地宣布散会，起身拂袖而去。

林彪对总政治部不听命于他，一直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开始，军委设立全军文革小组，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担任组长，同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总政治部按照军委几位老帅的要求，对全军“文化大革命”作了比较稳妥的部署。但军队一些院校却按林彪的要求，“踢开党委”，开展“四大”。院校学员不仅在学校造反，而且到处串连，一直跑到北京，造军委和总部的反，严重干扰了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总政治部请求军委领导同志接见军队院校学员。1966年11月13日、29日，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贺龙元帅前

后接见 10 多万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他们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强调军队要稳定，革命军人要守纪律。绝大多数与会人员都感到受到教育。老帅们的讲话，却成了林彪、江青诬陷老帅的“材料”。江青等趁机说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于是，刘志坚被撤职揪斗，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贺龙被“炮轰”。1967 年 1 月 12 日，不得不成立了以徐向前为组长的全军文革小组。此时，总部和一些军区机关，出现严重混乱局面，一些造反派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等。

1 月 19 日，军委碰头会上，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同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没有结果。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希望当面谈一谈，林彪都拖着不见。后来是徐向前坐车径直到毛家湾林彪家里，林彪才不得不见。徐向前讲了当前的紧急情况，理直气壮地提出处理意见，林彪只好同意。这才有了着重强调保持军队稳定的军委 1967 年 1 月 28 日的八条命令。这个命令要求军队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等等。对这件事，后来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康生竟然说是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江青也攻击徐向前“老了，不能工作了”。

2 月，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同志，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等人展开激烈斗争。3 月，二月抗争被江青公诸于众，并被诬为“二月逆流”。可是，尽管当时毛泽东对老帅们和其他老同志的二月抗争有些不满，没有反对“炮轰”他们，但也没有赞成打倒他

们。3月，确定由萧华主持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

总政治部依然是林彪的障碍。1967年7月25日，在所谓百万人欢迎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上，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军队的造反派煽动：“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店。”掀起“砸烂”总政治部的风暴。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批斗、抄家，副主任也无一幸免，都戴上“阎王”的帽子。正副秘书长成为所谓的“判官”，处长成为所谓的“牛头马面”，一般干部也成为“小鬼”。一时间，总政治部有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机关和直属单位有76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其中有17人被迫害致死。总政治部被他们说成是“一筐烂梨”。

11月，林彪指示在军委办事组下设立政工组、干部组，直接取代了总政治部的职能。1968年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由野战部队派干部战士到总政治部，把所有机关干部集中起来，编成班、排、连，离开机关办学习班，把被审查的部级干部集中起来加以“监护”。就这样，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管制”，这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荒谬的旷古奇闻。

总政治部被“砸烂”、被“军管”以后，谁来当总政治部主任？林彪自有打算。

他的本意是从吴法宪、李作鹏中任命一个。黄、吴、李、邱四员大将，黄永胜掌管总参谋部，邱会作掌管总后勤部，从吴、李中选一人掌管总政治部，这样三总部就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了。在他们的圈子里，这种传闻，早已不是秘密。在李德生到了军委办事组并分管总政治部工作后，他们依然毫不隐讳，经常互相恭维。李作鹏见到吴法宪时，半开玩笑地叫：“吴主任，你好！”吴法宪也爱回敬李作鹏：“李主任，你好！”李德生的警卫参谋多次听他们的

警卫人员互相询问：“你们首长什么时候上任哪？”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似乎已经在他们的囊中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林彪想的那样如意。毛泽东重用林彪，但又对他保持着警觉。对他重用亲信，很不满意。后来在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期间，他就曾经说：我是一方面军的，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

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毛泽东同样有自己的想法。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就是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生“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却一直没有下达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有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此事，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谢富治发言，他表示不同意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谢富治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队政治委员、八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治委员，很长时间是李德生的上级。应当说，他对于李德生的全面情况，是应当了解的。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跟上了林彪、江青。他明知毛泽东对李德生作了详细考察，有好的印象，却发言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这个发言，正好说出了林彪一伙想说又不好说的话。

毛泽东对李德生在安徽做群众思想工作，“大造舆论”，印象颇佳，他是赞成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在听了谢富治的发言后，很不高兴，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你就合适？”

就在政治局讨论确定以后，黄、吴、李、邱仍然想方设法，加

以拖延。按照惯例，李德生的任命手续，是应当由军委办事组办理的。他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却说：“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由此看来，他们的倾向性很明显，如果毛泽东画了圈，就可以按办文的惯例，按照报告上写的第一个职务，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以后他们再相机提名任命吴法宪或李作鹏为主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毛泽东焉能看出他们的用意，他在报告上批上了“同意”二字。同意和画圈不同，究竟是同意哪一个职务，毛泽东又没有明说。中央办公厅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那么，究竟是任命为主主任呢，还是任命为第一副主任？难题回到了军委办事组。

12月10日，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按说，这一次该明确了吧！黄永胜等居然又把报批手续拖延了4个多月，直到1970年4月30日，才向全军公布了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

这就是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的曲折经过。

总政治部负责全军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管理全军高级干部的任免和他们的历史档案，这是林彪集团志在必得的部门。林彪在1960年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毛泽东重新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时隔10年，林彪在污蔑总政治部为“阎王店”后，又想任命吴法宪或者李作鹏为总政治部主任，依然没有能够如愿。

九、既不批总政“阎王店”， 也不叫“新总政”

李德生“固定管理总政治部工作”，军委办事组只好按中央的决定，将原来由李作鹏管理的全军政治工作，转交给李德生。李德生怎么管理总政治部的工作？怎么做好全军的政治工作呢？

在李德生的军事生涯中，只有1934年1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后来在反六路围攻期间，部队有较大的伤亡，进行整编。9月，李德生主动要求回到交通队当班长。也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月，担任过政治工作职务。然而，他历来重视政治工作，并且经常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做好政治工作；他较长时期担任军党委书记，善于团结同志，处处以身作则，是很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军事干部。“三支两军”中“大造舆论”，就是非常实际的政治工作。他从切身体会中，懂得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完成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是军队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李德生自知，过去的经验，不能保证做好总政治部的工作。怎么才能做好总政治部的工作和全军的政治工作呢？李德生认为，一是了解军队政治工作和总政治部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二是把机关的同志团结起来，并且要在思想上统一起来；三是“摸着石头过

河”，从实际出发，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办事。

李德生通过有限的历史资料和请教老同志，了解到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历来在军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主要负责同志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任弼时先后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是元帅中唯一长期专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同志，对军队政治工作很有贡献和建树。战争年代，总政治部机关人员非常精干，少的时候，也就是一二十人。很多工作靠各个野战部队的政治机关去做。

全国解放以后，军队更加集中统一，总部机关的责任加重。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总政治部机关建设，加强对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为保证革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卓有贡献。总政治部机关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当时副主任、部长里面，有红军时期各个方面军、抗战时期各个战略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各个野战军的，其中就有李德生熟悉的第二野战军的优秀政治干部。总政治部五六十年代组织全军高中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发出向科学文化大进军的号召，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加强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指导出版《解放军报》等等，在全军有很大影响。李德生在部队学习文化，到军事学院学习，体会很深切。李德生认为，结合现实情况，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是总政治部的重要任务。

然而，总政治部的现状，同它的历史地位完全相反。总政治部的机关已经被“砸烂”，被说成是“一筐烂梨”，被“军事管制”。总政治部的干部被诬陷为“阎王”、“判官”、“小鬼”。几十年的历史怎么会如此巨变？李德生非常不解。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李德生谈到总政治部的历史，他虽然有不那么好的评价，但是也不是全盘否定。他说，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不要那么多人。战争年代，总政几十个人，不是照样工作吗。解放战争，军委指挥机构又有多少人？我看，总政机关不要超过 200 人。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怎么工作？毛泽东说，总政治部的工作，现在就是做好承办、批转。把党中央的意图承办好，把部队好的典型、好的经验，批转下去，加以推广。

由于中央分工李德生负责总政工作是明确的，所以，从 1969 年 10 月起，李德生不管有什么“吴（法宪）主任”、“李（作鹏）主任”一说，认认真真地抓总政治部的工作。

李德生首先抓总政治部机关的组织落实。组织落实怎么搞？难题多多。首先是机关要精简，总人数不能超过 200 人。其次是人员从哪里来？如果从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学习班的里面挑选，在当时会遇到各方面的阻力；而把他们排斥在外，也不符合继承优良传统的想法。几经考虑，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确定了一个原则，即编制总人数定额为 199 人，人员按五个“五分之一”选调：一是从原总政治部机关选五分之一，二从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干部组的工作人员中选五分之一，三是从各大军区军兵种机关选调五分之一，四是从军师机关选调五分之一，五是从团营分队选调五分之一。前两个“五分之一”中，原来也都是来自全军各大单位。后三个“五分之一”，一定要按罗荣桓元帅的办法，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199 人一次不要调齐，留一些机动名额，以便以后调整补充。尤其是各部部长、副部长人选，要坚持“五湖四海”，要同各军区、军兵种商量，请他们推荐人选。经过几次比较，总政治部机关 6 个二级部的 13 位正副部长，来自原总政治部机关和全军 11 个大单位。当时军队大单位有 20 多个，不可能都选到，那也要从战略区考虑。

由于正副部长中没有西北战略区的，不久，又专门从新疆军区调来一位副部长。

1969年新年前夕，总政治部机关人员调齐以后，住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李德生亲自动员，要求从1970年元旦开始，组织干部学习，主要是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统一思想，不要急于下部队。李德生认为，毛主席要求自己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下部队，刚调到机关的同志，同样应当把学习放在第一位。自己是“班长到了军部”，要学习，对于大多数机关干部来说，同样有个学习过程。他要求机关人员，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以适应高级领导机关的需要；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部队的实际情况带回机关来，在下面不随便表态，不随便答复问题，不指手画脚，不当钦差大臣；机关工作，着重加强研究工作，建立起集体办公制度。在情况不熟悉的条件下，一切事情要慎重处理，“领导机关无小事”，对于答复下面请示的事情，给下面打电话，都是代表总政治部机关的，都必须请示报告，任何个人不经集体研究和领导批准，不得随意给部队答复问题。由于机关干部绝大多数是来自部队，没参加过“四大”，没有受到派性影响；加之通过学习，人们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有了提高，思想行动比较一致，工作比较谨慎，组织纪律观念比较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总政治部机关，按中央和军委指示，由正副部长和部分处长带队，抽调10多个观察组、工作组、学习组，参加驻京机关部队的清查工作，都比较超脱，比较公正，及时给军委和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

然而，就在这前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开始给李德生出难题了。

1969年12月初，黄、吴、李、邱的亲信，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凡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统统烧

毁”。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政治部的历史档案里，有他们过去犯错误的不光彩记录，放在那里总是一块心病。他们惯用历史问题整人，现在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了，也怕有人以此整他们。黄、吴批示：请总政办理。他们是既想销毁材料，又不承担责任。

批件送到刚刚调来的两位副主任手里。二人一看，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二、什么是黑材料？他们请示李德生。李德生深知档案的重要。他在清江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专门派部队保卫市委档案馆，保证档案决不丢失一份，何况现在要销毁的是总政治部的档案呢。他同意两位副主任的意见，请他们写上：“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材料，应按以往规定办理。”显然，以往的规定，档案材料是不能随便处理的。报告回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又批示：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自行处理。那么，这个“自行处理”既可以按照过去的规定办，也可以自作主张办，实际上是给他们擅自处理留下空子。总政治部“军管小组”接到黄永胜的批示，将一些有关黄、吴、李、邱的历史材料，分别交给其所在单位了。

1969年12月29日，总政治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总政治部1970年新年、春节拥政爱民的通知，向全军表明，总政治部已经恢复工作了。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题目摆在李德生面前。“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治部成了“阎王殿”，被“砸烂”，把它叫作“旧总政”。而对刚刚恢复工作的总政治部机关，又有人叫它为“新总政”，以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叫法，比如“旧党委”、“旧某某部”，李德生对此做了一番思索。他想，如果人为地分“新总政”、“旧总政”，是割裂历史嘛，岂不是把我军几十年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都否定了吗？他在签发总政治部关于新年、春节

拥政爱民通知时，确定了一个原则：总政治部停止工作两年多，现在是重新工作，不是重建，我们的统一说法应当是“总政治部恢复办公”，不能叫“新总政”，要给机关干部讲清楚，自己不能自称“新总政”，别人这么说，要加以解释、纠正。“恢复办公”，在当时真是少有的大胆的提法。

就在1969年底1970年初，总政治部“军管小组”又给李德生出了一个难题。

总政治部“军管小组”是1968年10月成立的。总政治部被“砸烂”以后，全体干部，除了被关押、监护的，统统离开机关，成立班、排、连，在部队派来的干部、战士“军管”下，搬到北京郊区部队营房办“学习班”。“军管小组”组长由海军政治委员王宏坤兼任，但是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担任副组长的某军副军长。“军管小组”无论大事小事，都直接请示军委办事组，请示黄永胜、吴法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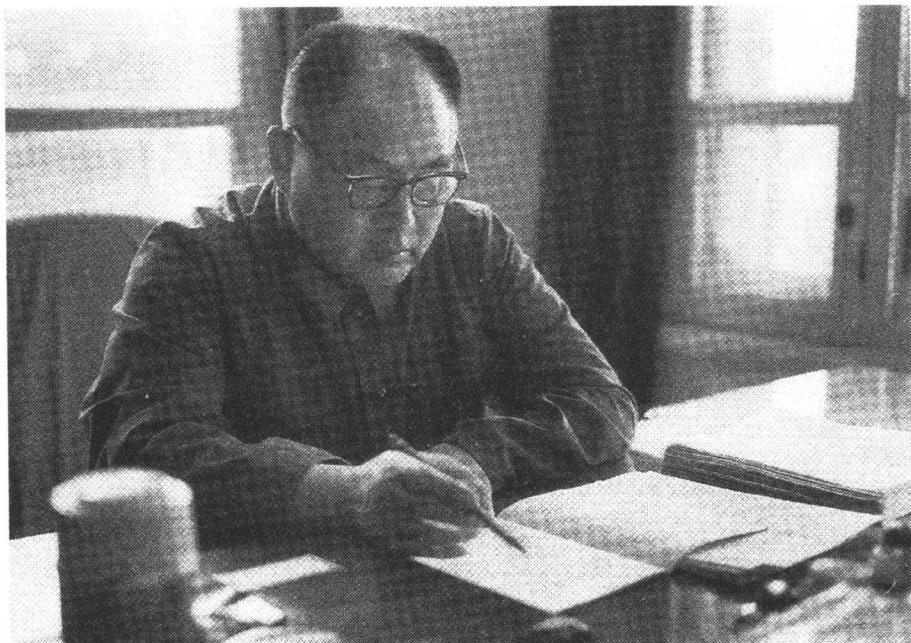
一向有事请示黄永胜、吴法宪的那位军管小组副组长，专门给李德生送来几大本打印好的材料，即所谓总政治部“阎王殿”的“罪行”汇集。他们送来这一套材料，大概是出于两个考虑，其一，可以显示他们两年多“军管”的“成果”；其二是，为“新总政”成立作“贡献”，为“大批判开路”提供材料。

“大批判开路”同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做法，干什么工作，都要先大批判一番，以示“破旧立新”。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就遇到要不要批判“旧总政”这样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

摆在李德生面前的是两种做法：搞“大批判”，这就是同意“砸烂总政阎王殿”；不搞，很不合时宜，很有风险。怎么办呢，李德生接到所谓“总政阎王殿的罪行材料”后，自己看了一遍。为了慎重起见，特意要秘书找专人认真阅读，要他们不带框框，看过以后，提出处理意见。隔了两天，李德生单独听取了汇报。汇报

的同志讲，他们仔细地看了几本材料，认为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大字报摘编。分类很仔细，观点很鲜明。但是所谓的“罪行”，批判语言多，事实很少，而且观点与事实不吻合，是上纲上线，扣大帽子的。群众组织这样的大批判并不少见，要是领导机关作为正式开展批判的依据，很没有把握。

李德生听了汇报，不提任何问题，不作任何解释，果断地决定：“将材料全部封存，不必在新调来的机关干部中传播。机关继续学习，不要放松。”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决断，使“大批判开路”销声匿迹，而机关干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到中央工作后，李德生夜以继日地工作。“天天高唱东方红”，这是他在办公室批阅文件。

“军管小组”送去材料，久久不见回音，不好问结果，也不敢要回来。这个材料，从此被尘封起来了。

总政治部机关恢复办公，在认真学习的气氛中开始了。

李德生知道，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按照毛泽东过去一贯的说法是要“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可是，从当前的情况看，总政治部人手很少，水平不齐，难以适应各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要从大的方面，制定和掌握政策，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好“承办、批转”，到是非常恰当的。可是做好“承办、批转”，也应当高标准。他在总政治部办公会议上提出，做好“承办、批转”，可以做得很一般化，也可以做得很出色。你可以照抄照转，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盲目的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那样是不费力气，不用脑子的。搞好“承办、批转”的高标准，应当很好地学习理论，学习中央的精神，并且结合部队实际，才能承办好；要深入调查研究，把面上的和点上的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发现有价值的典型经验，加以批转推广。

此后一段时间，总政治部保持了谨慎的低姿态，不轻易在重大问题上擅自作出决定，提出主张。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总政治部没有随声附和，没有新的“创造”。

十、林彪说：“找个‘丘八’管秀才”

李德生从“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到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相隔那么长的时间，个中的缘由，他自己并不知情。李德生甚至以为，通过这几个月的实践，使自己熟悉总政治部工作的大体情形，这个时候，正式任命比较合适。

但是，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他们，完全清楚其中的经过。他们原先的方案落空了，现在的总政治部主任，既不是“吴（法宪）主任”，也不是“李（作鹏）主任”，而是这位李德生主任。他既不是一方面军的，又不是四野的，而是四方面军出身的第二野战军的一位军长。林彪他们要控制住总政治部，必须先要把这位军长掌握好，要让他的工作，服从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也就是听从林彪集团的指挥。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请一些干部到他家里来，见一下面，照个像，说几句话，看一场电影，用这样小动作，小恩小惠，笼络人，拉拢人。这一手法，有时挺管用，有的人受到“副统帅”接见，感到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不吃这一套，毛泽东曾经风趣地揶揄林彪的这种做法，说：“喝了人家的茶，不一定是人家的人。”

林彪他们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一场精心设计的“接见”

总政治部领导干部的活动出台了。

1970年4月下旬，林彪从苏州回到北京，就在李德生任职命令颁发后不到20天，他同黄永胜、吴法宪商量，确定在他的住地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

按照一般情况说，作为军委副主席，接见新任命的总政治部的领导干部，也是无可厚非的事。问题在于他接见时讲话的内容，竭尽拉拢、威吓之能事，显得很不正常。

1970年5月19日下午4时，总政治部值班室军委一号台电话响起，林彪的办公室通知，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副部长，包括解放军报社的负责人，集中乘车，5时到达毛家湾。

总政治部办公室急忙通知有关人员集合，当时有5位部长、副部长出差，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11位正副部长和解放军报社负责人一共14人，按时从总政治部机关出发，赶到毛家湾。只见在客厅门外，叶群，还有早已到达的黄永胜、吴法宪，郑重其事地站在那里迎接。

“九一三”后有人揭发，叶群在筹划接见之前，曾经找人出主意，总政人员到达后，见面的第一句话，说什么最能打动人？她从提供的诸多条目中，精心筛选准备。这时，她笑脸相迎，连说这句台词：“见到你们格外亲！”“见到你们格外亲哪——！”

大家第一次进入毛家湾，第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有几分神秘，几分荣幸。进入会客室，只见里面沿墙摆着一圈沙发，大家在叶群的招呼下坐定。林彪这才从西面内室走出来，向大家致意，然后径直坐在中间沙发上。

事先安排的摄影人员开始照相了。镜头转到林彪，林彪摸摸胡子说：“我还没有刮胡子呢。”叶群迈着小碎步跑过去说：“我就喜欢你的胡子。”并且让摄影员多给他们俩人照几张。林彪指着在座

的众人说：“照片洗出来，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上。”

摄影完毕，林彪开口讲话说：“第一次见面，都不认识。只认识李德生同志、黄志勇同志。”要说他认识李德生，只不过是九大几次会议上见过而已，并没有单独谈过话。黄志勇原是四野的一位兵团参谋长，倒是熟人。

为了显得亲切，他对其他 12 人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然后夸奖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办事的时候，比较成熟了。”而且说：“你们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一连用了 5 个“新”字，来表示他对总政治部的“褒奖”。总政治部刚刚开始办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新”呢？只能说，这一“褒奖”是廉价的，是另有用意的。其实他的内心，对于李德生领导总政治部，是多么的不舒服。这一切，所有被接见的人，包括李德生在内，都不明就里。

林彪开始言归正传了。他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

林彪讲到这里，叶群马上插话说：“林彪同志十几岁的时候，就爱读政治理论书籍。”

林彪再次肯定说：“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指着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知道，我在东北，首先也是搞政治。”黄永胜连连应声说：“东北的胜利，也是靠政治。”这么一说，林彪不只是搞军事在行，而且兴趣在政治，是政治工作的内行啊。这就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解放军是“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你们总政治部做政治工作，当然也是“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了。而且，林副主席是“兴趣在政治”，“首先搞政治”，总政治部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岂不是都要听林副主席的？

林彪的“政治”是什么呢？他不讲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而是从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的主张讲起。他反复宣传他提出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他进而把它们归结起来，说这些叫做“老一套”。他说“这些都是经过考验的，行之有效的”。“可不要以为老一套没有用，老一套好像不新鲜，但老一套很管用”，“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卖狗皮膏药，不要上当”。很显然，林彪是希望总政治部更加卖力地推行他的“老一套”。那么，在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前的30多年里，军队的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哪里去了，古田会议决议哪里去了？

他还借这个机会，点名攻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说他们是“搞技术第一”，是“搞资产阶级政治”。“你们不要简单地以为搞政治的人，就是政治家，就能对政治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评价，才不是那么回事。”

林彪讲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搞政变的政治，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政治。他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政变经”讲得非常露骨，以致毛泽东认为“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不过那时毛泽东的话还没有发表，绝大多数人，包括李德生，都是不知道的。

到会的人忙于记录，不可能想得那么多，也不会想到那么多。

林彪的讲话一层一层引向纵深。他讲“不能离开中心”。还打了个比喻说：“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林彪是不是要大家围绕毛主席呢？从下面的讲话中，人们很难得出这个结论。下面的话才是他的本意。他说：“有些事不好做主，你们就请示，请示军委办事组，李德生同志也在内。”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总政治部的工作，要请

示军委办事组、请示李德生；更可以理解为总政治部、“李德生同志也在内”，都要请示军委办事组。

林彪借攻击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罗瑞卿、萧华，威胁总政治部的同志。他指责他们有事“请示彭真、陆定一、邓小平、刘少奇，不走合法的组织路线”，“我本来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他们很多问题不找我。他们走邪门歪道，不合法，不合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吴法宪插话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不找林副主席讲话，找邓小平、彭真大讲特讲。”林彪说：“他们无政府，到处乱跟，不请示报告。”其实，那时林彪称病，经常在外地疗养，开会请他与会、讲话，是很难请到的。

林彪话锋一转，告诫李德生说：“你们不要走不合法路线，要走合法路线，要吸取过去总政、报社的经验教训。不抓根本，不走正道，总有一天要垮台。合乎政治原则，合乎组织原则，对革命有利，就不至于垮台。”

这一段话，大家听懂了，就是说，过去由罗荣桓、谭政、萧华先后担任主任的总政治部，不请示林彪，不听林彪的，“到处乱跟”，是“走邪门歪道，不合法”，所以先后都“垮台”了。今后，你们要听林副统帅的，要围绕他这个中心，所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是“九大行星”，都应当围绕林彪旋转，有谁敢不走他的组织路线，就必然垮台。“围绕太阳转”的真实含义，呼之欲出。

人们知道，历来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都规定，总政治部是党中央在军队的工作机关，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从政治原则、组织原则上来说，总政治部历来是有了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示报告的。林彪却把请示党中央的负责人，说成是“不走正道，走歪道”，并且上升到“组织路线”的高度加以批评。

讲到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总政治部的工作要“围绕”他“旋转”，要按他的组织路线办事，有事“请示军委办事组”，要突出他的“老一套”。

谈话进行到最后，林彪很巧妙地点到李德生。他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

他说：“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叶群乘机说：“毛主席很赞成林彪同志这句话。”

林彪这一番话，给人的印象是，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完全是林彪一手挑选、推荐的。

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是党中央下的命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这个任命中间的曲折，总政治部的同志，不可能知道。经过林彪这么一说，似乎是他“选个‘丘八’管秀才”，是他选了李德生这位军事干部，来主持总政治部和全军政治工作。他的意思很明显的是说，你李德生是我选的人！

林彪讲他对政治有兴趣，讲他创造政治工作的“老一套”，讲总政治部新班子要出新气象，而且是他“选个‘丘八’管秀才”。那么，你这个“丘八”要“不垮台”就走我的“合法的组织路线”吧，就推行我的“老一套”吧！这就是林彪策划这次接见的真实目的！

将近一个小时，林彪接见完毕，总政治部的人员上车离开毛家湾。

叶群跑出来送行，再一次演戏般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呼喊起口号：“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这出乎意外的行为，搞得大家不知所措。

李德生等回到总政治部办公大楼，不敢怠慢，先是核对笔记，

接着组织讨论，以求领会精神，研究贯彻的措施。大家知道，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等，曾经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认为“是个创造”，于是纷纷力求从正面加以理解，讨论还是相当热烈的。李德生处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对于林彪的讲话，不可能不说一些表示拥护的话。尽管他觉得讲话里面，有些不是真实情况，不能完全置信，可是又不能公然怀疑“接班人”、“副统帅”。李德生对林彪讲话不能全部接受，这种保留，只能自己做到心中有数。这是许多身经“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得不违心地讲一些“文化大革命”语言的难言苦衷。

李德生对林彪的讲话，感到至少有两条不符合事实。一是他把总政治部的过去说得一塌糊涂；二是说自己当总政治部主任，是他选的“丘八管秀才”。他亲自听到周恩来讲，是毛泽东、党中央确定他到中央工作，并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处于当时条件，李德生不能明说。他认为，这个讲话，传达下去，对总政治部的形象不利，对自己、对政治工作干部都不好。因此，在如何传达林彪“五一九讲话”的问题上，李德生要求，只向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传达，避免把“讲话”传播到部队中去。

总政治部机关在讨论中，力求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实质”，可是这些林彪集团圈外之人，怎么可能弄明白林彪的言外之意。没有参与阴谋的人，怎么能够理解林彪他们“以合法掩盖非法”，“以红旗掩盖反红旗”的阴谋呢？李德生和总政治部后来的工作，并没有走林彪“合法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事实为证：

6月份，解放军报社以林彪的“围绕太阳旋转”为主旨，写了一篇社论，可是题目是这个题目，它的主要内容却讲的是“永远沿着毛主席建军路线胜利前进”。这就和林彪的真实意图南辕北辙了。李德生等总政治部领导看了，不便提出意见，按照重大社论送

审的规定，送到军委办事组审查。黄、吴、李、邱看后，都明白不符合林彪本意，都很不满意，认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黄永胜轻蔑地说：“自己没有领会，怎么能写出文章来！边都不沾。”李作鹏也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围绕红太阳转是什么意思。”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总政治部的“学习成效”，总政的同志并没有接受林彪的讲话。

在林彪接见后几个月，1970年10月21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部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使之“在全军深深扎根，全面落实”。这就是说，没有突出宣传“老一套”。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时期制定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文件，它使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而且后来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至于要学习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尽管那个决议里，有林彪的“四个第一”等错误主张，有许多“左”的错误思想。但是那个决议，正如后来人们评价的那样：在与会同志努力下，也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写进了不少正确的、积极的内容。总政治部的这个通知，实际上没有走林彪“合法的组织路线”，没有贯彻他的“老一套”。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后来他又讲过多次。但是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全军部队按照党中央7月20日的通知，展开讨论。20多个大单位，多数单位的报告，都是拥护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尽管当时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得到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的支持，他们更希望总政治部的报告应当对这个意见有足够的反映。但是，经过李德生签署的总政治部报告，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部队的意见，同样没有

走林彪的“正道”。

林彪在毛家湾住地接见一些干部后，总是有人感激涕零，甚至写“效忠信”。没有想到，“五一九”以后，他没有收到李德生表忠心的信件。林彪如何不快，不得而知。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林彪的5月19日接见李德生和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是空前的一次，也是绝后的一次。

十一、“没有‘五一六’，你抓什么‘五一六’？”

“文化大革命”中，清查“五一六”，曾经是从1967年延续到1971年的一个政治运动。

什么是“五一六”呢？所谓“五一六”，是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到了七八月份，北京有一个不大的组织叫做“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它在北京几个繁华的地方，散发和张贴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传单。他们在传单里，恶毒攻击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群众看了非常气愤，纷纷起而揭发它和批判它。在极少数人中，出现这股思潮，不是偶然的，是江青暗中煽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她进而接过揪“五一六”的口号，在1967年9月5日和1968年3月25日的讲话中，把打击范围极度扩大了，她和康生、陈伯达多次把所谓“三指向”的，都定性为“五一六”分子。江青说“五一六”不仅“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凡是所谓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即所谓“三指向”的，都是“五一六”分子。

由于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打击范围极度扩大了。各地许多群众组织借此互相攻击，指责对方为“五一六”，任意抓“五一六”分子。有的地方，抓了上万的“五一六”分子。

在安徽省革委会成立前后，两派群众组织也曾经互相抓“五一六”分子。但是李德生对参加武斗人员都不轻易定性，同样，对于群众中清理“五一六”，坚持重证据，不轻易作结论。

到了1970年3月2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这之前的3月2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一文件，《通知》针对前一时期清查“五一六”集团中出现的扩大化的倾向，提醒各级领导和组织“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并且指出，清查重点应当是该集团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坚决制止“逼、供、信”及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式。对于其他反动组织，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而不要一律都叫“五一六”。

李德生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体会到文件的主导方面，是要坚决防止扩大化的倾向，注意严格区别两类矛盾。《通知》下发后，李德生比较清醒地向安徽和总政治部作了布置。总政治部把文件发给所属机关和直属单位，组织学习，强调不要乱戴“五一六”分子的帽子。

1970年6月，李德生回到安徽检查工作，着重了解“三夏”农业生产情况。有一天，省革委会保卫组负责人专门见李德生，当面请示怎样执行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此之前，李德生听取了省委同志的汇报，觉得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他耐心地向保卫组的同志说，1967年，“五一六”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

题，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标准，我们没有在群众组织中清查到那样的“五一六”分子。1968年，我们也重视了这个问题，在安徽，我们还是没有发现那样性质的组织。现在文件讲得很清楚，既不能“为他们翻案”，也要防止扩大化，并且规定了具体政策，应当按照这个要求办。

保卫组的同志依然担心，没有查出“五一六”分子，怎么向中央写报告。

李德生坚定地说：“有‘五一六’当然要清查，没有‘五一六’，你抓什么‘五一六’？我们总不能为了写报告抓几个‘五一六’分子吧。”

保卫组的同志依然不放心，说：“那我们的报告怎么写？”

李德生问：“你们清查了没有？”

保卫组的同志答：“清查了。”

李德生问：“有吗？”

答：“没有新的发现。”

李德生说：“这就好写嘛，经过清查，没有新发现‘五一六’分子。”

这样，在总政治部，在安徽，都没有发生清查“五一六”扩大的倾向。事实证明，李德生的处理是对的。各地在清查中多少存在一些问题。第二年，1971年2月8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着重强调在清查中，“要防止扩大化，要重罪行，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认真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十二、毛泽东说，你向他们要，一次不给，再要第二次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几次向李德生说：“你向他们要，一次不给，再要第二次。”

毛泽东要李德生要什么？毛泽东指的是一份“语录”。在1970年8月23日庐山会议开幕的大会上，林彪作了长篇讲话。当天夜里，根据林彪和叶群会前的授意，由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发给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为在小组发言时，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理论依据”。但是这个语录没有给李德生。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是林彪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后来毛泽东知道李德生没有这个语录，不止一次地向李德生讲：“你向他们要，你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呀，一次不给，再要第二次。”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李德生自从到北京以后，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集体会议。时间长了，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互斗争的某些个别的、表面的、肤浅的现象，有所感悟，但只是从认识不同上去理解，并

没有往坏处想。在九大之前，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成分还比较多一些。江青是想借助林彪掌握军委日常工作领导权的影响，“请出尊神”，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林彪，则想借助江青是主席夫人的身份，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到九大以后，各自占据了政治局委员几乎相同席位，相比之下，林彪更多更直接地掌握军权，又通过军队参加“三支两军”，在地方和中央机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江青等人虽然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在政府和军队里没有实职，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被撤销了。双方的争夺也就更加激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多次讲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但哪里能够制止得了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到了筹备四届人大，这是关乎决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大事，林彪、江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更加白热化了。

1970年3月8日，李德生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毛泽东建议的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筹备工作。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他自从1969年加强战备工作以来，已经在那住了4个多月。政治局议定的事项，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向他报告。可是这次会议不同，跟随毛泽东外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汪东兴也到了会，显然，他是从武汉专程赶回来的。他向会议转达了毛泽东对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听了汪东兴的传达，大家都表示拥护。会议接着讨论了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班子。李德生觉得这些都是大事。按说，国家体制，应当有一位首脑，应当设国家主席。既然毛泽东提出来了，自会有他的道理。因为在11年前，毛泽东为了减少烦琐的国务活动，省下时间从事调查研究，曾经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特意向从苏州赶回来的政治局委员叶群交代，请她向在苏州的林彪，报告毛泽东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李德生

感受到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到和办事的细致。会议同时研究决定成立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

接着，李德生又参加几次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文件。

4月初，李德生接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送来的一个传阅件，是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写的批语。这是李德生进京后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批语。批语中，毛泽东以气愤的语气写道：“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李德生一看，删掉的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话不都是林彪讲过的吗？李德生仔细想想，觉得林彪的提法，确实是把话讲绝了，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的批语，实际上是对林彪的批评。主席以如此严厉的口气，批评副统帅，这是很不寻常的。

4月11日，中央办公厅传阅一个电话记录，是林彪从苏州打来的，说是仍然建议国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而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专门讨论林彪的意见。李德生当时想到，这个问题政治局不是讨论过吗？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现在请他继续担任，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意思呢？既然不设国家主席，那就谈不上设副主席的问题了。可是，从宪法来讲，设国家主席，林彪似乎有道理。会上，多

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讨论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

不久，中央办公厅传阅了毛泽东的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毛泽东回到北京。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他甚至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而林彪仍然坚持他的主张。主席、副主席的意见不一致，李德生感到这个问题太大了。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又建议宪法上也不要设国家主席这一条，明显是自己不当，也不会同意其他人当国家主席的。而林彪却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他虽然说由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不宜担任副主席。他已经担任了党的副主席，焉有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道理。是不是以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为由，他要当国家主席呢。李德生并不知道，叶群私下里道出秘密：“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李德生处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政治局会议，发言更加谨慎了。

李德生已经知道毛泽东三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第一次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听汪东兴的传达；第二次是看到毛泽东的批示；这一次是当面听到毛泽东讲明此事。毛泽东言犹未尽，又引用历史典故，说明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会后，李德生请总政治部一位副处长，查找《资治通鉴》，弄清这个典故的详情。据史书记载，三国争霸，曹操自恃强大，封孙权为南昌侯，孙权屈于曹操势力，上书称臣，阿谀曹操为帝，并说这是“天命”。曹操把孙权的书信给手下的人看，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意思是：这个小子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隔了10年，孙权也自封皇帝。这说明，孙权请曹操当皇帝，并非真心，他自己想当皇帝，倒是本意。曹操看

穿孙权的真实目的，才有“孙权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这么一说。那么，现在，谁是曹操，谁是孙权？毛泽东同林彪这位“亲密战友”之间，怎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分歧！？

此后，毛泽东又三次讲不设国家主席，一次是7月中旬，中央召开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后两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谈过此事，并对林彪、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7月10日，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问题。会议确定8月21日至28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政治局会议后，李德生请假回安徽。

在宪法修改过程中，林彪一伙的意图日益显露出来；江青和张春桥等当然不会轻易让林彪的企图得以实现，而要利用这个难得机会，给林彪集团以打击。

李德生是在庐山会议后才知道，8月13日的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又就宪法草案稿中的一些提法，展开争论。张春桥事先了解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删去草案稿中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吴法宪听了很不以为然，当即情绪激动地反驳说，这是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否定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急忙打电话报告黄永胜，黄永胜马上打电话报告在北戴河的叶群。叶群回电话说：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奖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8月15日，李德生在皖北皖中检查工作时，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的电话，征求他从哪里上庐山的意见，他表示要再到

一些地方看看，将直接从安徽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随后，他又到安庆视察，并主持了省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筹备召开省党代会和抓工农业生产的问题。

8月19日，李德生同安徽的另两位中央委员从安庆乘中央派来的专机，直接飞往庐山。李德生下飞机后，改乘汽车登上庐山。汽车在山间盘旋，真个是“跃上葱茏四百旋”，气候越来越凉爽。这是李德生第一次上庐山，他亲身体会到这个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

李德生到了山上，会议秘书处安排他住在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驻地。

国务院业务组成员驻地有几座小楼，周恩来住在主楼。主楼上面几十米的山坡上有几幢小楼，李德生住第一幢，上面是李先念，再上面的一幢是余秋里。

庐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参加会议的人都利用会前短暂的空隙时间，偷闲一游。李德生不爱游山玩水，对于经常转战在青山秀水与穷山恶水之间的人，只觉得跋山涉水的艰辛；进得城来，才感到城市的嘈杂，不如大自然有山有水的情趣。他每天看看会议文件，空闲下来就在周围风景优美、空气新鲜的林间小道上散步，享受着大自然清新、凉爽的空气。

李德生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会，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九大后的一中全会，只是选举政治局成员。这一次要讨论三项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议题。对于他来说，参加中央全会讨论重大问题，又是第一次。这时，他还不知道，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8月23日下午3时许，中央全会在庐山会堂开幕。255位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早就在会场就座，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

候补委员坐在前排。主席台上是五位常委。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战备问题。

在周恩来宣布议题后，林彪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突然在会上讲话。坐在下面的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情况，都认为副主席讲话，是早就安排好的。

林彪说：“昨天晚上，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指示。”李德生听了这个开场白，觉得他的讲话似乎已经得到常委同意。接下来，林彪用很大篇幅，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林彪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

接着林彪从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甚至从自然科学等方面，来称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毛主席，是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政府、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讲话，用了一个半小时，其中有些提法，恰恰是毛泽东4个多月前在修改文章时删掉的词句。这不能不引起李德生的思考。

在林彪讲话之后，康生接着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并且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

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李德生想，担任宪法修改工作小组组长的康生讲这一番话，是不是在他离开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宪法修改小组有什么新的决定？

炎热的夏季，凉爽的庐山，使李德生心情安静不下来。毛泽东关于不当国家主席已经讲过多次，而林彪要求设国家主席也讲了不止一次。全会开幕，又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呢？原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争论，现在又在全会上提出，将造成什么情况呢？



这是李德生在 1970 年庐山会议期间所住的房子。左下面十多米处是周恩来住的主楼 442 号。

当天晚上，李德生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吴法宪突然在会上提出，讨论前应当先学习林彪讲话，为了学习好，可以再听一遍林彪的讲

话录音。这个建议得到政治局同意，并由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林彪知道后，特意派随同他上山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夸他又立了大功。

就在这天夜晚，陈伯达、吴法宪按照林彪在全会前的布置，整理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其中，还有林彪的语录九条。第二天中午，就打印出来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在北京），作为他们发言的依据。正如后来毛泽东批判的那样，设国家主席，是他们的政治纲领；称天才，是他们的理论纲领。可见，这份语录在他们那里的分量。然而，这份语录，在庐山的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里面，他们偏偏就是不给李德生。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李德生是不可信任的人。

24日下午，各组开会学习讨论。华东组组长许世友有事，华东组没有讨论，要求各小组自行学习。安徽小组一共只有3个人，又没有“称天才”的语录，所以议论一下，倒也无事。

分别参加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按照林彪的意图和定下的调子，拿着“称天才”的语录，作煽动性的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在西南组，吴法宪再次和张春桥大吵起来。黄永胜在北京值班，也授意专人起草他拥护林彪讲话的发言稿。他们都吹捧林彪的讲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甚至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写进宪法“是经过很多斗争的”；“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土话，他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边表演、边解释说：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24日晚，李德生和国务院业务组的同志，在余秋里住地再一次讨论修订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准备提交会议，作为第二项议程讨论。

第二天（25日）一早，会议秘书处送来第6号简报（华北组第2号）。秘书看到简报上陈伯达措辞激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赶快送给李德生。这一期简报，不仅登载了陈伯达的发言，还反映了小组讨论情况。简报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煽动性极大，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看了这期简报，就有人提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李德生把会议简报看了一遍，又仔细看了第二遍。没有想到，原来的担心，怎么这么快、这么激烈地反映出来了？他认为事态太严重了。在他的印象里，陈伯达只是个“大秀才”，常常自称是“小小老百姓”，为什么胆子这么大？有什么来头？以他常委的地位，煽动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他觉得看不透事情背后的真实情景，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从来不抽烟的李德生，下意识地从桌上抽出招待客人的香烟，

点燃后，用力吸了几口，以图理顺自己的思绪。2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对当时会上出现的问题，使我引起了很多思考，深深感到情况严重，斗争复杂，这是我到中央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严峻的局面，而且许多问题使人迷惑不解。比如，林彪为什么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后，一直坚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为何如此有恃无恐地带头发难？陈伯达和张春桥过去常喊叫“战斗在一起”，现在却剑拔弩张，势不两立？这场矛盾和斗争的根源何在？性质是什么？毛泽东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可能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现实，最要紧的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光明磊落，要按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办事；不能随意表态，不要跟着起哄，不要介入非组织活动。不管碰上谁来打与拉，都不动摇。一个上午，他都在沉思中度过。

李德生在林彪“九一三”叛国出逃后才得知，林彪25日看到简报，高兴得哈哈大笑，说：“数这份简报有分量，讲到实质问题。”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兴高采烈，神气十足。吴法宪找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气氛写得足一点。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一期简报。

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一年前，林彪的“第一号号令”，“亲自指挥”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现在，已经讲过多遍的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又在二中全会上突然再次提出，并且在两天之间，造成这么严重的状态。他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25日中午，李德生接到通知：当天下午3时，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是在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逐一谈话后确定召开这个会议的。

据李德生回忆，当时毛泽东讲话十分严厉。他说，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转过脸对林彪补充一句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主席职务。他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精神的。应该按照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泽东还把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年纪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只能在后台，不能在前台。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年好不好。会议决定，各分组立即停止讨论林彪 8 月 23 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总第六号）简报。

8 月 26 日，会议秘书处通知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晚，李德生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在会议室里，大家在一圈沙发上就坐。会议开始，由陈伯达、吴法宪做检讨，两个人吞吞吐吐，只讲他们是出于拥护毛主席的愿望，希望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结果犯了错误。周恩来严肃批评他们打乱了全会议程，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林彪发言，明为批评，其实是为陈伯达、吴法宪辩护、开脱。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说，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再当国家主席，我已经说过六遍，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一句顶一句也有六句了，怎么就不听呢。接下来他又说了几句话，更令李德生听了感到震动。毛泽东说，我是一方面军的，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李德生听出毛泽东是在明显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的宗派主义。

28 日起，各大组听取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录音。大家听到陈伯

达、吴法宪的检讨和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才初步了解在“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上的斗争。

从8月26日到30日，各小组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庐山会议上，只有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后来上山的黄永胜，这样极少数人，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宣传两个纲领，是事先串连好了的。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里面，不少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因而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闹出大笑话”，于是，使事态出现那种复杂的局面。

29日上午，周恩来通知李德生，准备下山换班。原定国务院是由李先念下山换纪登奎，军委办事组是由吴法宪下山换黄永胜。可是吴法宪还要继续检查，中央决定由李德生下山换黄永胜。

30日清晨，李德生到周恩来住的主楼，请示总理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正在吃早饭，他指指对面椅子，请李德生坐下。周恩来说，先念同志回去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你回去替换黄永胜，让他上山参加会议，你回去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周恩来接着问李德生，你们华东组是怎么讨论的？李德生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华东组的情况没说什么，只是说，林彪在开幕时的讲话，我也没想到，华北组陈伯达搞的简报，是突然袭击。李德生这才了解，林彪在开幕时的讲话，并没有经过常委会，他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后来他才知道，那几天，周恩来按照和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同一些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谈话做工作。因为自己要下山回北京，周恩来特意向他打招呼。

30日上午，李德生和李先念乘汽车下庐山，到了九江机场。不久，一架专机飞来，上面下来纪登奎和黄永胜。双方见面握手后，北京来的人换乘汽车上山，山下来的李先念、李德生搭乘飞

机飞回北京。

9月2日，周恩来有一个重要外事活动，临时从庐山回北京，中办通知李德生到机场去接。李德生按时到了西郊机场，迎接周恩来的只有李德生一人。周恩来下飞机后，拿着一份文件，向李德生说：“德生同志，你看一下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庐山的问题就全明白了。”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是8月31日写的，也就是他从8月26日到30日，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以后写的。此时李德生已经回到北京。

李德生回到办公室，认真仔细地看了好多遍。《我的一点意见》开头就对“称天才”语录加以批评，指出：陈伯达搞的这个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他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

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庐山会议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起此事。

毛泽东问李德生：“你们那个组是怎么讨论的啊？”

李德生如实说：“我没有那个语录，所以我们组没有讨论天才的问题。”

毛泽东再次问李德生：“你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你怎么会没有呢？”

李德生这才知道，在军委办事组成员里面，他没有“称天才”的语录。

李德生说：“我是从《我的一点意见》的附录里看到的，我也奇怪，怎么就没有人给我送这个材料。”

毛泽东清楚，林彪、陈伯达是不会把语录给李德生的。他向李德生说：“你向他们要，一次不给，就再要第二次。你就说，‘你那个宝贝怎么不给我啊’。”此后，毛泽东多次给李德生提起此事，要李德生向他们要语录，一次不行，再要。这是毛泽东的政治幽默。

十三、毛泽东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 但指出，除李德生外

李德生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是8月19日到的庐山，30日离开庐山回北京。而九届二中全会是从8月23日开始，到9月6日结束的。李德生没有参加后期的会议。

回到北京，李德生一直在思考庐山会议的复杂斗争情况。

庐山会议上的风波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是毛泽东对于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对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错误，毛泽东认为与陈伯达的性质不同。8月26、27日，周恩来在同毛泽东谈话后，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谈话，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背地里报告了林彪。林彪暗中向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更直截了当地对吴法宪说：“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2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在分组讨论中的错误发言。接着，他们作了“检讨”。作为主持会议的林彪，这次会本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检讨一下他在全会开幕时讲话中的错误。而林彪却对错误采取

回避推诿的态度。他借机表白说：“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他又为吴法宪等人开脱说：“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以掩盖吴法宪等人的错误。

许多情况，李德生当时并不了解。他回到北京后，先是看到周恩来带来的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他感到这篇短文集中地批评陈伯达，并且从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作了分析。后来他又了解到，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要陈伯达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李德生认为，毛泽东对陈伯达，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对林彪，是有区别、有步骤地采取了不同措施，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

庐山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公报》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讲到会议的三项议程，提出了今后任务。而对庐山的斗争，没有做任何透露。公报最后的号召里面，依然写着：“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读了公报，李德生感觉到，庐山的斗争，依然是放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作为党内斗争来处理的，依然采取团结的方针。不要让它干扰既定的部署，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随后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由林彪发表国庆讲话。

9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成立审查陈伯达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和李德生3人组成。

李德生很不了解陈伯达。他只知道陈伯达1927年入党，到过苏联，在白区做过党的宣传工作。抗日战争初期，陈伯达到了延安，写过几本有名的小册子，是个“大秀才”，经常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没有听说他做过什么实际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据说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

件的起草，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许多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被排除出中央工作之后，惟有他和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处讲话，常常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很善于鼓动群众造反，被造反派称之为“左派理论家”。李德生到北京工作，已经是九大以后了。陈伯达由于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没有被毛泽东采纳，很不得意，虽然是政治局常委，是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领导人，但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般很少说话。在李德生的印象里，这位“小小老百姓”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处讲话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李德生并不知道，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前，就和林彪结合在一起了。他只是觉得，庐山会议上那个第6号简报，陈伯达的发言，确实惊人。他不仅发挥了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设国家主席”、“天才论”这两个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还直接有所指的提出“揪人”，按照他的语气，是要揪政治局里的人，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了。按说，这位理论家，应当懂得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吧；这位政治局常委，应当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应当懂得组织性纪律性吧。这么大的事，政治局没有酝酿，更没有讨论过，陈伯达居然在这样严肃的会议上，作出极富煽动性的发言，毛泽东批评说是违背了九大的团结路线。出现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审查陈伯达的专案组成立后，为了弄清陈伯达复杂的历史情况，确定委托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到福建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10月7日，专案组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林彪，建议将《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到省军级，以便得到揭发陈伯达的更多材料。

按照毛泽东批示的意见，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要求传达到地、师级，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庐山会议后，李德生将会议精神，在总政治部机关中，作了认真的传达。他在向机关师以上干部传达时，提到毛泽东讲的，他是一方面军的，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他是湖南的，身边没有湖南人。

总政治部机关干部，来自全军各个方面，保持军队的优良传统，遵守保密纪律，没有人私下议论和传播。他们听了李德生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大家认识有所提高，工作更加谨慎，也都更加重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而且，总政治部机关绝大多数干部，同林彪、黄、吴、叶、李、邱等，没有私下交往，所以能始终保持着距离。

庐山会议的斗争是复杂的。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其实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9月2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康生一起，把毛泽东的批示送给林彪看，建议林彪转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希望他们写出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对于这样的善意，林彪依然加以拒绝，推给周恩来出面，给他们做工作。

经过周恩来分头谈话后，9月29日，吴法宪不得不写出第一次书面检讨，认为他所犯错误的原因是“没有认真改造世界观”，“主观主义，自以为是”，“政治上极端幼稚”，“不论从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说，都是错误的”。而把真实的情况隐瞒了。

叶群在10月12日向毛泽东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她回避“称天才”的语录，欲盖弥彰地辩解说，8月24日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

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是事隔一个多月，在周恩来谈话之后，才不得不做的。

对于他们的检讨，毛泽东作了多段严肃的批示。

对于吴法宪 9 月 29 日的检讨，毛泽东 10 月 14 日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在文内还写了八处批语。批评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对于吴法宪检讨的“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下面，毛泽东画了线，指出：“这些话似乎不真实。”在另一处批语说：“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驳斥了“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的批评，不止对吴法宪，而且指明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但是，毛泽东在括弧里注明，“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

对于叶群的检讨，毛泽东 10 月 15 日批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

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的批示，既严肃地批评他们在政治上、理论上的错误，又指明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

李德生看到毛泽东“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的批示，给他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事情不仅是吴法宪、叶群了，“其他宣讲员”是谁呢？李作鹏、邱会作也曾经作了激烈发言，毛泽东已经表示“愿意看见”他们的检讨。至于黄永胜，他是后上山的，那时，事情已经明朗，他不可能再作那样的发言。在这场斗争中，他是个什么状况呢？！

李德生从吴法宪、叶群的检讨全文和毛泽东的批语看出来，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是不满意的，而且要看到“其他宣讲员”的检讨。然而到1970年底很长时间，吴法宪、叶群不作第二次检讨，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没有任何要作检讨的表示。他们这样对待毛泽东的批评，令李德生颇感意外。

从1969年4月组成军委办事组的时候，毛泽东在组成人员名单上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到1970年10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的时候，又指出除李德生外。一个“还有”，一个“除外”，表明了李德生在这场斗争中的情况。事情确实是这样，李德生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后，没有跟着林彪跑，没有参加他们集团的阴谋活动；而林彪他们许多非法活动，都背着李德生。“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把他排除在外，就是一例。

十四、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1970年11月18日，李德生向中央政治局请假，回安徽检查总结1970年的工作，部署1971年的工作，研究准备召开安徽省第三届党的代表大会。在安徽，他召开各种座谈会，到一些地区和单位检查工作。一个多月，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12月19日，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他很了解，即使在北京，毛泽东那里有了通知，也是必须按时到达的；但是，已经请假到外地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日常的政治局会议一般可以不到。自己这次外出，是请了假的。通知传到安徽来，显然不同一般。李德生赶紧把安徽的工作向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作了交代。第二天，12月20日，就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

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吧。他简要地汇报说：“从现在看，今年安徽粮食

丰收已成定局，比去年增产，工业生产也不错。党的各级组织基本恢复了，我们正在筹备召开省的党代表大会。”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毛泽东让李德生到北京军区工作，是他处理林彪、陈伯达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陪同叶剑英视察北京卫戍区部队。

李德生毫无思想准备。他一直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经提出减少兼任的职务，当时毛泽东就说，一个也

不要免，安徽的不要免，南京的也不要免。每当提起工作压力大时，毛泽东总是鼓励他。现在竟然又要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他想，自己已经有那么多的职务，一个也不免，再管一个大军区的工作，而且这个大军区，北有苏联大兵压境，内有京畿卫戍重任，所属野战部队在各个军区里面是最多的，这个军区司令员的担子更重。如果关照不好，将会给党的工作带来损失。可是毛泽东已经作出决定，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他不能再提出推辞的意见了。

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李德生想，如果不答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少兼一个职务了。

不料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毛泽东说：“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搞好承办、批转。”毛泽东接着讲开了总政治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评价了从红军时期到解放以后，总政治部历届主任的情况。

同李德生刚到北京时毛泽东同他谈话一样，毛泽东没有讲到北京军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到北京军区应当注意什么，而是向李德生说：“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哦。”

毛泽东又问李德生：“你知道北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吗？”李德生当然答不上来。毛泽东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啊。”

毛泽东交代李德生：“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再到职上任。”

李德生回到总政治部机关办公大楼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送来

了毛泽东 12 月 19 日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请示的批示，他又让秘书找出 16 日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

那是李德生回到安徽以后，1970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请中央和军委“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毛泽东还说：“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政治局于 12 月 18 日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后，决定 19、20、21 日先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然后召开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华北会议。同时确定由黄永胜、李作鹏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要他们在会上通过揭发批判，达到团结的目的。

12 月 19 日，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告毛泽东。当天，毛泽东批示照办，指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并且提出：“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要求“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两个包袱”指当时部队中不少人存在的打仗有功、“三支两军”有功的思想包袱——作者注）

21 日，也就是李德生赶回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京西宾馆，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华北会议。这个会议，是北京军区召开的，由于会议的主题是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陈伯达，所以称之为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于 1970 年 12 月 22 日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 449 人。与此同时，军委办事组也召开了有各大单位领导

干部 143 人参加的军委座谈会，开展批陈整风。可是军委座谈会开了 1 个月，还根本不批陈，黄、吴、叶、李、邱又不检讨。毛泽东指示，参加军委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参加华北会议。

1970 年 12 月 22 日，华北会议正式召开。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

李德生对于到北京军区任职，对于参加华北会议，毫无思想准备；对北京军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很了解。在参加会议时，无论大会小会，他按照自己的一贯作风，认真听各方面的发言，在没有形成准确的看法前，不轻易发表意见。但是，毛泽东已有交代，他积极了解和分析情况，会议期间，他多次参加了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

华北会议开了一个月零两天。首先展开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主要是揭批他的历史问题，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等。今天看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在林彪问题还没有揭开的情况下，对陈伯达的批判，不可能涉及像 1981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那样，证据确凿地表明：陈伯达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伙同江青、康生，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诬陷陆定一，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制造冀东冤案，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历史地看，华北会议的揭发，没有触及陈伯达真正的罪行；会议的批判，也难以触及陈伯达问题的要害。

华北会议接着又批评帮助在陈伯达问题上有“错误”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北京军区和河北省的领导同志李雪峰、郑维山。庐山会议期间，由于李雪峰、郑维山也在华北组，听了陈伯达的发言，同意出简报，庐山会议后“不认真开会传达”；于是，华北会议批评他们“积极配合，表态支持”，“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华北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政治局没有指派江青参加会议活动。然而，她却跑到大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她不是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是大讲特讲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再次把矛头指向聂荣臻元帅。庐山会议，林彪集团受到批评，江青集团重新张狂起来。她在华北会议讲话中，耸人听闻地说：“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同志们想一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这个华北山头大得很呀，而且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完全不能掉以轻心。”“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她污蔑聂荣臻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她指责北京军区“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在庐山帮助陈伯达反党夺权，北京军区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

江青的讲话，给会议起到“点火升温”的作用。

在一个月零两天的会议期间，李德生先后七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研究下一步工作，这使他接触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矛盾。他对于周恩来正确掌握会议进程，正确处理江青讲话的做法，非常钦佩，自己从中也了解了北京军区的某些情况。

在会议开了近 10 天的时候，会场上“温度”越来越高，1971 年 1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汇报后认为，会议已经进入高潮，需要加强领导，减少对立，以利团结。当夜，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进一步提出：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要“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合主席对‘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报告，1 月 5 日召集会议，专门讲了开好华北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并要求予以落实。这就使得李德生进

一步明确了开好华北会议的方针，是团结的方针。

江青在华北会议大会上两次讲话，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她的讲话，专门整理了记录。这个记录怎么办，不发，江青不会同意；发下去，在更大范围传达，必将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周恩来写信给江青：“我勾掉了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并且告诉她，毛泽东在1971年1月6日批示：“（江青）讲话不要印发。”7日又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11日，周恩来将江青两次讲话记录整理稿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毛泽东的批示，使李德生领会了今后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些，是没有向会议传达的，听了江青讲话的干部并不知道，应当防止他们中某些人产生偏激情绪。李德生作为会议领导人之一，只能循循诱导，以掌握会议的中心议题。

1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了华北会议结束的工作。20日，周恩来将讨论情况写信报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信中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华北会议之后，仍需进行一段艰苦的教育工作。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华北会议于1971年1月24日结束。周恩来作总结讲话，讲话提纲事先经毛泽东审阅。讲话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对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作了部署，最后提出：“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以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周恩来同时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党委第二书记（谢富治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谢去世后，1972年10月，李德生任第一书记），纪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三书记。

按照中央决定，郑维山调离原职，被中央安排到安徽休息。李德生专门向十二军交代，要他们在生活上关照好郑维山，有病治病，不得耽误。十二军经常派管理人员和医生去看望。粉碎“四人帮”后，郑维山见到李德生说：“我1971年到安徽以后，得到十二军的很多照顾，我是很感谢的。”李德生很诚恳地说：“华北会议和军区的批陈整风会议，对你的批评，是不实的，我很不安。”李德生说的是真心话，即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违心地批评一位领导同志，对于李德生来说，也是极少有的。郑维山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坏人当道”等等，以及后来又说北京军区是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纯系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迫害和受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华北会议期间，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又写了一个批示，后来他把这个批示也称之为解决林彪集团的一块石头。那是1月5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作了《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在部队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以及总政治部审定的解放军报社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之后，提出要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立新功的思想。后来看，这“三破三立”，实际上也是对林彪集团思想倾向的批判。此时，正在召开华北会议

和军委座谈会，而黄永胜等人依然没有作进一步检讨的表示。毛泽东的石头甩出来了。他1月8日在批示中指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他着重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批语后，周恩来即将批件给李德生，请总政治部代拟批语。

李德生此时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华北会议，他按照毛泽东的批语和政治局的意见，立即把总政治部的同志找到京西宾馆研究，起草了代拟的批语。李德生立即报送周恩来。周恩来又作了仔细修改，突出了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要“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并具体分析了骄傲自满的表现：“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1月11日，毛泽东批示“照发”。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至县团级。而总政治部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发出通知，这是多年没有过的。

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传达贯彻华北会议精神，开展批陈整风。1971年2月2日，军区召开批陈整风会议，团以上干部1000多人参加。李德生、纪登奎主持会议。会议按照华北会议的基调，反复强调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一分为二，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会议开了40多天，3月23日，李德生作了总结讲话。讲话经过多次修改，坚持按照华北会议的调子，不要“升温”，不要“拔高”。虽然也“批评”山头主义，但始终避免使用“华北山头主义”。讲话稿报告中央，经

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以中央文件印发，李德生才在大会作总结讲话。

李德生在此期间，还抓了总政治部机关和全军的理论学习。

毛泽东在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指出1964年中央曾经选定30本马、恩、列、斯著作，根据毛泽东最近的意见“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规定了6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5本毛泽东的著作。对此，毛泽东说：“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及1000个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还认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李德生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组织了总政机关和全军高、中级干部学习理论。

李德生要求总政治部党委中心组和机关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理论，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统一思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每周都请军队和地方院校的理论工作者讲课辅导，并且强调着重弄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问题。

毛泽东在要求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对于林彪搞的个人崇

拜，非常不满。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时，他曾经讲“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他在一次同政治局的同志谈话时，批评了形式主义的种种现象。然后提出，你们最好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他严厉地说，不把那些东西取下来，我再也不进大会堂。当时他指着李德生说：你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你去负责办这件事，办好了给我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悬挂“毛主席语录”，普遍得很，有的人家家里也贴上几张。至于公共场所，“毛主席语录”几乎无处不在，都弄得非常突出，非常醒目。可是，挂上容易，摘下难。李德生遵照毛泽东的要求，亲自出面，和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王良恩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认识他们两位，按照他们的指挥，把所有语录牌匾，从各个会议厅全部摘下来，换上了图片或国画。事后，李德生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李德生联想到，京西宾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总部经常使用的场所，应当和人民大会堂一样，把所有语录摘下来。他亲自到京西宾馆，指导工作人员把会议场所、客房室内的语录，全部摘下来，换成国画。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听说军队搞了一本新的语录，这件事没有经过中央，德生同志，请你查一查。李德生调查后，果然发现，早在1969年底，政治学院在军委办事组的授意下，编辑了一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小红书，封面是林彪手书的书名，书中不仅收入原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33章270页，又编入了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最新指示”为主的语录46章492页；还编入了林彪的语录35章490页，大量收入了林彪突出政治，煽动极左思潮，打倒一切，制造个人崇拜的言论。这本语录的出版和使用，不仅干扰了理论学习的系统性，而且助长了极左思潮的发展。李德生指示总政治部机关，负责收缴已经出版的

书，制止了这本书的继续出版发行和使用。处理的结果，李德生向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报告。

华北会议和毛泽东“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的行动，并没有引起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对自己错误的认真检讨。

毛泽东于2月19日对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批示中，指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军委办事组接到文件后，不得不开会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批评。大家都说，要写一个检讨报告。李德生说，我们召开军委座谈会的时候，没有认真批陈，也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后来参加华北会议，依然没有认真批陈，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这样对待主席的指示，很不好啊！我希望把这个检讨写好。会后，黄永胜虽然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只是不痛不痒地说是“认识不足”。毛泽东接到报告，再次批评“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直到1971年3月21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才写了书面检讨。3月24日，毛泽东批示“我认为写得都好。”紧接着他又写上：“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希望他们有改正错误的行动。

李德生于3月25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李、邱书面检讨的批示，要求吴法宪、叶群做第二次书面检讨。为了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创造在一定范围内检讨错误的机会，会议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深入批陈，总结各地批陈整风经验的同时，安排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检讨。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前，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带着黄、吴、李、邱和李德生、纪登奎一起，到北戴河，找林彪谈一次，汇报批陈整风的情况，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希望林彪认识错误，出席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在会上讲几句话，在适当范围作个交代，给他一个台阶下。

3月30日、31日，周恩来一行到了北戴河。

庐山会议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林彪都在苏州休息。1971年3月，他却从春暖花开的江南，来到春寒料峭的北国。这个蹊跷，是在林彪叛逃之后，才弄明白的。正因为林彪在苏州和叶群、林立果商量，认为庐山的事，毛泽东不会放过，不是想着如何检讨，而是策划了新的阴谋。他让林立果指挥他的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处长刘沛丰躲到上海，极其诡密地制定《“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为了避免引起中央的注意，林彪反常地转移到北戴河来了。北戴河本是避暑胜地，冬季几乎没有来人前来疗养，林彪也没有冬天到过北戴河。

李德生随同周恩来等到了林彪休息的别墅。依然寒冷的北戴河，别墅里放着暖气。众人进得客厅，只见林彪面色苍白，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心里想些什么。

周恩来关心地询问林彪在苏州休息得可好。林彪却漠然地说，这一段，身体还是不大好。周恩来简明地汇报了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陈伯达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介绍了陈伯达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谈到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最近，他们先后写了书面检讨，主席认为写得都好，并且说，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最近，北京军区刚刚开了批陈整风会议，中央准备在下个月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全党的情况作个汇报，他们几位也好把在庐山的问题，在小范围内向大家有

个交代。周恩来委婉地说：主席建议，请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会上讲几句话。

李德生静静地听着周恩来既严肃又动情的谈话，深切地体验到周恩来处理党内矛盾的艺术。此时林彪依然是党的副主席，他得尊重林彪，又要把问题讲清楚，把道理讲到。真是用心良苦，很是使人感动的。李德生又观察林彪。按说，周恩来在南昌起义时是起义的领导者，而林彪只是一个排长。但现在，尽管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也应当对周恩来保持应有的尊重。他很奇怪，林彪对周恩来的谈话并不动容。只见林彪像背书般地说，完全拥护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

李德生觉得，林彪的讲话，言不由衷。他不说自己是不是参加会议，更不说是否讲话。他以进为退，说，过去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么严重，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他表示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很高兴”，要求吴法宪、叶群按中央的要求，重写一次书面检讨。林彪对着黄、吴、李、邱貌似批评，实际上是不痛不痒地说：“错了，要好好检讨。”李德生从林彪的讲话中感到，好像这个事情与他无关。那么，林彪这个话，是说给黄、吴、李、邱听的呢，还是说给周恩来听的？林彪还说，他的身体不好。很明显，他是不会参加会议，更不会有检讨的意思了。这种情况，更增加了李德生对这场斗争的担心。

周恩来一行3月31日晚回到北京。4月1日，周恩来同李德生、纪登奎和黄、吴、李、邱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当面指着黄、吴、李、邱，严厉地批评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李德生当时还奇怪，人有了错误，为什么这样难于承认，难于

检讨呢。他哪里知道，林彪他们不是思想认识的错误，如果把他们背地里的事情全交代出来，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就将暴露无遗了。

批陈整风汇报会，按计划从 1971 年 4 月 15 日到 29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 99 人。毛泽东特地指定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出席会议。

周恩来宣布会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接着，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会议前 7 天主要是讨论黄永胜等 5 人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几天是揭发批判陈伯达，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

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认为他们“承认了，检讨了，这是好的；错误是严重的，自我批评不够深；希望今后好好改正，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并且引用毛泽东的话，“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李德生认为，这个会议，不仅是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认识，而且将他们的错误扩大到适当的范围，有利于对他们的监督。从他们五人的检讨看，他们之间在庐山为什么配合得那么一致，讲得并不清楚，一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看来，问题并没有了结。

会议进行中间，4 月 19 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周恩来曾经给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并且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是，林彪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到会的意思。尽管庐山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重大问题，周恩来依然是书面或口头报告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语，毛泽东也先批给林彪阅，应当说，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了，但是林彪一直没有任何悔改的表示。

十五、“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

1971年4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交代，处理了一件事。毛泽东称之为“事关大局”。这个大局是什么呢，现在看来，毛泽东是为了解决林彪等人插手浙江，造成派性严重，军队内部和群众的严重不团结的问题，并且使南京军区重新实行对浙江驻军的有力领导。

会议的第五天，即4月19日深夜，李德生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找他马上去。李德生立即从京西宾馆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午夜时分，毛泽东依然全神贯注地阅读文件，见李德生来到，放下文件，向他说，你在南京军区10多年了，浙江的情况，舟山的情况，都会知道的。那里的问题，拖的时间长了不好，应当解决了。你去找许世友谈谈，请他出面，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

李德生在十二军任军长的时候，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政治委员龙潜，驻浙江某陆军的军长、政治委员是熟识的。十二军从朝鲜回国后，曾经驻在浙江6年，同省的领导同志也有交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浙江地近上海，许多造反组织同上海造反派相互串连，受上海造反派的影响很大，打倒省委领

导，打倒一切，调子很高。1967年初，省委书记江华被“打倒”，形势很乱。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这是全国比较早的一个省军管会。当时由省军区政治委员龙潜担任省军管会主任。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这就与造反派产生矛盾。不久，军管会、省军区受到冲击，工作难以展开。

现在，李德生听了毛泽东的交代，确实感到，浙江的问题，到了应当解决的时候了。尤其是舟山，是国家海防的前哨，那里的驻军不团结，将会影响当地群众的团结，影响渔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海边防的巩固。

毛泽东提出抓浙江问题，是有预见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在《“571工程”纪要》中，“准备阶段”，要“争取某某军”；“巩固阵地，扩大战果”阶段，要“固守浙江”。他们的死党，从庐山会议后，多次到浙江活动。空某军政治委员陈励耘成了他们的死党。尽管在当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浙江问题，是作为团结问题来处理的。应当说，毛泽东让许世友出面，处理浙江问题，是预先在这里布了一着棋。

1971年4月20日上午，李德生在开会之前，早早来到许世友司令员住的房间里，他向许世友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许世友正准备参加会议，发言批评黄永胜、吴法宪。他对他们插手浙江问题，把军队搞乱，很有意见。一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显得特别高兴。二人交换了对毛泽东指示的看法。

许世友是位心地坦诚的痛快人。他说：“这个政委，在军区政治部当干部部长的时候，是个老实人，表现还是可以的嘛，‘文革’一来就变疯了；那个军长呢，是我们四方面军的团长，在新四军当过旅参谋长，长期在我的领导下工作，为什么现在这么不听招呼呢？”

坦诚的许世友竟然打起哑谜来，他说：“是有人支持啊。我看不惯，要去管。”他气愤地对李德生说：“反而有人说我要代替华东局，要掌握华东大权，要当‘华东王’，真正是岂有此理！”李德生听得明白，许司令指的是那位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经常阴阳怪气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

许世友谈起毛泽东的指示，高兴地说：“过去我不是没有看出浙江的这两个问题，我是一怕别人说我是黑手，二是怕别人说我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愿意管，也不愿意多说这方面的话。我不能不避嫌。”说到这里，许世友特别气愤。他接着说：“现在好了，只要毛主席要我过问，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一定按主席指示去办，凭党性处理好它。我早就在想，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只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建议你再找他们谈谈。”

李德生说：“司令讲得对，你想的和主席想的一样，浙江在华东战略地位很重要，必须解决好。我马上去同他们谈。”

李德生离开许世友的住处，各小组已经开会了，他让人把那两位军长、政治委员从会场请到自己的房间。

李德生向他们说：“昨天深夜，主席把我找去了，他对于舟山的问题，对浙江驻军的团结问题很关心。主席不希望看到浙江的形势继续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也不希望浙江驻军不团结。我们正在开批陈整风会，主席讲了，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就是不能上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搞天才论、搞分裂的当；而且要通过整风，开展认真的批评，进行一场自我教育，从而更好地团结起来。主席提醒我们，军队要谨慎，我们都要注意啊。对于解决浙江舟山问题、驻军团结问题，主席提出来，请许司令员出面，和你们商量，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李德生以规劝的口吻提醒他们：“许司令员是我们的老首长了，我知道你们对许司令员是尊重的。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主席的期望，在许司令员领导下，解决好驻军的团结问

题，进而解决好浙江问题。”

这两位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关注浙江的问题，都显得特别感动。又听说毛泽东交代许世友亲自抓浙江舟山问题和驻军的团结问题，许司令员已经答应要找他们谈话，二人表示，欢迎许司令员抓浙江问题。他们也认为，只有先解决好军队的团结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地方的问题。

李德生安排了许世友同他们谈话的时间，分别通知他们。许世友按时找到二人，坦诚地谈了军区的意见。他们也汇报了有关情况，表示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许司令员的领导下，把驻浙江陆海空三军、省军区、舟山要塞区的团结搞好，以军队的团结促进地方的团结。

李德生参与了双方的活动。然后，他将处理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份 400 字的简短报告，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看法，包括许世友过去的那两点顾虑。许世友不怕避嫌，自己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也不应当避嫌！

李德生的报告说，向许世友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许世友同志听了很高兴，表示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同时也谈了他过去没有抓这两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为了避嫌，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想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报告又反映了那两位军长、政治委员的态度：“他们说，早就有这个愿望。当即表示希望许世友同志遵照主席指示抓一下，并且认为只有首先解决好军队的团结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地方的问题。”

李德生的报告是 4 月 24 日凌晨送出的。毛泽东看到李德生报告后，当天早上就作了批示：“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

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办公厅先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同一天（24日）即批：“请德生同志先阅，再请许世友、杜平、张春桥、南萍、熊应堂同志传阅……然后退李德生同志存。”25日7时半，周恩来再次写信给李德生：“昨（24）日至大会堂参加四个小组会，都未遇到你。听说你在西北组，我赶去，你们已散了。现将主席批示给你一阅，并将批示抄三份，一份送张春桥同志，一份送许世友、杜平同志，一份送南萍、熊应堂同志。许告我，他们已谈了，照主席指示办理。门算开了，还要继续做工作。”“原件退你存。”周恩来让中办秘书处派专人在政治局委员中传阅。

毛泽东的批示，首先是进一步推动了浙江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浙江主要领导同志提高认识，增强了浙江驻军的团结，这对于“九一三”后更好地解决浙江问题，打下了基础，起到了“预先效应”。其次，对于批陈整风汇报会，对于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也起了积极的影响。周恩来在4月29日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来，“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成为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中，解决团结问题的重要原则。

当时浙江的问题，有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插手，有林彪的亲信多次去策划，有陈励耘在浙江直接操纵，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同他们之间，讲团结，无异缘木求鱼。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通过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通过这次交锋，许世友、李德生直接接触那两位同志，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心，使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警觉，起到了敲警钟的作用。正是有了这次谈话，“九一三”后，1972年三四月，浙江省委和驻军的10位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

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主持和帮助下，揭发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大量阴谋活动，同时批评帮助了犯错误的同志，使他们认识到“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态度逐步好转，认识逐步提高。

十六、毛泽东交代李德生，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市郊

从庐山会议起，我们党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在庐山，尽管毛泽东已经看出会议的风波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是林彪是“副统帅”，是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而且对于风波的幕后复杂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所以，批评集中指向陈伯达一人，对林彪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庐山会议后，又通过政治局会议、华北会议、批陈整风汇报会，批评黄、吴、叶、李、邱；通过传阅毛泽东的批示、派周恩来当面规劝，希望林彪有自我批评。既有耐心的等待，又有严肃的批评，既靠他的觉悟，又在一定范围内教育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识别能力。然而，林彪不但不认识错误、检讨错误，一再错过作检讨的机会，反而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令人惊讶的是，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林彪勉强到场，但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只坐了一会儿，就不辞而别，把党内矛盾暴露在公开场合。

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批评、等待的同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曾经连续五天（8月26日到30日），找人谈话或开小会，了解情况。在尔后的一年里，他从批陈整风运动中揭发的大量事实和种种迹象中，对于庐山风波的真相看得越来越

清楚了。到了7月，毛泽东得知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真相，不下发他们的检讨，这哪里是“实践这些申明”呢？毛泽东认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于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的部署进行。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确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三人组成筹备小组。8月16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再次到北戴河（李德生出国访问），向林彪汇报国际形势问题，以及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说明根据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

那么，从庐山会议后的一年，林彪在做什么呢？

他一直称病，既不揭发批判陈伯达，也不对自己的错误作一点自我批评。当时，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周恩来都是书面或者当面向毛泽东、林彪汇报。比如，华北会议期间，政治局研究后，周恩来及时将情况和意见书面报告毛、林。1970年10月十四五日，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的第一次书面检讨作出严肃批评后，周恩来同康生一起，把批语送到林彪家里，给林彪、叶群看，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而林彪就是不正面回答问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同黄永胜谈话的事，他也推给周恩来。甚至中共中央即将发出的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毛泽东批示“同意”，文件传到林彪那里，他让秘书模仿他笔迹，代写了“完全同意主席批示”8个字。

在阴谋活动方面，林彪却是异乎寻常的积极。1971年2月12

日，他带着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养病”。养病是假，策划反革命政变是真。他派林立果到上海、杭州活动后，找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副处长于新野等起草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然后又让林立果召集南京军区空军原政治委员江腾蛟、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委员王维国、驻杭州的空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开了一个“三国四方会议”，讨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问题。原则确定之后，由周宇驰、于新野等起草。《“571工程”纪要》是3月22日至24日起草的。而林彪为了避免被中央察觉，带着叶群，从苏州转移到北戴河“养病”。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入伍，是林彪特意安排到空军的。被吴法宪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并经吴法宪介绍入党。1969年2月16日，林彪专门给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处长刘沛丰写信，说：“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作者注）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只两年时间，林彪要让林立果“单独行动”、“独立工作”，要放“单飞”了。1969年10月经吴法宪提名，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兼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此后，林立果立即组织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成立“调研小组”。庐山会议后，“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

庐山会议前夕，1970年七八月，空军召开“三代会”。按照林彪、叶群的意图，为了积累“政治资本”，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作了一个所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大讲空军建设问题。接着，又在空军系统的“三代会”上放他报告的录音。林彪听了这个“讲用报告”的录音后，很得意地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当时，吴法宪吹嘘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

一颗政治卫星”，是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超天才”；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接班人”。

1970年7月8日，吴法宪竟然主持空军党委会议，作出决定：“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把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林立果。

庐山会议召开时，林立果以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的身份，跟着林彪上了庐山，为林彪等人出谋划策。

庐山会议后的一年里，林立果在空军发展党羽，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副部长的职务，把司令部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部分二级部长、处长笼络在身边，同时在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等处设立秘密据点，作为他网罗党羽、收集情报、培训骨干、策划阴谋的场所。

庐山会议后，周恩来曾经派人追查吴法宪，责问他为什么把25岁的林立果吹捧为“超天才”。毛泽东也得知这一奇闻。他批评说，把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经过一年的批陈整风运动，从大量揭发的事实和各种迹象中，毛泽东对庐山那场斗争背后的真相有了更多的了解。毛泽东对于林彪，既批评帮助，寄予希望，又继续观察，看其发展。为了进一步调查情况，同时向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吹吹风，把话说得更明白，来统一大家的思想，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到中南、华东等地巡视。这是自从1970年9月，他从庐山回京将近一年后，再次离开北京外出。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的谈话，是向领导干部打招呼，同时教育受骗的、受蒙蔽的、犯错误的人。在谈话时，尽管他强调保密，但还是被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广州军区

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等人，陆续密报林彪和黄永胜等人。他们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关系已经很深了。毛泽东也看出有些在庐山犯过错误的人，并没有醒悟之意。他在江西、浙江听到汇报，说是叶群确实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空军的周宇驰7月两次秘密到南昌活动，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警告说“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这些迹象更加引起了他的警觉。

毛泽东经过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许多党政负责人谈话，对于事情的真相了解得越来越清楚了。9月10日，专列到了上海，他一反惯例，没有住到市区去，而是仍然住在专列上。11日上午，毛泽东在列车上会见了事先通知由南京赶到上海的许世友和上海的王洪文。空四军政治委员王维国也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在上海来的人离开后，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起程回京。这个突然的决定，使得他的行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从而打乱了林彪的罪恶阴谋。根据“九一三”后的揭发，林彪谋害毛泽东的计划，原准备在上海或专列通过苏州硕放车站时下手，都因为专列的提前离开，而完全失败了。

毛泽东的专列在9月12日中午到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毛泽东外出巡视期间，按照中央的决定，李德生于8月14日至9月3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这次访问，是在我们党为了改变我国在国际关系上比较孤立的状态、加强与各国发展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李德生从参加政治局多次活动中，体会到毛泽东、周恩来花很大精力抓国际大事。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更是做了大量工作。5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中美关系问题。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经毛泽东批准

后，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进行宣讲和讨论。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这是双方都有需要、都有利的事。为了使部队同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李德生组织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专门学习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和中央有关中美会谈的文件精神。当时部队中对于我国外交政策，确实有许多模糊认识，比如说，有人认为“备战备战，备了两年，和平谈判”，有人说“北方静悄悄，南方传捷报，仗打不起来了”。李德生专门向干部作报告，具体分析了国际形势、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要求加强学习和搞好战备。他强调“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作为军队来说，要立足备战。他详细勘察了北京周围的地形、北京市内的人防工事，检查战备工作的落实情况。

李德生的出访，就是为了加强与阿、罗的友好往来，并且相机说明我们的外交政策。

李德生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后，9月3日回到北京，接着就参加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日起，又参加了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准备在国庆节前召开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时间已经很紧迫，各项工作安排得都很紧张。

9月12日临近中午，李德生在家里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中午12时前到达丰台车站。一般情况下，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都由秘书处打电话，将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带什么文件，讲得具体明了。有时为了保密就不通知会议内容。这次通知也是这样，显得很紧急，很重要，却没有告诉去干什么。

李德生接到通知后，匆匆吃点东西，按时赶到丰台车站。中央

警卫团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只见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先后来到。不远处，毛泽东的专列进站，缓缓停在专用车道上。李德生听说过，每次毛泽东出巡回京，极少中午到达，也极少在丰台车站停留。这次为什么例外？

正想着，只见随同毛泽东出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下专列，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请他们四位一起上了毛泽东所在的车厢。

李德生和纪登奎、吴德、吴忠三位上车后，看到毛泽东面带微笑，精神很好，依然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态。

大家就座后，毛泽东点燃烟卷，不紧不忙地问李德生：“你这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怎么样啊？”

李德生回答说：“他们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国内政治是稳定的，只是从市面上看，群众生活不是那么好。”

毛泽东又问：“你同他们谈尼克松将要访华，他们有什么反映？”

李德生如实说：“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他们讲了他们自己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从会谈中听得出来，他们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他们是怕美国从亚洲撤走，会增加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国拖住。他们（指东欧诸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不要美国撤军。”毛泽东补充说：“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大家也都笑起来，气氛一时显得轻松。

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讲话转入正题。他从党的历史讲起，再次分析庐山会议的情况，批评了林彪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天才论”的理论纲领。

李德生已经熟悉了毛泽东的谈话艺术。他谈话的开头，总是谈

些轻松的话题，是使大家心情放松，以便吸引人们注意他讲的主题。李德生的思绪，随着毛泽东的谈话，进入我们党的历史和现实，进入毛泽东的分析与判断。

四个人都在认真倾听，认真记录，纪登奎的记录速度快，记得仔细。事后核对笔记，大体以他的记录为准。

毛泽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打着手势解释说：“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网上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一个个的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毛泽东在讲了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后说：“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

毛泽东说：“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

李德生听到这里，想起他看到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和附在后面的语录，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

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后来他专门查了《实践论》，发现他们引用的这个语录，只引用了半句，有意地省略了后面很重要的话：“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说几百年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出一个天才？”

毛泽东说：“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毛泽东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工作要表扬，但不能吹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天才，这没有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表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写在纸上，讲在口头上，问题在于实践他的申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心虚。”

毛泽东说：“我那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报告是一块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是甩石头。”

由于提到陈伯达的“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毛泽东转向李德生再次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李德生没有想到，毛泽东又提起这件事，还加了一次，“一年说三次”。他从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体会到，同林彪的斗争远还没有完，对于那个“宝贝材料”“称天才”的语录，即对唯心论的批判也不能完。

毛泽东指出：“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第一天的小组会上的发言，都整理了简报稿，听说收回陈伯达发言的简报，也连忙收回这几个简报稿）。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毛泽东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强，是有头无脑。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他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泽东认为，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会上的检讨，虽然承认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他们检讨的后头是吞吞吐吐的，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不能改好。毛泽东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以参加军委办事组。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泽东虽然保林彪，但是对于路线问题、原则问题，他说：“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对军队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军队要谨慎。”还说：“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干坏事，听你的？”他批评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军队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他批评“一好带三好”说：“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他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泽东认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对于这场斗争的前途，毛泽东作了两种估计。他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泽东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李德生联想到，在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听说黄、吴、李、邱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

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句话，后来被简称为“三要三不要”。

毛泽东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四个人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录。毛泽东向他们讲了党内这么大的事，每个人的思绪，都随着毛泽东的分析驰骋。

这次谈话，连同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多次谈话记录，后来经过整理，经中央政治局1972年3月15日讨论修

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于3月17日发至全党，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了传达。

有些话，当时没有引用。比如，在谈到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时，毛泽东8月16日在武汉，同刘丰、刘建勋等谈话，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都曾谈到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

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系统地讲了党内这场斗争的经过、性质和方针政策，深感斗争的严重性。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泽东郑重地交代李德生，要他准备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时情景，使李德生觉得像接受战斗任务那样的紧张郑重。看来，同林彪、黄、吴、叶、李、邱之间的斗争，不止是在会议上、文字上的交锋，还要准备武的一手。林彪、黄、吴、叶、李、邱现在掌握兵权，不能没有防备。毛泽东历来讲，有备无患。李德生懂得，毛泽东的决策，关乎斗争大局，非常重要。

李德生告别毛泽东，从专列上下来，立即会同纪登奎，驱车直奔西山北京军区机关驻地。

这一天是星期日，李德生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陈先瑞政委等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到作战值班室来，大家一起研究部署调动三十八军一个师进京的紧急任务。

离开北京军区，李德生又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早已确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十七、坐镇空军：监视 256，迫降直升机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 8 点钟以前，李德生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李德生到了大会堂福建厅，坐在自己经常坐的位置上，从皮包里取出会议讨论件，等待会议正式开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陆续到齐。只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个个面色凝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黄永胜更是毫无表情。不像过去开会前，他们之间总是谈说一点什么事情。

李德生看到黄永胜，不由得想起毛泽东 6 个小时以前讲的话，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是啊，黄永胜一个人怎么能指挥得动解放军千军万马？毛泽东又讲，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能够指挥黄永胜造反的黑手，又能是谁。毛泽东一方面讲，对林还是要保，要再找他们谈；另一方面讲，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尤其是毛泽东要求调一个师到京郊，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行动。李德生觉得这场斗争，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但是他依然一如既往，不动声色地端坐在那里，等待会议的开始。

周恩来主持开会了，他全神贯注地引导与会人员逐段议论政府

工作报告的讨论件。

四届全国人大，原定是在 1970 年国庆前后召开的。由于庐山会议发生陈伯达的问题，延迟一年了。1971 年 8 月，毛泽东决定 9 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 月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起草小组起草后，9 月，周恩来亲自同起草小组集体讨论修改了两次。现在正式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李德生的脑子里，一直在转着毛泽东下午接见时的谈话，紧张和忧虑的心情始终平静不下来。他在想，看来，同林彪的斗争还没有完，而林彪并没有认错的迹象，这场斗争的前景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还是继续向坏的方面转化？他非常钦佩周恩来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集中精力，妥善地处理一个一个问题的本领，也就很快进入到会议议题的讨论中去。

会议进行到晚上 10 点多钟。大会堂的服务员进来请周恩来到东大厅北小厅接电话。

一般情况下，这种重要会议，除了毛泽东那里有事找，没有特殊原因，周恩来是不接电话的。周恩来去接电话后，很长时间没有回来。这个情况更少有。大家等在那里，不知道有什么事，会场上一片寂静，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谈说。李德生刚刚听了毛泽东回京后的重要谈话。他在想，毛泽东担心的事，难道真的会这么快就出现了？他看了看纪登奎，因为在会场上，刚刚听到毛泽东谈话的，只有他们两人。

又过了一会，只见服务员把吴法宪请出去。不一会，吴法宪却面无表情地回来，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神情呆滞，一言不发。这时，既没有散会，又不可能继续开会。大家只好坐在那里静等。

刚过午夜 12 点，服务员走到李德生身边，轻轻地对李德生说：“总理请你。”李德生立即起身，来到东大厅北小厅。周恩来神情

严肃地对他说：“现已查明，有一架空军 256 号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林彪要乘这架飞机逃跑。主席已经知道，并且作了指示。你的任务是立即到空军指挥室，代替我坐镇指挥。发生重要情况，必须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李德生马上明白了，毛泽东担心的事，已经发生。周恩来在毛泽东领导下，正在指挥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此时的气氛，使他突然有了一种战争年代激战前受领任务的感觉。他坚定地回答：“明白了，有情况我随时报告。”

这件事还要从头说起。

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即重用他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吴、李、邱把 1967 年 5 月 13 日，看作是林彪、叶群保他们“过关”纪念日，每年 5 月，都要聚会，以感谢林彪、叶群对他们的“教育深恩”。（当时黄永胜还没有调到北京。）1969 年，林彪写了《重上井冈山》的词，词中有“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以抗拒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他的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特意找人将词谱曲，1971 年 5 月，秘密录音。

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积极配合，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修改宪法起草小组会议上，在庐山会议上，多次坚持这个意见。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遭到严厉批评，但是并没有任何悔改之意。9 月 7 日离开庐山时，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叶群特意导演，林彪和黄、吴、李、邱挤坐在一起，合影留念。

在林彪阴谋政变的 1971 年 9 月 6 日至 12 日，据电话总机接转的记录，林彪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之间秘密通话达 50 余次。有时一次电话，几个人争着打。尤其在得知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上海后，9 月 12 日一天，黄永胜、叶群之间通话达五次之多，有一次

长达 90 分钟，另一次长达 135 分钟。

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由林立果组织了“联合舰队”，作为“基本力量”。

他们以空军司令部的一些人为骨干，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分舰队”、“左派组织”，以及“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组”。在北京、广州、上海、北戴河、汕头等地设立反革命据点，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阴谋活动。这些秘密组织，都要宣誓效忠林彪、林立果：“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有严格的纪律，联络的密语和暗号；主要骨干，都有代号，如“金钟”、“阿飞”、“锤子”等，这些骨干分子的代号都在林彪、叶群那里备了案；“联合舰队”成员都要进行各项特种军事训练，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带头秘密学习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和直升飞机。

在“联合舰队”与黄永胜等人之间，由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意图单线联系。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林彪组织“联合舰队”的目标，就是实现“571”政变计划。

在中央 1971 年 4 月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4 月 23 日晚，“联合舰队”骨干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会研究批陈整风形势，认为批陈整风汇报会，让黄、吴、叶、李、邱作检讨，形势对他们不利，按照林彪的意图，确定“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政变计划。

8 月，当他们得知 9 月、10 月即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消息后，认为“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571 工程”计划更加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

他们知道，靠“联合舰队”成员，甚至黄永胜等人个人出面，

是指挥不了解放军造反的，必须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9月8日，林彪亲笔写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个手令，他们使用多次。

第一次使用是9月8日林彪写手令的当天深夜，林立果和周宇驰在西郊机场据点，给南京军区空军原政治委员江腾蛟看了林彪的手令，指定江腾蛟为在上海下手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员。他们提出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火车，用100口径高射炮平射打火车，由空四军政治委员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动手等。同日，他们派于新野到杭州，会见空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商量用改装后挂有火箭的伊尔-10型飞机，谋害毛泽东。并说，10日将从北京派驾驶员去执行任务。

接着，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的据点，找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给王飞看了林彪9月8日的手令。他们向王飞交代说，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你和周宇驰负责。

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同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在西郊机场开会，确定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同时给了北京的负责人王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要王飞在必要时给黄永胜送去，由黄永胜统一指挥北京的行动。

11日晚，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又在西郊机场给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看了林彪的手令。林立果交代说，现在情况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让鲁珉驾驶飞机，炸毛泽东的专列。

林立果向鲁珉部署后，从上海传来消息，毛泽东的专列提前离开上海。他们在南方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破产了。“联合舰队”

的主要头目顿时一片恐慌。他们只好暗地交代“解除任务”，另谋对策。

第二天，9月12日下午，林立果打探到毛泽东确实回到北京的消息，和他的亲信们连连叫喊：“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他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里，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电话说，情况变了，要改变计划了。接着要求周宇驰准备实施《“571工程”纪要》的第二套方案，研究由林彪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且作出了行动部署。当晚7点多钟，林立果私自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256号三叉戟飞机，通常情况下都是林彪外出乘坐的专机，按规定，别人不能动用。

林立果走后，留在北京的周宇驰，按照同林立果商量的方案，交代空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胡萍，准备5架飞机：一架是已经转移到北戴河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由林彪、叶群等人乘坐，13日8时由山海关机场起飞，直飞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乘坐，13日早从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一架伊尔18，一架安24，一架安12，拉上“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和重要文件，直飞广州。

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北京起飞后，于12日20时15分降落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惟恐他们的阴谋被发现，到了山海关机场后，故意将256号飞机改为252号。

林立果从山海关机场急忙赶到北戴河，立即同林彪、叶群密商。三人都感到形势不好。他们以给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为掩护，组织所有的工作人员参加，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他们趁机躲在林彪的房间里密谋准备南逃。晚上11点，叶群从北戴河向西郊机场打电话，问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三十四师师长胡萍，南逃的大飞机准备好了没有。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长期以来同叶群关系不好。而这个订婚仪

式，并没有经过林立衡同意，是由叶群提议操办的。在举办订婚仪式时，林彪、叶群、林立果却没有一个人露面，林立衡非常奇怪。她悄悄走近林彪住室外边，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明天几点”，“到了广州如何如何”，察觉他们可能准备南逃，便偷偷地向驻地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报告，说林彪、叶群他们准备逃跑。张、姜一听，虽然不敢断定真是假，但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到北京，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紧急报告。

张耀祠接到电话后，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报告。汪东兴认为事情非常紧急，立即打电话报告正在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周恩来要汪东兴告诉北戴河的张宏，查清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同时找来吴法宪，严词责问他：“256号飞机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今天晚上飞到山海关机场？”按照空军的规定，领导人的专机调动，都是要报告空军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人乘专机起飞，空军值班首长要到机场接送。吴法宪没有听说256号飞机的行踪，知道出了大事，却故作镇静，回答说要查一查空军调度室。吴法宪打电话给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胡萍是怎么回事。胡萍知道事情不好，应付说正在追查。胡萍放下电话，立即给周宇驰打电话说，256号飞机飞北戴河，已经暴露，让他转告林立果早打主意；同时打电话给已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飞机驾驶员、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让他借口发动机有故障，飞机飞不回来。他的意思是，好留下给林彪13日南逃的时候使用。

吴法宪按胡萍的说法，向周恩来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落在山海关机场。周恩来看吴法宪的回答不着要领，很不正常，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又直接给北戴河的张宏打电话询问情况，张宏证实，当天傍晚，确实

有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山海关机场。

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辖。周恩来查问李作鹏，问他今天有没有一架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按说，专机在海军机场活动，作为海军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李作鹏同样含糊地回答，要查一查。

这么大的事，吴法宪、李作鹏二人都不知道，却又都回答得含糊其词，更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

此时已到晚上 11 时半。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叶群，单刀直入，问她：“知道不知道林副主席的 256 号三叉戟专机现在在北戴河？”叶群已经从林立果那里得知周恩来追查 256 号飞机，撒谎说：“我还不知道。”周恩来说：“据说是今天下午飞过去的。”叶群迟疑了一下，知道隐瞒不住，只好回答说：“哦，那是立果坐过来的，林副主席说，如果明天天气好，他想到天上转一下。”

周恩来顺势又问：“转了以后，是回北戴河，还是准备到别的地方去？”

叶群答：“原来想到大连去。”她用向北飞行的谎言，掩盖南飞广州的密谋。

周恩来劝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者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说：“一定要把气象掌握好。”并叮嘱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听周恩来要到北戴河，更是担心南逃广州的计划破产。连说：“总理啊，你工作那么忙，就不要来了。”

周恩来从与叶群通话中，听到她的回答矛盾重重，事情已经明白八九分。他要求空军通知 256 号三叉戟飞机连夜飞回北京，同时下达命令：所有军用飞机起飞，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达的命令，才能放飞。但是李作鹏在给海军传达

命令时，篡改为四人中有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事情很清楚，现在问题的焦点在空军，空军失控，影响很大。此时已经到了午夜12点，周恩来找来李德生，交代他代表自己，坐镇空军作战值班室。

北戴河那边，叶群接完周恩来的电话，垂头丧气地告诉了林彪。林彪心中有鬼，听说周恩来追查256号飞机行踪，惊恐万分，看来明天乘飞机南逃的计划可能破产了。他叹气说：“今晚反正睡不成了，赶快准备东西，马上就走。”

叶群听说此言，更加惊慌，大叫：“快，快，越快越好！”

按照林彪的设想，反革命政变的上策是谋害毛泽东，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策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现在只能取下策，北飞国外。

12日晚将近12点钟，林彪、叶群、林立果带着刘沛丰，顾不上另一辆车上装载的机密文件、珍贵物品，乘上防弹红旗轿车，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直奔山海关机场。

13日零时22分，林彪等人到达山海关机场停机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面前。汽车还没有停稳，林立果、刘沛丰跳下汽车，提着手枪，大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快，快，快！”此时只有飞行员潘景寅几人赶着上了飞机，匆匆发动，而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飞机客舱也没有客梯，只能在驾驶舱前，放下飞行员专用的简易梯子。刘沛丰第一个窜上去，在上面拉着披头散发的叶群，林彪跟在叶群后面，脑袋几乎顶着叶群的脚，几个人急急忙忙上得飞机。由于李作鹏没有通知山海关机场采取措施，制止飞机起飞，潘景寅在机舱门还没有关上时，就启动飞机，强行滑出。仓促间，飞机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上的加油车罐口盖，刮伤了飞机机翼的铝皮，撞破了绿色玻璃灯罩。机场

上没有照明灯，没有通信保障，在夜色中，256号三叉戟飞机摇摇晃晃腾空而起，仓皇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

从林彪一行到达机场，到飞机离开地面，整个过程，只用了10分钟，即零时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已经起飞。

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周宇驰，听到胡萍的报告，得知周恩来正在追查256号飞机，他在报告林立果的同时，通知王飞：“暴露了，不搞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午夜11点多了。王飞策划南逃方案的7人会议刚刚开过，一听这个消息，惶恐万分，也不敢通知其他成员。那些人还蒙在鼓里，在家做了一夜黄粱好梦。天刚透亮，有人起床，准备出发，却不见王飞和车辆，只看到办公大楼前停着李德生的红旗车，而不是吴法宪的专车。凭着他们特有的嗅觉，觉着情况不好，一个个踅回家中，心中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没有人看见他们。

再说李德生接受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后，快步走出人民大会堂，只带着随身警卫参谋，乘车沿着长安街向西，直往空军司令部而去。夜深人静，红旗轿车风驰电掣，不过10多分钟，已经到了空军机关大院。一路上，李德生在想：林彪要乘飞机逃跑，为什么？是他一个人，还是有好多人参与？乘坐的是空军飞机，起飞的是海军机场，吴法宪、李作鹏，还有黄永胜等人，同这件事情牵扯有多大？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但不是一下子能够弄清楚。他认为，当务之急，一是必须牢牢控制空军指挥权，不得有半点疏漏；二是要监控好256号三叉戟：这应该是“坐镇”的关键。自己一个人去坐镇，空军司令部机关会不会听从指挥。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遇到对抗，但是从林彪逃跑，可以看出他们软弱的一面，估计空军司令部机关采取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只会是极少数

人，若出现这种情况，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迅速控制局面。第二种可能是，多数人会听从党中央指挥，少数人阳奉阴违，这就要辨清真伪，谨防干扰。第三种可能是比较顺利，机关人员能够配合。不管是哪种可能，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迅速控制空军指挥权，正确处置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不让任何违反中央命令的大事小事出现。

李德生乘坐的汽车，进了空军机关大院。大院内一片寂静，李德生让司机小韩直接开到办公大楼前，乘电梯登上三楼司令部指挥室。

李德生并不知道，就是在这层楼上，一个小时以前，“联合舰队”成员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召集其他成员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作战部长鲁珉、司令部某部部长贺德全、司令部办公室处长朱铁铮、司令部某部处长郑兴和等七人刚刚开过会，他们拟订了第二天凌晨随同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的6个组20多人的名单，确定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分工串连、机场动员、枪支配发等事项。会议过后，各自回家睡觉，准备在13日凌晨，一起到机场集合，南飞广州。

李德生进入作战值班室，已是13日凌晨零点以后。正在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出来迎接。他们满腹狐疑，不知道总政治部主任为什么半夜来到空军机关。

李德生告诉曹里怀：“在北戴河海军机场，有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可能要不经批准，突然起飞，中央命令我来直接掌握情况。”

值班室内，还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值班参谋人员，听到李德生的说明，得知党中央派人来直接掌握空军情况，都明白是出了大事，谁也不敢有丝毫疏漏，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

职责。“联合舰队”成员，有的听说李德生来了，非常惊慌。王飞专门到办公大楼来窥探，听说李德生在作战值班室，吓得连忙躲回家去了。

很快，各个地面雷达网站的信息直接传来，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标图板上，跟踪记录着三叉戟 256 号的航行轨迹。司令部的工作理应由参谋长负责，空军参谋长梁璞，对空军指挥业务很熟悉，但是此时正在天安门广场指挥国庆阅兵的预演。为了仔细准确地掌握一切情况，李德生要值班室立即通知梁璞迅速返回司令部。空军政委王辉球接到通知，不一会儿也赶到作战值班室。

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交代李德生坐镇空军以后，派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杨德中随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到西郊机场掌握动向。西郊机场是中央和军委的专机机场，必须严格控制。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掌握情况。在林彪乘坐的 256 号飞机起飞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李德生在空军作战指挥室，始终注视着飞行标图，只见 256 号飞机的标志已经从山海关向北移动。

256 号飞机过了承德……

256 号飞机进入内蒙古……

256 号飞机接近边境……

李德生一边听着参谋人员的报告，看着标图；一边紧握专线电话，随时将 256 号飞机的走向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准确弄清飞机不是向南，而是不断地向北飞行，立即要与飞行调度员通话。

周恩来问：“用无线电呼叫 256，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能听到。”

周恩来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们开着机器，但是不回答。”

周恩来说：“那就请你向 256 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者是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连呼三遍，得不到回答，只好如实报告总理：“他们不回答。”

李德生听到 256 号三叉戟飞机不作任何回答，立即要空军值班参谋向三十四师索要有关 256 的一切资料。很快得知 256 号飞机的机组人员情况、飞行油料储量。李德生继续注视飞行标图板上的飞行轨迹，只见 256 号飞机先是向西飞行，仍然在我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到接近边境时，突然转头向北飞去。

整个空军作战指挥室的人员，听到调度员转达的周恩来的话，气氛更加紧张，大家同时密切注视着航行标图。空军参谋长梁璞也注视着图板，此时他向李德生报告：“256 的飞行异常，已经不是常规飞行了。”

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

梁璞答道：“第一，它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改为向北飞行，很快就要飞出国境，进入蒙古；第三，飞行高度过低，看来是有意躲避地面雷达。”

李德生要求参谋人员立即将飞机储油量换算出飞行距离。经在图板上测定，飞机续航能力最远飞不到乌兰巴托。

李德生再次用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以及对飞机续航能力的判断，请示周恩来飞机一旦出境，应该如何处置。

周恩来在电话里告诉李德生：“已经请示过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了。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不要

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又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当时，中央并不掌握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梁璞等人没有听到周恩来的讲话，只是看得出飞机的乘客非比寻常，眼看着飞机即将出境，显得十分焦急，他再次请示李德生怎么办。李德生只好告诉他和在场的人员：“这架飞机不能拦截，不能打，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我们要始终掌握它的飞行动向，不能放松。要通过各种手段，侦察一切有关情报。”

在此期间，李德生接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专人送来的电报，中央命令全国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实行全国禁空。此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下达命令，立即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周恩来电话通知李德生，要求李德生通知各地空军配合陆军行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掌握着全局的动向，指挥各地的应急部署，随时向已经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请示报告。

13日凌晨1时50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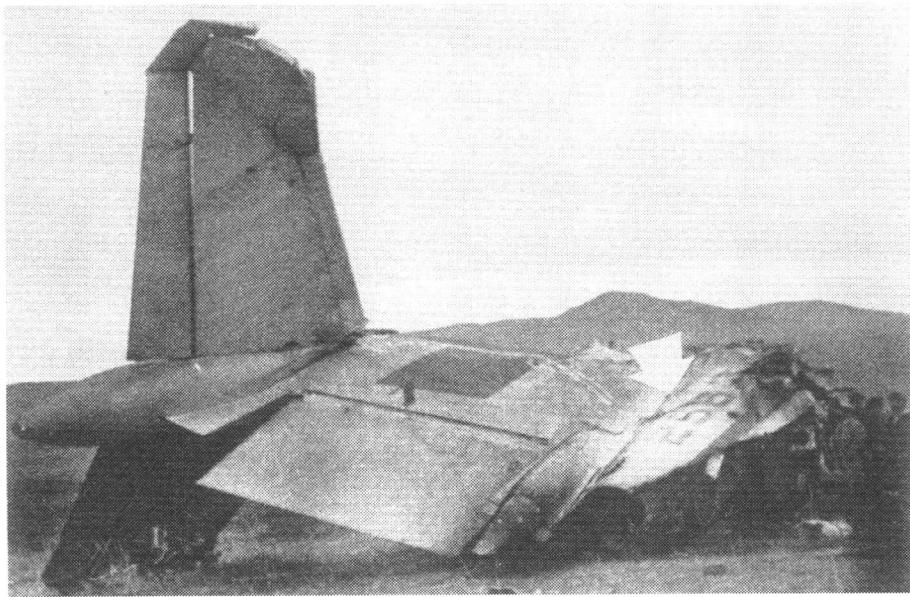
13日上午，李德生接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关切的电话：“德生同志，我们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部队已经进驻了所有机场。听说你在空军坐镇，你一定要好好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用保密电话，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九一三”事件。为了保密，又为了便于对方听明白，他按照不同对象，说：“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或者说“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同时通

报了党中央、毛主席采取的措施。讲完以后，他问对方听懂了没有，直到对方表示“听懂了”，他才放心。

13日上午，李德生请北京军区陈先瑞政治委员和作战部长来到空军机关，亲自向他们部署了部队战备工作。

14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给外交部发来电报，说是有我国一架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国提出严正交涉，大使馆不知怎么回事，请示如何处理。256号三叉戟是1时50分出境的，到大使馆报告中所说的坠毁时间共40分钟，按时间、地点和携带油料计算，必是256号。周恩来接到电报后说：“摔死了，摔死了。”



这是林彪叛国外逃时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附近。

为了进一步证实此事，周恩来给李德生打电话，让空军作战值

班室的人员再次计算飞行距离。李德生指示有关人员计算，得出的结果也是出境后，飞行不可能超过一个小时，情况完全一致。李德生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很高兴，当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也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发电给我国驻蒙古使馆，立即派人到现地调查。

这就是李德生坐镇空军，监视林彪乘坐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从起飞到消失，直至在蒙古坠毁的全部经过。

9月15日，我驻蒙古大使馆送回在飞机坠毁现地拍摄的照片。坠毁飞机残骸上“256”字样依然非常清楚；九具尸体，和出逃人数组相符。从12日夜起，中央决定，为了便于及时讨论突然出现的情况，政治局成员都集中在人民大会堂。15日，李德生接到通知赶回人民大会堂。当政治局成员看到林彪折戟沉沙，葬身温都尔汗的照片，都庆贺不动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解决了党内的一大祸害。周恩来要来了茅台酒，同大家干杯。李德生虽然三四天中只睡了几个小时，听到这一消息，也高兴地同周恩来碰杯。黄、吴、李、邱在这种气氛下，强作笑脸，很不自然。周恩来当着大家的面，非常严肃地向他们指出，林彪的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他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志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让我们再回到13日凌晨1时50分，256号飞机飞越国境后，李德生坐镇的空军作战值班室。与256号三叉戟飞机外逃的同时，北京沙河机场又发生一起直升飞机强行起飞的事件。

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越国境，很快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作战参谋无法报告坐标，标图员无法标图，作战值班室一片寂静。人们对

于刚刚出现的一切，还无法作出判断，都紧张地坐守着各自的岗位。3时15分，突然电话铃响起，空军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正向张家口方向飞去。”

此时，中央的禁飞令已经下达到所有空军部队和机场，怎么还有飞机起飞？李德生叫参谋长梁璞追问沙河机场：“为什么接到禁空令以后，还让飞机升空？”

沙河机场回答：“周宇驰副主任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飞机起飞了。”

李德生第一次听说有林彪的手令。他不由得想起，林彪的飞机刚刚飞出国境，怎么又有“林副主席手令”？李德生立即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这架飞机绝不能让它飞走！要立即迫降，迫降不成就坚决打掉！”

李德生询问梁璞，怎么才能迫降直升飞机，技术上有什么问题？

梁璞说：“迫降直升飞机，只有起飞战斗机。但是战斗机和直升飞机的飞行速度悬殊太大，拦截很难。不过战斗机起飞，可以起到威慑作用。”

李德生认定，必须起飞战斗机，迫降直升飞机！他请示周恩来同意后，命令北京军区空军，派8架歼6战斗机起飞，一定要拦击住直升飞机。

歼6战斗机起飞后，果然由于两种飞机飞行速度相差太大，无法接近直升飞机。

歼6战斗机在直升飞机上空，靠机上雷达搜索直升飞机的行踪，但是直升飞机与地面目标混在一起，歼6飞机的雷达屏幕上，目标太多，无法分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向李德生汇报了这一情况。

李德生命令空军的地面雷达搜索，然后通过导航系统，向歼6

战斗机指示目标位置，再由歼 6 战斗机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对直升飞机也是一个威胁，迫使它降落，防止外逃。

在李德生部署歼 6 战斗机打直升飞机时，周恩来布置吴德、吴忠，派出大批民兵，在地面待命，不让直升飞机上的一个人跑掉，直升飞机上的一件物品、一张纸片都不得丢失。

直升飞机上是什么人呢？

后来查明，那上面乘坐的是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情况是这样的：12 日晚，林立果飞往北戴河，周宇驰留在北京，准备第二天乘坐伊尔 18 到北戴河同林立果会合，一起南下广州。这是一个美妙的如意算盘。

周恩来追查 256 号飞机，林彪、叶群、林立果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逃跑。逃跑之前，林立果急匆匆地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去广州的计划肯定不行了，你们能走的都争取走！

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从西郊机场赶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咱们只能乘直升飞机跑了。”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急忙带着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和大量美元，连忙赶往沙河机场，到达时已经是 13 日凌晨 1 点多钟了。此时沙河机场已经接到中央的禁空令。周宇驰进到调度室，拿出林彪“手令”，沙河机场领导干部看到“林副主席手令”，不敢怠慢，只好派出一架直升飞机。

经过一番准备，直升飞机启动待发。惊魂未定的周宇驰押着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陈士印，坐在前舱；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舱。凌晨 3 点 15 分，直升飞机起飞。

前有禁空令，后有“林副主席手令”，这次飞行是怎么回事？驾驶员陈修文满腹怀疑地上了直升飞机，发现周宇驰他们神色紧

张，并且强令向北飞，觉得事情不好，就故意制造罗盘故障，改变向北飞行的方向，有意返航。“联合舰队”成员学过各种军事技术，周宇驰学过驾驶直升飞机，发觉不对头，用枪逼着陈修文掉头继续北飞。这时，歼6战斗机已经升空，经地面雷达引导，向直升飞机开炮。陈修文借口躲避歼6射击，东转西绕，向北京市郊飞行，最后不得不降落在怀柔县境内。周宇驰发现直升飞机仍然降落在京郊，大为恼怒。陈修文在与周宇驰搏斗时被他开枪打死。



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得到林立果电话通知后，持林彪“手令”强行乘直升飞机向北逃跑，被强击机迫降。这是直升飞机和李伟信。

周宇驰3人下得直升飞机，慌不择路，在农田里狂跑。只见四面影影绰绰有民兵踪迹，感到走投无路，急忙撕碎林彪手令，按照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规定的“纪律”：“不成功便成仁”。

周宇驰问于新野、李伟信：“是我先打死你们我再自杀，还是我们一起自杀？”于、李都说一起自杀。周宇驰举起手枪，对着太阳穴，喊口令“一、二、三”，周、于开枪自杀死亡。李伟信心怀畏惧，听到口令后，枪口朝天，虚放一枪，没有死，但很快被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民兵抓住。那些散落在田野里的物证，也被民兵们一件一件地收集起来。

直升飞机被迫降成功，李德生下令8架歼6战斗机返航。

13日上午，李德生接到北京卫戍区传来消息，直升飞机迫降后，缴获了一批重要文件和外币，活捉一人，名字叫李伟信，是上海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另有两人已自杀。经过李伟信指认，他们是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和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

十八、鲁珉求见，交代谋害毛泽东的计划

李德生在空军作战值班室，经过紧张的 5 个小时，直接监视林彪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叛逃，指挥迫降周宇驰劫持的直升飞机。但是，林彪为什么外逃？周宇驰为什么强行驾驶直升机同样向北逃跑？“林副主席手令”又是怎么回事？周宇驰被迫降后为什么决然自杀？这些统统是个谜。在这诸多现象的背后，显然有重大隐情，必须尽快弄清深一层的内幕。

就在李德生坐镇空军作战值班室不到 40 个小时，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求见李德生，哭诉林彪集团策划谋害毛泽东的详情。正如周恩来所说，这对于清查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是一个重大突破。

为了弄清林彪外逃之谜，9 月 13 日上午，李德生不顾休息，在空军党委会议室，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人在一起，回顾这几个小时的一连串事件。李德生说，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三叉戟飞机不经过正常手续，居然能够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北戴河；总理追查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知道。李德生问曹里怀副司令员：“你是值班首长，知不知道呢？”曹里怀连声说：“我 24 小时在指挥室，确实没有接到任何报告。”

李德生问大家：“这么大的事，有谁能够有权放飞？”大家分析了几个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可以直接向西郊机场发命令；副参谋长胡萍，因为他兼三十四师师长，可以直接向三十四师下令；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彪那里，因为这架飞机是林彪专用的。李德生确定，要把几个方面的线索，一个一个地查下去，特别是胡萍那里，无论是吴法宪，或是林彪，派飞机的时候，要避开胡萍，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指定可靠的人负责，既要迅速，又要保密。后来，经过请示周恩来，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进驻三十四师，负责查明情况。

当天下午，李德生又和王辉球、曹里怀商量，在个别调查的同时，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清查工作。李德生认为，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点消息不走漏，与其让小道消息传播，引起大家胡乱猜测，不如向群众讲清可以讲明的事情，这就有可能揭发出更多的线索，有利于清查。经过请示，周恩来同意了他的意见。此后，当中央几次发出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时，他都请示中央在空军适当扩大传达范围，以有利于揭发问题，教育群众。实践证明，这样做，都取得了好的效果。

按照这个设想，他们决定，召开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门负责人会议，讲清空军有两架飞机出了大事，宣布空军机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所有人员到办公室待命，不得外出，不经请示不得对外联系。加强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以部门为单位，实行部门首长集体负责制，组织学习。同时按级负责，弄清这几天每个人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要求大家积极参加学习，有什么重要情况和问题，可以在正式会议上反映，也可以个别汇报。这是对每个党员党性的考验。在普遍布置的同时，重点掌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作战部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动态。

13日、14日上午，李德生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汇报、

找人谈话，甚至同一些与这件事联系比较多的人谈话，晓以大义，交代政策，鼓励他们揭发交代问题。

李德生坐镇空军，在空军机关引起震动。李德生的动员，传达到各个部门，人们知道空军出了大事，都在审慎地回忆这些日子的大事小事，以便提供组织上参考。少数心中有鬼的人，现在已是断了线的风筝，他们回答不出这几天的活动，更是惶惶不安，思想斗争激烈。

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就是内心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

鲁珉，抗日战争时期参军，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击落美国号称世界超一流的亚音速佩刀式（F - 86）战斗机 5 架，是全国有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人民功臣。20 世纪 60 年代，调到空军司令部担任作战部长。1969 年 10 月，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经常向他转达林彪、叶群的问候，进行拉拢，使鲁珉受宠若惊，逐渐靠过去，成为“联合舰队”的一员。林彪、林立果也需要这样的战斗英雄，他们看重的是他的空中战斗能力，到了关键时刻，要把他推上第一线。

从 9 月 13 日起，李德生在毗邻空军大院的京西宾馆，临时开设了办公室，架设了保密电话，以便汇总各个方面送来的揭发材料，随时向周恩来电话汇报情况、报送材料。当时的京西宾馆，已经腾空所有客房，准备迎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军委办事处组的人也不来了，整个宾馆空空荡荡。

14 日中午，李德生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刚到京西宾馆的办公室，准备小憩片刻。突然，军委一号台电话铃响起，秘书接到空军一号台总机话务员的电话说，空军作战部长有急事找首长。

李德生觉得奇怪，在空军作战值班室 30 多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到作战部长，为什么？他怎么现在出现了？他让秘书立即与作战部长通话。那边传过来作战部长鲁珉边哭边说：“我有非常紧急的情况，要向首长报告。”

李德生听说过这个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鲁珉，现在求见，一定有重要情况，觉也不睡了，他让秘书答复鲁珉，立即到京西宾馆来。

京西宾馆门卫接到李德生秘书的通知，让鲁珉进入大楼。

鲁珉到了京西宾馆九楼，秘书引进后，他一见到李德生，不由放声大哭，接二连三地说：“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啊，我犯了杀头之罪啊。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我犯了罪，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

李德生听了，很是吃惊。一天多来，大量可疑事实表明，林彪北飞叛逃，定有重大隐情。后来有个“林副主席手令”，一时还弄不清“命令”是什么内容。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人突然揭露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这么大的阴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秘书扶鲁珉在会客室沙发上坐下，给他倒一杯水，对鲁珉说：“你先喝点水，冷静一点，慢慢讲。”

鲁珉没有想到李德生如此宽厚对待自己，格外感动，坐下喝了几口水，稍稍平静，才讲出阴谋的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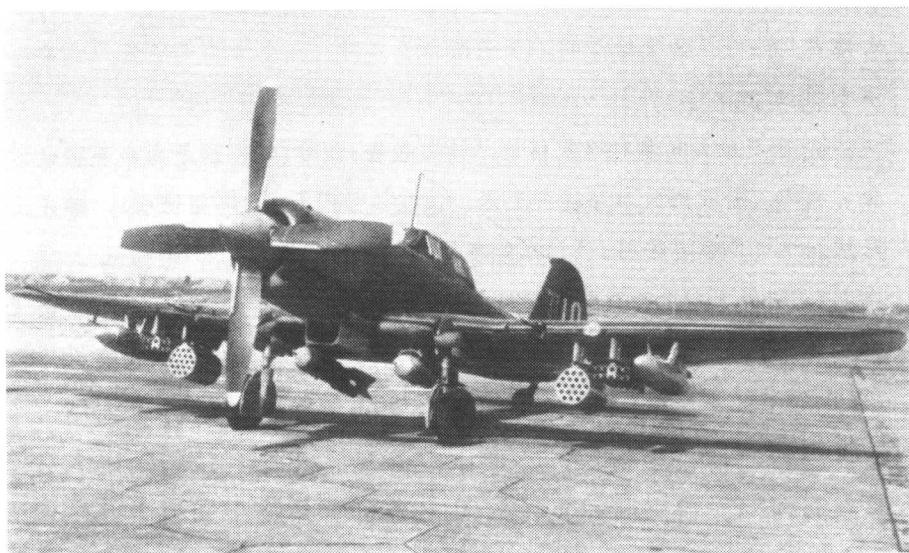
鲁珉交代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几个人在西郊机场策划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后来我参加了。”

李德生说：“你讲具体一点，不要急。”

鲁珉接着说：“他们的方案是，乘毛主席在外地巡视的机会，在上海由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时，下手行刺。此计不成，让‘联合舰队’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100 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专列。如果这个计划还不成功，第三个方案是在苏

州硕放桥埋放炸药，炸毁专列。实在不行，第四个方案是用轰炸机炸毁毛主席的专列。”而轰炸专列的任务，就选飞行员出身的作战部长鲁珉担任。11日当晚，江腾蛟派车拉上鲁珉，到西郊机场，由他们四个人向鲁珉交代任务，派他驾驶飞机发射火箭，攻打专列。

鲁珉讲，他回到家里，心情紧张复杂。自从林立果担任作战部副部长后，由于林彪接见过鲁珉，二人的关系倒也不错，没有想到自己一步步走向罪恶的陷阱。现在，林立果交代了任务，背后当然是林彪。鲁珉想，轰炸毛主席专列，成功了，自己将成为罪不容赦的千古罪人；而且林彪还会打着“高举”的旗号，肯定把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转嫁给他。如果炸不成，林彪、林立果同样不会放过他。不管怎样，他受领过轰炸毛主席专列的任务，林立果他们会留活口吗？



林彪反革命集团就是准备用这架伊尔—10 强击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

12日下午，林彪、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他们在南方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落空，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由林立果、周宇驰布置，当晚9点多，由王飞、于新野等人召集开会，确定13日清晨，护送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拟定了飞机和20多个随行人员的分组名单，从驻地到机场的车辆组成，以及出发时间。这个会，鲁珉又参加了，并且上了分组名单。

12日夜，鲁珉回到家中，越想越怕，前一个计划虽然落空，南下广州的计划就要付诸实施，自己怎么也跑不脱了。想想自己是一个穷孩子，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自己，培养自己，学了技术，当上飞行员，又成为空军的作战部长；明天，就要变成反革命分子，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心中十分矛盾，十分害怕，连夜同妻子商量，怎样才能躲过这场灾难。

鲁珉的妻子是门诊部医生，给他想了个既可装成“重病号”，又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办法。她帮鲁珉用食盐水揉眼睛，一下子把眼睛揉得通红，马上看急诊住进医院。

李德生问，你为什么隔了一天多才来揭发交代呢？

鲁珉说，当他得知13日清晨，原先约定的车辆没有开出，也没有人通知他到西郊机场。是逃过去了，还是没有逃过去？他的妻子告诉他，发现机关办公大楼岗哨增多，司令部通知各部组织学习，他估计情况有变化，更是惊恐万状。他想揭发，但是担心弄到林彪的人手里；不揭发，心中充满罪恶感。怎么才能直接报到中央去？他先用电话找老同学、人民日报社的鲁瑛，说是有重大情况要向中央反映，请鲁瑛帮忙。鲁瑛不敢答复，让他直接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西门。鲁珉哪里敢去？又多方打听，终于知道李德生代表中央坐镇空军，才通过一号台接线员找总政治部李主任通话。

鲁珉的交代，断断续续，归纳起来，一是林彪要谋害毛泽东；二是林彪要携带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这是第

一次听到由当事人亲口讲出的骇人听闻的大事！

李德生让秘书将鲁珉揭发交代的记录整理誊清，让鲁珉核对后，签上姓名，立即报送周恩来。同时报告说，此事太大，为了彻底弄清情况，将在空军机关和几个重要单位，继续清查，并对鲁珉采取保护措施。

不到一个小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德生同志，鲁珉的揭发交代太重要了，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清查工作要抓紧，要继续深入下去。”

林彪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为了彻底弄清全部情况，李德生请示中央批准，从总政治部机关调出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由部长、副部长或处长带队，到空军机关、西郊机场、沙河机场、空军学院等林立果经常活动的地方，展开清查工作。工作组在查看空军党委记录时，发现在1970年7月6日的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有“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

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询问了鲁珉的交代经过。他听了李德生汇报的鲁珉交代和空军党委的决定以后说，林彪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当人们知道他要做坏事，是不会跟着他干的，他一切不能调动，一切也指挥不动。

鲁珉交代之后，李德生当即果断决定，在空军机关，将直接放走256号飞机的副参谋长胡萍、主持制定南逃广州行动实施计划的副参谋长王飞等人先后收审。他对于收审的重要对象，亲自谈话。

为了体现坦白从宽、区别对待的政策，将鲁珉送到收审地亚洲疗养院时，李德生吩咐单独给他安排一间住房，允许他的妻子孩子

看望，允许他在院内活动。这个政策的体现，给了其他收审人员以实际的政策教育。

李德生注意到鲁珉交代中谈到的江腾蛟。他知道，江腾蛟原来是空四军政治委员，1967年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后来因为有错误被免职了，长期住在北京。现在却多次出现在林彪、林立果密谋活动的场合，出谋划策。这是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江腾蛟很善于逢迎。1964年，吴法宪、叶群在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他多次从上海赶去看望、送东西。“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底到1967年初，动乱最严重的时候，大学停课，学生到处串连，林彪、叶群委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他把他们安排在上海营区里。1967年2月，他亲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林彪曾经提议他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否定了。他多次写信给林彪、叶群，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一家，没有我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就是这个江腾蛟，虽然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居然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鲁珉交代的当天下午，李德生派秘书带一位警卫人员，坐车到江腾蛟家里。李德生交代：一定要把他带过来。秘书乘汽车到了北京市灯市口附近的一座四合院，敲门进去。江腾蛟听说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的，忙把二人让进客厅。秘书说，江政委，李主任有事，想请你去谈谈，我不知道你家电话号码，所以专门来请你。

江腾蛟略一迟疑，一声未吭。显然，他自从11日晚布置鲁珉谋害毛泽东以后，等了三天，不见动静，也接不到林立果、周宇驰的电话，心中十分忐忑不安。现在总政治部李主任请他，暗暗感到不妙。他转身走进内室，一直延迟十多分钟，出来后脸色沉闷地说：“我们走吧。”

江腾蛟走到门口，他的妻子赶出来问，药带齐了没有。江腾蛟答道，带了。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江腾蛟，心中有鬼，既不反抗，也不询问，做好了“不归”的准备，一句话不说，钻进小车。

走在路上，江腾蛟实在憋不住了，终于发问：“李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啊，要谈点什么？”秘书回答说：“主任没有和我们说，到了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汽车从东城很快就到了空军办公大楼，来到党委会议室。李德生严肃地向江腾蛟说：“空军昨天跑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是西郊机场的。而你 11 日在西郊机场开会，你现在在空军没有职务，到西郊机场干什么呢？”

江腾蛟听到西郊机场几个字，心中发虚，满头是汗，但是他不知道林彪情况，还不愿意回答。李德生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架飞机已经在逃出国境后，摔下来了。”江腾蛟听到这里，脸色陡变。

这时中央办公厅通知李德生，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让他晚上 8 时到达。李德生要求江腾蛟：“你要端正态度，认真写出交代。”江腾蛟一个人坐在那里，对着工作人员送来的纸笔，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当晚，被送到亚洲疗养院，在一个单间住下。江腾蛟看着架势不对，越发坐立不安。

亚洲疗养院，位于北京西郊北京军区机关附近，本来是接待来自亚洲各国友好人士休息疗养的。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没有客人，一直空着。由于那里是一个封闭式的大院，房舍比较集中，又靠近北京军区，便于警卫和人员管理。于是，把有关林彪事件的所有收审人员，都集中在那里。

当时收审的人员，有从山海关押送北京的 256 号飞机的骨干人员；有空军机关的王飞、胡萍等人；有南京军区空军原政治委员江

腾蛟；有从西郊机场、空军学院、西交民巷招待所几个秘密据点，拘留的一批骨干分子；有广州、上海等地的“联合舰队”骨干，经过南京、广州军区拘留后，押送北京的；还有十几个从北京先头去广州，被收容回来的。

这十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王飞 12 日策划南逃时，根据林立果交代的另立中央计划，需要人员太多，第二天的几架飞机坐不下，就让一部分人坐火车先走。13 日中午，李德生、纪登奎审讯迫降直升飞机上的李伟信时，李伟信揭发了这一情况。李德生立即通知广州军区，注意这些人所乘火车的到达时间。这十几个人在火车上晃荡了两天两夜，没想到在广州下了火车，并没有乘飞机先行到达的人员前来接站，他们正在站台上东张西望，就被广州军区派来的人拘留，押送回北京了。

短短几天时间，参与反革命政变的骨干分子无一外逃，无一漏网。

在亚洲疗养院的收审人员，由北京军区派出保卫干部和部队警卫，由中央专案组统一管理。

集中在亚洲疗养院的涉案人员，是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的。有的是属于拘留审查；有的是组织学习，使他们划清界限，进行检举揭发。林彪、黄、吴、叶、李、邱身边的工作人员，属于后一种情况。毛泽东曾经针对林彪一伙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说，这些秘书，是党派他们去工作的，林彪搞阴谋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情，要区别对待。这个讲话，后来给在亚洲疗养院的收审人员作了传达，给林彪、叶群、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人员也作了传达，使他们很受感动，促进了他们深入揭发和交代问题。

收审对象情况不同，到西郊亚洲疗养院后，态度也各不相同。

一些“联合舰队”的“战斗小分队”骨干，过去长期集中在

一起，有“队歌”，有暗号，有联络密语，有“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等等法西斯纪律，又经过“路线交底”，“宣誓效忠活动”，满脑子是“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一切听林副部长指挥”，“我们要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一到亚洲疗养院，发现被监护起来，自恃是“林副主席、林副部长的人”，情绪对立，根本不交代问题，有的抵赖，有的装疯卖傻，有的避重就轻，有的依然神气十足地要“誓死忠于林副主席”。经过宣传政策，特别是告诉他们，林彪乘飞机外逃，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他们才泄了气，开始交代问题。后来看到党的政策确实得到体现，交代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三支两军”中，李德生总是习惯直接接触关键人物，以迅速掌握第一手材料，从而保证战斗和工作的胜利。此时，他认为，通过对重点人的直接谈话，了解情况，极端重要。就在林彪阴谋活动真相还未完全揭开之际，李德生开始同一些重要知情人谈话。除了同前面讲到的同鲁珉谈话外，还同一些重要收审对象谈话，直接了解情况，包括江腾蛟、王飞、胡萍、关光烈、程洪珍等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鲁珉所说的9月11日晚西郊机场开会的情况，李德生再次找已经收审在亚洲疗养院的江腾蛟谈话，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腾蛟是一个“老狐狸”了，他回避要害问题，只是说：“那是林立果要我找鲁珉的。”

李德生指出：“你是参加革命军队40多年的老同志，怎么能够听一个二十几岁娃娃的话，说不过去吧。你在那个会上说了些什么，你又要在上海干些什么，你应当好好想想，毫不隐瞒地向党交

代清楚。”

江腾蛟说：“那次会，是林副主席布置林立果召开的，我没有搀进自己的意见，在上海主要是王维国执行林副主席的指示。”

李德生见江腾蛟毫无交代之意，再次告诫他：“我告诉你两个情况：第一，林彪乘飞机外逃，飞机坠毁了，林彪、叶群已经摔死；第二，鲁珉等许多人已经陆续交代了不少重要情况，包括你的事情。我希望你‘竹筒倒豆子’，彻底讲清楚。”

江腾蛟开头不知林彪是死是活，不知别人揭发自己什么问题，听到这里，头上再次冒汗，答应仔细想想。不久，他终于交代了9月8日、11日林立果策划谋害毛泽东的黑会情况，其中包括关于谋害毛泽东的几个方案，如点着停放专列的机场油库，乘救火之机下手；用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办法，炸毁铁路。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是个重要人物，李德生在收审他的时候直接同他谈话。

9月17日，李德生在亚洲疗养院派人到空军机关，在值班室里找到王飞，说李主任请你去谈话。王飞心中有鬼，一直等待被拘留。他主动问：“要带什么东西吗？”

到了亚洲疗养院，李德生向他说：“王飞同志，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在这场斗争中，你的问题很严重，组织上决定对你停职审查。”

王飞开始就顶牛，什么都不说。李德生严肃批评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你这个态度，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呢？”

王飞混不过去，又采取推诿的态度。他向李德生说：“我是副参谋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林立果、周宇驰虽然是办公室副主任，可是他们好多事情是背着我搞的。主任，你不知道，我在司令

部办公室是受排挤的。”

李德生严肃地问：“组织谋害主席、另立中央的会议，你参加了，怎么没有被‘排挤’啊！”

王飞无话可说，又采取蒙混的办法，说：“我是受蒙蔽的，他们好多事情，是背着我搞的，我并不知道。”王飞被收审后，在亚洲疗养院统一组织学习党的政策，顶牛的态度，没有坚持多久，后来也交代问题了。

李德生同“联合舰队”成员程洪珍谈话，掌握了新的重要情况。

程洪珍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年轻的秘书，办事认真，有头有尾，周宇驰利用他办过好多事。比如接听广州、上海等地的电话，到火车站接人，查找有关化学武器的资料，甚至绘制钓鱼台的地形图等等，都交给他去办。“九一三”后，他发现领导、指挥他的人突然都不见了，察觉到空军出了大事情。想到自己办的一项一项事情，都和这件大事有关。他已经听说，中央派李德生坐镇空军，就在他的办公室附近。15日，他终于鼓起勇气，要求同李德生谈话。

李德生听说程洪珍是党委办公室的一位年轻秘书，为人比较老实，工作也很细心。他想，党委办公室是要害部门，利用年轻人、老实人办坏事，是坏人惯用的手法之一。他决定亲自接谈。果然，程洪珍不仅交代了“联合舰队”让他办的许多事，还交出了他的工作笔记。

程洪珍的交代，都和林彪、林立果阴谋谋害毛泽东有关，特别是他的笔记本，保存了原始记录，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事件等重要线索和证据。比如，他的笔记本上，只是9月9日这一天，就记了四件事：一是早晨，周宇驰交代他，描绘北京市钓鱼台地图。他绘好后，下午交给了周宇驰。这张地图后来在于新野的保险

柜里查获，并且得到证实。11日，林立果、王飞、江腾蛟、于新野曾经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实地看了地形。二是周宇驰交代他，向王飞的秘书孙水森，要一份国防科委和空军司令部科研部研制的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文件，程洪珍找孙水森要到后，也交给了周宇驰。三是周宇驰打电话，交代他11日早晨，到火车站接10次特快，接从洛阳来的一二七师政治委员关光烈，安排住在反帝路招待所。后来周宇驰又打电话说，不要程洪珍接了，他将自己去接。四是接到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电话，说“总管”（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长陈伯羽的代号）乘16次火车从长沙到北京，他报告了周宇驰。这个笔记本，记录了很多事，是林彪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重要罪证之一。

当林彪的原秘书、时任一二七师政治委员的关光烈，被武汉军区按通知护送到京后，李德生也亲自同他谈话。

林彪策划谋害毛泽东，南方是在上海等地动手；北方将在北京采取军事行动，包括用坦克、火箭筒攻打钓鱼台、中南海，准备谋害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确定调有兵权的关光烈，到北京受领任务。9月11日，关光烈乘坐10次特快到北京，是周宇驰亲自到火车站接的站，并且安排住进西交民巷空军招待所。11日晚，关光烈参加了林立果召开的策划谋害毛泽东的黑会。

四十三军的领导接到通知，马上找关光烈谈话。关光烈13日接到军区通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知道有大事，现在听到领导找自己谈话，已经闻出点味道来了。他对军的领导说，我不同你们谈，谈了你们也听不明白。要谈我到中央谈。

李德生首先向关光烈指出，过去给林彪当秘书，是组织上的安排。但是你参加林立果企图谋害毛主席的活动，就不是组织上的安

排了。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揭发，不报告，这是犯了不能宽容的错误。你受党的教育多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关光烈无言以对，不得不交代他参加黑会的经过。但是他辩解说，他们要我调防化连来，我说，不要说一个连，就是调一个班到北京也进不来。李德生认为这倒是实情，按照部队的规定，调部队进京，必须有军委的命令，他关光烈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李德生把同重点人员谈话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以后指出，林彪搞阴谋活动，有的人不愿干，有的人不敢干，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干坏事的死党，不会超过100人。他是副统帅嘛，有些人是跟着犯了错误的。毛泽东的分析判断，对于后来清查工作的深入，防止扩大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九、缴获林彪“手令”和 《“571工程”纪要》

林彪乘坐 256 号三叉戟飞机外逃，是以行动说明他“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而当时中央并没有掌握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任何证据。

对林彪事件的清查，是逐步深入的，又是以空军为重点迅速展开的。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分工，李德生负责空军的清查工作。

林彪集团的揭露，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搞突然袭击，“犯了路线、方向错误”。这在“九一三”以前，中央是很清楚的。

第二个层面是，林彪坚持错误，拒不检查。毛泽东多次通过批转文件、召开会议、派周恩来等同他当面谈话，都没有能够使他回心转意。直到 9 月 12 日，在周恩来调查他们私调 256 号飞机后，林彪以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事情败露，心惊胆战，仓促决定向北外逃。林彪一跑，他坚持错误的态度，也就很明了了。有人说，是不是可能像王明那样，跑到苏联当寓公呢？毛泽东对林彪的外逃，说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了”。这在“九一三”凌

晨已成事实。这个时候，中央依然不知道他的其他阴谋活动。

第三个层面是，林彪有一个谋害毛泽东的罪恶计划，这个计划由于毛泽东提前回京，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接着又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继续同中央对抗。对此，他下达了亲笔手令。这是在李德生坐镇空军作战指挥室的第二、第三两天，通过迅速清查王飞在12日夜召开的南逃会议，以及审讯李伟信，得到初步证实。这是中央事先还未掌握，而在“九一三”后才发现的。

然而还有第四个层面，即林彪有一个实行反革命政变的纲领《“571工程”纪要》和一系列活动，这一个隐藏极深的深层次问题。它是通过在空军的清查，收集到大量人证物证才揭露出来的。

首先是查获林彪手令。

在9月13日凌晨，周宇驰等乘坐的直升飞机被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只有李伟信假装自杀活了下来。

13日中午，李德生、纪登奎立即对李伟信突击讯问，进一步证实他们是凭据林彪“手令”动用的直升飞机。

李德生追问：“林彪‘手令’哪里去了？”

李伟信慌张地说：“我是负责保管箱子的，那个‘手令’，一直由周宇驰收藏，确实不在我手里。”

在迫降直升飞机时，周恩来已经布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派出部队和民兵，包围现场。押送李伟信的北京卫戍区干部报告说：“直升飞机迫降后，我们已经组织民兵包围了现场，散落在田野里的所有物品，都已收拢起来。”

李德生问：“文件呢？”

卫戍区的干部回答：“直升飞机上有大批绝密文件，有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的航行图，有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还有大批100元、50元面额的美元，都

已由专人保管。”

李德生问：“在死者的尸体上，有没有发现什么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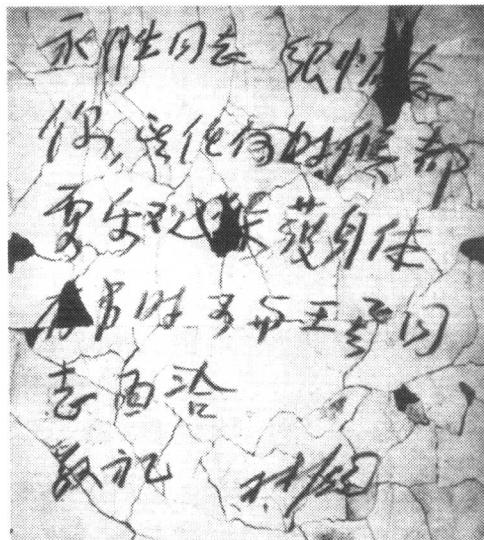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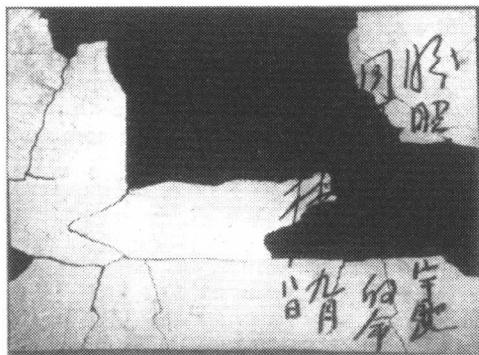
来人回答：“都已搜查过，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收拢在一起。”

李德生说：“那些都很重要，你们还要注意单张的，或者已经被撕成碎片的字纸。你们要重新到现场，把散落在田间的所有片纸只字都仔细收集齐，哪怕是一块小纸片也不能少。”

周恩来得到李德生、纪登奎的报告，再次要求北京卫戍区组织民兵，在现场进行拉网式的寻找，一定要把散落在田野里的碎纸片，统统收集起来，全部上缴。

秋季的田野，庄稼还没有完全收割，沟沟垄垄，坑凹不平。在包围直升飞机时，又经过多次践踏，找大大小小的纸片，确实很难。然而事情确实如李德生所料，周宇驰在直升飞机被迫降以后，下了飞机，自杀以前，连撕五六下，把林彪手令撕得粉碎，散扔在田野里。民兵们分工负责，一小块一小块地“过筛子”，陆续把散落在地表的、踩到土里的，大大小小几十块碎纸片，收集起来，经过吴忠司令员，上缴到周恩来那里。

9月17日，周恩来约李德生、纪登奎、吴忠等一起，将碎纸片仔细拼对。林彪的手令，已经被撕成六七十块碎片。尽管经过拉网式搜寻，总还是有一些小纸片被踩在泥底下，找不到了。纸片不全，拼起来更难。周恩来端着放大镜一小张一小张地拼对，逐渐发现，分别是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一张上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另一张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原件均无标点）。其中第二张拼成后，字迹全部清晰。第一张缺了几个字，经过分别找江腾蛟、胡萍、李伟信和沙河机场等十多个看过原件的人，分别回忆交代。因为他们对这个特殊手令印象极深，字数又少，所以记得都比



林彪的两份“手令”。

较准确，他们虽是分别交代，文字却完全一致。核对结果，证明原文确实无误。

这两个“手令”起到什么作用呢？李德生通过多次在亚洲疗养院讯问收审人员和学习班人员，逐步弄清了详细情况。

第一张“手令”，即“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如前所述，它在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中至少用过四次：第一次是 9

月 8 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江腾蛟布置在上海或沪宁线上谋害毛泽东，出示了这一“手令”；第二次是在空军学院向王飞出示；第三次是 9 月 11 日晚，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向鲁珉布置谋害毛泽东，再次出示了这一“手令”；第四次是 9 月 13 日凌晨 3 时 15 分，党中央已经下了禁空令，周宇驰还是靠这个“手令”，骗取了直升飞机。

第二张“手令”，即写给黄永胜的，“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它从王飞手里两进两出，显现出林彪一伙阴谋策划的极其诡秘。

林彪密谋实行反革命政变是见不得人的。他的死党，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成员，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自己在“联合舰队”里的身份。公开场合，他们还是以他们的行政职务身份出现的。“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空军副参谋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王飞，许多时候，负责在第一线指挥。但是，黄永胜、王飞之间，并不知道彼此身份。为了在必要时协同行动，9 月 8 日，林彪下达了这个给黄永胜的“手令”。当时并没有交给王飞，而是由林立果派王飞给黄永胜送去叶群的信，让王飞转达叶群、林立果对黄永胜的问候，转达了他们探听到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内容，使黄永胜感激叶群，同时知道王飞的特殊地位。

林彪这个“手令”第一次交给王飞是 9 月 11 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确定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同时确定北京由黄永胜他们指挥，当时就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交给王飞，让王飞充当林立果同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由王飞到最后时刻，把“手令”向黄永胜出示。可是，11 日夜，林彪、叶群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下令“解除任务”。于是 12 日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从王飞手里收了回去。

第二次是 12 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布置王飞组织南逃广州，

另立中央，由于新野再次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交给王飞，以便向黄永胜出示，安排黄、吴、李、邱 13 日凌晨乘飞机南逃。12 日夜，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说是去广州的计划肯定不行了，连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这一“手令”又由王飞交回到于新野手里，于新野交给周宇驰，带上了直升飞机。

这个“手令”，在王飞手里两进两出，虽然最终没有到黄永胜的手里，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南逃广州的计划都没有得逞，但是却确凿地证明林彪图谋实行反革命政变，黄永胜是林彪计划中的重要成员。

缴获的这两份“手令”，是林彪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铁证。

最令人震惊的是缴获了《“571 工程”纪要》。

9 月 14 日，李德生把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找到京西宾馆，向他说：“林彪的事情，党中央已经向全军各大单位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过招呼了。看来空军的几个单位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中央同意由总政治部派出几个工作组，进入空军学院、空军三十四师、西郊机场、沙河机场、空军招待所等几个地方，那里有林立果设立的秘密据点。他们逃跑很仓促，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带走，也会有一些同他们搞坏事的人，留下来了。工作组去，要依靠那里的干部战士，迅速稳住局面，特别要把他们的据点严格控制好，不能丢失一份罪证材料。还要有一个组到空军机关，帮助我掌握情况。”

田维新回到总政治部机关，立即分别找几位部长、处长，组成五个组，一个一个地分别交代任务。当时，林彪叛逃的消息，是严格控制在极小范围的，尔后，才逐步向下传达。9 月 18 日，党中央发出第 57 号文件，将这一事件传达到大单位的党委常委；28 日，党中央决定将 57 号文件传达到军级党委常委，空军传达到团；

10月6日，党中央再次决定将57号文件传达到连级党员干部；10月24日，决定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九一三”后的几天，报纸上甚至偶尔还有“林副主席”的字样出现。这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大的波动和混乱，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当时，田维新给工作组作动员，要求他们认真谨慎，严守纪律，全力以赴，绝不漏过一点线索，发现任何问题，都必须及时直接向李德生主任请示报告。

空军学院，是林立果的主要据点之一。工作组到达时，李德生亲自去给空军学院全体人员讲话。他指出，空军机关有些人不经过组织，经常到空军学院进行秘密活动。最近，空军发生了重大事件，都和他们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有关系。党中央正在认真处理这件事情，希望大家把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彻底揭发出来，不得隐瞒。

李德生讲话后，工作组深入干部战士中做思想工作，对于林立果秘密据点周围的工作人员，又逐个谈话。

过了两天，有一位小食堂工作人员找工作组的同志说：“有几个经常住在我们这里的人，平时很神秘，经常夜间活动得很晚，几乎每天都要吃夜餐，最近不见了。我去他们的房间里收拾餐具，发现了一个本子，大概是他们没来得及带走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开始没有留意，听了报告，我才从那个房间里找出来。”

工作组同志一看，里面是手写的提纲，有大标题，小标题，一行有几个字的，有十几个字的，每一段最多一两行。许多段落用数字标志，或者用破折号标志，也有的用三角符号标志。

工作组的同志看到里面的话，有的不好理解，有的明显很反动。既然是这个据点里的东西，一定是一份重要材料，立即密封，派人送给李德生。

李德生接到笔记本，打开一看，只见第一页是标题《“571工程”纪要》，下面用括号写着（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

四）。李德生当即想到，这个日子恰恰是在他随周恩来到北戴河，向林彪谈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前。

下面是行书写的，每行或两三行一个意思。有的地方删去了一些词句，有的地方还有错别字；但是条文分明，意思清楚，一共写了23页。李德生粗粗一翻，从标题看，是一份完整的计划书，往后翻，发现有的话看不懂，有的话特别反动，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工程”？“571”代号是什么意思？不由得又从头仔细看过。

第一页的大标题《“571工程”纪要》。下面分九个小标题：（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每个小标题各占一行。

正文中每个小标题下都画上粗粗的黑线或双线。然后一段一个意思，有的一句，有的几句，是一种提纲式的写法。

这种写法，当时在空军机关很时兴，叫做“拉条式”，无论是给领导人准备讲话稿，对上写报告，或是对下发指示，先不写成正式文章，而是提纲挈领地写成纲目式的要点，便于审读。通过了，再写成文件。显然，这是空军机关人员写的。

李德生觉得，《纪要》虽然还有很多地方看不透，可是已经能够看出，这是一件杀气腾腾、充满法西斯气味的文件。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批评林彪，是批评他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那还是党内的矛盾；这一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了弄清内情，李德生立即派人提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李伟信，亲自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纪要》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人参加策划的，是干什么用的？李伟信看了原件后

交代说，2月，林彪、叶群带林立果到苏州后，派林立果到杭州、上海活动。3月18日，林立果在上海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同时叫周宇驰于20日从北京赶到上海。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在一起商量。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作者注）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研究了形势，认为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对于林彪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如果提前抢班，就要“直接陷害毛主席”，他们想的办法是：“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为了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他们研究，“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个计划，计划的代号想了好久，最后由林立果定的，就是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571”工程计划。并且决定，这个计划，按照林立果到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二是要有个组织，即以培养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于22日至24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七八月，于新野在广州曾经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叶、李、邱都检讨了，叶群很紧张。9月11日，于新野还夸耀说，这个计划和最近摘录的一本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林彪、叶群那里了。

李伟信的交代，证实了这个《纪要》确实是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李德生听了李伟信的交代，终于弄清了这个谜。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在想，林彪要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搞反革命政变，

尽管有鲁珉的交代，查到林彪的“手令”，可作证明。但是，这么大的行动，难道没有一个通盘安排和计划？查到《“571工程”纪要》，终于证实了林彪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李德生立即将《“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以“特急绝密件”报送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李德生送来的《“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当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认为这是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他当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

《“571工程”纪要》既然要搞武装政变，拥戴林彪上台，它的矛头所指，集中在毛泽东身上。它以“B-52”作为毛泽东的代号。攻击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当代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这同林彪口口声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个伟大”，并且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完全判若两人。充分暴露出他此时真实的另一面。当时群众创造了一句名言，说林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它活脱脱地刻画出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形象。

《“571工程”纪要》里面有的内容是针对着江青集团的，它反映了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它也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某些内容，但林彪长期以来，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的极左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没有根本分歧。他在《纪要》里说的某些内容，不是为了真正纠正、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提出“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其要害是“夺取全国政权”！

政治局的成员看了《“571工程”纪要》，都认为语言恶毒，

是矛头指向毛泽东的非常反动的纲领，不宜公开发表。毛泽东不信这个邪。他对林彪的咒骂，不屑一顾。他主张把这一份反面教材发给全党、全国人民讨论。利用反面教材，教育群众，增强人民群众的免疫力。这是伟人的气魄。

《“571 工程”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附件，于 1972 年 1 月，印发全党，要求先在干部中传达讨论，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尔后做好向群众传达讨论的工作。事实证明，广大群众讨论了这个《纪要》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看得更加清楚了，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571 工程”纪要》1971 年 3 月出笼后，成为林彪实施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并且付诸实施。3 月底，他们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会议明确“上海 - 王（维国），杭州 - 陈（励云），南京 - 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4 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4 月 23 日，他们研究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先后建立了“联合舰队”、“分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北戴河等地，设立了 10 多处秘密据点。但是，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所有这些，都不能挽回他们覆灭的命运。最后，只能是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在查获《“571 工程”纪要》的同时，还在西郊机场从周宇驰的绝密文件袋中，查出“联合舰队”41 人的名单；查到 9 月 12 日晚 9 时许，胡萍以训练为名，派 3 架飞机准备第二天使用，有的先去上海，有的先去长春，然后经当阳、长沙到广州，准备为林彪另立中央之用。短短几天，林彪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一件一件被揭露出来。

二十、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交锋

9月13日，林彪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外逃后，中央政治局成员都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以便随时研究处置新的情况，毛泽东也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

9月14日，当中央从鲁珉、李伟信等人的交代和直升飞机缴获的材料中，得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向黄、吴、李、邱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中央决定，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但是，他们回到自己住地，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都在拼命销毁罪证，毫无悔改之意。黄永胜为了烧毁罪证，把一个大瓷缸都烧得炸裂了。过了四五天了，黄、吴、李、邱依然毫无动静。

9月17日，周恩来在听取李德生、纪登奎汇报亚洲疗养院收审人员情况后，对李德生说：“你去和他们四个人分别接触一下，

看看他们有什么揭发交代，看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分别去登门看望。纪登奎特意叮嘱：“德生同志，你得注意安全，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李德生知道他是好意，笑着说：“他们能把我吃掉！”自从坐镇空军后，李德生深切体会到，尽管突发情况接二连三地出现，处理起来，时间非常紧张；但又是可以做到从容不迫，有紧张而无惊险的。因为，林彪他们没有真理，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他们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12日深夜、13日凌晨，李德生只身到空军机关，尽管王飞的“联合舰队”骨干刚刚在那里开过会，尽管周围还有一些“联合舰队”的成员在窥视着，可是他深信，更多的群众是站在真理一边的，他并不感到有什么惊险。第二天，经过动员，机关广大干部更加拥护党中央的措施，完全遵守纪律，积极配合清查工作。即使那些有问题的人，内心虽然斗争激烈，表面上也都老老实实。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说得非常对。现在，林彪已经摔死了，黄、吴、李、邱即使反抗，也翻不起多大浪来了。

从9月19日起，李德生利用晚上的时间，接连走访黄、吴、李、邱。

第一天晚上，李德生按事先约定的时间，乘车到了西山。汽车开到黄永胜的住地门口，黄永胜的秘书和妻子都出来迎接。李德生一人下车，进入客厅，警卫人员留在外边车上。李德生在客厅落座后，黄永胜的妻子和工作人员都先后退了出去。

当时，黄永胜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要在平时，他是不把李德生放在眼里的。现在，他不得不会见李德生。“九一三”已经过去一周，他没有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检讨或揭发材料，面对李德生来访，当然也不愿意谈什么，显得有点

尴尬。

李德生有备而来，先是客气地问候黄永胜这几天睡眠可好。黄永胜掩饰道，还好，还好。

李德生说：“林彪的飞机已经在温都尔汗摔下来了，这个情况总长是知道的。后来，我们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报回来材料和图片，证实了摔的那架飞机就是256号，飞机上9个人的尸体，大使馆拍了照片，有的人依稀可以辨认，已经在政治局传阅了。”李德生说到这里，只见黄永胜面色煞白，不作回应。

李德生顺势说：“林彪采取这样一个背叛祖国、背叛党的决然行动，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总长怎么看哪？”

黄永胜很不愿意回答，可是又不能不回答。只好说：“林彪这个行动确实是背叛行为，我也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的嘛。”

李德生听得出，黄永胜是在虚与应付，你问什么，他回答什么，而且一点自己的话都没有。李德生加重语气地说：“为了查清林彪事件的全部真相，中央最近很忙，查出不少新的材料。总理让我来看看你，希望你早点作出检查和揭发，向中央有个好的交代。”

黄永胜说：“我和林彪虽然是老上下级关系，但是，他干的许多事，我并不知道，他也不可能让我知道。有的事情，他是有心，我是无意。”

李德生知道，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两次到王飞手里，是要在谋害毛泽东、准备南逃的关键时刻给黄永胜出示的，但是都没有给成，没有证据证明黄永胜看到这个“手令”。他对黄永胜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他干的事情是不是都告诉你，是很难说的。但是，你知道的呢，是都讲了，还是有什么没有讲呢？”

黄永胜说：“这些日子我是在想。为了向党负责，我不能把表面的、零碎的现象作为事实去揭发吧。请你向中央转达，我会向中

央作出交代的。”

看来还是应付推脱之词。李德生最后说：“我觉得中央是很慎重的，也希望总长能够郑重地作好检查和揭发，并且希望要抓紧一点。主席、总理都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们都寄予希望。请你珍重中央的这个态度。”

谈到这里，实在再也谈不下去。李德生认为，已经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给黄永胜了，只能希望他好好想一想吧，于是，告辞了黄永胜。

第二天晚上，李德生再次到西山军委机关驻地。他先到吴法宪家中。

李德生在空军时，已经和吴法宪有过交锋。

那是在周恩来9月14日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考虑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罪行后，吴法宪回到空军大院。本来，他应当在家里考虑检查，但是他却依然有时到办公室来。吴法宪见到李德生连连表白：“主任啊，我们空军犯了大错啦，我有罪啊！”

李德生在召开座谈会时，听到空军政治部的同志揭发，林立果在1970年空军“三代会”期间，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当时搞得很神秘，对外封锁，这个材料一直不让总政治部知道。会议简报，也控制得很严密。吴法宪在会上讲话，极力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个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竭尽吹捧之能事。林立果在空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李德生追问吴法宪，他只是说：“我们丧失了原则，我们不讲唯物论，我们犯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错误。”

李德生要求查看党委会记录。总政治部工作组终于查到一年以前，1970年7月的一次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有“空军的一切

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李德生感到非常气愤，作为空军一级党委，竟然把空军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一个新参军的学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副师级干部。

为了弄清林彪、林立果等人在空军的罪行，同时，又要弄清空军其他领导人，在这场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李德生建议召开空军常委会。

9月20日的常委会议上，吴法宪检查说：“我是引狼入室，认贼作父。”但他辩解说：“‘三代会’报告后，我讲话说‘放了卫星’，以后就被他们抓住了，大肆宣传。今年在九师开了现场会，又要传达我的讲话，被我压住了。但他们就以广州军区将我们的军。（广州）大军区发到团以上。我是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采取拖的办法，打算等11月开师以上干部会来解决。”

对于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吴法宪竟然解释成为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李德生责问吴法宪：“你说只是讲放了卫星，虽然没发文件，但现场会是开了，影响是出去了。这个会，是以空军的名义召开的，你是以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身份讲话的，它的恶劣影响已经形成了。这个会，准备了一年多了，你们党委是有责任的。而且去的人越来越多，你们还计划召开全空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如果说那些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1970年8月党委的这个决定，就是个严重的组织问题了，是关乎空军的领导权、指挥权的大是大非问题。无论从组织上、政治上看，你们背着党中央，把我们党领导的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应当好好想一想吗？”吴法宪唔唔吁吁，难以回答。

对于空军其他常委，通过交谈，大家初步认识到不讲原则，软弱怕事，跟人不跟党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这次会议，只是初步交锋，它为后来召开党委扩大会，解决空军路线问

题，组织问题，作了一点思想酝酿。

这次到吴法宪家，李德生开门见山，向吴法宪说：“林彪在庐山的错误，由于他的外逃，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从空军机关揭发的事实，也都说明他的这个行为，是早有预谋的。你领导空军党委作出的‘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也就不能再以犯了唯心论、先验论的错误来解释了。你在常委会上的检讨是避重就轻的啊。中央给你们时间，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时间，尽快作出一个好的坦白交代。现在，总理让我来，再次转达中央的期望。”

吴法宪连说：“我犯了大错误，我听命于林彪，让林立果掌握空军大权，我有罪啊！”

李德生说：“不要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嘛！你应当把错误的具体事实交代清楚，还应当把你知道的林彪罪行，揭发彻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吴法宪应道：“主任说的是，主任说的是。主任啊，我有罪啊，我们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作为司令员、党委书记，确实是罪不容赦。毛主席在我的书面检讨上批示，‘要敢于反潮流’，批评我‘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批评得好，批评得对。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我要检讨，我要深刻检讨的。”

李德生问：“你原来的书面检讨是林彪外逃以前的事了，现在林彪的问题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你还有什么新的检查交代没有？对于林彪，你有什么要揭发的吗？”

吴法宪说：“我正在准备，正在准备，一定要深刻地检讨。”

李德生说：“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只要是想交代问题，并不见得要拖很长时间的。希望你抓紧啊！”

接着，李德生又来到李作鹏家。

李作鹏接到通知，早已在家等候。进入会客室，李德生只见李作鹏依然戴着墨镜，让人看不出他的表情。

李作鹏长期做参谋工作、机关工作，是比较有能力的。到东北后，担任军事主官。可是他错误地把党对他的信任，归于林彪一人，他感恩于林彪，曾经表示，“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现在林彪死了，他还活着，还要揭发林彪。思想弯子够大的。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于9月13日凌晨0时32分从海军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在这之前，12日23时35分，也就是周恩来已经宣布命令：所有军用飞机起飞，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下达的命令，才能放飞。李作鹏却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说：“告诉你，它（指256号飞机——作者注）的行动，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13日0时6分，李作鹏又打电话强调：“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可是事件发生后，13日下午，李作鹏派秘书打电话找机场值班员更正，说李政委说的是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你好好想一下。然而，当时的电话有文字记录，值班员记得很清楚，李作鹏就是那样讲的。这就是说，在飞机放飞问题上，李作鹏是故意修改了周恩来的命令。而且，在13日0时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祥浩请示李作鹏，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可以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他并不提出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在飞机强行滑出时，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向李作鹏报告，李作鹏回答说：“好吧！就这样吧！”

李德生坐定后，询问李作鹏这几天的思考情况。李作鹏竟断然否认自己与林彪的阴谋有牵连。李德生问：“那么，山海关机场的命令为什么错传呢。”

李作鹏回答：“那是他们记录错误。”

又遇到一位不愿意检讨的。李德生把中央的意见，郑重给李作鹏转达，希望他抓紧时间，认真地作一个像样的检查和揭发。

同邱会作的谈话，是在总后勤部大院邱会作的家里。李德生遇到几乎同样的情况。邱会作只讲正在回忆思考，不谈自己的具体错误。李德生说：“已经几天过去了，这些天查获了林彪的大批罪证，党中央希望你们能够有所揭发，帮助中央弄清林彪的问题。你们自己的错误，现在更应当检讨得彻底一些好。”邱会作默默无语。

李德生从面对面的交锋中弄明白了，黄、吴、李、邱在“九一三”后，知道林彪外逃，也知道飞机坠毁，后来不再参加政治局活动，清查揭发出的新的大量问题，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短短几天，中央就将参与阴谋反革命政变的人员一网打尽，并且很快查获了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罪证。看来他们是以为他们极少数人知道的事，别人不会知情；密室谈话，没有文字可查；林彪、叶群一死，更是死无对证了。所以口头上都说，正在准备检讨，准备揭发，其实是心存侥幸，放放空炮罢了。

李德生将他同黄、吴、李、邱接触的情况和看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后几天，黄、吴、李、邱仍然没有一点交代。10天时间到了，党中央决定，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周恩来要李德生参与执行。

9月24日上午，李德生来到人民大会堂，只见工作人员已经将福建厅收拾妥当，室内的痰盂、烟灰缸统统撤去，双门大开。

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一起在福建厅就座。中央办公厅通知

黄、吴、李、邱4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先后到达，邱会作到首都机场参加一个外事活动后，也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他指出：“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反而相互串连，销毁证据。你们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中央决定，你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周恩来还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连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的。”叶剑英同意地点点头。随后，即由北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派的人分别将他们带走。他们的秘书、警卫人员则带到亚洲疗养院学习班集中。

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黄、吴、李、邱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同时指出“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成立了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中央专案组，成员有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

李德生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

二十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

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大量罪证被揭露，“联合舰队”成员被收审，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已经暴露无遗。李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带有自责的口气说：“我看错了人，我看错了人。”但是，再往过去看，怎么分析批判林彪把持军委日常工作12年，他所推行的那一套错误路线，这是在开展批林整风以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深深体会到，林彪在把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活学活用”等等，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深入批判林彪的错误路线，彻底肃清他的影响，成为批林整风的重要任务。那么，林彪错误路线有哪些方面，它的实质是什么？批判怎么才能引向深入？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李德生的认识逐步加深。

首先是在干部路线上。“九一三”后，许多老同志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以及林彪对老同志的诬陷和伤害。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判了林彪以“高举、突出、干劲”为标准的干部路线。他说，那三条不讲马列主义，不讲反对修正主义，不讲团结大多数，不讲批评与自我批评。11月20日，在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历来

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的嘛。”

这几次接见，毛泽东就干部问题的讲话，实际上批判了林彪“打倒一切”的极左谬论，给李德生印象极深。他认为让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工作，就是对林彪、对军委办事组的否定；而指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对批判“二月逆流”的否定；毛泽东对于林彪下面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搞清楚，给他们工作做，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连政策的否定。李德生不由得不想到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讲，对干部要大提一批、大罢一批、大保一批，而且不断批判老帅，打倒了不少老将军。他觉得，这是林彪长期以来在干部路线上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劣表现。

为了肃清林彪“左”的影响，贯彻党的干部路线，统一解放干部的思想，在“九一三”后4个月，李德生报告周恩来、叶剑英后，确定由总政治部召开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

1972年1月24日至2月10日，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李德生参加会议，传达和组织学习毛泽东有关解放干部的指示精神。会议批判林彪破坏干部队伍建设，推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给我军干部队伍建设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要求各大单位对受到批判和审查的干部，都要重新审查，尽快

平反和安排工作，充分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要调整领导班子，进行干部交流。会议讨论了落实的具体意见。总政治部关于召开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送军委办公会议，叶剑英很快批示，以军委文件转发全军。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为解放干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军队建设问题，林彪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我军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突出政治，一条是突出军事。当时，担任军长的李德生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很不理解，很不满意。觉得把军事同政治对立起来，这同毛泽东讲的全党抓军事的要求不一致。现在应当怎样批判他的错误观点呢？毛泽东在1971年10月4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的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可见，抓军队建设，不能不抓军事工作，不能不抓军事训练。李德生坚定了批判林彪在建军路上的谬论的想法。

李德生向主持军委办公会议的叶剑英请教。叶帅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全军的训练工作，而且对于李德生抓军事训练有很好的印象。

那是在1963年底，担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了总参谋部召开的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12月24日，他冒着严寒，在江苏镇江野地现场，观看郭兴福单兵战术作业表演。郭兴福教学法是李德生在连队蹲点一年，帮助、总结出来的。叶剑英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战士负荷有多重？戴上防毒面具对射击、战术动作有多大影响？看完表演，叶剑英高兴地连声说：“大开眼界，大开脑筋！”



1961年，李德生在连队蹲点，总结了郭兴福教学法。经叶剑英推荐，在全军推广（前左一为李德生、右一为郭兴福）。

接连三天，他听取汇报。27日大会总结时，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郭兴福和郭兴福教学法，他形象地说：“郭兴福教学法在十二军的连队里生根发芽，军的各级党委首长加肥，南京军区党委和首长又追肥，现在到了1963年，经过军委军训部推广，在全军范围内有了第一次收成。经过数年，全军公认了。”他指出：“不管哪个军种、兵种的基层连队，全国民兵，都认真按郭兴福教学法来训练部队，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的提高。”当天，他给军委写报告，总结郭兴福教学法的五个突出特点：善于在教学中抓现实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把练技术、练

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郭兴福教学方法，不仅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主要是在新条件下的发扬。”他对送来报告的总参谋长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不久，叶剑英提出改进部队军事训练的意见。李德生积极支持，将全军的步兵、技术兵训练时间，由原来的一年不到 60 天和 80 天，增加到 90 天和 100 天。恢复全军 41 所军事院校，恢复团以上教导队。并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部队训练质量。按照军委办公会议精神，在李德生分工空军工作期间，1972 年 2 月、11 月，空军先后召开了飞行训练会议、飞行训练安全工作座谈会，1972 年 1 月至 9 月，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时间，比 1971 年同期增加了 50%。

至于在军队政治工作上，需要清理的东西更多。林彪不是有所谓“一整套”的政治工作言论吗？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就曾经批评：“军队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1971 年 10 月 4 日，又批评“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的作风带坏了，要改变。

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怎样批判林彪的谬论，肃清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李德生在抓清查工作的同时，就注意同总政治部机关的

同志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些意见。

首先，大家认识到，还是要提高全军干部的理论水平。毛泽东不是说“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吗？林彪的许多观点是唯心论的，必须提高人们的理论水平，用唯物论批判他的唯心论。庐山会议后，总政治部遵照中央的通知，组织全军高中级干部办学习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这对于“九一三”后批判林彪，起到一定作用。李德生要求总政宣传部，起草《关于高、中级干部学习和连队政治教育的意见》，并于1972年5月9日以总政治部文件转发全军。自此，全军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出现了高潮。

其次，要科学分析林彪路线的主要表现，引导部队深入批判。1972年5月，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揭发、批判林彪罪行。李德生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总政治部机关，主要是宣传部，学习会议精神，做好深入批判林彪在政治工作中极左错误的准备，也是为毛泽东提出的召开军委全会作准备。

李德生向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气愤，批判起来，比较容易深入。而对于他长期推行的错误路线，在军队里影响深，危害大，必须抓住要害，抓住本质，深入批判，才能从根本上肃清他的影响。林彪善于把真理推向极端，真理前进一步，就成为谬误。我们要批判谬误，不能批判真理。比如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对的，而林彪却提出30字方针，强调“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

经过多次讨论，总政治部的同志归纳了批判林彪在政治工作上错误谬论的若干方面，它的要点主要是：

——批判林彪对我军建军路线的严重歪曲。所谓“我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突出军事，一条是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地走

突出政治的道路”。应当通过批判，提高部队对人民军队全面建设的认识。

——批判林彪突出政治的谬论。林彪提出所谓军事训练、生产等任务，如果和政治工作发生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等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应当通过批判林彪的空头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部队学习军事、技术活动的开展，从根本上提高部队战斗力。

——批判林彪破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林彪的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30 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有“顶峰”、“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等，是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应当通过批判，掀起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掌握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且使学习雷锋活动逐渐在全军重新恢复起来。

——批判林彪破坏党的领导的谬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说“群众运动，它自然是合理的”，在一些单位党委内部封某人是“正确路线代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左派领导干部”，使他们凌驾于党委之上，从而破坏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通过批判，增强部队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批判林彪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林彪提出所谓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干劲”，以林彪划线，对干部“大罢一批、大升一批、大保一批”。应当通过批判，正确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恢复遭受林彪打击迫害的领导干部的工作。

——批判林彪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加强对军队的管理教育，逐步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基层建设，使部队组织纪

律性得到加强，官兵关系得到改善。



1972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陪同叶剑英在军事博物馆参观全军美术展览。

这个提纲的基本内容，集中批判了林彪在政治工作中的极左路线。它通过宣传部门传到正在开展批林整风中的部队，使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199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对此评价说：“经过一段批林整风，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有了加强，其他各项工作也有了起色。”

这份材料是准备充实修改后，提供军委全会的。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接见刚刚组成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就提出：“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叶剑英也指示军事科学院准备了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材料。可惜的

是，由于后来批判林彪的极右，加之军委全会的筹备工作，受到江青、张春桥的干扰，没有开成，这个材料没有能够形成正式文件。

李德生提出，批判林彪，提高认识，一定要落到实处，落实到改进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上。大批判搞空对空，也是林彪那一套。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多次听到周恩来、李先念批判极左思潮，使得他的认识更加明确和坚定了。特别是1972年8月一二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的一个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明确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他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他提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周恩来的讲话概括了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对林彪路线的深刻批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到文艺、卫生、体育等领域，全面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就在政府机关和军队各大单位，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都取得明显成效的时候，江青他们认为，“批极左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反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有关批极左思潮的文章。1972年10月中旬，《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关于批极左思潮的意见，组织一整版文章，批判极左思潮的突出表现——无政府主义。文章尖锐地批驳了“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谬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通过找《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在上海《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报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在中联部、外交部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批判极左

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上写批语，竭力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周恩来为了避免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字面上的争论，在中联部、外交部的报告上，删去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样，而保留了报告的原先基调。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反映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担心批极左，会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12月17日，他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明确表示不同意王若水的观点，主张对极左思潮应当“少批一点”，应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江青等人则进一步发挥说，林彪的路线是极右，右得不能再右。此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只能是以含蓄的、迂回的方式继续进行着。

总政治部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李德生也不好提批林彪的极左路线了，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同样以含蓄的、迂回的方式，批判和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1973年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批林整风座谈会，李德生在讲话时，虽然不便再讲批判林彪的极左，但是他鲜明地强调要“恢复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传统。”在当时，只能这样从正面讲我们提倡什么，来批判林彪的错误路线。

李德生对于江青批极右的动机开始有所警觉，当然这个警觉是有个过程的。就在这年的年初，即1972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召集新疆主要负责人到京开会，解决新疆地区的问题。政治局分工李德生负责主持他们的会议。不料就在会议结束前一天，江青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场，她根本不提会议开始时中央政

治局成员接见与会人员，周恩来所做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一坐下就锋芒毕露地说：“我是不请自来。各省、市、自治区开会，是德生、登奎同志管。可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有权参加会议。”“我过去受林彪迫害，邱会作派来护士想毒害我。”接着对于一位负责人已经检讨的问题反复责问，肆意上纲。这还不够，转而又对着中央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赛福鼎·艾则孜责问说：“你参加工作这么久了，经常到北京来，为什么不讲汉话，为什么开会还要带个翻译？应当说，在你们新疆，维吾尔族是多数，汉族是少数，可以说汉族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汉族人多的地方，容易有大汉族主义；你们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多，不要有大维吾尔族主义。”她又说：“你赛福鼎有事不找我，只找叶剑英，为什么？我也是政治局委员嘛。”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两年了，刚来的时候，对于政治局委员江青，是尊重的。在参加政治局多次活动中，逐渐发觉江青有时说话容易“冒炮”。开始以为她是偶尔失言，后来发现，她总是有什么缘由的。在华北会议期间，她的不负责任的讲话，随意点名批评聂荣臻元帅，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妥善处理，才没有在更大范围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又随意点名刚刚主持军委办公会议的叶剑英元帅，更是令人费解。由于没有弄清江青为什么发火，李德生自然不便表态。这是他第一次直接看到江青如此霸道！

从华北会议起，李德生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江青毫无根据地评说政治大事，他不能不有所警觉，但是在这种场合，又不能公然表露。在江青喋喋不休时，李德生只好坐在那里翻阅文件，不插话，不置可否，沉默以对。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了，江青的讲话得不到回应，气咻咻地离开会场。李德生要求大家按照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指示，按照政治局集体接见时周恩来讲话的精神，按照这次会议形成的一致意见，把新疆问题解决好，然后宣布散会。对于刚才江青的讲话，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二十二、解决好“重灾区”的问题

被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把持的总参谋部、空军、海军、总后勤部等单位，受到他们的恶劣影响比较深，时间比较长，当时称之为“重灾区”，是清查和整顿的重点。中央政治局确定在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公会议领导下，分工李先念、余秋里负责总后勤部，李德生负责空军，张春桥负责海军，张才千负责总参谋部。

从“九一三”起，为了调查、解决驻京单位的问题，按照叶剑英的要求，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研究后，派出组织部长李宝奇、副部长孙子斌，干部部长魏伯亭，宣传部副部长翟鸣武、刘永寿，保卫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群众工作部长吕村夫、副部长李平以及十几位处长，带领工作组或观察组，到空军、海军、总后勤部、科委、军政大学、民航和几个兵种机关了解情况，及时向分工的军委领导汇报。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坚持总政治部机关的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定期听取总政治部的综合汇报。

自从“九一三”后，中央先后解决武汉、成都地区的问题。接着，又逐个解决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新疆等地的问题。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有

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312 人参加，着重揭露、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解决各自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央和军委对于驻京单位的整顿，也在有步骤地进行。

李德生一直负责空军的清查工作和批林整风运动。

空军被林彪视为“机动能力强”，“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的“基本力量”，是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的“重灾区”。“九一三”后，李德生接到空军机关和部队送来的大量揭发材料，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罪证，像《“571 工程”纪要》、“联合舰队”名单、南逃广州随行人员编组名单、空军党委关于“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的记录、空军政治部落实“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的记录等。也有的材料是揭发犯错误同志的问题的。还有的材料是提出疑问的，比如，有的提出，既然林立果在司令部有一帮“联合舰队”，那么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空军报社工作，政治部有没有王飞式、周宇驰式的人物？既然林立果在北京几个空军部队有秘密据点，那么，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中还有没有林彪死党？李德生要求工作组的同志认真研究，郑重对待这些材料，要在调查研究中，把那些揭发林彪重大罪行的线索搞清楚，查确实，而对于一些没有足够根据的东西，需要加以分析、甄别。

许多时候，李德生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情况，认为：第一，林彪仓促出逃，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带走，这就给清查工作带来很有利的条件，人证物证俱在，只要我们清查工作做得细致彻底，什么问题都可以查清楚。但是在揭发搞得比较彻底的时候，也要防止“怀疑一切”。第二，毛主席已经讲得明白，林彪的死党不会超过 100 人，这个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许多人并不知情；当人们知道他要做坏事，是不会跟着他干的。后来又讲，批林整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在历史旧

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所以，我们对待数以千件的揭发材料，一定要认真分析，任何有用的线索，都不要放过，做到件件清楚；一时没有确凿证据，弄不清楚的，不匆忙做结论。李德生进一步向他们讲：“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实在，要全面，不能片面，不能主观，更不能偏激，不能极端。为什么有人对极左的东西有兴趣？他们思想方法片面，他们看问题偏激，他们处理问题必然走向极端。”

到了1973年初，清查、揭发、批判已经一年多了，李德生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第一，要把林彪、吴法宪等人在空军的罪行和他们推行的路线，在全空军范围内进行系统地深入地揭露批判，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增强“免疫力”，这对于空军今后的建设有长远的意义；第二，要帮助空军党委几位犯错误的同志，进一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样，这也会对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所教育；第三，现在空军领导班子已经不健全，要按照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和老中青结合的原则，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现在，按照中央的要求，召开一次空军批林整风会议，彻底批判林彪罪行，肃清他在空军的影响，帮助几位犯错误的主要领导提高认识，调整领导班子，条件基本成熟了。

李德生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解决空军问题的指导思想、重点、方法、步骤，经过政治局讨论，得到了批准。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会议，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于1973年3月18日至5月1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为了加强会议的领导，请各大军区（除新疆）各派一位领导同志参加。请受到林彪、吴法宪打击迫害的原空军领导干部刘震、聂凤智、张廷发、成钧、吴富善等10位老同志与会。当时，对这些老同志还没有作出平反

结论和恢复工作，请他们到会的本身，就是对林彪破坏空军建设的批判，这给到会同志以很大的鼓舞。

会议首先开展批林，充分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所进行的大量阴谋活动。

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系统揭发、批判了吴法宪等肆意吹捧林彪，鼓吹唯心论，为林彪实行反革命政变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吴法宪等人吹捧林彪“是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林立果是“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天才小将”等等。深入批判，使大家认识到这些论点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论，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谬论。他们宣传这些谬论的目的，是为林彪实现反革命政变做舆论准备的。

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吴法宪等人在组织上向林彪、林立果交权，妄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空军，演变为林彪实现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的罪行。吴法宪表示，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副主席及其一家”，要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空军党委于1970年7月6日，竟然作出让林立果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决定。空军政治部7月14日作出贯彻空军党委决定的五条措施的纪要，其中说：“对林立果、林立衡必须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必须向林立果、林立衡请示报告；坚决执行林立果、林立衡的指示；向林立果、林立衡学习；抓紧两条

路线斗争教育”。鼓吹“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挥”。有了这“两个一切”的决定，“联合舰队”的核心骨干，逐步控制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等要害部门，在空军一些单位，林立果建立了秘密据点、非法组织，包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

林彪逐步篡夺空军领导权的惊心动魄的事实，引起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慨，大家认识到保持我们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极端重要性。

在各组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先后召开了四次揭发批判大会。这就加深了到会同志对林彪在空军的罪行的认识，大家深刻认识到我们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大家“对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方针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理解，更加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

在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基础上，会议第二阶段分成四个组，由大军区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具体帮助空军领导干部中的四位同志。大家批评他们听任吴法宪的摆布，以党委名义作出错误决定，拱手把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交给一个刚出校门的林立果，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帮助组的领导同志分析，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老战友陆续被打倒，上有林彪高压，中有吴法宪打着军委办事组名义盛气凌人，下有林立果等人威逼，“怕”字当头，置党与国家利益于不顾。人们哀其不斗，怒其不争，殷切期望他们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四位同志经过小组帮助，个别谈心，先后在小会、大会上作了检讨，他们从不可自拔中得到惊醒，极其沉痛地作了检讨，认识有了提高，大家表示欢迎。

李德生及时听取各个组的情况汇报，要求大家本着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不仅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而且要进一步分析他们犯错误的根源，这对所有同志都是有

教育意义的。经过与会同志努力，会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大家对犯错误同志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

一、犯错误的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不是不了解情况，也不是识别不了”，“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完全站在林彪一边，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听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话，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吴法宪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他们也跟着吹捧，有的甚至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捧成“指导思想”。

二、林彪一伙提出“亲不亲，线上分”，搞“划线站队”。犯错误的同志，在“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个问题上，“从个人私利出发”，因而犯了错误。

三、林彪、林立果以“合法掩护非法”，以“技术掩盖政治”，甚至“送礼送政治”。而有的同志，“私心重，骨头软”，逆来顺受，不敢斗争；有的丧失警惕，麻木不仁，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

会议使与会的同志认识到：林彪的罪行，使人触目惊心；犯错误同志的教训，使人深受教育。批林整风会议，确实也是一场自我教育的会议。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会议，开了两个月，李德生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听取汇报，综合情况，及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最后阶段，讨论、修改、通过了给党中央的报告。

5月17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接见了与会全体同志。周恩来讲了话，宣布了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空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

次会议精神，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经党中央批准的空军新的领导班子。在新班子里，司令员、副司令员中有两人是空军战斗英雄。飞行员出身的同志担任领导职务，在我国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空军会议期间，也出现一个小的插曲：江青到会“放炮”。

有一次，帮助一位领导同志的小组会议，由当时已经被分配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的陈再道主持。陈再道正在发言，江青来到会场，她突然打断陈再道的话，指责那位被批评的领导同志说：“你为什么调查我的家庭历史？”这位同志正在接受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被这一问问得莫名其妙，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与会的同志也很诧异，这位同志的错误里面没有调查江青家史这一条啊，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与批判林彪是什么关系呢？

江青说：“我是城市贫民，有什么好调查的。你是何居心？”这位同志这才记起，有一次他出差到山东诸城，有人介绍，此地是江青的家乡，他顺口说我知道。也就是这么一件事，不知道怎么传到江青那里去了。尽管他一再解释，我没有调查。江青就是不依不饶，抓住不放。她从包里拿出梳子，一会儿梳头发，一会儿拍打着梳子，一直折腾到晚饭时间，才作罢休。

还有一次，江青参加小组会时，遇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她说：“成钧同志，对不起啊！”别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成钧心里明白，“文化大革命”初期，成钧被“打倒”，有一条“罪状”就是江青说他是“反革命”。这么大的莫须有的政治帽子，江青随意给人戴上，现在又轻描淡写地以“对不起”搪塞过去，就算了结。



1973年，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决定，李德生与李先念、余秋里一道参与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李德生与李先念、余秋里、陈永贵和任仲夷在辽宁鞍山的合影。

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在1973年6月底召开。李先念、余秋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请李德生一起参加对会议的具体领导。在6月28日会议领导小组和召集人会上，李德生代表中央宣布了张宗逊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命令，介绍了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对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的开法，提出建议。李德生说，我们要把会议开好，第一要把邱会作以及他的几个同伙的罪行，作深入分析、批判，弄清总后勤部系统的大是大非，提高人们的鉴别能力，这是有长远意义的大事。第二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把他们的错误解剖透，教训总结深刻，教育他们自己，也

教育同志。第三要重视团结问题，不能沿用邱会作打倒一大片的办法，对于同邱会作有过工作关系的，或者在邱会作主持工作时期正常提升的干部，不要笼统地都说是邱会作为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的，都是不可信任的。有人干了坏事，又没有转变，另当别论；有一部分人，在当时情况下，受骗上当犯了一般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是教育的问题，同上林彪贼船的也要区别开。这是我们在空军开会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搞得好，我们这个会时间不一定开得那么长，效果会更好。

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对于邱会作在总后勤部残酷迫害干部，打击一大片等等罪行，作了大量揭发批判。许多被邱会作“流放”到宁夏贺兰山干校的老同志，慷慨地揭发邱会作的罪行，使人们对林彪的极左路线，有了具体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结束时，8月6日，周恩来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出席会议的同志，同样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政治成果和组织成果。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亲切地向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同志一一问候。而后他环顾四周，问道：“贺诚同志来了没有？”

贺诚中将，1926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1927年参加了广州起义。红军时期担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邱会作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指使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但是找不到任何“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刘伯承、陈毅元帅都出面证明贺诚无罪，邱会作不得不恢复贺诚的组织生活和工资待遇。1972年落实干部政策时，周恩来交代李德生找贺诚谈话，听取贺诚的意见和要求。然后由总政治部向党中央报告：“建议贺诚同志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或者任国家卫生部部长。我们倾向于在军队任职。”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报告时，江青以贺诚年龄太大为由，使任命未能通过。

贺诚此时的听力已经不好了，周恩来的问话，他就是听不见。周恩来请他走到主席台前。周恩来大声说：“这些年你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啊！”

贺诚说：“他们赶我走，我怎么能留得住。”

周恩来深情地说：“你怎么不找我啊？”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许多老同志，现在听到周恩来说到这里，许多人感动得流泪。

周恩来大声说：“贺诚同志，你不是要求工作吗？我交给你一项工作，到岳阳去，调查一下那里治理‘三废’的问题。”贺诚知道没有安排他的职务了，但是非常爽快地应承：“总理交给的任务，我愿意去。但是我没有助手。”

周恩来说：“助手可以从总后勤部要，也可以从国家卫生部、化工部要。”在1973年，周恩来已经前瞻到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中必然遇到的一个生态环保问题，提出研究治理“三废”的任务；对于贺诚，不安排职务，可以安排工作，发挥他的作用；而贺诚只要有工作做，不计较职务安排。此情此景，使许多人激动不已。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海军的批林整风情况。

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公会议分工，海军批林整风由张春桥负责。按照军委办公会议的要求，总政治部派出宣传部副部长翟鸣武率工作组到海军了解情况。翟鸣武为人谦虚谨慎，在“文化大革命”前由军副政治委员调到总政治部，李德生特意安排他带领工作组到海军。李作鹏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海军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初，“打倒”政治委员苏振华后，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他紧跟林彪，在海军搞以他为“正确路线”代表的划线站队，不仅在海军机关，连海军部队里，几乎人人都要表态：你站在哪一边？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领导干部”

李作鹏这一边。人们传说一个故事：有个炊事班，在“站队”表态时，有一位炊事员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哪一边”，就说：“我站在锅台这一边。”一时传为笑谈。

工作组了解到，由于李作鹏把海军机关搞得很乱，派性严重，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不是集中力量揭发林彪、李作鹏，而是有揭发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的，有揭发司令员萧劲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组请求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总是说他工作忙，一拖再拖。难得安排一次听汇报，工作组讲到机关对李作鹏揭发批判不够，而对王宏坤却批判很多，李作鹏在海军很霸道，王宏坤作为第二政治委员，很多事情他管不了；至于司令员萧劲光，实际上他是受李作鹏排挤的。把矛头指向他们两位，容易放松对李作鹏的揭发批判。张春桥显得很不高兴地说：李作鹏的问题要揭发批判，王宏坤、萧劲光难道就没有问题？有问题，也要揭发。你们作为总政治部的工作组，看问题怎么这样不敏锐呢？是不是右倾保守了？你们也应该好好学习了。

翟鸣武回到总政治部，向李德生和副主任田维新汇报情况，讲起海军的批林整风运动，批判的面宽，两类矛盾分不清，派性依然严重。李德生问他：“这些情况向春桥同志报告了吗？”翟鸣武很谨慎地说：“他指示揭发还是应当彻底的好。”李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经常听到张春桥发言，不管什么问题，他总是讲得很尖锐，很偏激，很“左”的。是这位理论家的实际经验少，还是别的缘故？他听出翟鸣武的意思了。看来，工作组的看法有道理，但是他们的意见，不可能得到张春桥的支持，继续在海军待下去，工作很困难。总政治部要改变张春桥的意见，现在条件不成熟。李德生和田维新商量后，向军委办公会议建议，撤出在海军的总政治部工作组。

1972年5月，中央政治局确定，海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解决

问题，统一认识，调整领导班子。但是在派性的干扰下，会议批判没有重点，两类矛盾混淆不清。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集体找海军负责人谈话，指出海军的批林整风运动，重点不放在庐山会议和“九一三”后，而放在海军历史问题上，是不对的。纠缠历史，容易走偏方向，不利团结。然而，从9月开始，会议又开了3个月，“横炮”照打，形不成统一看法。周恩来亲自听取会议情况汇报，认为会议不要开得太长，应当适时结束。1972年11月16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会议的总结报告。但是张春桥私下里依然坚持海军批林，必须联系批判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对于海军揭发李作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竟然指责海军党委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来，党委扩大会议上，依然有批李作鹏的，有批萧劲光的，致使会议偏离方向，颠倒主次。直到毛泽东出面干预，肯定了萧劲光的功绩，同时确定苏振华担任海军政治委员后，才摆脱了张春桥的干扰。这个扩大会议，从1972年7月，一直开到1973年2月，开了8个月，可以说是创造了党委扩大会议时间之长的马拉松式纪录。

驻京兵种机关同样呈现着复杂的矛盾。

从远一点说，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问题。如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1964年的党委整风，1965年参加地方“四清”，“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些“斗争”中，都不同程度地有“左”的思想影响。致使在某些单位，一次运动来了，这一些同志受到过火的错误的批评；下次运动，另外一些同志又受到过火的错误的批评。往往出现“角色互换”的情况，这次你批评我，下次我批评你，是非恩怨，错综复杂。这就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李先念在听汇报时，曾经把这种现象比喻为“烙烧饼”，这面烤了烤那面。多次过

火的政治运动，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很难弥补的伤痕。

自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多年来，搞任人唯亲，搞极左路线，造成了恶劣影响。他有时请一些领导干部到毛家湾看电影，送像章，捎口信问好，极尽拉拢之能事。“文化大革命”中，兵种机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成立了好多“战斗组织”，在群众中，甚至某些领导干部中滋长了严重的派性，加深了领导干部之间、机关干部之间、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

为了弄清情况、解决问题，叶剑英亲自召开了一些单位的座谈会，同许多领导干部交谈，他都请李德生参加。

这里举某兵种机关为例。它最初组建时，领导干部、机关干部来自不同单位，“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的影响，形成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的派性又与领导干部间的分歧互相推波助澜。好几位主要领导干部同林彪有过一些一般的往来，牵连不是太大。但是，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从领导干部到机关干部，却互相指责，上纲上线，争论激烈。党委常委成员各执一端，会议经常开不下去。双方都向军委写信、打电话，反映对方的问题。

叶剑英几次给他们打电话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把对方的问题想得那么严重。叶剑英指某一位领导同志说：“他也是一位老同志，你们要照顾他，他恐怕还不是林彪死党，过去的工作大体上是好的吧。”就是这样中肯的话，有的同志往往听不进去。1972年1月，叶剑英在一次电话中再次讲，希望他们不要在内部矛盾之间纠缠不放。叶剑英多次把电话记录和来信，转给李德生处理。

1972年1月23日，李德生向叶剑英建议：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先召开党委常委会，在小范围内认识统一了，再开全委会，工作就好做一些。以后在适当时机召开党委扩大会，统一各军级单位领导干部的思想。叶剑英听了秘书转达的李德生意见，当即表示同

意，电话回复了李德生。1月27日，叶剑英又在一份电话记录上批示：“德生同志：不好把常委内部不统一的意见，就拿到扩大会上去争，最好先把常委意见统一起来（我想是能够统一的）再开一个以林陈反革命集团为主题的批判大会、团结大会，达到团结的目的。请考虑后答复他们。”

李德生将这一书面答复通知兵种常委讨论执行。

军委办公会议领导同志为了进一步解决他们的问题，专门接见他们的常委领导同志。不料回去后，几位常委竟然拿出了两个不同的记录文本向下传达。

到1973年5月，兵种党委扩大会议已经开了9个多月，进展很慢，成效不大。李德生派出工作人员参加他们的会议，将会议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并且商量了解决办法。5月11日，李德生陪同叶剑英再次接见他们的领导同志。

叶剑英郑重地说，第一，会议首先是批林，只有把批林搞深搞透，把林彪对军队的破坏弄清楚，才能弄清军队建设的大是大非；然后，犯错误的同志才能看清自己的错误在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中的位置。不这样做，林彪是林彪，自己是自己，既不能提高觉悟，也不能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第二，要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有错误的同志，达到增强团结的目的。批评别人，要与人为善，不能因为别人错待过自己，批评别人就不实事求是，就不容人。犯错误的同志要变被动为主动，从必然到自由。如何主动，就是要勇于自我批评，只有把错误讲清楚了，同志们谅解了，包袱就放下来了。他极而言之地说，总不能把错误的包袱一直背到棺材里去啊！第三，组织上要利用这次会议，把领导班子调整好，这是关系到军队领导权的大事。第四，要充分认识这支部队在军队建设中的贡献和地位，以部队建设为重，不要纠缠个人得失恩怨。

叶剑英的讲话用了将近一个小时，非常有针对性，而且语重心

长，循循善诱。李德生认为，叶剑英的讲话，把批林的意义提高到关乎今后军队建设方向上来认识，提高到个人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上来认识，就把批林与整风统一起来了，把批林整风与军队建设统一起来了，讲得既严肃，又有针对性。

叶剑英诚挚的讲话，使与会人员的认识有了提高，由总政治部工作组整理了记录，供会议传达讨论。后来又开了 18 天的大会小会，大家的思想认识逐步得到统一。5 月 29 日，会议顺利结束。

叶剑英的这一讲话精神，总政治部及时向其他兵种党委常委作了传达。

1973 年 5 月 8 日，李德生主持总政治部将各个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加以综合，写出五兵种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叶剑英 5 月 9 日批示：“德生、维新同志，建议从 11 日开始，每天下午 3 时到 6 时，汇报一个单位（晚上时间给中央安排），具体安排请你们组织和通知，如何，请酌。”叶剑英认为，报告对几个单位情况分析“综合得简要，似可打印给中央政治局各同志一阅，亦请酌。”

从 5 月 11 日到 15 日，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其他领导成员，分别接见这几个兵种的领导同志。叶剑英根据不同单位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阐述他在某兵种的讲话精神，使各单位的问题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得到顺利解决。

李德生除了参加领导军委直属单位的批林整风运动，还在国务院分管国家体委工作。“九一三”后，周恩来工作极度繁忙。1972年下半年，他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提出，请李德生协助他分管国家体委的批林整风运动和工作。

李德生查阅了国家体委的有关历史资料，亲自到国家体委机关召开了一些座谈会。当他看到国家体委被“军管”后，专业队伍解散了，运动员被下放了，机关不像机关的样子，体委名不副实，

很是痛心。

李德生向周恩来汇报，并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后，1973年1月22日，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列举了建国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取得的巨大成绩，说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体育战线上占主导地位！当时，几乎各条战线都套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资产阶级黑线占主导地位，敢于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是江青最不愿意听到的。这也是后来在批林批孔中，江青要整体委的一个原因。



李德生曾分管过国家体委工作。这是1991年李德生会见邓亚萍并祝贺她荣获世界乒乓球赛冠军时的情景。

李德生批判林彪路线对体育事业造成的危害。他说，毛主席批评林彪只搞文不搞武，使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我们体育队伍同样不能只搞文不搞体育训练。他要求：一、要进一步发展我国体育事

业的重点项目，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二、抓好青少年业余体育活动，培养后备力量；三、抓好专业队伍的建设和训练，逐步恢复项目队，认真贯彻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方针；四、积极配合外交活动，搞好国际体育交往；五、在开展友好国家交往中，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后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调三十八军政委王猛任国家体委主任，主持国家体委的工作和建设。经过批林整风，国家体委和体育战线的工作有了明显改观。

二十三、做好解放 175 位将军的工作

解放干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这里面，有林彪、江青一伙排除异己，“打倒一切”的一面。但是，毛泽东对于干部的态度，也是造成“打倒一切”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这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的悲剧。”“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正是由于“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以致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当他本人没有认识之前，很难得到纠正。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解放干部，在当时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九一三”后，批判林彪的罪行，揭发了林彪大量迫害老干部的事实。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变化。他在 1971 年 10 月 4 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是蓄谋已久的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11 月 14 日，毛泽

东接见成都地区来京负责人时，毛泽东第二次讲到“二月逆流”的问题。他指着叶剑英对成都地区的几位领导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德生还常听到毛泽东讲，林彪是要打倒老干部的。并且说到贺龙等老同志被打倒，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辞。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显然，这是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否定。

许多老干部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其中许多军队干部的信，毛泽东转给了李德生，有的还批上“处理可能有错”，“请李德生同志酌处”。周恩来、叶剑英、朱德也把一些老同志的信件转给李德生。这都使李德生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李德生认为，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尤其对陈毅元帅的评价，为解放干部带来了有利条件。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追悼会以军委的名义，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请周恩来出席。追悼会即将开始，中央办公厅传来消息，毛泽东要亲自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已经到场，他决定立即通知，请宋庆龄副主席、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出席，并且尽可能地通知老同志出席。此时正是数九严寒季节，八宝山公墓休息室温度不高，周恩来要求尽快加高室温；同时他考虑到毛泽东的腿疾，特意让人找一个高一点的沙发。叶剑英得知毛泽东来参加追悼会，立即将悼词

稿拱手送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宣读，以提高规格。

毛泽东只穿了一件棉大衣来到八宝山。到了休息室，他看到神情悲戚的陈毅夫人张茜，也凄然泪下。他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是个好人。”“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他转而向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说：“要是林彪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还说：“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示意张茜，将毛泽东的话，转达给邓小平。毛泽东的讲话在老同志中间传播，使他们备受鼓舞。

李德生主持了追悼会。他听到毛泽东的谈话，目睹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他体会到，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林彪的干部路线，而且对具体人的评价，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流行说法。这就昭示人们，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在毛泽东提到的人里面，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所谓“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所谓“右的代表”。重新评价他们，就为解放干部树立了榜样！这就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提供了极好时机和依据。

李德生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解放干部的谈话精神，以及批转给他的对受林彪迫害的高级干部来信或口头指示，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认为这是纠正林彪错误路线的最实际的工作。

这里讲两个事例：一个是解放苏振华，一个是“提审”吴克华。从中可以一定程度上看到解放干部工作的困难和曲折。

苏振华上将，1928年参加湖南平江农民暴动，红军时期，在彭德怀领导的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担任连政治委员、团总支书记，著名的模范红十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即有名的杨（杨得志，后为杨勇）苏（振华）纵队政治委员和兵团政治委员。李德生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六纵任团长、旅长时，常和第一纵队并肩作战。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李德生多次见到过苏振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振华先后任贵州省军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委副书记、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政治委员。1959年担任我国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的第一任组长。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林彪的指使下，1967年1月，当时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给苏振华扣上“三反分子”、“彭德怀分子”的罪名把他“打倒”，自己当上了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

1972年1月，李德生接到叶剑英转来的苏振华的申诉信。信是从湖南冷水滩一个军队农场寄出的，经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转给叶剑英。几乎同时，李德生也收到苏振华妻子陆迪伦的申诉信，讲到在农场，多次受到看管人员的无理对待，甚至被用脚踢倒。

“文化大革命”期间，负责专案的，中央有三个专案办公室。管理军队“专案对象”的是第二办公室，归黄永胜直接领导，李德生无权过问。“九一三”后，由总参谋部代管。李德生通过张才千副总参谋长从“二办”借来“专案材料”，才知道所谓“彭德怀分子”，就是因为苏振华在红军时期是三军团的，是军团长彭德怀的部下。所谓“三反分子”，是将他一些讲话断章取义，加以摘编，无限上纲。李德生写信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说明情况，认为这个案子应当翻过来，建议先接回苏振华回北京治病，以后适当分配工作。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看到这一批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都很高兴。苏振华有“三反分子”、“彭德怀分子”两顶帽子，这样的同志可以解放，就为解放军高级干部树立了“标杆”。

海军接到李德生的通知，接苏振华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身体。李德生请干部部派人到医院看望苏振华。

苏振华出院后，李德生专门把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

李德生的办公室在总政治部机关大楼的七楼上，在这里有一间和秘书在一起的办公室，一间会客室，一间会议室。所有党中央、国务院、总政治部、北京军区、安徽省的文件，都送到这里办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批办的专送件也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直接送来。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军委办公会议、北京军区的活动以外，李德生都在这里办公，阅读、处理文件，找人谈话，召开总政治部的会议和各类座谈会。

一天晚上，李德生在总政治部办公楼会见苏振华。李德生热情同他握手，问候这位老领导、老政治委员。苏振华却觉得这位昔日的军长，如今成了中央负责同志、总政治部主任，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上来的人，几乎都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傲气得很哪。他特意带着他的夫人，来做记录。

三人坐下以后，李德生首先询问：“苏政委，身体检查结果怎样啊？”

苏振华答道：“还好，还好，下去有5年了，身体居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李德生高兴地说：“没有病就好，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苏振华年长李德生4岁，是位老政治工作者，看到李德生的态度诚恳，讲话也没有摆“文化大革命”的臭架子，心情这才舒展

开来。

李德生说：“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有批示，我们都为你将要重新出来工作高兴。中央让我征求一下你对以后工作的意见。”

苏振华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工作了，很多情况不了解，马上工作也许会有不少困难。如果让我自己考虑，我认为还是回海军工作，要熟悉一点。”

李德生说：“我会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你的意见，有了批示，就及时通知你，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给我或我的办公室打电话。”

二人又谈了一会后，李德生请苏振华一起吃夜餐。苏振华说：“我在农场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已经多年没有这个习惯了。”李德生不再勉强。只是说：“以后工作了，又会拣起这个习惯的。”

说起李德生的夜餐，如果在中央政治局开会，那就在人民大会堂吃夜餐；如果在总政治部工作到深夜，则由机关食堂王师傅做夜餐，标准一样是五角钱。可是在机关吃夜餐，只是一人份，五角钱的标准不能超过，王师傅只能熬一点稀粥，一次蒸几个馒头，分几顿吃，或者从大食堂买一个馒头，烤几片馒头干，炒一盘素菜，加一碟酱菜。有时煎一条小鱼，就很难得了。其他工作人员一年四季都在大食堂吃夜餐，同所有值夜班的干部战士一样，每餐标准是一角四分钱，只能做一碗挂面或者把晚餐的剩饭用菜汤烩一下。

李德生同苏振华谈话以后，按照毛泽东的交代，首先请海军提出安排苏振华工作的意见。此时，海军重大问题都要先征求张春桥的同意。不料海军的报告送到他那里后，竟然被他压了一个月，才告诉海军，由海军党委给军委写报告，建议苏振华到基层蹲点。

叶剑英接到海军党委向军委的报告，感到明显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知道是张春桥作梗，在手里放了9天。4月11日，他转给李德生：“德生同志：这一件，我难办。请考虑并与春桥同志商量

一下，呈总理批示。此件我犹豫了几天，还是请你考虑。”

李德生知道老帅很不愿意亲自出面与张春桥交锋。因为按照组织手续，是应当由总政治部请示军委办公会议后，直接报告中央的。既然中央政治局有分工，事先还是要和分工的政治局成员打个招呼。而在这个问题上，同张春桥是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李德生认为，这件事情由老帅出马，确实没有必要，还是自己找张春桥，可以争上一争。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李德生找张春桥，以商量的口气说：“春桥同志，按照主席的意思，苏振华同志还是要用哩，要在海军安排他的工作。最近海军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他到基层蹲点，他已经在农场蹲了四五年了，我看再去蹲点不一定妥当吧。”李德生向来对坚持正确的主张是毫无顾忌的。他直截了当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后，张春桥却阴阳怪气。开始，他佯作看会议文件，不接李德生的话。李德生在办事的时候，从不计较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决不因为这些小事耽误正事。他又接着说：“请你们和海军说说，让他们再研究一下吧。”

张春桥这才回答说：“苏振华同志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了，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下到基层蹲点，补补文化大革命的课，对于以后工作有好处。”张春桥的答复，果然证实叶剑英的判断。

李德生很清楚，中央政治局成员对于驻京军事大单位分工负责，是指导性质的，重大问题还是应当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一位军种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是一件大事，我们已经征求了分工负责的张春桥的意见，还是应当按照正规手续，由总政治部写报告给党中央。

总政治部的报告提出，建议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和对苏振华问题的初步审查，分配苏振华在海军工作。政治局开会讨论时，江青、张春桥坚持要低一级分配，说是要“考验他对群众的态度”。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力争，才任命苏振华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又

过了一段时间，经毛泽东直接过问，于 1973 年 3 月，才任命苏振华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

吴克华的“提审”是怎么回事呢？

吴克华中将是炮兵司令员，他与政治委员都曾经在四野担任过军和兵团的领导职务。但是在林彪突出政治时，二人的积极性不那么一样，对林彪的态度也不那么一样，这种“差异”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驻京军事机关开展“四大”，在林彪的授意下，吴克华被戴上了“一贯反对林副主席”，“陷害三军革命领导干部”的帽子，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经过多次批斗，他被“群众专政”，秘密地关押起来了。

“九一三”后，吴克华听到一点风声，偷偷地写信给朱德、叶剑英，他们两位都把信转给李德生。叶剑英在 1972 年 5 月 29 日批示：“吴克华的案件似乎可以结束了。（据）说是林彪、某某某搞的鬼。请考虑批示。”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也曾经多次询问：“吴克华哪里去了？”李德生要总政治部派人到炮兵去查找。事情有点奇怪，炮兵机关的许多人，竟然不知道他们的老司令员哪里去了。总政治部的同志通过炮兵机关干部，从侧面了解到，吴克华司令员被造反派秘密关在某处的密室里。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并非个别事例，造反派随意抓人，“无法无天”的现象很多。

总政治部的同志汇报后，为了防止吴克华被转移别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李德生派人到炮兵去，以“提审”为由，叫他们立即交出吴克华。这一手真灵，那些搞“专案”的人，听说李德生主任要“提审”吴克华，当即带着总政治部的人找到吴克华。

当时李德生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结束了。1972 年 6 月 27 日，总政治部的同志带着吴克华到了京西宾

馆，随同吴克华来的“专案组”人员居然还要求打个收条。李德生的工作人员说：“李主任找他，还要什么收条，你快走吧！”

总政治部的同志为寻找吴克华，忙了一天，此时已是夜晚。吴克华被专案组人员“押”到京西宾馆，以为真是“提审”。

李德生说：“吴司令，已经半夜了，先吃夜餐吧。”服务员端来夜餐，李德生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吴克华这才明白过来，二人相视而笑，夜餐吃得特香。

第二天，李德生写报告给军委办公会议，介绍吴克华说的炮兵关押他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说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二是说他陷害“三军革命领导干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是说他打击政治委员。这些都是不成立的。建议解除吴克华同志的监护，恢复自由，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叶剑英同意了这一报告。

两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张春桥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类似这样解放干部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原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上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经过总政治部调查，所有罪名都不存在，李德生正准备给党中央写报告，建议解放和使用。不料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转来一封写给毛泽东的匿名信，指控李志民有重大历史问题。按照规定，凡是给毛泽东的信件，处理结果是要报告毛泽东的。此时已是1972年三四月，李德生叫总政治部立即去人到李志民的家乡再作调查，终于弄清所谓历史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并取得证明材料回来。当时群众中有个顺口溜：“花上八分钱（指的是一封平信要贴八分钱的邮票），够你查半年”，讲的就是乱告状的。调查的同志

回来，已经到了4月底，李德生立即给党中央写了报告，第二天，终于安排李志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上了新华社“五一”新闻稿的见报名单之中。当时，“五一”、“八一”、“十一”这几个重大节日活动，名单见报不见报，往往被看成是一个人政治命运如何的晴雨表。

又如，1972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空军问题，问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是怎么被林彪、吴法宪迫害的？李德生汇报了他们的情况后，毛泽东说，你派人去访问他们，了解林彪对空军破坏的历史情况。

李德生派人到刘震上将家访问。刘震在空军建设中曾有重大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空战，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多次取得胜利。这时，他刚刚被安排回到北京治病，听到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激动，详细揭发了林彪、吴法宪对空军建设的破坏，也谈到他被立案停职审查，下放农场劳动5年的经过。李德生将谈话要点报告周恩来、叶剑英说：“主席6月17日曾谈到着人访问刘震、成钧的问题。即由总政去人往访。刘是1967年9月由空军立案，停职审查，去农场劳动的。今年6月回京治病。7月，空军对刘案复查，初步发现有虚假，有逼供信。现正继续核查。”刘在谈话中“要求恢复军籍”，拟答复他“同意其穿军装，戴领章、帽徽。”叶剑英阅后呈送周恩来。8月20日，周恩来批：“拟同意，呈主席批示。”21日，毛泽东圈阅后批上：“退李德生照办”，在“退”字下面还特意画了一个圈。在当时，被允许重新穿上军装，戴领章、帽徽，同样是恢复政治名誉的标志。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将批件退到李德生手中，刚好中央政治局要开会，李德生立即将批件带到会场，请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

一阅。

再如，1972年7月，毛泽东问李德生，你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毛泽东接着说，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而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毛泽东要求先把他们接回北京。李德生打听到他们被“监护”的地点，派人接回，安排在京西宾馆休息，并且建议安排他们参加八一建军节的活动。

随着老干部的解放，197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的活动，新华社的新闻稿都发了大名单，越来越多的老干部名单见诸报端，引起了全党、全国、全军的注意。

解放干部，一个一个解决，实在太慢。怎样才能加快进度呢？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议定了几项事情。其中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指定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将党、政、军受“审查”的干部，提出先易后难的解决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这样，“先易后难”就成为当时解放干部的一个重要方法。

周恩来说，解放干部要从上到下、先易后难。他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也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了。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会变得容易了。他还建议，落实干部政策的分工，地方省委常委以上干部的落实政策，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国务院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的落实政策，由国务院业务组政工组负责；军队正军级以上干部的落实政策，由总政治部负责。所有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

须送中央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各部门要把待解放干部的情况，包括姓名、历任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复查结论、分配工作的意见等，造成表册，使人看了一目了然，便于讨论。表册先送给政治局成员，大家有个准备。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请来上述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列席。

李德生感到这样做很好。一个一个解决，是“手工业”的办法，太慢了；成批解决，是“工业化”的办法，这就可以大大加快解放干部的进度。他立即将会议精神，向总政治部党委作了传达，并且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由总政治部领导抓好这一工作。

总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这个办公室是“九一三”后成立的。在当时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屡屡遇到困难，听到这个决定，都很高兴，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立即将已经掌握的全军被“打倒”的正军职以上干部的情况，按由易到难的原则，将每个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治部的复查结论，有的还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列出详细表册。然而，在极左思潮还没有彻底批判的当时，重新复查并推翻这些被“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定性结论，恢复他们原来的领导工作，仍然遇到重重困难。首先，总政治部要审查鉴别原先的结论，做过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弄清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在写出复查结论前，要与原单位商讨，统一认识，为此往往经过几次反复，才能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总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完成任务，表册经总政治部党委研究，军委办公会议审议后，报送到中央办公厅。

这个时候，中央已经为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解放干部，实际上是召开十大的组织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央办公厅将党、政、军各部門报送的表册，分头送给政治局成员。周恩来在组织政治局会议讨论时，特意通知政治局委员朱

德、董必武两位老人参加。这样，一是保证到会的政治局成员达到法定人数；二是这两位老革命家熟悉老干部的历史，一贯公道正派，在防止江青等人的干扰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平常并不参加政治局的日常活动，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健康，每次讨论到午夜时，周恩来就请他们回去休息。

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三本名册，其中军队的一大本共有 175 名。他们都是曾经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军队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有的被关押，有的被下放劳动。总政治部总的意见是，建议解放，恢复原待遇，重新分配工作。

按照原来的设想，这个做法把所有被“打倒”的干部全部列出来，而且同类型的干部放在一起，可以加快审查进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请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再讨论。可是江青、张春桥不断发难，时而说“这个材料不真实”，时而说“材料里没有了罪行部分”，时而说“定性定低了”或“定错了”，时而说“这样的结论，否定了造反派的功劳”，甚至说“你们（指总政治部——作者注）包庇了坏人”，企图挑起争论。

每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都会及时出来说话。他概括地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反问道：“这个事能扣这样的帽子吗？”有的被解放干部确有缺点、失误，江青、张春桥就会无限上纲，周恩来依然耐心地解释：“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样，每次讨论几乎都得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几乎又是一个一个审议，一次仍然只能讨论通过几个人。

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颜金生少将，是作为“易”的对象，放在前面讨论的。颜金生，1930 年 12 岁时参加革命，14 岁参加红军。红军时

期，曾任红二方面军青年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〇师七一六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师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1965年春，国家文化部被批评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而被“改组”，他和南京军区政治委员萧望东和两位省委书记一起调到文化部，萧望东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部长由陆定一兼任），颜金生担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负责文化部集训班的工作，保护了一批文化界的名人。1966年10月，江青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公开指责萧望东领导的文化部是“旧文化部”。1967年1月，造反派夺了文化部领导的权，所有司局长都靠边站，副部长被集中看管。在一次大会上，江青点名说：“颜金生也不是好东西。”江青一句话，颜金生倒了霉，马上被关押起来。此时，萧望东先是同国务院几十位部长被周恩来接到中南海“避难”，后来被送到卫戍区“监护”，造反派抓不着他。颜金生就没有这个“待遇”了，他被造反派关进“牛棚”，经常被拉出去批斗。为了保护文化部的老同志，每次批斗，他都把文化部党组决定的，或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批准的事，自己承担下来，这样更引来狂批猛斗。关押期间，他不仅挨批斗，每天还要打扫厕所，冬天就去烧锅炉。整整关了两年，才获准晚上可以回家休息。颜金生历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靠边站了，谈不上有什么错误。而且在职务安排上，总政治部建议任命他为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这已经是低一职分配了。这样可以减少争议吧，所以放在第一个讨论。

然而情况并不如人愿。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在汇报到颜金生“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时，介绍说：“颜金生同志是从军队转业到文化部的，时间不长，刚刚熟悉情况，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没有什么原则错误。”



李德生与叶剑英（左二）、张才千（左三）、田维新（左四）在一起。

江青马上接话说：“颜金生有错误！他在文化部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解释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参加红军时只读过三年书。”

朱德戴上花镜，念着表册上颜金生的简历说：“颜金生，1918年生，1932年参加红军，才14岁嘛。他能读多少书，他就不识几个大字嘛，不好说他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但江青仍不放过，转而指责说：“让颜金生到陕西军区工作，是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当分配到西北，应当分配到东

南去。”

会上谁也不与她争论“山头”问题，那样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而转移了主题。田维新解释，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原来是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是一方面军的。李德生也就事论事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的已经不多了。

江青依然纠缠不放，说：“颜金生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

颜金生由大军区主任改任省军区政治委员，已经低一职了，怎么还是不行呢？田维新再次说明：“陕西省军区现在已经有一位政治委员，颜金生去当政治委员，主要是管军工企业，现在战备任务重，陕西军工企业多，需要加强领导。”总政治部的报告，事先报告过叶剑英，是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审议过的。叶剑英接过来说：“现在忙于备战，炮弹、子弹储备不足，很需要抓一抓。”

周恩来最后说：“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军区当政治委员，分管军工生产，是合适的。”这样，一个小时已经过去。

有几位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论上纲很高。不过说穿了，就是把他们和已经被错误打倒的彭德怀、贺龙元帅连在一起。

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就是一位。李达，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他有着丰富的参谋实践和理论，是我军难得的高级参谋人才。

林彪嫉恨这位有很高军事水平的老将军。在李达的审查报告中，他的“罪名”是，参与指挥“二月兵变”。“证据”是他亲自调动部队，把大炮架到了什刹海。这个罪名太大了，而且同贺龙元帅的罪名“二月兵变”联系在一起。李德生早已料到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专门派人详细调查所谓“二月兵变”和李达“调动部队，架炮什刹海”的真实情况。调查的结果是：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在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卫戍区曾经向有关单位借一所营房，以便集中训练。“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调动部队搞“兵变”，并且写了揭发材料。这就是林彪诬陷贺龙的“证据”。所谓“调动部队”，是中央军委的决定，根本不是李达的个人行为。至于“把大炮摆在什刹海”，李德生派人去看了，在什刹海沿岸，确实有一尊大炮，建国初期，就已经摆在那里了，那只是一尊不能使用的古代大炮。田维新汇报调查经过后，周恩来表示：“事实清楚了，应当以事实为准。”李达的问题才获得通过。

还有几位，也是和彭德怀、贺龙元帅连在一起的，江青纠缠了好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文化大革命”中较早被“打倒”，“错误”一栏中的问题，经过复查，证实是几个参谋、科长的一般问题，算在杨勇头上了。江青、张春桥不好挑刺，硬说他和彭德怀有关系，是彭德怀的人。其他政治局同志都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个意见，杨勇的解放这才得到通过。

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解放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

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秦基伟、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他们同贺龙的关系时，周恩来有理有据地指出，总不能把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都说是不正当关系吧！

175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本来应当成批解决的问题，依然是一个一个讨论，几乎对每一个人，江青、张春桥都要抓住一点小事，挑挑“毛病”。这样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讨论完毕，终于全部获得通过。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总体上没有被否定，江青一伙还在干扰，这些领导同志的解放，许多人都留下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分配的职务大都低了一级。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同志得到解放和重新工作，在后来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大作用。

叶剑英元帅身临其事，深尝个中滋味。在江青等人胡搅蛮缠的时候，他端坐在那里，极其慷慨地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形容当时的艰难和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二十四、毛泽东派李德生到南京， 劝许世友“少喝酒”

1973年5月，空军党委四届五次会议后期，毛泽东在他的住地询问空军会议情况后，交代李德生说，你到南京去一下，听说许世友同志天天喝很多酒，酒喝多了伤肝，你劝劝许世友同志，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喝酒的豪饮海量，和他打仗的勇猛顽强，是一样有名的。

许世友上将，1905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县许家洼村（今属河南省新县），家境贫寒，全家备受地主恶霸的欺凌。8岁时，许世友只身投奔少林寺，当了佛门苦役，经过8年勤学苦练，练就一身本领，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在回家报仇后，伪乡长连夜派乡丁抓人，许世友摸黑跑上后山，从此参加革命。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许世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起义军到处打游击，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剿”，历尽无数次浴血奋战，建立起鄂豫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许世友每逢打仗，总是枪刀并用，战斗打到最后，同敌人肉搏时，只见他一把大刀左砍右杀，杀得敌人胆战心惊。直到当了团长、师长，他的大刀也不离

身。他曾经说：“我当战士时，打了几十次仗才当班长，当排长打了百把次仗，当连长打了三四百次仗，到当团长的时候，已经打了上千次仗了。”许世友后来担任红四军军长，骑兵师师长，都以英勇善战、屡打胜仗而闻名全军。

从红军时期起，许世友从不离酒。他“出征前喝壮行酒，胜利后喝庆功酒”。他认为，能喝酒的都是十分刚强、十分性烈的人。在紧张的战争年代，许世友喝酒，是红四方面军首长特批的。谁要不服气，首长们会说：“喝酒你有许世友那么大的海量？打仗你有许世友那么大的胆量？”人们只好没有话说。他一生喝酒从没有对手，从没有喝醉过，以至人称“酒神”。但是许世友也有三不喝：战前布阵不喝，战斗进行中不喝，打败仗不喝。

许世友，这位农民出身的“酒神”、“战神”，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和毛泽东有过一段“不打不成交”的知遇之情。

那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到达陕北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四军军长、骑兵师师长的许世友，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学习。不久，传来西路军失败的消息，后来学校组织揭发批判张国焘。许世友对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的错误，认识不足，对这场斗争的性质理解不深，对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在讨论中不能正确评价四方面军和过火言辞不满，感到委屈。“哪里都可以闹革命！”一时感情冲动，他同一些老战友密商后，计划出走四川，到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并且制订了出走计划和路线图。

事情泄露，情况一直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许世友被捕。审讯时，他毫无保留地诉说自己对张国焘的看法，对红四方面军的正确评价，对部分学员过火言辞和行动的不满，直至对党中央的意见，一直讲了两个小时。

许世友的意见，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后决定亲自见他。许世友见警卫要用枪押送他，就提出自己也要携枪去见面，

想以此试探毛泽东的诚意，不料毛泽东慨然应允。许世友感动万分。到了毛泽东那里，见到毛泽东心平气和，许世友一进屋就向毛泽东谢罪，说：“我打死过一千多地主、国民党，决没有伤害主席的意思。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用红军的武装押送我见主席，所以我才要求这么做的。”说罢，泪如雨下。

毛泽东搀扶起许世友，说：“许师长，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我爱都爱不过来，怎么能处斩你。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张国焘负责，与四方面军干部没有关系。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是张国焘的干部。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和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表示歉意。”毛泽东把驳壳枪还给许世友，鼓励他到前线打鬼子。

许世友说：“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从此，许世友对毛泽东非常信赖敬重，毛泽东对许世友也非常信任。

许世友和李德生，曾有过特殊的交往。

李德生和许世友，都是大别山贫苦的农家子弟。李德生出生在河南新县李家洼，许世友出生在新县许家洼，两个村子相距咫尺。许世友比李德生大 11 岁。红军时期，两人虽然都在红四方面军，只不过李德生在十一师三十二团通信排当战士、班长的时候，许世友已经担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了。许世友不认识李德生，李德生却熟知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1954 年 4 月，十二军从朝鲜回国，驻守浙江省金华、江山，江西省上饶地区，归属南京军区领导。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这才开始熟悉这位小老乡，熟悉这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里面

智勇双全的团长、旅长、师长，在朝鲜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师长、副军长。

许世友同李德生自幼受苦，对党的事业忠诚坚定，对同志诚恳热心，打起仗来勇猛顽强，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两人的性格又各具特色。许世友嫉恶如仇，不管是谁，有了缺点错误，他会不讲情面地严厉批评，批评过后，不记成见，依然坦诚相待。可他那急如风火的脾气，有时难免出差错，一旦知道批评错了，他会立即改正，虚心认错。李德生坚持原则，同许世友是一样的，但是态度和蔼，待人厚道，不管是谁，有了缺点，他总是在弄清事实后，耐心和你谈心，不发脾气，不扣帽子，让你心服口服。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和许世友一样，不记成见，不记方式，即使批评错了，不管是来自上级的，还是下级的，他从不计较。人们总说，李德生肚量大，很能够团结人。

这两位有共同理想、又有着鲜明的不同个性的人在一起工作，就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碰撞”。1960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江苏北部的战略防御，调十二军从富裕的鱼米之乡浙江省，移防到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苏北。考虑到苏北地区的困难条件，军委总部规定，十二军可以携带铺板和部分营具，带足一至两个月的粮食和柴草，以免到苏北大批采购，增加群众负担。十二军了解到苏北防区，地面黄土裸露，又从浙江带了草皮，准备到苏北铺在营房周围，改善营区环境。还有，十二军在浙江驻了6年，拥政爱民工作做得好，同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同志非常融洽。临别时双方互相访问，依依惜别，军、师领导机关也举行了一些告别招待活动。于是，有人夸张地说，十二军移防，把当地的大米白面和柴草都带光了，把浙江的地皮（指草皮）都“刮走”了，招待地方请客超过了“三级国宴”。

这些说法传到许世友耳里，他听了非常生气，立即把李德生叫

到南京。许世友当面批评说：“你李德生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你们到苏北是准备打仗，还是去享受？是你们下面有享乐思想，还是你们军的领导有享乐思想？”听到许司令员劈头盖脸的批评，并不符合事实，李德生头皮发麻，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但是李德生深知许世友的个性特点，在他火头上的时候，不必马上作辩解，不争执顶撞。他不是不讲理的人，是会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许世友训着，李德生忍着，慢慢地许世友火气下去了，回过头来问李德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德生如实作了汇报，许世友听后改变了语气说：“部队的实际困难当然要解决。我已经好久没有到苏北去了，我要安排时间到苏北看看。”

时隔不久，许世友带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领导同志到苏北十二军驻地视察，就地解决部队的实际问题。他特意对李德生说：“你们移防时不带那些东西，部队的日子还真的不好过。”他觉得对李德生的批评过分了，他称赞李德生：“没有想到，李德生还有这么一个好脾气。”

毛泽东为什么派李德生到南京去劝许世友少喝酒呢？

因为那个时候，许世友心情非常不好。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为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抛出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天才论的理论纲领。而不少中央委员则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对张春桥搞极左的不满，对林彪的阴谋毫不了解等原因，也表示同意毛泽东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许世友在会上并没有对设国家主席发言，甚至有人提出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设国家主席，他都没有理睬。他在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上，是很清醒的，没有中央指示，没有毛主席发话，他是从不乱表态的。8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亲自对大家说，我年纪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不要让我当国家主席了。许世友当即表示，主席不要讲了，我通了，我回去做其他人

的工作。毛泽东还告诉许世友，陈伯达是个坏人。

26日下午，在江苏和南京军区小组会上，许世友传达了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对他讲的话。讨论中，有人提议写封信向毛主席表个态。信里表示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并且建议：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毛主席检讨；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基层；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会；四是反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信件由许世友签发，送中央办公厅转呈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后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偶然知道这个事情，认为应当表态拥护毛主席的决定，也分别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分头上送。

“九一三”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三封信在林彪那里被清查出来。这可成了江青、张春桥抓住的把柄了。他们把军队的老将军视为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障碍，一有机会，就要打击陷害。

1972年12月25日，许世友奉命进京。中央派人谈话，问他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信件为什么落到林彪手中？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员写的信件内容一样？如果是串连，就是非组织活动。按照江青、张春桥分析的这三个问题，许世友的信，是指着张春桥来的；是故意送给林彪的；是有意串连好的。这可是莫大的“罪名”。他们以庐山写信为由头，整军队的老将军，是他们“抓军队一小撮”的继续。

实际情况是，许世友当时已经知道陈伯达是坏人，他在信中说到“犯错误的人”，当然是指陈伯达和其他犯错误的人了。何况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在宪法修改过程中的斗争详情，也不知道张春桥在斗争中扮演的角色，许世友的信怎么可能是指张春桥呢？尽管许世友对夺了上海市委领导权的张春桥，后来居然又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很是反感，很看不起，不屑与之为伍，但他是光明

正大的人，有意见当面讲，从不会搞影射之类的事。比如，1968年在北京开会，张春桥借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时，许世友出席剪彩，拍摄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当面攻击许世友“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许世友当即毫不留情地反驳：“你放狗屁！你才想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呢！”这么光明正大的许世友怎么会写信影射张春桥呢？至于信件为什么落到林彪手中，这是中办传阅中的问题，许世友他们无法回答。而所谓“串连”，后来几经查对，都没有查出证据。对于这三个明显不存在的问题，江青一伙依然抓住不放。

许世友被整得病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还不得不把事情的原委和自己的责任向毛泽东写了检讨。许世友在北京7天，就住了5天医院。

回到南京，许世友不得不会同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起回忆，写出“检讨”，由他签发给党中央和毛泽东。

许世友对于张春桥借机小题大做，挟嫌整人，心中非常窝火，常常借酒浇愁，喝上了闷酒。这与打胜仗后的豪饮，全然不是一个滋味。

毛泽东对许世友是有感情的。早在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到了上海，8月17日，专门派自己的专机，到安徽接许世友到上海谈话，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讲不许揪许司令，讲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后来他还说，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

现在，江青、张春桥又抓住一封信不放，逼得许世友在北京发病，回去后借酒浇愁。这种情况，哪里瞒得过毛泽东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看到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毛泽东全然理解许世

友的心情。俗话说，闷酒伤身，不宜多喝。毛泽东知道李、许二人的关系，觉得派李德生到南京劝许世友少喝酒，是合适的人选。

李德生5月5日受命后，于第二天上午，乘空军伊尔-24专机从北京直飞南京。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同机经南京回福州。许世友得知李德生到南京来，专门交代，把他安排在靠自己家最近的中山门小招待所里。

李德生中午到达南京，许世友立即到招待所看望。许世友见到李德生，感到非常亲切，非常高兴。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对许世友司令员的关怀和问候，不好立即谈喝酒的事，更不好马上说庐山写信的事。许世友亲切地拍拍李德生的肩膀说：“走，走，吃饭，吃饭。”

二楼小餐厅里，桌上早已放着两瓶茅台酒。

李德生酒量不大，但饮酒风度同样很豪爽。他总是一开头就和熟悉的同志一杯一杯地干杯，不拖泥带水，不留后手，不要滑头，喝够酒量就不再喝了。这样，对手也不好意思勉强他。所以，他很少醉过。

李德生熟悉许世友的脾气，他按照许世友的惯例，头一杯酒端起来，一饮而尽。许世友高兴，连饮三杯。许世友知道李德生的酒量不大，但是他最讨厌喝酒扭扭捏捏，喜欢李德生喝酒时豪爽痛快的脾气，也不再劝。

酒过三巡，李德生说：“你知道毛主席为什么派我来吗？”

许世友哈哈大笑：“你说，你说。”

李德生端起酒杯说：“就是为了这个。”接着他恳切地说：“主席是专门要我来劝你的，希望你以后少喝酒，更不要喝闷酒。”他乘机劝道：“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少喝一点吧，现在我喝多少，你喝多少。喝完了，咱们吃饭。”



李德生与许世友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这是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与许世友（中）等在一起的合影（左二为曾绍山、左五为江拥辉）。

许世友脸色阴下来说：“主席劝我少喝酒，总不会还是为了那封信的事吧。”

李德生同样郑重地再次说：“主席派我来劝你少喝酒，是怕你喝闷酒伤身。”

许世友听到李德生接连两次讲起“闷酒”二字，不由得注视着李德生，希望听到下文。

李德生停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主席说，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许世友请李德生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他琢磨以后，同样郑重地说：“我明白了！”

停了一会儿，他再现豪气。说：“少喝嘛，不是不喝。我还是老规矩，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不喝，我心里有数！”

许世友又喝了几杯，对李德生说：“我给你讲讲老百姓的顺口溜吧。‘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李德生说：“这大家都知道是讲林彪的，很形象，很深刻。”许世友又说：“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思想一包糟，打起仗来朝后跑。”李德生说：“前面几句，群众中早有传闻，后一句是你司令的创作吧。”

许世友敛住笑容说：“你回去报告主席，我许世友感谢他老人家的关心，我以后注意，少喝酒；我也请他老人家放心，我许世友是忠于党的，不会因酒误事。”

李德生意会了许世友的言外之意是回答“斗不过他们”。两位老战友，两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心心相印的老战友，心有灵犀，不用多说，尽欢而散。

只停留一天，7日，李德生就赶回北京，向毛泽东单独汇报了南京之行，又继续参加空军的会议。

二十五、江青“拜年”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她的职务只是中央宣传部的处长，“文化大革命”一来，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这个小组成立时，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她如此飞黄腾达而又有恃无恐，重要原因之一是她勾结了林彪这位“尊神”。而林彪也有求于江青，他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打听毛泽东的某些想法。于是，这两个集团又勾结又斗争。

庐山会议后，林彪集团虽然失势，但是毛泽东说了，对林彪还是要保，所以江青不会轻易丢掉这位“尊神”。1971年初夏，毛泽东外出巡视，江青专门在钓鱼台她的摄影室，给林彪拍照。林彪同样对江青怀着既不满又要利用的心情，拿着《毛泽东选集》，装模作样，让江青拍了一张又一张。江青把冲洗好的照片，让林彪挑选满意的一张，以《孜孜不倦》为题，署名“峻岭”，登载在《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七八月合刊上。

然而不久的时间，林彪叛国外逃，折戟沉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审查。中央政治局成员里面，林彪集团消失了，江青集团的比重上升。

江青深知，夺取最高权力，必须利用军队的影响和实力，她把目光转向军委办公会议。在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里面，既是政治局成

员、又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而且主要负责军队工作的，是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可是，叶剑英了解江青的历史，而且在1967年2月，对江青等人搞乱党、国家和军队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抗争。江青不敢造次去施展拉拢的伎俩。

江青的目光转向李德生。李德生不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中央组织宣传组（1970年11月）都有职务，在军队里，是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1年1月）。李德生处理林彪事件的能力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得到周恩来、叶剑英和各方面的支持。

早在1971年11月10日，江青接到一封专门写给她的揭发空军问题的群众来信，第二天她将信转给毛泽东：“送主席，此件是某某师几个人的联名信，有些提法值得注意。如有暇，可供参考，退江青。”但是毛泽东没有将信退给江青，却批道：“此件应送李德生同志查明酌处。”1972年3月，江青又在一封揭发军队人员的来信上批：“即送毛主席、周总理”。周恩来3月21日批：“提议送总政李德生同志”，毛泽东也批示：“李德生同志酌处”。

所有这些，都使她重视“做”李德生的工作。

江青是怎样施展伎俩“拉拢”李德生的呢？这里介绍几件笔者亲历的“小事”。

1972年12月21日，李德生从新疆回来。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李德生的汇报。毛泽东也看了李德生的书面报告，对李德生的工作予以肯定。1973年2月2日，也就是1972年阴历年的除夕。这是家家团聚，户户欢乐的佳节。中央各部门也按照约定俗成，除了特急件，一般情况下，电话、文件都少了。只是各位领导同志的办公室，依然24小时有人值班。

笔者在总政治部机关大楼七楼李德生的办公室值班。除夕之

夜，偌大一座办公大楼，只有各部值班员，也就是八九个人，坚守在各自的值班岗位上。当时，没有电视机，炊事员也都放了假，没有了夜餐。楼内一片静悄悄。偶尔远远传来居民区里的阵阵鞭炮声，提醒人们，今晚是团圆夜，是春节三天假日的前夕。

8时许，从来繁忙，今天格外安静的军委一号台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打破除夕夜的寂静。一号台总机那熟悉的女接线员说：“江青同志办公室杨秘书的电话。”一号台总机的女接线员们都有两个本领，一是她们熟悉所有用户的不同声音，一听就知道对方是谁；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找到所有用户的行踪。

那边，杨秘书非常客气地说：“江青同志要我打电话，请转告德生同志，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

笔者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怎么回答？说德生同志也给江青同志拜年，他没有授权给我；说谢谢，也没有授权，都不好。只好回答说：“我一定转报德生同志。”

笔者放下杨秘书打来的电话，不好耽搁，立即给李德生家里打电话，将这一内容直接报告给李德生，并且等着他如何给对方回话。李德生听了之后，只是答应一声：“哦！”从他历来处理事情的习惯，我知道，这件事到此就算办完了。他不会给你讲为什么，确实也不便讲为什么。

事情到此结束了，在远远的鞭炮声中，我过了一个平静的除夕。

第二天大年初一，李德生照例到办公大楼来，给各部门值班的工作人员祝贺春节，问候家人。到了七楼，问问有没有急事，却没有提起要不要给江青回电话的事。

李德生到北京以后，已经过了两个春节了，江青给李德生“拜年”，这是空前的一次，也是绝后的一次。

没过几个月，春暖花开，有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江青走到

李德生面前，显得非常关心的样子说：“德生同志，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到过你的家里看望过。我准备找个时间，到你家里拜访一下，好吗？”

林彪、江青总是喜欢对人施以小恩小惠，或者给以廉价的“关怀”，以此拉拢人；而有的人会受宠若惊，连忙表示“忠心”。李德生是很朴实的人。他很不善于无事应酬往来，更不善于做“联络感情”一类的事，很不习惯这种小动作。过去，在部队工作时，每逢军地之间、友邻部队之间，在一起吃一顿饭，开一个联欢会，他是把它作为加强军政团结、兄弟部队团结的工作来做的，总是借这样的机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他听到江青的要求，很感突然，他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政治局开会，我们常常见面。你又很忙，不要去了吧。”

江青哪里听过这样的大实话，她不答应，说：“那不一样，去一下好，看看你住得怎么样。”

李德生不会虚与委蛇，也不会敷衍地表示感谢，而是如实地：“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个小胡同，车子不好走哩。还是不去的好。”

江青并没有因此作罢，她让杨秘书和中办警卫处的同志给她“勘察”地形，真的打算要登门拜访了。警卫处的同志熟知江青的脾气，她要到哪里，事前有一大堆事情要办，像警卫工作、室内温度、周围环境、接触人员等，稍一不慎，她挑出毛病，一顶政治帽子就可能给你戴上了，谁个受得了。

警卫处派人到缎库胡同看了一番，证实了那里确实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还要拐两个九十度的直弯，江青的大红旗轿车是很不好开进去的。那么李德生的座车是怎么进出的呢？他的司机小韩，在部队开车的技术很过硬，每次拐弯，都要猛打方向盘，坐在里面的人会稍稍晃一下的。出现这种情况，江青能受得了吗？怪罪下来，谁能承担，警卫处的同志和杨秘书向江青汇报，那条胡同确实不好

走。江青这才作罢。

再讲一件事。

还是1973年春末的一天，李德生偶犯感冒，在政治局开会时，服务员悄悄送了一次药，被江青发现了。江青显得格外关心地问道：“德生同志，怎么了？”李德生没有想到，江青居然发现医生送药这么一件小事，只好回答说：“有点感冒了，已经差不多好了。”

不想第二天，李德生参加政治局活动后，回到总政治部的办公室，警卫参谋小倪拿出一个褐色的玻璃小瓶，放在办公桌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普通的药瓶，里面原来的药片和外边的药签已经没有了，药瓶上面贴张白纸，用铅笔写着“竹沥盐”三个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江青手写的“仿毛体”。小倪说，这是江青的警卫员交给他的，说是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治疗感冒用的。

“竹沥”是一味中药，据中医书上记载，有清热化痰、镇惊透络之疗效。

李德生有病，都是服用保健医生从解放军总医院开的药。他的身体好，很少有病，偶尔头疼发热，服用普通的药物就可以很快见效。他是从不乱求医，乱吃药的。那瓶竹沥盐，连瓶盖都没有打开，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睡大觉”。

江青是很挑剔、很难伺候的人，她有病，医生、护士都战战兢兢，打针吃药，惟恐不周。这次，她怎么关心李德生的小小感冒来了呢？林彪有言，“送礼送政治”；江青送药，是不是也是送的“政治”药？！

短短几个月内发生的这些小故事，它多少能够折射出江青的一点政治心态，也可以看出李德生刚直不阿的为人。

二十六、当选党中央副主席

“九一三”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随着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和其他方面政策的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大批老干部逐步得到解放，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

1973年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同时根据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在1974年召开。可是自从出了林彪事件后，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21位委员，已经有7人成了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央政治局不健全了，应当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加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竟然成为反革命政变的头子，这个党章不修改实在不行了。经过一年多批林整风运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已经查清，应当向全党作出交代。党章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因此，政治局会议决定，提前举行党的

十大。

会议议定，中央政治局成立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党章修改小组、林彪专案报告和决议起草小组、十大代表名额和产生方案起草小组，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李德生参加了十大代表名额和产生方案起草小组，主要负责军队代表的产生。

8月2日，中央设立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是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是副主任。十大召开前夕，8月13日，在选举准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选举准备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建议，为使筹备和准备工作衔接得好，主任仍为王洪文，副主任增加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在这个过程中，李德生主要是负责军队的十大代表名额分配，提出军队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名单。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名额及其成员候选名单。20日，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议定名单。2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在提到主席团主席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为主席，对于副主席人选，先后提出了4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这时，耿直的许世友两次提议，副主席有一人，或者有三位老同志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是表明了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且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的强烈不满。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十大组织人事安排。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



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李德生多次去看望。这是1978年，邓小平视察东北时二人的合影。

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大家都不同意。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毛泽东说：“谁当副主席？”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他听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说服的口吻，解释说：“他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接着说：“康

老（指康生——作者注）算一个，叶剑英算一个。”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40岁至59岁为中年，60岁以上为老年。在主席、副主席候选名单里，毛泽东已近80岁，周恩来75岁，康生75岁，叶剑英76岁，都属于老年了。只有王洪文38岁，属于青年范围。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大家对这个原则没有异议。而当时符合中年条件的政治局委员，却有好几个，究竟是谁呢？

不料毛泽东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中”的候选人之外了。

按照毛泽东提议的条件，周恩来发言说：“建议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当时，李德生57岁，是属于军队里的中年范围的。

毛泽东说：“可以。”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表示赞成。

李德生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连忙说：“我不合适，我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合适。”

他又说：“从我们党内来说，先念同志是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的。”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的旁边，他拉拉李德生的袖子，悄悄地对他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李先念当时是64岁，虽然比周恩来、叶剑英小10多岁，按照有关规定，也是属于老年范围了。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协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

说明自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周恩来传达、解释了毛泽东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路线。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应当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希望大家按照主席讲的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

周恩来还介绍了毛泽东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他来当主席。由于大家不同意，毛泽东说，我只好鞠躬尽瘁。

尽管这样，许世友仍然多次插话陈述自己不同意王洪文当副主席的意见。

被提名为会议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斥责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在谈到政治报告时，周恩来解释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掌声寥寥，提名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的更是没有几个人。十大还没有召开，中央内部已经显示出分歧。而对王洪文的不满，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李德生当时有一种预感，十大以后，还会有新的矛盾、新的斗争。自己担任常委、副主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十大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除以上 7 人外，增加董必武、朱德 2 人。

8 月 24 日晚，党的十大召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 148 人的名单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项议程。



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李德生作为主席团副主席，坐在主席台前排。

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宣读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张春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而且在 7 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曾经提议，政治报告由王洪文来作。直到 8 月 20 日，毛泽东最后审定政治报告时，才明确提出由周恩来作这个报告。

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修改后的党章，只是去掉了“接班人”林彪，其主要精神不仅是九大党章的继续，还增加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内容。

8 月 28 日，十大召开闭幕会。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中央委员 195 人，候补委员 124 人。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成

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措施。

8月30日，新产生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有一个小故事：

李德生在填写十大代表登记表时，只填写出生年、月。我们说，按照中央办公厅的要求，登记表的每一项目，都必须填写。这个登记表有年、月，还有日，不好空着。李德生想了想说，我过去填过很多登记表，从来就没有填写过出生日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德生从小家境贫寒，穷人家没有过生日一说，9岁时，母亲去世，就更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出生的了。他知道自己是属龙的，农历四月出生。李德生想了好久，终于记起有位婶婶曾经给他讲过，他是农历四月十九日出生的，说是这个日子吉利、好记。我们找来公农历对照万年历查对，才弄清李德生的出生日应当是1916年5月20日。我们把查对的结果告诉他，他说，57岁了，才弄清自己的生日。

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不久，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展对周恩来的错误批判。

按照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预计，十大之后，将于10月召开四届人大。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

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政治局内，设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织工作小组的组长是王洪文，政治局分工李德生参加这个小组，主要是负责军队代表名额的分配、调整。

在江青集团看来，召开四届人大，意味着权力的新的“分配”。自从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更加膨胀。她视周恩来为实现她的野心的最大障碍。1972年，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江青横加反对，最后毛泽东表态，认为林彪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周恩来虽然不好再提批极左思潮，但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纠正极左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从1973年夏季开始，江青等人又利用毛泽东谈儒法斗争，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孔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7月4日，毛泽东批评外交部报送的《新情况》，不讲世界形势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讲“大欺骗、大主宰”。毛泽东对此的结论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而外交部的工作，是周恩来主管的，他为此作了检讨。

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三次访华，在基辛格行前的13日夜到14日早晨，基辛格要求再举行一次会谈，他提出了中美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以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于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了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

从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错误”，列席的还有外交部人员。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发言肆意攻击周恩来、叶剑英是什么“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调子越来越高。江青甚至声色俱厉地

讲，恩来同志的问题，实际上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甚至说周恩来是“第十一次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李德生第一次以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加这样的会议，尝尽了如坐针毡的滋味。他从3年多来参加中央工作的实践中，对周恩来、叶剑英加深了尊敬、信赖的感情。“九一三”后，他的工作是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于他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很深的印象，受到很深的教育。他仔细阅读了中美会谈的记录稿，认为周、叶的谈话符合毛泽东讲过的，外交工作应当原则性同灵活性相结合这样一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发不发言呢？如果发言批评周恩来，他确实看不出周恩来的谈话中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上不了纲。如果大家都发言了，自己不发言，又绕不过去。最后，他只能违心地说两句不痛不痒、不上纲不上线的话。

会议如此批评周恩来，李德生有许多不解，内心确实不好受，却又不能同任何人交换看法。每次开会回到总政治部的办公室，他的心情总是很沉重，往往要坐在那里沉思好久，才开始阅读文件，处理办件。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我们还以为，当了副主席，压力大了，才有这个现象的。

会议的温度急剧上升，毛泽东终于停止了会议。李德生事后才知道，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既肯定会议“开得很好”，但也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还否定了江青乘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要。”毛泽东指出，把他们（周恩来、叶剑英）讲得不像话，以后不好做工作。既要用他们，也批评他们，不是打倒。

处在这种情况下，李德生只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军区

和总政治部。

李德生在北京军区继勘察熟悉地形、研究华北地区战略方针之后，着重地抓了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重点又是加强“三打三反”训练，即反空袭、反坦克、反空降，打飞机、打坦克、打伞兵。并且从单兵和小分队的战术技术训练进入诸军兵种合成训练。李德生组织军区部队在华北某地，组织了“三打三反”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阵地防御作战演习，及有空军、诸兵种和民兵参加的打敌人集群坦克研究性战术演习。



李德生陪同叶剑英观看打集群坦克时，在发射点看火箭布雷装置。

组织打敌人集群坦克研究性战术演习的报告，由北京军区书面报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1973年10月，得到了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同时通知各大军区派人参观。叶剑英亲临演习现场指导。演习结束，10月18日，叶剑英接见了参观人员、演习部队和民兵代表、驻地的地市县领导干部，并发表讲话，对于打集群坦克演习，给予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他认为：“演习的很好，从中学习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开了一个好头！”他从华北的战略地位，对“三打三反”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部队今后训练的努力方向，作了详细的论述，使参加演习的部队和民兵受到极大鼓舞。10月19日，李德生向参加演习的领导干部总结讲话。指出这次演习是“研究性演习”，要求部队今后继续研究，继续提高。

二十七、“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 我怎么不知道啊？”

批林整风中提出批孔，李德生最早是在 1973 年 5 月 25 日听到的。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汇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十大、各地各单位批林整风运动、1973 年国民经济情况的时候，毛泽东先讲了在批林整风中，要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的，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然后，他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这是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谈到批林整风运动的时候，提到批孔，是把它作为抓意识形态的一项内容提及的。

7 月 5 日，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了头一天毛泽东同他和王洪文的谈话，谈到外交部近来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并且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有讲。”讲到批孔问题，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不赞成骂秦始皇。毛泽东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的批评，由张春桥转达，李德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周恩来讲述了 6 月份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他作了检讨，承担了责

任。李德生开始感到毛泽东对批孔的强调。

不久，李德生看到 7 月 17 日毛泽东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在座的周恩来针对杨振宁提出某些文章对秦始皇评价很高，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但他基本上是法家。李德生开始找有关书籍来看。

8 月 6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显得很神气地传达毛泽东讲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情况：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江青还读了毛泽东的一首七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江青在会上要求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时表示，对此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没有异议。李德生抄录了那首七律诗，专门查找《史记》和《封建论》。看来，毛泽东对于批孔很是重视。

李德生认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有一定道理。在清查林彪罪证时，专案组从林彪住处毛家湾确实查出一些条幅和卡片，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孔孟语录。林彪思想同孔孟之道有着一定的渊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孔子？李德生查阅有关历史书籍，自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进步人士对孔子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或者是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就曾经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

现在，毛泽东并没有突出“批孔”，更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

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至于要不要把它写进十大政治报告，李德生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批判封建主义儒家思想，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个长期任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周恩来的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可是，就在江青传达毛泽东意见的第二天起，8月7日、1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批孔文章。十大闭幕后，9月4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笔名发表的长篇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接着，一些报刊陆续发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到了11月，《红旗》杂志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罗思鼎”的文章，更是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和反“复辟”，公开影射周恩来。

到了这个时候，李德生看出来了，这是在1972年反对批极左之后，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报上的批孔文章日益增多，调子越来越高，而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就全国范围开展批孔问题讨论过，毛泽东也没有这方面的新的意见。署名文章，怎么能代表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呢！

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迅速波及部队，在部队引起日渐强烈的反应。

李德生亲自遇到一件事：1973年10月中旬，北京军区在华北某地组织“三打三反”军事演习，李德生乘飞机到演习部队去。李德生到了西郊机场，在候机室休息，一位干部汇报说：“李副主席，我们师的批林整风取得很大成绩，部队在加强训练，学习理论。”李德生回答说：“这就好嘛。”这位干部接着提问：“听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搞？”李德生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议论呢？

李德生坦然地说：“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与此同时，总政治部机关也接到部队的多次请示，电话记录纷纷送到李德生的办公室。李德生同其他领导同志说，我在西郊机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报纸上的署名文章不能代表中央，这件事情，政治局讨论后，有了决定，会通过中央文件或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的。现在，部队还是应当抓好十大精神的贯彻，学习理论，搞好批林整风的教育。在批林中联系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可以放在政治教育中进行，不要形成运动。他要求总政治部宣传部，针对部队的各种思想反映，起草一个通知，发给部队，以统一思想。

10月24日，总政治部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中批判孔子的意见》。李德生、田维新审定后，10月27日，由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栗光祥在七个大单位战备思想教育座谈会上作了传达。主要内容是：

一、批孔的口径、意义怎样提法，一定要按中央两报一刊的口径办，宣传中不要乱提口号，更不要乱点名。

二、批孔的位置和声势要适当，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在深入批林中联系批孔。连队要讲一讲孔子是什么人，他的反动思想是什么，不要把批林与批孔并提，更不要单提批孔运动。

三、军区和军兵种报纸不要报道批孔动态，可以发表批孔文章，但在数量上也要适当控制，文章内容和宣传口径，都要很好掌握。

然而，在江青策划下，报刊上的批林批孔文章连篇累牍，调子越来越高。部队在执行总政治部宣传部的意见时，又陆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如批孔的意义是什么，林彪的反动思想同孔子的反动思想是什么关系，特别提出，批孔宣传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等。总政治部宣传部再次起草电话稿，经李德生、田维新审查批准后，于11月13日发给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报社。

这个“电话稿”提出：

一、军区和军兵种报纸可以转载和发表一些批孔文章，对于批孔的意义、批林和批孔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口径，批判文章要注意科学性、准确性。

二、中央报刊和新华社目前都没有发表过关于批孔方面的动态性报道，请你们也不要发表这类报道。

这两个通知，是在当时江青等人组织的批林批孔文章连篇累牍的情况下，作出的军队内部教育方面的规定。规定不可能不提批孔，但是要求把批孔放在适当范围内，防止乱联系、乱点名，防止形成一场政治运动。这就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批林批孔为名，批“宰相”，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批林批孔批周公”，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格格不入。他们得知总政治部通知后，极为不满，只隔两个月，就公开展开对总政治部通知的“批判”。

二十八、解决八一厂的问题， 与江青正面交锋

党的十大之后，在新的复杂的矛盾之中，李德生只能以主要精力抓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的工作。北京军区的情况，前面讲过。他又是怎样抓总政治部的呢？

总政治部机关的批林整风运动和清查工作，在“九一三”后，一直抓得很紧、很细。当时要求所有和林彪、黄、吴、叶、李、邱有过非工作关系来往的机关干部，都在党支部范围内作出说明与检查，在没有查清以前，不能参加派往驻京单位的工作组。

有一位副部长曾经抄录过林彪的《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这首词是林彪在1969年9月找人代他填写的，其中有两句他自己作了修改，就是“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这是他发泄对毛泽东当年批评他对“红旗能打多久”疑问的不满。1970年1月，叶群将它写成条幅，送给李作鹏。于是，这首词在海军的一些人员中间传抄。经过调查，总政治部的这位同志是从海军某干部那里抄来的，他自己和林彪并无联系，本人对此作了检讨。

还有人揭发，有位部长在“九一三”前一天，曾经和外地某省军区领导人打过电话，而那人与林彪关系密切。揭发人怀疑，这个电话可能和反革命政变有关。如果真有其事，可是一件大事。李

德生专门派人到通信兵部长途电话台，查找长途电话记录。因为当时的通讯条件，打长途电话都是要经过长途台登记接转的。第一次，查了半个月的全部电话登记单，没有发现有这个长途电话；李德生又要求再向前查半个月，依然没有发现记录，终于排除掉这件揭发材料。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总政治部的清查工作是认真的。

十大之后，李德生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研究确定，党委要直接抓好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批林整风运动。

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有解放军报社、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博物馆、文工团、军乐团、八一体工队、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画报社等。大都是文艺、宣传单位，是搞舆论工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单位搞了“四大”，又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串连下，形成两派。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后，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业务工作几乎停顿，专业质量下降。而这些单位在全军很有影响，不通过批林整风解决问题，难以集聚人心，更不符合全军的期望。

直属单位的整顿从哪里入手？李德生说：“要抓那些影响大的，能够起重要作用的单位。”这是李德生的一贯指导思想。打仗的时候，他就是要打那些能够决定全局胜利的地方，即使一块“硬骨头”也要啃下来。平时工作，他也是要抓那些决定全局的有影响的项目。党委最后确定，直属的三个军级单位，先抓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报社，尔后再抓军事博物馆（当时军事艺术学院还没有恢复）。

为什么要抓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时研究有三条理由：

第一，八一厂是全军惟一的电影制片厂，是解放后集中了全军多年从事文艺、摄影工作的骨干组成的。10多年间，拍摄了《钢铁战士》、《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战上海》、《五更寒》、《怒潮》、《苦菜花》、《万水千山》、《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等深受群众欢迎的故事片，涌现出田华、王苹、严寄洲、王心刚、李俊、史超、梁信等许许多多优秀的编、导、演人员。还有纪录片、军教片的生产发行。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起到形象化的宣传、教育和鼓舞作用。

第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厂是“重灾区”。群众“造反”，领导干部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军委办事组派进去一些部队基层干部，有连队指导员、文化教员等，由他们担任各片室党支部书记。他们不懂业务，不熟悉干部，不了解八一厂的历史，又受极左思潮影响，不能认真掌握政策。革委会成立后，7个成员中有6个是年轻的非专业干部。他们奉命有事直接同黄、吴、李、邱指定的一个干部联系。革委会搞“大批判”，追查“文艺黑线”，把许多经过我们党长期培养的编、导、演人员都说成是“反动权威”，“三名三高”。几乎一半人被卷进各种案件。为了显示“革命”的彻底性，他们甚至把全厂的宿舍也来个大调换。叫做“干部下楼，工人上楼”。将一些领导干部和编、导、演骨干，从宿舍楼里搬下来，住进工人的平房；一些工人搬进楼房后，烧煤炉子、种菜、喂鸡都不方便了，也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7年了，除了领导机关下达的拍摄几本纪录片任务和《红灯记》以外，什么故事片、纪录片都不搞了。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第三，电影事业太重要了。而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很是薄弱。李德生在总政治部党委会上说，今年元旦，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工作者代表，周恩来同志

曾经指出，今后两年，电影技术要在许多方面赶上去。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他要求国务院文化组要把电影大抓一下。1月15日，周恩来同志再次指出，发展电影工作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总政治部现在不抓住这个极好时机，认真整顿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是失职。

要说解决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问题，从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分管总政治部工作和全军政治工作时起，就没有放松过。

1969年底，为了改变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局面，李德生征得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同意，调六十军政治部主任、当时任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彭勃，担任八一厂革委会主任。彭勃是位“三八式”的老同志，是有名的“临汾旅”的战将，文武双全，外号“小诸葛”。是许世友点名任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南京军区不想放彭勃，曾经另外推荐过五个人选，李德生斟酌再三，觉得还是彭勃比较合适。李德生知道，彭勃在南京，有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派斗争、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经验，于是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请求给予支持。

许世友对于刚到北京工作的李德生，一直给予关注和支持。他非常痛快地答应李德生的请求。许世友专门召开省革委会领导同志的会议，调整了南京市革委会主任。他听说彭勃不愿意到北京工作，特意请彭勃和他的爱人到自己家里，用茅台酒款待，亲自给他敬酒壮行。

许世友向彭勃说：“叫去就去吧！越快越好。革命军人，不能拖泥带水的。”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告诉彭勃，许司令员极少在家里请客喝茅台，这是一次破格的待遇，这杯酒寄托着司令员对你的爱护和厚望。彭勃痛快地举杯一饮而尽，并且表态说：“司令员，从内心里讲，我还是不愿意去的。组织上既然定了，我只能服从。我不仅要去，而且去了要争取干好，决不给司令员丢面子，不给我

们六十军丢面子。”

许世友高兴地说：“像个革命军人说的话。到北京后，有什么困难找我。”

彭勃知道，中央政治局的重要会议，许世友都去参加，对于中央的工作情况是熟悉的。于是他请教许司令到北京以后注意什么。许世友略一思索，关切地叮嘱他：“一不要乱窜门，二不要乱说话，三先摸清情况，再着手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情况下，很有针对性的要求，也是人们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注意事项”。许世友快人快语，给这位手下爱将“点拨”出来了。

1969年12月22日，彭勃来到坐落在北京西郊莲花池附近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这是解放初期，由军队建立的大型综合性电影制片厂，担负故事片、纪录片、军教片的生产任务。厂内有大型摄影棚，有标准放映室，有办公楼和工作人员宿舍楼，有1000多干部战士和员工，担负着编剧、导演、演员、服装、道具、化装、行政、政治工作以及后勤保障任务。厂区内外，树木婆娑，环境幽雅。可是这个地处首都西南郊区的好地方，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派性干扰下，到处贴着大字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什么业务都停顿了，一片混乱景象。

彭勃开始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到演员剧团，见到许多只是在银幕上见过的著名演员。这些演员几乎都是从小参军，是在我们革命军队里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他说：“我们既然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总要拍电影；要拍电影，还是要依靠你们老演员的。”演员田华也是一位“三八式”、心直口快的同志，她说：“不行了，说是我们干文艺工作时间越长，文艺黑线越深，拍的片子越多，受黑线影响越重。”彭勃懂得了，要搞好八一厂，必须抓影片生产，而要生产影片，就必须有剧本，有编剧，然后有导演、演员和各种专业人才等一套工作人员。可是现在人呢，有的在牛棚里关着，有

的在农场劳动，有的在家“闭门思过”。看来首先要有编、导、演等人员。要有这些人，就要抓落实政策，抓团结的工作。

彭勃不赞成对领导干部和艺术骨干肆意批斗。全厂开批判大会，大家喊“打倒陈、冯、严、王、张（指原厂领导和导演陈播、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作者注）”的口号，彭勃不举手。有人上台责问，彭勃说：“大家喊口号举手可以，我是革委会主任，在组织上没有做结论以前，我举手有点不合适。”他的观点，一下子公开在群众面前。革委会讨论导演严寄洲的问题，有人提出判刑 20 年，争来争去，定成 4 年。报告送到总政治部保卫部，他打电话说明情况，请求机关暂时压下来。革委会讨论给厂长陈播戴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彭勃提出要慎重，等中央有了明文规定再做结论不晚。

1970 年 4 月，总政治部举办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有关落实政策的指示，以推动直属单位落实政策的工作。别的单位学习后，思想统一了，先后结束学习，返回原单位抓工作去了。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产生严重分歧。有人提出八一厂“有机会主义路线”，“当前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妄图为黑帮、黑线人物翻案”，彭勃“站错了队，走错了路”，要老实交代错误。彭勃哪能认这个账，双方僵持，学习班“学习”了 90 多天，也没有结果。

总政治部临时党委讨论时认为，现在解决八一厂的问题，就要下定决心，一定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没有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干扰了，受到他们支持并有错误的革委会成员已经受到批评，大家对整顿都很乐观。

李德生很清楚，八一厂之所以是块“硬骨头”，不只是过去有林彪集团的支持，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依然会受到江青的无理干

预。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几年时间，到八一厂多达200多次，她曾经指责八一厂是“文艺黑线专政”，“坏人掌权”，“水浅王八多”。八一厂批判“三名三高”，许多“批判对象”是她点的名。江青视电影事业为她的“领域”，八一厂是她的“领地”。总政治部整顿八一厂，江青会怎么样？

只要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事，只要是看准的事，李德生从来不会“绕道走”，从来不怕困难，从来不怕任何反对或攻击。这就是他的性格。

参加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会议的许多部长们，当时还不知道有个江青夜袭八一厂的“故事”。

那是“九一三”后不久，1971年12月27日晚，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在军委办公所在地三座门开会，讨论清查林彪罪行的工作。此时，离“九一三”后只有3个多月，军委办公会议有大量的事情要讨论处理。会议开到10点多钟，突然，江青戴着皮帽子，披着黑披风，气势汹汹地走进来。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叶帅啊，不得了了啊，八一厂竟然有人揭发《红灯记》！我求求你支持我，去把这个反革命事件查清楚！”

叶剑英对江青“无风也掀浪”的脾气很了解，他沉着地说：“你请坐，我们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都在这里，坐下慢慢说。”

李德生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接话，他说：“天太晚了，八一厂有些干部住在城里，现在去找人来不及，是不是明天上午去？”

江青哪里肯依，她不管室内温度高，不脱帽子，不解披风，拉着马上要走的架势说：“不行，就是要马上去，就是要奔袭！”她用了“奔袭”二字，显得问题多么严重。

叶剑英坦然地答应说：“好吧，我们愿意陪你去八一厂。”他

邀请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同李德生等一道前往。李德生表示赞同说：“八一厂是总政治部管的单位，军委也要管，应当请大家一起去。”

那时的北京城，又是寒冬的半夜时分，路上人少车稀，几辆红旗轿车和随卫车急速驶过城区，来到莲花池附近的八一厂。八一厂陡然进来了这么多的红旗轿车，听到动静的人从窗户里面向外张望，值班员赶快请军委领导同志到厂部会议室，又连忙找厂领导。

第一个得到通知的是彭勃。他到八一厂后，基本上是住在办公室里。半夜，他忽然听见多辆汽车开进院内，向窗外一看，只见几辆领导人乘坐的大红旗轿车，还有几辆随卫车辆，连忙起身，急匆匆穿上衣服，来到会议室。他向在座的军委领导同志敬礼。叶剑英摆摆手，向背风的沙发一指：“江青同志在那里。”

江青见彭勃进来，劈头盖脸地申斥道：“彭勃，说轻一点，你是宗派主义，说重一点，你是反革命。好家伙，你们敢揭发《红灯记》！《红灯记》是我搞的，你揭发《红灯记》，就是揭发我；揭发我，就是揭发毛主席；揭发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就是江青“帽子公司”的逻辑。“你说，是谁揭发《红灯记》的？”

八一厂拍摄《红灯记》，是彭勃在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刘贤权少将那里接受的任务。他认为，让八一厂拍电影，总是好事。摄制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国务院文化组指定的。他们还规定，每人都要填写登记表，报给国务院文化组和江青审批。八一厂革委会专门研究，作了分工，由导演成荫抓业务，彭勃负责后勤保障。他像打仗一样，召开了全厂大会，作了动员，对各方面的工作作了细致部署。主要人员都准备了替补，保证不耽误摄制任务；摄制用电，请求供电局架设双线，彭勃还想办法借了一辆发电车备用；生活供应，提供的特殊米面，也准备齐全；医疗保障，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他白天黑夜跟班作业，人称第一流的“后勤部长”。

就在摄制紧张的时候，彭勃在镇江部队当兵的儿子，在执行任务中遇车祸去世，李德生知道了，专门打电话表示慰问，并且批准他回去办理丧事。然而彭勃担心《红灯记》拍摄正在关键时刻，自己离开不好，正在犹豫，他的夫人毅然说：你工作为重，还是我回去吧。彭勃强忍悲痛，继续工作。《红灯记》拍摄完成，有他很大的心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样片送审时江青也表示满意。怎么现在又有揭发一说。彭勃听江青扣来这么大的政治帽子，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不明白，江青的真实意思是什么？

江青见彭勃不吭气，更是来火：“你说，是谁揭发《红灯记》的？”

彭勃镇静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有这个事，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事。”

此时，八一厂的其他领导成员先后到达。江青转而问反映情况的那个人：“你说，是谁揭发的。”这位同志哪里回答得出，紧张得浑身冒汗，下意识地脱了棉衣，又冷得浑身打颤。李先念见状，幽默地说：“不要脱了，天气冷，小心着凉。”在江青一再追问下，他只好如实说：“有人说我是地主。”

江青继续追问：“彭勃，你们为什么说他是地主？”

彭勃这才明白，他解释：“没有有人说他是地主。我们在拍摄《红灯记》时，国务院文化组发了通知和表格，要求每人都要填写简历表。表上有本人出身成份这一栏，规定过去怎么填，现在还是应该怎么填。他过去一直填的是地主，这次只是照旧填了。”

所谓揭发《红灯记》，大家已经听出眉目来了。原来是他自己填写的地主成份，就成为“揭发”他是地主；揭发他是地主，就是揭发《红灯记》。而揭发《红灯记》，就是揭发江青；揭发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就是江青的“推理”！

江青见无人附和，转了话题，斥责说：“你们这个房子，又大

又冷，是不是想把我冻死。”彭勃马上让人找来一条毛毯，江青盖上还嫌冷。当时的八一厂机关办公室，白天的温度也就是十多度，到了后半夜，也就只有十一二度，江青哪里受得了。李德生说：“是不是把暖气再烧热一点。”彭勃说来不及了，建议换到审片用的标准放映室。江青站起来，竟然要求叶剑英、李先念扶着她下楼。

在八一厂的领导人员陪同下，大家到了放映室。刚刚坐下，江青又说：“今天我把叶帅、先念等同志都请来了，本来他们都在三座门开军委办公会议，我斗胆请他们把会议停下来，到八一厂来和你们算账。就是要弄清揭发《红灯记》的问题。”

她转向叶剑英：“叶帅，你说说。”叶剑英在从厂部办公室到放映室的路上，问过彭勃是怎么回事，彭勃回答说我不知道。叶剑英心中有数了，他对大家说：“拍摄《红灯记》，八一厂做了很多工作，我看拍得不错，成绩来之不易，一定要爱护。”

江青又让李先念讲。李先念只好说：“《红灯记》是个好戏，我作为一个观众，看了这部电影，感动得流了泪。影片是你们拍的，你们要爱护，不能反对。”

“揭发”《红灯记》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江青难以收场，只好说：“今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归国务院文化组狄福才和总政治部李德生两人领导。明天文化组派人来调查，一定要查个清楚。”

第二天，文化组派人来到八一厂，在大会上号召抓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吵吵嚷嚷，但是始终找不到根据。批斗彭勃，也斗不出个结果。人们知道彭勃在拍摄《红灯记》中的表现，更加同情他了。

李德生第一次见到江青蛮不讲理到如此地步。他完全没有想到，“文艺旗手”竟然会是这样。对于政治局委员、主席夫人，应当尊敬；对于不讲理的事，要学习叶帅的办法，保持距离，“敬而

远之”。但是，对于八一厂的问题，他并不因此而放手不管。

李德生在1972年参加批林整风的繁忙活动中，挤出时间，到八一厂开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又派工作组去调查。不料文化组有人说：“总政治部无权调查，调查就是否定江青同志的指示。”总政治部的工作组只好撤出。

江青不容总政治部领导八一厂，但是有了矛盾，她又往总政治部推。1972年3月，八一厂要求对几个与黄、吴、李、邱有密切关系的人办学习班，江青批给周恩来，说是“八一厂属总政管理，应德生同志批办。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周恩来明确批示：“同意应由总政办这个学习班，并派人至八一厂听取干部和群众对赵、姜、陈三人的意见，提请他们三人反省。”

江青夜袭八一厂后，彭勃的日子更不好过。他没有想到，几十万人的南京市他管得了，1000多人的八一厂，竟然如此棘手。总政治部派来工作组，江青他们竟然否定了。事情真是太复杂了。他求见李德生，要求调离八一厂，回部队去。

李德生和田维新会见了彭勃。李德生对这位很能打仗的老同志，很动感情地说：“你的处境很困难，我们不是不知道。你走了，就是调一位大军区司令、政委来，也很难改变八一厂的现状。我们都是带兵出身，今天好比打一场恶仗，你腰板要硬，要敢于刺刀见红。在任何条件下，要咬牙，要顶住。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死也要死在八一厂。只要有这种气概，我就不信你不能打胜仗！”李德生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彭勃听李德生以打仗来比喻坚持八一厂的斗争，也很动感情，还能有什么话好说。打仗的时候，能中途退却吗？他听得出李德生的话，既是劝说我彭勃的，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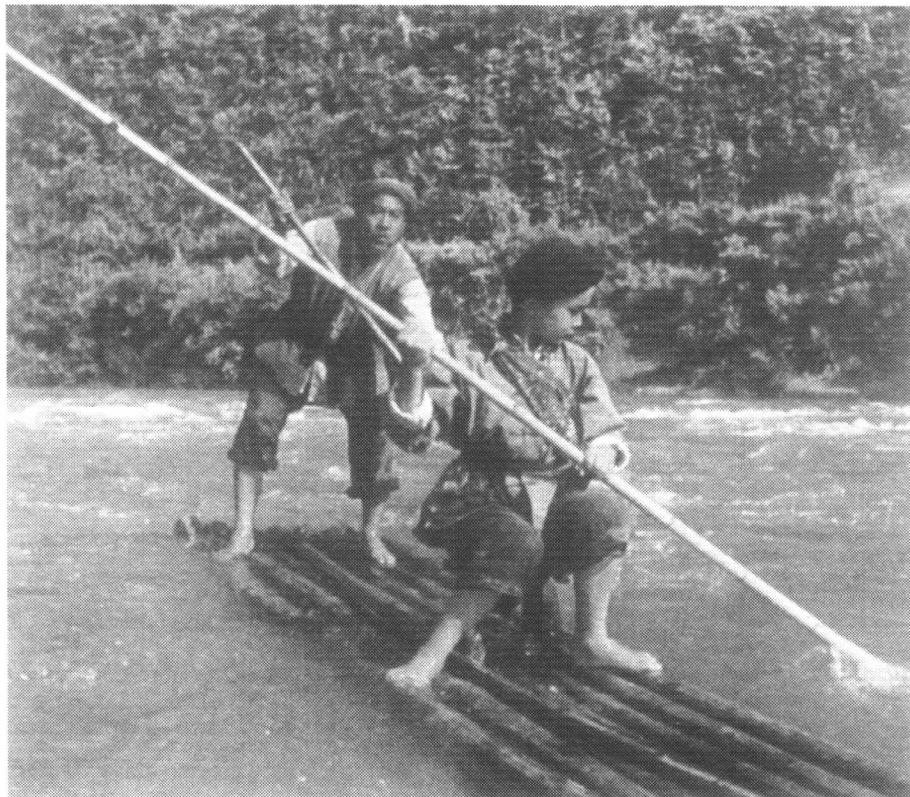
李德生当面鼓励彭勃，同时，他将调查的结果，即不存在揭发《红灯记》的问题，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1972年

4月20日，周恩来看了总政治部的报告后批示，《红灯记》拍得很好，八一厂做了大量工作。有什么错误，要接受教训，把革命与生产抓上去。李德生接到批示，立即转给彭勃，要求他们很好落实。有了周恩来批示，彭勃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研究解放干部、解放各方面的业务骨干，并且在进一步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发动群众更好地完成生产规划。他亲自抓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抓编剧、导演、演员的解放和业务实践。

经过艰苦的准备工作，他们制定了1973年生产任务的规划。其中，计划先拍摄两部故事片，一是《激战无名川》，一是《闪闪的红星》。彭勃亲自抓摄制组人员的组成。从演员来说，单是潘冬子这一角色，就物色了12个孩子。彭勃全力以赴抓摄制工作，母亲去世，他没有回家乡奔丧。1973年冬，李德生在三座门一号会议室，专门审看了《闪闪的红星》的样片片段。

在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会上，李德生没有讲江青“奔袭”八一厂的故事，他只是说，现在到了解决八一厂问题的时候了。不解决，八一厂作为军队生产故事片的大厂，拿不出好的影片，满足不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总政治部无法向全军交代。

怎样解决八一电影制片厂批林整风的问题？总政治部要抽人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国务院文化组也管着八一厂，最好有国务院的人。李德生从总政治部机关抽调3人，又向李先念副总理商借3人。李先念很支持李德生整顿八一厂，他派了经常参加国务院重点单位调查研究的张沛、张广友、于重英。李德生接见了由6人组成的调查组，他明确提出，你们这个组到八一厂，不是去处理任何问题的，而是为总政治部解决八一厂的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的，因此叫观察组比较合适。他介绍了八一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讲了八一厂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的情况，提出八一厂在今后应当拍



《闪闪的红星》剧照。

摄更多更好的影片，这次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好。他同样没有讲有关江青夜袭八一厂的事。这就使得观察组没有不必要的政治压力，没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可以不带框框，去做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

观察组于 1973 年 9 月 15 日进驻八一厂。他们先后找各方面代表人物 70 多人个别谈话，或者召开座谈会，查阅各种资料，调看八一厂过去拍摄的故事片，逐渐形成比较客观的看法。

观察组向李德生和总政治部党委作了多次汇报。他们认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 7 年里，八一厂的问题确实积累太多。一个

1100 多名干部、战士的厂子，竟然有 111 人在清队中受审查，有 44 人定为敌我矛盾，有 240 多人作复员退伍处理。

经过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集团对八一厂的破坏，人们的认识有很大提高；3 名接受黄、吴、李、邱指示，搞派性活动，使八一厂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的人，在整风中受到群众的严肃批评；全厂团结气氛有所加强；干部政策逐步落实；绝大部分同志要求恢复生产的积极性高涨。有少数人对清查工作有抵触。现在，搞好批林整风，恢复电影生产，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八一厂的问题可以尽快得到解决。

观察组先后反映几个重大问题，李德生觉得这是解决八一厂问题的关键，必须统一思想，切实解决好。

第一，所谓文艺黑线专政问题。“文艺黑线”，指的是原厂领导和主要艺术骨干。受到批判的代表人物是原厂长陈播，现在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陈播 1937 年参加革命，一直从事部队文化工作，担任过文工团长、战斗剧社社长，导演过话剧《刘胡兰》、《九股山上的英雄》。1952 年调到八一厂，主要抓纪录片和军事教育片。他在电影生产和繁荣创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陈播是“反革命”？观察组请八一厂有关部门提供材料。专案组拿出来的惟一根据是，1967 年江青的讲话记录稿，里面有一句“陈播是反革命”。甚至到 1973 年 1 月，江青还说严寄洲“是反革命，是坏人，要专他的政”。说：“还有一个陈播，陈播可坏了。”但是，她的讲话里，没有讲到任何事实。而八一厂 6 年来所有的揭发材料，也都没有举出一件具体事实，能够说明陈播是“反革命”。

李德生听了汇报后，答复说，没有事实就不要急着定性，不定性就不要急于批判。当前首先是批林，批判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对八一厂的破坏。这是大方向。至于冯毅夫、严寄洲、王

冰、张加毅，“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靠边站了，他们和林彪集团没有关系，现在是抓紧审查，做出结论，落实政策，该解放就解放的问题，不属于批林整风中应当批判的范围。至于说他们是“文艺黑线专政”，根据观察组调看过去拍摄的电影，不能说八一厂拍摄的电影没有缺点，电影是所谓“遗憾的艺术”，但是不能把那些影片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

几年来，批判“文艺黑线”，使得一些导演、演员被“批判”，其中处理比较严重的有王晓棠等7人。青年演员王晓棠被批成“黑线人物”后，清理出部队，下放到北京郊区一个林场劳动。八一厂的文艺骨干绝大多数是军队文工团出身，从小参加革命，怎么可能成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和“反革命”呢。王心刚在同观察组交谈时建议，八一厂要把故事片搞上去，应当把王晓棠从地方收回部队来。她不但能够演戏，也可以放在演员剧团教戏，培养新学员。观察组建议考虑王心刚的意见。李德生当即表示可以把王晓棠收回来。

第二，所谓反党集团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起来造反，八一厂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后来谁也不敢提出否定的意见。彭勃来到八一厂后，看了干部档案，看了很多揭发材料。在党中央提出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后，提出落实政策的意见，虽然解放了个别人，但总体上还是受到阻挠，一直拖延不决。李德生听了汇报，笑了笑说，全党、全军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进展，想不到八一厂落实政策，也会遇到那么多困难。他说，这次着重解决批林整风问题，解决班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让新班子去解决落实政策问题，就比较顺当了。

第三，所谓“八一六黑会”问题。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案子”。说的是在1967年8月16日晚上，有人看见陈播和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等人在一起开会，是“阴谋杀人夺权”的

“八一六黑会”。后来结合进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给江青写信揭发此事，江青批给黄、吴、李、邱，吴法宪派“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人员到八一厂支持夺权。并且把陈、冯、严、王、张定为“八一六黑会”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是“陈、冯、严、王、张反革命集团”。

八一厂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理由。说有这个“黑会”的人称，当时有人爬到室外的树上，亲眼看见他们在室内开会。说没有这个“黑会”的人说，当时他们几个人并不在一起。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观察组的同志请有关人员一起，专门到“开黑会”的宿舍楼外实地考察。事隔6年，那棵很细的树依然不可能爬上去人。而且小树斜对着窗户，即使爬上去人，从那个角度也只能看到窗户，不可能看见窗户里面有什么人，搞什么活动。这棵树几年来又没有移动。所谓有人亲眼看到陈、冯、严、王、张开“黑会”的事实，根本不能成立，那么，“反革命杀人黑会”也就不能成立。因此而加在陈、冯、严、王、张头上的主要罪名也就不能成立，完全是“莫须有”的了。

李德生亲自听了多次汇报，他给观察组的同志说：“解决好八一厂的问题，首先是批林，林彪、黄、吴、叶、李、邱插手八一厂，造成严重的破坏，要在批林中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在批判派性中，增强干部、文艺工作者、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团结。其次，要在批林整风中配好领导班子。这方面，也要广泛听取广大群众意见。你们一直住在八一厂，工作了两周，现在情况基本清楚了，要准备召开八一厂的批林整风会议，出好两个成果。”

1973年10月14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在海运仓总参谋部第一招待所举行，到会代表47人。李德生到会讲话。他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是批林整风，重点在批林。我们应当深入批判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以提高大

家的觉悟。在批林中要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不要企图把历史上所有问题都放在批林中解决；也不要颠倒主次，把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放松了批林大方向。第二是在整风中，要多做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八一厂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有三派，现在全国范围的消除派性都很有成效，我们军队的文艺单位，难道能落在后面吗？一定要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第三是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明确宣布，八一厂纠缠多年的“八一六黑会”是个假案，受这个假案牵连的同志和制造这个假案的有关人员，应当按照党的政策分别处理。第四是配好领导班子，加强八一厂的领导。我们将按照党的政策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和提出方案。第五是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与建设，推动电影艺术的创作和生产。他归结说，我们这个会，一是解决路线问题，深入批林整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二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把会开好。

会议期间，李德生专门和一些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开座谈会或个别谈话，听取意见，统一思想。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开得比较成功，大家认识逐步统一，关系逐渐融洽。

总政治部将会议情况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同时提出新领导班子任命的建议。总政治部提出的新班子是厂长王心刚，政治委员彭勃，还有六位副厂长、两位副政委，两位顾问。厂长王心刚，沈阳人，家境贫寒，父亲早已去世，靠母亲卖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8年15岁时参加部队文工团，后来调到八一厂，是一位优秀的电影演员，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等影片中的出色表演，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观察组了解了很多同志，都反映他工作上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虽然是“大明星”了，可是没有一点架子。到外地拍摄外景时，他和大家一样坐硬席，还帮列车员拖地板，端

开水，群众威望高。可是，因为他的岳母在香港，有着“海外关系”，入党的事一直“卡壳”。彭勃了解情况后，认为王心刚既没有和岳母见过面，又没有往来，把这样一位好同志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是没有道理的。经过八一厂党的核心小组根据党支部意见，报经总政治部同意，1972年由彭勃和另外一位同志介绍王心刚加入了党组织。王心刚和其他领导班子的提名，经过八一厂上下酝酿，又经过总政治部临时党委郑重研究，正式报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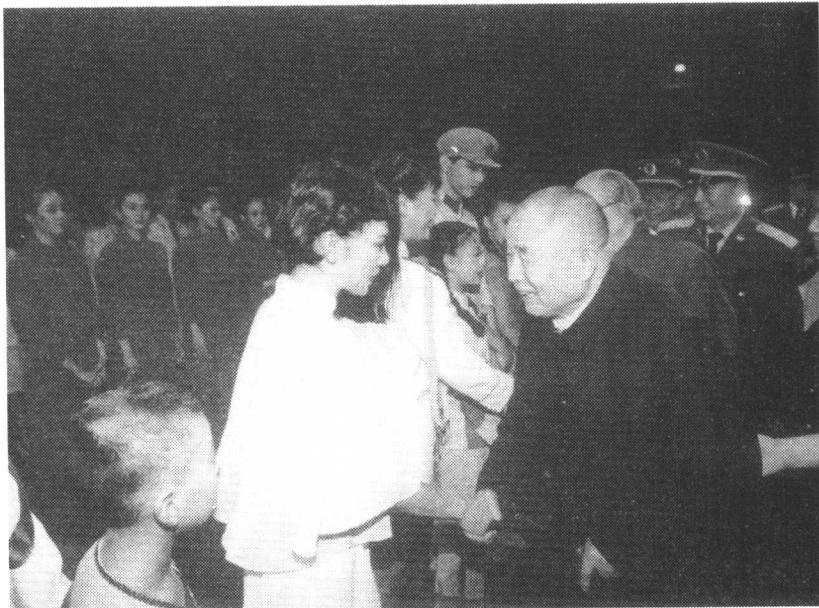
总政治部关于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班子任命的报告，经过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传到江青那里。江青很不满意彭勃和几位老电影工作者也在领导班子里面。但是她没有在具体名单上做文章，而是批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为什么撤销八一厂的革委会，我不同意，我们四个人坚决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跟着画圈，同意江青的意见。看来他们已经事先商量好了。

文件在传批中出现不同意见，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把报告退回总政治部。李德生看到这个批件，立即感到江青的这个批语十分厉害，她不在具体人选上做文章，而是攻击你取消革委会，“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那么，你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德生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讲，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李德生常常听到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你们不信我信。江青的批语，实际上是说你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是要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哪！

李德生请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大家到了李德生办公室，看到批件，都出乎意料。总政治部有一些直属单位，“文

“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都成立了“革委会”，在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先后恢复了馆长、政治委员，团长、政治委员的领导体制。只是那些单位相对小一些，没有引起江青等人的注意。李德生让人找来《毛泽东选集》和《政治工作条例》，在党委会上读了有关章节。大家更加明确，我们军队历来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八一厂是军队系统的单位，八一厂的成员都是现役军人，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政委制，符合军队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大家意见一致了，李德生让办公室再次起草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明理由。

总政治部关于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干部任命的第二次请示报告，送到周恩来、叶剑英处，得到他们的赞同，批件传到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那里都没有异议，多数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认识一致，江青无法推翻。



李德生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是非常关心部队的文艺事业。

接到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批件后，11月14日，李德生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召集参加八一厂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宣布命令，再次讲话。他特别说明：我们八一厂是在全国全军有影响的电影制片厂，一个很大的优势是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同志多，各方面的骨干多。这次配班子，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同志进领导班子。他介绍说，毛主席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时讲过，当选的中央委员，不一定水平比没有当选的人要高，只是当选的人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同样，我们八一厂，老同志很多，有经验的同志很多，没有进领导班子的同志，有很优秀的，不比进领导班子的同志差；进领导班子的同志，也不一定比没有进领导班子的同志强，但是我们的责任加重了。

李德生又请几位有代表性的同志谈谈看法，会议开得很活跃。最后，他希望八一厂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支持新班子的工作。希望八一厂继续深入批林整风，增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抓好影片创作和制作，把八一厂的建设与各片种的生产搞上去。

前后两个月，八一厂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同时，也埋伏下江青等人整李德生、整总政治部的伏笔。

二十九、解决解放军报社的问题， 再掀波澜

在派观察组到八一厂的同时，1973年9月，李德生派总政治部干部部长魏伯亭带领工作组，到解放军报社了解情况，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

《解放军报》是1956年元旦正式出版的。

战争年代，部队分散在各个战场，有条件的部队都自己办报纸，有的团也有油印小报。军队的报纸起到传播胜利消息、传达领导意图、交流工作经验、激励部队斗志的有力作用。

全国解放后，交通方便，部队集中统一，需要有一张全军性的报纸，作为军委的机关报，实施对全军的指导。1955年，总政治部党委在罗荣桓主任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筹备出版一张全军性的报纸。这个意见于1955年6月3日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刘少奇批示同意，并经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圈阅。彭德怀于7月22日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8月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总政治部从全军选调了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宣传干部到解放军报社工作。

解放军报社在前门外驻地成立，很快出了26期试刊，得到各方面好评，1956年1月1日正式出版。后来，搬到靠近总政治部

机关的平安里新建的大楼工作。第一任总编辑是红军时期就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的欧阳文中将。几位副总编辑和一些部门领导干部，也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长期做军队宣传工作、新闻工作的。

《解放军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中央军委的指示，宣传军队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很有成绩。军委领导同志和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对报纸宣传工作都很重视，直接指导，甚至亲自撰写社论和重要稿件。加上有精干的新闻工作者队伍，他们非常团结，全心全意地投入报纸编辑工作。有了重大宣传题材，大家一起商讨，需要新闻、通讯、评论相互配合的，就分工协作，昼夜突击，形成强有力的宣传效果。

“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期间，由于报纸积极反映军队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及时传达军委和总部的意图，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解放军报》宣传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南海前哨钢八连、威震长空的霹雳大队、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爱民模范谢臣、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天涯哨兵海军西沙守备队、钢铁战士麦贤得、郭兴福教学法等典型单位和人物，推动了全军学习英雄模范的活动。但是，在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解放军报》也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宣传过“突出政治”、“最高最活”、“立竿见影”等错误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林彪、江青又勾结、又斗争的情况下，《解放军报》积极宣传“文化大革命”，为之推波助澜。在江青、陈伯达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初期，解放军报社曾经派人参加陈伯达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派出快报组到钓鱼台，为“中央文革小组”提供参考资料。《解放军报》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列为所谓“两报一刊”，成为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舆论工具。林彪、江青的圈子是小而又小的。几经变化组

合，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军报社的领导班子有了极大变化，原先的领导干部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一些造反派掌握了报社的大权。不久，先后调了两位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陈金元、廖初江，任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组长。他们只是基层政治工作干部，要让他们同造反派一起，领导一张全军大报，实在是够难为的了。

李德生到军委办事组后，又调来几位军、师干部华山、林辰、迟浩田，和“文化大革命”前刚刚调来的张志，参加领导工作。然而在当时那种状况下，“造反派”成员仍然把持着领导小组，他们说话没人听，很难发挥作用，报社不可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了，可是，《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文章，仍然要送军委办事组审查。《解放军报》的编辑方针和人事大权，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管得很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放手，使总政治部对解放军报的领导困难重重。

这里讲一件张春桥无理刁难的事情。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问题正在作深入的了解；而江青并没有放弃与林彪集团的勾结。1971年夏，《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的七八期合刊，为纪念建党50周年和建军44周年，拟登载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个人照片。江青特意乘林彪从北戴河回北京的短暂时问，请林彪到钓鱼台17楼她的摄影室里，装模作样地手拿《毛泽东选集》，拍了一张照片。画报上其他领导人的照片都是“标准照”，惟独林彪的照片是由峻岭（江青笔名）署名的艺术照，特意加上标题《孜孜不倦》。意思是说林彪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

解放军报社的人当然不知道庐山会议斗争的详情。8月初，由廖初江签发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的请示报告，向总政治部提出，要

在报纸第一版登载林彪“孜孜不倦”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报告送到总政治部，田维新副主任一看，觉得为难。因为他知道庐山会议的精神，知道黄、吴、叶、李、邱正在检讨。从党中央领导人的照片中，单独选登林彪的照片，而且配发评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可是，总政治部不便于向解放军报社的同志说明不宜刊登的理由；如果不让登载，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造成轩然大波。

田维新副主任向李德生请示。李德生看了报告，也觉得不妥当。但是这时不好请示军委办事组了，他就对田维新说：“这是一件大事，我要请示周总理，如果中央同意，《解放军报》就转载；中央没有批准以前，《解放军报》不要转载。”田维新将这个意思转告解放军报社，要他们暂时不要转载。

碰巧，周恩来于1971年8月9日到12日陪同缅甸总理奈温到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交代由张春桥照管一下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李德生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把解放军报社的报告和评论员文章带给张春桥，请他先看一下。这本来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正常工作程序。可是，周恩来12日回京后，张春桥找周恩来告状，企图先入为主，说李德生为难他。

周恩来专门把张春桥、姚文元同李德生、田维新找到一起，让李德生和田维新把情况讲一讲。田维新汇报了事情的具体经过，周恩来觉得讲清楚了，可是张春桥仍然坚持总政治部是有意为难他。周恩来说：“林彪同志的照片和评论员文章，总政治部没有同意《解放军报》登载。他们没有把握，就把报告送到中央，中央也没有批准他们转载。所以，在《解放军报》上刊登照片和评论，没有成为事实。现在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我看也就完了。”

张春桥当面不好再纠缠，只得暂时作罢。

由此可以看出，解决解放军报社的问题，同样会遇到江青、张

春桥的阻力。这是李德生必须认真对付的。

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后，总政治部召开临时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批林整风运动中的问题。10月6日，李德生同解放军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谈话，要求他们认真搞好清查工作，要把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军报社的罪行搞清楚，搞彻底，一定不要捂盖子。

1973年9月，总政治部工作组到报社以前，李德生专门同魏伯亭谈话，交代他们要实事求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

魏伯亭提出，报社的问题，很可能涉及一位青年人，这是个难题。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

这是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安排到解放军报社实习。1966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专门找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胡痴，说是把她送到军队锻炼锻炼。10月底，她到解放军报社上班，胡痴安排她在记者处担任记者。她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除了少数几位领导干部外，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在这以前，李德生已经了解到，1967年秋，吴法宪指定她为解放军报社总编小组组长，毛泽东知道后，曾经说她不宜任此职。1967年底，她离开了报社。可是，解放军报社几个年轻的造反派，极左思潮严重，个人主义膨胀，依然打着她的旗号，甚至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胡作非为，胡说八道。

李德生对处理解放军报社的问题，虽然在总体上心中有数，但他也很明白，具体处理起来会遇到不少矛盾。他向工作组再三交代：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把事实彻底调查清楚，不要急着做结论。只有弄清事实，难题就不难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工作组及时将了解的情况，通过书面和口头，多次向李德生汇

报。详细反映解放军报社自从 1967 年初，打倒了原先的领导干部，造反派夺了权，有过多次“事件”。受到这些“事件”牵连，先后有 60 多人被“专政”，报社的骨干力量受到错误处理，政策难以落实，严重影响报纸宣传工作。这是解决解放军报社问题的关键。

首先是“一·一三”事件。

1967 年 1 月 6 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权。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面夺权”的高潮。

此时，正在京西矿务局采访的那位女记者，与同去的 7 人多次议论解放军报社的运动，认为解放军报社与全国相比，不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是“愚民政策”。1 月 12 日，在得到江青的支持后，连夜起草了一份大字报。13 日凌晨，在解放军报社一楼大厅，贴出了每幅 3 米多长，共有 5 幅的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落款是 8 人署名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这篇大字报点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胡痴、副总编辑冯征以及二级部门负责人的名，提出“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的包庇下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没过几天，他们又写了一张《揪出又粗又长的黑线》的大字报，认为解放军报社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黑线人物不仅包括社领导、处领导，还包括一大批老编辑、老记者。不少人认为这两张大字报来头不小，来者不善，于是，解放军报社天下大乱。在钓鱼台办公的《快报》被封，胡痴和《快报》编辑组的 9 位编辑被责令回报社参加运动。

1 月 17 日，林彪写信给报社“全体同志”，表示“坚决地支持”“革命造反突击队”。并且提出“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认为“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

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林彪信件一公布，在彻底揭露、批判“胡痴阴谋小集团”的口号下，许多干部被打成“叛徒”、“反革命”，被关进“牛棚”，被“停职”，被监督劳动。

就在这时，江青授意王力、关锋起草了《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的建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措施，经过林彪批准，付诸实施。

不久，《解放军报》成立了“版面监督组”，所有稿件要经他们过目，才能上版面；所有版面，要有他们签署，才能付印。实际上取代了原先报社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职权。

由于“一·一三”事件过程中，林彪点名要“彻底批判胡痴小集团”，由此波及一大批干部被错误地停职或关押。这个事件的案子必须重新甄别。

紧接着“一·一三”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八二三”事件。

在“一·一三”事件后，胡痴代总编不能工作了。1967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赵易亚为总编辑。赵易亚是位老宣传工作者，曾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在《解放军报》创刊时，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

1967年7月25日，在林彪、江青策划下，北京举行百万人欢迎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江青、叶群专门和解放军报社“革命造反突击队”几员“小将”合影。林彪煽动说：“你们要突击，你们要战斗，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有了林彪的交代，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酝酿，1967年8月23日，解放军报社办公楼内又贴出了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它不仅列数赵易亚“篡改和抗拒最高指示”、“对抗毛主席”、

“扼杀报社的文化大革命”、“假批判，真复辟”、“假革命，真包庇”、“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等罪名，戴上了“危险分子”、“萧华的死党”、“反革命两面派”、“政治骗子”等帽子；还提出“彻底揭发、批判萧华的新老罪行”，直接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名，要“坚决把总政党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示众”。落款是有三人署名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附带说一下，自从1月13日之后，7个多月，“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队长已经换了四任，队员们也有很大变化。

在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同时，吴法宪等支持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派人到场助阵，陈伯达也亲自跑来讲话支持，宣布军委和中央文革任命那位女记者为总编组组长，并由“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派协作组进驻解放军报社。

于是，在“批判”了“胡痴阴谋小集团”之后，在矛头指向总政治部萧华主任的同时，解放军报社又有了赵易亚的“复辟阴谋”，打击的对象更多更广了。显然，这也是林彪直接煽动的，对于因此而错误处理的干部，同样必须加以甄别。

到1968年1月，有所谓“一·二〇”“企图绑架某某同志”的案件；有3月的“三二四企图颠覆以某某为首的红色政权”案件。这些案件同样都是莫须有的事。比如后一案是说有几个人在3月24日开会，企图“颠覆红色政权”。总政治部工作组调查，几个“与会人员”，有的当时并没有在报社，而且查证了所去单位传达室，他们有会客登记可以为证。既然人都不在报社，怎么有可能在一起召开“黑会”呢！

上面这些事件加在一起，军报几乎所有的社、处两级领导干部和老编辑、老记者都受到冲击，很多老同志被关在“牛棚”，有些

“靠边站”，只能做一般编辑工作。全社被错误处理的达 60 多人，几乎占了全社人员的三分之一。就连“革命造反突击队”的第一任队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复员回家了。

解决解放军报社的问题从哪里入手？李德生主持总政治部临时党委多次听取汇报后决定，作为第一步，把那些长期错误关押的干部，先解除监护；把那些错误复员处理的干部，先收回部队；已经解放的干部，能够分配工作的，可以分配到部队工作；多数人可以暂时不安排具体职务，先在报社上班，参加日常编辑工作。总政治部于 1973 年 9 月 5 日、10 月 4 日，专门发文，先为所谓“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事件”这一假案平反，恢复被错误处理的 5 名同志的军籍。在当时的条件下，正式发文件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平反，实在是不多见的。

第二步，解放军报社要开好批林整风会议。这个会议解决问题的重点有三个，一是深入批林，解决办报的指导思想、编辑方针问题；二是落实政策，切实处理好冤假错案，促进报社团结；三是走群众路线，配备好领导班子，解决组织建设问题。

解放军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按照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的决定，于 1973 年 10 月 11 日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共 55 人，其中有领导小组成员 11 人；各个处、室、组、工厂选派代表 42 人，其中有老的主编、处长；有原副总编辑 2 人。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成员会见了到会全体人员。李德生和田维新讲话，明确指出会议应当解决的重点问题，要求大家“要立党为公，出以公心。通过批林整风，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

会议简报同时发给报社各部门，以便与坚持日常工作的人员，及时进行会内会外的交流。

会议首先批林，不仅揭发了报纸宣传中大量宣传林彪的唯心论的、极左的言论，如学习理论要“走捷径”、“一本万利”；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顶峰”、“一句顶一万句”；“军事就是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王力、关锋起草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的建议》，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影响很坏，据统计，只是1967年1月到8月，报纸版面上就出现过268处。在庐山会议前，1970年7月，经陈伯达修改的八一社论中，说林彪是“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社论中有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吴法宪坚持删去“毛主席和”4个字，变成“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陈伯达提出，《解放军报》要突出宣传林彪。有一篇1500字的文章，竟有16处“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1970年八九月，以毛主席指示做通栏标题的有17次，而用林彪“语录”做通栏标题的竟有40次之多。事实证明，报纸宣传中的问题和教训，值得清查和总结的问题太多，太深刻了。

林彪集团对解放军报社组织建设的破坏同样很严重。他们说，“报社多年积累下污泥浊水”，“水不深王八不少”，要“统统揪出来”，“把几朝元老都弄走”。要清理阶级队伍，“弄出一百多个，可以干净一点”，“我们给你们处理”，“我们给你们补充”，“我们给你们负责”。所以说，“清队扩大化”，根子就在林彪集团那里。

会议集中批林，使大家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组织上，对于错误处理的人员，能够纠正的，立即解决，不留尾巴。比如，有一个军事编辑，在部队时钻研军事工作有成绩，写的文章受到叶剑英的重视，被调到报社。“文化大革命”开始，曾经是“革命造反突击队”的第一任队长，因为意见不同，离开“突击队”，后来被诬陷为“三二四”黑会的“头头”，打成“现行反革命”，复员回

乡。既然“三二四”黑会不存在了，所谓“现行反革命”也就应当完全平反，而且经过审查，他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工作组认为，这是解放军报社落实政策的标杆。经过李德生审查批准，总政治部决定，立即把他收回部队，恢复原职级，安排工作，重新上班。

为了配备好领导班子，工作组按照李德生的要求，从老中青三结合考虑，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酝酿配备方案。对于解放军报这样举足轻重的大报，主要领导人选事关重大。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定要选调政治水平高、有办报经验、熟悉报社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担任主要领导。不这样，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解放军报社现状。而任命报社老的领导干部重新出任报社领导，极易引起争议。而且张春桥已经对某个中层干部，大发议论了。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同志一起，从十几位原报社领导干部中权衡，最后确定由副秘书长华楠回解放军报社兼任社长。华楠少将，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八路军，长期在部队做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总政治部进城以后，他被调任总政治部八一杂志社总编辑，后来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已经“靠边站”了。1972年，李德生安排解放军报社原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冯征到总政治部政治工作研究处工作，不安排具体职务，也没有分配具体工作，而是让他们有机会到部队去调查研究，熟悉情况。不久，华楠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这就为解放军报社领导干部的解放，埋下了伏笔。现在，由副秘书长华楠回解放军报社兼任社长，争议会较少。李德生的这个建议，得到总政治部临时党委的赞成。

解放军报社新的领导班子，按照当时“老中青”三结合的要求，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当同时配有中层干部和年轻干部。当时，造反派以年轻自居，非常想进入领导班子。工作组经过广泛酝酿，提名了一位34岁的编辑作为副社长人选。此人由上海复旦

大学新闻系毕业，到军报工作已经有 11 年了。这个人选的提出，打消了“造反派”进入领导班子的幻想。

在此期间，李德生亲自主持召开多次座谈会，了解情况，并且同拟选进班子的干部个别谈话，进行考察。

在征求对新班子意见的座谈会上，果然有人按照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按照这个“黑线专政”的论点，提出异议，说这个大学生，既没有当过工人，又没有当过农民，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李德生已经了解了情况，他当即指出，他是农民子弟，是解放后上的大学，是我们党用助学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又经过部队锻炼，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苗子呢？

经过总政治部临时党委讨论后，总政治部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解放军报社领导班子任命的报告。

总政治部调整解放军报社领导班子的方案，果然再次触动了控制着舆论大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岂能轻易放过。

江青看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传阅件后，在社长华楠的名字下边刁难地写上“此人我不了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跟着附议江青的批语。可是“不了解”不等于不同意啊；在政治局成员传阅时，多数同志没有不同意见。周恩来最后批示同意。按照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批件就可以执行了。

不久，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江青突然提出问题，她说：“解放军报社的命令，我还有不同的看法。解放军报社社长是正军职，按规定应当由主席任命，现在只有总理签署，是不符合规定的。”

江青这一招很坏，看来她是有备而来的。这不仅从审批权限上否定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班子的任命，而且攻击周恩来说“越权！因为

按照当时的规定，部队的正军职干部的任命，要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批准副军职干部的任命，由周恩来最后审批。周恩来没有同她直接交锋，他向李德生说：“德生同志，你们总政治部再研究一下，提出意见。”

第二天，李德生同总政临时党委委员商量。田维新等同志说，华楠是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是副军职，报社社长是正军职。可是我们报告上写的是任命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华楠兼解放军报社社长，仍然以副军职的身份去兼职，而不是免去副秘书长，任命为报社社长。应当说，华楠仍然是副军职。由总理批准，是完全符合干部任免权限的规定的。

这样讲有一定道理。在部队里，有时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队伍的构成状况，有低职高配的，比如有的副军职的职务，任命正军职干部去担任；也有高职低配的，比如有的正军职的职务，任命副军职干部去担任。这种情况，在师、团或其他工作岗位都有过。

总政治部再次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说明华楠是由副秘书长兼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仍然是副军职。中央政治局再次传阅了总政治部的报告，大家都圈阅同意，这才算了却了这桩“公案”。江青的肆意妄为，在解放军报社的问题上又遭到挫败，她对李德生的嫉恨，更增加一分。

11月23日，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临时党委成员接见了参加解放军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的全体同志，宣布了新领导班子的任命。李德生在讲话中，肯定了会议的成绩，肯定会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对经过充分酝酿所产生的新班子给以鼓励。他寓意深长地说，这次会议，把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不要忽视还存在不少“小”的问题；旧的问题解决了，不能忽视可能产生的新的问题。希望大家继续做好批林整风的工作，继续搞好团结，办好军报，这方面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当大家认为解放军报社的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时，谁也不知道，不到两个月，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又一次冲击解放军报社，出现了新的风暴。

在解决八一厂和解放军报社问题的同时，李德生又派工作组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负责收集、整理、保存解放军的历史文物、文献、资料，通过展出，反映我军的历史，宣传人民军队的本质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面貌。“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林彪、黄、吴、叶、李、邱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馆长贾若瑜少将被“打倒”，展览停办，群众中派性严重滋长。1973年，李德生提议八一厂原政治委员张景华，一位三八式的老宣传干部，到军事博物馆担任馆长。撤销原来的“革委会”，同时配备了领导班子。

经过工作组的调查和做思想工作，12月13日，李德生和总政治部党委委员一道，接见军事博物馆7位领导同志；12月24日，李德生在即将离开总政治部工作时，出席军事博物馆党委扩大会并讲话，再次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这是李德生抓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最后一次活动。

这几个单位虽然只是总政治部所属的军级单位，但是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特殊地位，纠正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具体错误，有些是带根本性质的。这就不能不触动江青等人的神经，以至后来成为江青诬陷李德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口实。

三十、毛泽东说：“你是唱李铁梅的……你是陪绑的。”

1973年12月，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全国11个大军区中的8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这是我军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在这次对调中，李德生离开北京，到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军队的问题。他反复讲，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他认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1971年1月，他批转济南军区政治部报告，认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他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对于军队的严重关注。

从1973年12月12日到15日，连续4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复讲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问题，多次指挥大家唱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在 12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毛泽东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不议政，不议军，以后改了就好了。

毛泽东说，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边唱边解释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毛泽东讲了对调的具体方案。他说，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济南军区）杨得志同志跟（武汉军区）曾思玉同志对调；（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跟（广州军区）丁盛同志对调；（福州军区）韩先楚同志跟（兰州军区）皮定均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军区，他们都刚去，不要动。

毛泽东说，李德生是陪绑的，他刚来不久。

毛泽东转向李德生说：你是唱李铁梅的。你一家出了个李铁梅，你是陪绑的。你也做些好事吧，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

毛泽东说了一句“顺口溜”：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关于“喝烧酒”的故事是，1973 年 12 月 9 日，也就是同李德生说“喝烧酒”的前 3 天，毛泽东曾经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说：

“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毛泽东认为，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司令员一个人说了算，不调动人家不好说话。司令员对调，但是政治委员不走。

他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毛泽东要求叶剑英：你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

毛泽东最后强调，事不宜迟。

政治局成员在毛泽东那里散会后，又到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请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李德生参加会议后，感到这是毛泽东从全局考虑的一件大事。自己离开北京，是突然；但同当年来北京一样，虽然突然，可是从党的事业讲，又很正常。从自己在北京的工作重心来讲，重点是北京军区。北京军区作为“三北”防御地带的中心，已经有了初步研究；再到“三北”地区的重要一翼沈阳战略区去，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会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自己去钻研，也会减去不少兼职，有做好工作的更多时间、精力和主动权。

第二天，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

毛泽东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他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他再次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谈起头一天讨论的情况说，落实主席指示，不宜迟。他说，行，也不要太急，三至五天军委就开起会来。军事机构，绝对保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改变过来。三支两军人员虽撤回部队了，但矛盾留下没有解决，还必须回去做出认真检查。

第三天，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

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谈起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这时，京外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到达。他问，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一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个群众组织）就会批你（指陈锡联），那也不要紧。辽宁八三一、辽联是两个小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

毛泽东进而讲了司令员对调的一些具体事情。他说，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包括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要开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会吧。比如东北吧，要他（指陈锡联）在场介绍他（指李德生）；比如华北，要他（指李德生）在场介绍他（指陈锡联）。毛泽东说，东北人口比华北少，可是资源多于华北，木材华北可以说没有。辽宁副业发展慢。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

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泽东说，他们（指大军区司令员——作者注）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

毛泽东提出，这些人是不是还兼省委的工作，都不兼，其他人没有说的。

——这个问题，看来在司令员的对调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这八大军区司令员，除了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没有兼任地方职务，而是由政治委员冼恒汉兼任甘肃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其他 7 位中，李德生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在辽宁、杨得志在山东、曾思玉在湖北、许世友在江苏、丁盛在广东、韩先楚在福建，都兼任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以后，1974 年，中央先后任命了新的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

这一天的会上，毛泽东两次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针对司令员的调动，还说，无非是去与不去，强调要求步调一致。

李德生进一步领悟毛泽东的想法。他认为，这次司令员调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要解决军队参加“三支两军”以来形成的诸多矛盾。从总政治部掌握的情况看，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有 280 万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到 1972 年，总政治部按照党中央指示作了调查，提出“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的意见。1972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在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但是这个工作有些单位做得不彻底。所以毛泽东认为：“地方打架，根子在军队。”毛泽东提出：“这些人是不是还兼省委的工作，都不兼，其他人没有

说的。”因为在各大军区所在的几个省、自治区里面，还有的省、自治区的领导人也是由军队领导干部担任的，军队干部不兼省委工作，这就为地方领导同志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四天，12月15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见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他再次指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毛泽东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毛泽东还对李德生说，司令常来又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反复思考，设想到离开北京后的种种情况。从全局看，司令员调动，对军队建设地方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从个人讲，到一个新的战略区去，进一步研究“三北”防御中的重要一翼，可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担负起新的使命。李德生戎马一生，有时提拔很快，有时在一个职务上干很长一段时间。这是革命需要，不是个人能够强求的。他工作调动多次，从来没有患得患失、思前虑后。所以他很干脆地回答：“一定顺手。”

毛泽东却说，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李德生想想，这话也有道理，思考问题，总要从两面想，才能防止片面性。

毛泽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干部把反对他的人打成“三反分子”的现象，说，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毛泽东说，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的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再次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毛泽东说，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从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大家听得出来，毛泽东又是指王洪文而言。

最后，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他甚至表示，我还可以打一仗呢。

中央军委有关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会议，适时召开了。会议即将结束时，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客厅接见了到会的43人，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老帅们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大家一一握手。

毛泽东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毛泽东对调动的司令员们说，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

他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

他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许世友回答，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毛泽东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

毛泽东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晋书·刘元海传》里是“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我把“鄙”字改为“恨”字。《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绛、灌”是指随何、陆贾、周勃、灌婴，绛就是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回答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不怕啊？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从毛泽东和许世友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些开国将领的复杂心情。他爱他们，又“恨”（而不是“鄙”）他们“厚重少文”。两年前，1971年夏季，毛泽东到中南、华东巡视，把一年来从大量揭发的事实中弄清的庐山会议真相，给领导干部吹吹风，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在南昌时，他专门把许世友、韩先楚接到南昌，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讲话的内容，特别讲

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在谈到南京军区工作的时候，他批评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他还说许世友，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也听也不听。

毛泽东接着说，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毛泽东对于参加会议的朱德、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一一问候。他同朱德握手时，问候道：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他又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

他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说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这时周恩来插话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毛泽东回过头来向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说，没有了。毛泽东说，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插话说，40年了。毛泽东说，我跟你，40年了。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会见持续了1小时20分钟。周恩来建议唱个歌，大家再次唱

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会后，叶剑英找李德生商量了第二天会议总结的事。

12月22日，会议结束，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命令，叶剑英作了总结讲话。他再次阐述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加强团结，为加强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规定，各位司令员在10天内到达新的军区。这样，新华社的新年新闻中，就可以公布新的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名单。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规定每位司令员可以带10个以内的工作人员。

李德生在23、24、25日，先后陪同陈锡联司令员到北京军区参加欢迎会，向总政治部党委交代工作，到叶剑英处辞行。26日中午，也就是毛泽东80岁诞辰的那一天，他仅带了秘书和警卫参谋两位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陪同，和陈锡联、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一道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沈阳，踏上新的征程。

李德生12月26日下午到沈阳，第二天，参加军区机关和军师领导干部参加的见面会；接着，陪纪登奎到黑龙江省，参观大庆油田。回到沈阳，他立即听取了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开始投入到沈阳战略区的战备和部队建设中去。

可是，李德生在沈阳军区党委内一时还没有职务，党委常委会由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曾绍山主持召开，李德生列席。过了1年又8个月以后，1975年8月，中央正式任命李德生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没有党内职务的情况下，李德生以司令员的身份抓部队工作。他是一个不怕工作多，只怕闲下来的人。他白天安排司令部汇报有关战备和部队训练情况。晚上和元旦假日，机关干部休息了，他调来东北地区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拿着放大镜，伏案工作。在那曲折的等高线上，他看到的是山川关隘，交通枢纽，是6000多公里边防线，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他要把这些深深地记在脑子里。过去打仗，他就是这样，地图看得烂熟，行军打仗，不看地图，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头，都熟记在胸。

他在到达军区的第一天，就请军区参谋长刘凯组织司令部机关，做出勘察东北战略区周边地形的计划，向军委做了战略勘察的报告。叶剑英很快打来电话，转告计划已经毛泽东批准。叶剑英还派出两架刚刚进口的米-8直升飞机和一架云雀直升飞机，给予支持。

从司令部做出计划，到军委批准，前后只用了3天。1974年元旦，为了各大军区新任司令员见报，李德生在沈阳参加了新年军民联欢活动。第二天，在副司令员张峰、参谋长刘凯和作战部6位参谋人员陪同下，李德生先北后南，勘察了东北的边疆、海疆、边防和纵深的各个战略要地。

在北线，从图门、延吉、牡丹江、佳木斯、满洲里、黑河、阿尔山、赤峰，勘察了边境和纵深地区的长白山、张广才岭、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图们江、黑龙江等地的地形地貌、防御工事，同时视察了边防部队和野战部队。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到基层连队看一看，看看战士的冬季保暖和伙食状况。有一次，他还到边境地区的知青点，看望上海、江苏下乡的青年学生。勘察时，凡是通铁路的地方乘火车，通公路的地方乘越野吉普车。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季节，在积雪覆盖的公路上行驶，车轮必须挂上防滑链，有时车辆还会打滑。勘察险要地段，就改乘直升飞机，顶着呼啸的北风，降

落在高山之巅，李德生和参谋人员一起，摊开地图，对照地形，研究布防谋略。

从北线回来，李德生又勘察了辽东半岛的防御地域；勘察了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湾，对渤海湾里每一条海道之间的岛屿，都逐一登临。并且在胶东半岛，同济南军区的领导同志，交换了两个军区如何协作、搞好共同防御的意见。

半个月的行程，李德生看到的不仅是军事地理，还看到城市、农村，众多的工业基地，广袤的黑土地，丰富的工农业资源，深深感到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

通过勘察，李德生对兵力部署、要地设防、发挥重要关口险要地形的屏障作用，加强边防建设、加强部队训练，纠正林彪的所谓“政治边防”等问题，形成了初步意见。1974年1月20日，他将勘察结果和对东北战区战略防御的意见报告叶剑英，叶剑英认为很重要，立即转报毛泽东。李德生准备在加强东北战略地区建设上，做一番事业。

三十一、江青“放火烧荒”

党的十大的召开，江青集团攫取更多权力的野心没有实现，但是她的阴谋活动没有停止。她利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利用毛泽东对孔子的某些评说，利用毛泽东错误地批评周恩来，掀起了一系列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从组织所谓评法批儒文章，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发给全国，到1974年春节擅自召开两个大会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直到公然提出“放火烧荒”，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毛泽东确实是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他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他对中央政治局成员说，你们不信我信。1973年下半年，他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李德生在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活动时，知道这些情况。

江青进攻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一直支持周恩来工作，江青也不放过。攻击周、叶，必然涉及李德生，因为李德生一直在周、叶的直接领导下，在军队里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在党的十大又被选为党的副主席，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又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小辫子，攻倒李德生，可以成为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靶子。

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周恩来，后来被毛泽东终止了，而且还批评了江青，使得江青攻击周恩来的愿望没有实现。她在组织撰写批孔文章的同时，组织人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直接送给毛泽东，建议批转全国。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1974年1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第一号文件，于1月25日发出。但是，中央转发的通知中，也没有批林批孔的提法。就在中央文件还没有印好发出的时候，江青迫不及待地于1974年1月13日、22日，不经过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公会议，不经过叶剑英，以她个人名义，给空军、海军领导人和二十军防化连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要求部队开展批林批孔，直接把手伸向军队。

1974年1月23日，正是农历的大年初一。江青打电话给叶剑英，说是要同驻京各总部开座谈会，她有话要讲。叶剑英紧急召开会议，听取了总政治部关于批林批孔情况的汇报，征求各总部负责人的意见。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汇报总政关于批孔口头通知的三条内容。会上，有的同志建议，与其同江青分别开座谈会，不如驻京机关部队开一次干部大会，由她讲一次算了。叶剑英电话询问江青的意见，江青立即要求第二天，即1月24日下午，在首都体育馆展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叶剑英决定自己到会主持，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在会议开始时讲话。不料第二天上午，江青电话通知叶剑英，她不同意田维新讲话，要叶剑英讲，她还写了封信，要叶剑英读，还说她自己也不来，要迟群、谢静宜来讲。江青的信不经过毛泽东，不经过军委办公会议，是以个人名义，写给全军的，同时送《林彪与孔孟之道》等五种材料，说是“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江青这个行动非同寻常，充分暴露了她企图号令全军的图谋。

24日，正是大年初二。这天下午，驻京部队14个大单位1.8万名干部战士聚集在首都体育馆。叶剑英宣布开会后，江青派来的迟群、谢静宜，大讲批林批孔的“意义”、“内容”，同时影射总政治部对批林批孔不得力。等到他们讲完了，叶剑英什么话也没有说，宣布散会。

江青又用同样手法，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她要求周恩来召开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月25日，大年初三，在首都体育馆，同样有1.8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江青颐指气使，和姚文元以及迟群、谢静宜，轮番讲他们是怎样组织班子，怎样收集材料，怎样形成中共中央1号文件，怎样组织批林批孔文章，怎样给连队送材料，等等，置到会的周恩来等其他政治局委员于不顾，甚至几次当众点名批判到会的郭沫若。在这个会上，他们还攻击总政治部关于批林批孔的通知是“清规戒律”，是“定调子”，“把批林批孔与军队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批林批孔的“禁令”，是“屁话”。他们一再宣传“反潮流”，要“斗、斗、斗”，还说要敢于同“走后门，特殊化”作斗争，“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批林批孔兼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

两次大会，江青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叶剑英，经过认真考虑，采取了巧妙的反击措施。1月30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检讨”走后门的“错误”。毛泽东于2月15日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

向下发。”

叶剑英接到毛泽东 15 日批示的当天晚上，就通过保密电话提醒在沈阳的李德生：“‘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请你注意！”李德生一时不明就里，没有听清，叶剑英连说两遍，待李德生听明白了，他才放心。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于领导干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江青一伙企图通过批林批孔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第一个回合，批“走后门”，就此败下阵来。对此，张春桥极为不满，他咬牙切齿地说：“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江青竭尽全力插手军队，除了给军委和全军，给海军、空军、二十军防化连、广州军区写信送材料外，还布置那两位干将到各总部、海军、空军等单位去“点火放炮”。她说：“现在就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

王洪文、张春桥在2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总参谋部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总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矛头直指解放军领导机关三总部，公然要夺取军队的领导权。

江青企图从总政治部、从李德生突破，来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但是当时李德生已经离开北京，于是她先批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

1月27日，大年初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主持在京1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会上，姚文元大讲批林批孔的“理论”。因为中央委员读书班有军队中央委员参加，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参加了接见活动。正当姚文元讲了个开头，江青突然打断，指着台下的田维新说：“我们正在考教授，你

田维新不是教授，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差不多。我们现在要考考你！”于是她连发五问。

江青先问：“田维新同志，《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不好不回答，他说：“是1848年发表的。”

江青又问：“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田维新答：“那是1871年。”

江青三问：“第二共产国际是哪一年成立的？”

田维新答：“1889年。”

江青四问：“辛亥革命发生在哪一年？”

田维新答：“1911年。”

江青没完没了地又问：“金田起义是哪一年？”

周恩来看见江青问起来没有完，插话说：“那不是1851年嘛。”既想把这个局面打破，又有提醒田维新的意思。江青见状，用胳膊捅了一下周恩来，说：“你不要代他回答。”

江青还没有完，她气势汹汹地说：“我为什么三番五次点你田维新，是对你有气。你包庇黄、吴、李、邱，你批准烧了黄、吴、李、邱的黑材料。”

田维新据实力争，回答说：“我没有包庇黄、吴、李、邱，没有批准烧毁黄、吴、李、邱的黑材料。”周恩来对江青说：“关于烧黑材料的问题，总政治部有个报告，你看了吧？”

江青不加理会，进一步指责说：“你们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革委会改掉了，改成了厂长、政委。把解放军报的领导小组也改掉了，改成了社长。解放军报社的社长来了没有？”她指着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说：“总政治部报你当社长，我对你不了解，你们军委批准了，我们不同意，我们政治局有4个同志不同意。不了解你，就不同意！”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特意交代说：“今天的会议，大家回去以

后，暂时不要传达，等候中央的通知。”

然而，消息不胫而走，有人绘声绘色地传播江青对田维新的考问，总政治部机关已经不那么太平了。

邓小平关注着这一情况，他于1月30日找田维新，要他汇报一下1月27日会议和总政治部揭发李德生和田维新的情况。对于这场斗争，他是从战略全局上观察的。邓小平听了田维新的汇报，嘱咐说，那天会议上，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今天，我什么也没有讲。田维新曾经在刘邓大军担任过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接见，使田维新感到有力的关怀和支持；邓小平的郑重交代，使田维新感到斗争的复杂性。

1月27日“考教授”，还只是对着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到3月5日“放火烧荒”，就把矛头直指李德生了。一场搅乱总政治部、搅乱军队的邪火终于爆发。

3月5日晚10时半，江青、张春桥等接见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乐团、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几个文艺单位的人员。

江青一开头就说：“今天谈一谈批林批孔的问题和创作问题。”接着，她嚣张地说：“我就是要整整军队！”“准备他们骂娘，我不怕。”

在讲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时，她说：“听听八一厂的吧，八一厂是造了孽，倒了霉啦，军阀在管你们。”江青的所谓“军阀”，也有可能是泛指军委办公会议的领导同志。可是她在接下来的讲话中，直接点了李德生的名，随着这个讲话的迅速传播，“军阀”的头衔指向李德生。“打倒大军阀”，“打倒大军阀李德生”标语、大字报，不仅在总政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铺天盖地，而且全国许多地方的机关、学校，甚至火车厢外边都刷上了这类大标语。

江青说：“你们要查一查，到底为林彪拍了一些什么？这个问

题没有搞清楚，我们委托的人都给包下来了。”“你们八一厂是没有娘的孩子，多么可怜啊。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某某某也请来了，就是要整整军队。”她煽动地说：“我也是解放军嘛！我有军籍嘛！我已经去领军装去了，我还是个军人！”

江青说：“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他们不许普及样板戏，有坏作品批评不得，我们的话根本不听。刘永寿（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作者注）不是个好人！”“叫刘永寿也亮亮相嘛！这个人怎么那么对我有刻骨仇恨！”她进而指责说：“他们都是做坏事的。他们抓这个方面抓得很紧。”后来向部队文艺单位传达这个讲话的人还解释说：“‘他们’，是指总政的头头们；‘抓这个方面’，指的是文艺。就是总政头头们抓文艺是抓得很紧的。”

她说：“看封存影片，军队最严重。他们不是批判、借鉴，而是看那个过日子。”

张春桥作为“军师”，故意递话给江青：“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有没有经过群众讨论？”

江青接着说：“讨论个屁！是弄个王心刚当挡箭牌。你们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没有批准。”“倒不是不同意你王心刚和某某某。已经是革委会了嘛，为什么要改厂长制？改厂长制我们不同意，政治局有四个人坚决不同意。”她毫不隐讳政治局里只有他们“四个人坚决不同意”。她又说：“他们把你抬出来，是为了他们自己。我不反对你王心刚当厂长，给你下不来台的是李德生。他们是打掉革委会，打掉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拿你（指王心刚——作者注）来当挡箭牌，其实呢，是李德生在整你，叫你作难。还是叫革委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不是要革委会，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

江青说：“选你当厂长就是为了突出他彭勃。彭勃来了以后，

八一厂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勃这个人见了我就不亲切。我可不敢管你们，前些时候我只是去讲了两句话，彭勃就跳起来了。”她说：“我有一年多没有去八一厂了，我不敢惹八一厂，我怕去。”“彭勃这个人很不老实，惹不得，一批评他就跳。我们批评彭勃一句，李德生就要为他辩护。”江青诬陷彭勃说：“谁是黑手？我看彭勃就是林彪的黑手。”

会上有人“揭发”说：“江青同志曾经讲过八一厂某人是林彪的小爪牙，可是田维新看到一份简报上有‘地地道道小爪牙某某某’，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批上‘此提法不妥。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结束之后，不应在开始就这样定性。’”江青一听田维新竟然批评她讲“小爪牙”不准确，大为恼火，大声说：“他（指田维新——作者注）是个大爪牙！”很快，总政治部机关铺天盖地贴了两条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打倒大爪牙田维新”。

江青煽动八一厂到会的人员：“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有3个人，去放火嘛！”她认为：八一厂“看来要夺权”。

当时八一厂参加会议的是厂长王心刚等3人。八一厂要抓故事片生产，是王心刚向彭勃推荐，并经总政治部同意，请某某某到八一厂帮助工作。他被“打倒”5年了，重新工作，听到江青再次提到他，头脑发胀，于是在传达江青讲话时，加以发挥。他甚至说：“确实在军队内以李德生为首的在对抗江青同志，因而使江青同志不敢管军队。既然李德生可以反，有谁不可以揭呢？在揭发中必须上挂下联，刘永寿不是孤立的。”他认为江青所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他们”就是指部队的“高级干部”，“这股势力相当大”，“各军兵种也有”。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3月，这位同志对此作了检讨。

八一厂的形势逆转了，彭勃被批斗。有人莫须有地揭发说，彭勃坐小车到黄永胜家去过；其实，彭勃是坐车到军委办事组开会。

有人说，彭勃整江青的黑材料送总政治部；其实是国务院文化组有人追问彭勃，田华参加天津黑会，为什么不抓田华？彭勃请示田维新，田维新认为证据不足，说抓人要慎重，材料退回八一厂。3月23日，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执意坚持下，彭勃被停职检查。

江青的所谓“刘永寿不是个好人。叫刘永寿也亮亮相嘛。这个人怎么那么对我有刻骨仇恨。”“军队有坏作品批评不得。”是怎么回事？

刘永寿是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分工负责文化工作。当时，总政治部采取措施，在全军逐步恢复文艺团体，组织文艺创作。刘永寿按照军队的组织系统办事，没有请教江青这位“文艺旗手”。

1970年6月，为了外事工作需要，周恩来询问军队文工团的情况，总政治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下放到山西农村的文工团调回北京，各军区文工团也逐步恢复，并且开展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7月初，周恩来审查驻京部队文艺团体演出，曾经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这是滥用激情。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当时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学习了这个讲话后，向部队文艺团体传达和贯彻了这个精神。

1972年4月，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的文艺演出，对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发表意见，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总政治部临时党委学习后认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的具体阐述，组织宣传部机关和文艺单位学习了周恩来的谈话精神。

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总政治部于10月组织全军文艺

团体在沈阳、兰州、南京、广州军区分片举行了文艺会演，从而产生了一批反映部队现实生活质量较好的歌舞节目。在这个基础上，1973年举行了一次全军文艺调演。9月，将调演节目中评选出的优秀节目，组织了一次综合演出。刘永寿负责全军文艺调演的工作。

调演节目中，新疆军区文工团的维吾尔族舞蹈《葡萄架下》受到好评。这个作品以优美的民族舞蹈形式，较好地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丰收的喜悦，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被评为优秀节目，参加了综合演出。宣传部副部长刘永寿向李德生、田维新汇报了调演和评选的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意。可是江青派来的国务院文化组的人认为，这个节目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不应当评为优秀节目。

刘永寿长期在部队做政治工作，性情耿直，对这种不讲道理、横加指责的态度很不以为然，回敬一句说：“总不能一花独放嘛。”这可是触到“文艺旗手”的痛处，很快传来江青的话：“《葡萄架下》是修正主义的。”江青无限上纲的看法很难令人赞同。

李德生、田维新听了刘永寿的汇报后认为，《葡萄架下》被评为优秀节目，符合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而且已经宣布评为优秀节目，就不要再改了。

这就是所谓“有坏作品批评不得”的缘由。

江青为什么说刘永寿对她有“刻骨仇恨”呢？那是在党的十大以后，1973年9月，各军区文工团调演的优秀歌舞节目在京西宾馆礼堂演出，李德生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请了朱德、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和驻京的总部、军兵种领导同志观看，江青也到场了。

负责这场汇报演出的刘永寿在休息室里接待各位领导人，他向各军区文艺团体负责人介绍观看文艺演出的领导同志。先介绍朱德，接着介绍叶剑英，对于旁边的江青，他介绍说：“这位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介绍各军兵种领导同志。江青硬是说刘永寿在那天没有介绍她。江青“放火烧荒”点了刘永寿的名以后，刘永寿

多次被批斗。

江青借着刘永寿，攻击李德生主持的总政治部说：“他们都是做坏事的，他们抓这个方面抓得很紧。他们选来的人都是不简单的。”

江青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放火烧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不得不写出检讨。3月20日，毛泽东再次写信批评江青。3月21日，王洪文、张春桥故意当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面，欲盖弥彰地抵赖，说什么什么话江青没有讲过，张春桥说：“根本没讲那些话，也不可能那么讲。”他指着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亲信：“我没有听到，你们听到了吗？”那几个人忙说：“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他们企图借此掩饰江青的错误。22日，那个到处传达江青“放火烧荒”讲话的人，也奉命出面说，记录“可能记得不完全，不够准确”。后来，“四人帮”处境越来越困难，5月18日，又让他们的亲信，要那位传达江青讲话的人再次出来“承担责任”。22日，他又写了一个经过“四人帮”审查的声明，再作六点“更正”。当然，这些对江青不利的消息，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广大群众是毫不知情的，以至江青放的那把火，还在总政治部和一些地方蔓延，并没有一下子熄灭。

解放军报社的情况同样严重。

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文章是介绍空军一个航修厂党委，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搞好团结的经验。它强调在党委内部“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展开批评，“还要能互相谅解”。这篇短文，体现了周恩来、叶剑英在1973年5月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对于当时许多单位在批林整风运动

中，特别是整风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很有启示作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接见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成员的会议，完全知道周恩来讲话的内容，知道中央对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然而，就在江青召开两次批林批孔大会后三天，1月28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江青气势汹汹地说：“要派几个人到解放军报社去，我气得很！”张春桥点题说：“《解放军报》1月17日有一篇文章，怪得很，你们可以写文章批评。”王洪文说：“这篇文章很坏。”

他们派人到一个连队，要连队重新找出十多天前的那张报纸，“联系当前的批林批孔来找问题”。连队的几个同志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按照组织系统转给《解放军报》。可是，“四人帮”看到信件觉得“分量”不够，让人修改加工，又不经写信人的同意，即以连队4个战士的名义，写出署名文章《这样‘批评’对吗》，无端指责《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是宣传折衷主义，宣传中庸之道。实际上是影射周恩来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们要求《解放军报》自己加按语发表。“按语”又经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修改，说文章是要搞折中、调和，取消（指批林批孔——作者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按语和批评文章在《解放军报》2月15日第一版刊出。张春桥还假惺惺地说：“本来，《人民日报》要加编者按登载，后来考虑党报登出来批评军报影响很大，所以叫《人民日报》告诉你们加按语自己登。同时也是给军报党委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从此以后，“四人帮”接二连三找《解放军报》的岔子。时而

说某一篇文章“和中央唱反调”，时而说某个版面“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他们还要一个连队“眼睛盯着《解放军报》”，“全军都要盯住它”，甚至要人以连队的名义，到解放军报社贴大字报。对解放军报社领导班子，江青竟然说是军委批的，中央没有批。张春桥则要无赖说：我是画了圈的，但我不同意。3月3日，江青在一封有关解放军报社的信上批给王洪文道：“要烧萧华、李德生、胡痴的坏人，帮助革命的，教育犯错误的好人。……”

为了处理解放军报社的问题，3月11日，军委办公会议六人小组，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接见解放军报社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听取汇报。

张春桥、王洪文在会上对解放军报社、对总政治部、对李德生，展开了颠倒是非的攻击，对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严重的歪曲。

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张志汇报刚刚开始，张春桥就打断话头，责问说：“奇怪的是，李德生不是总政治部主任，他走了以后，登的照片，李德生的照片突出，说李德生还是主任？”

他们接着指责《解放军报》1月17日的文章。

张春桥说：“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支持八连批评那篇文章的大字报？你们文章与党中央文件的精神不一致。”

王洪文接着说：“你们不是团结起来支持八连的大字报。大事不抓。前几天我们去了几位同志，觉得你们不抓大事，对八连的大字报，你们是什么态度？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抓，你们抓什么？”

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他们不讲阶级斗争，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

王洪文又说：“他们不讲阶级斗争，还不让别人讲阶级斗争。”

他们起初把文章归结为搞折中、调和，现在又上升为阶级斗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张春桥又把《解放军报》1971年8月请示登载林彪照片问题，重新提出来。他说：“我说一下登‘狗头像’的问题。”他用造反派常用的“砸烂狗头”语言，用在我们党的会议上。其实，毛泽东早就批评过这种说法，明明是人头嘛，怎么叫“狗头”呢？张春桥说：“此事他们那些办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用的是江青同志拍的那张，要登在第一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画报也登了嘛。当时是出于团结的愿望，这有什么。可是他们利用总理不在京，李德生把照片放在我面前，总理外出时，开会叫我召集一下，那一天是研究经济问题。我一看照片，脑子动了一下，我问军委办事组讨论没有，黄永胜吱吱吾吾的。为什么不是黄永胜，而是李德生交给我呢。我当时说，这么长的文章我带回去看看。‘九一三’后我一想，这一手好厉害，我同意登，就有我一份，不同意登，可抓到你反林的事实了。这一手好厉害。”

张春桥真会颠倒是非。因为这个问题，早在1971年8月，已经经过周恩来同李德生、田维新、张春桥、姚文元当面讲清楚了。他指出“现在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我看也就完了。”

在批林整风中，群众对于《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登载那张照片，议论不少。它是江青的一块心病。有机会总要翻出来，为自己辩护。张春桥对此当然非常卖力。他利用李德生、田维新都不在场的“优势”，危言耸听。按照张春桥的说法，不是江青吹捧林彪，而是李德生要吹捧林彪了；不是张春桥要陷害李德生，而是李德生要陷害张春桥了。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同志们想一下，廖初江为什么要搞这一手，要想大局，我讲这个例子可以想出一些问题。”“敌人用什么样的手段整你？我仅仅说我知道的过程。”在张春桥的眼里，李德生已经是“敌我矛盾”了。

王洪文紧接着又提出一个“大问题”。他指着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张志说：“张志，民兵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谁规定的？”他接着说：“《解放军报》去年5月17日登了（文章）。”“1967年春桥同志给主席写了报告。上海文攻武卫从成立就一直有斗争。军报文章与上海针锋相对。上海有反映，一查果然有。”

王洪文提到的是关系到我国武装体制的重大问题。自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洪文在张春桥支持下，成立了“民兵指挥部”。这实际上是他原来的武斗队的班底，从而取代了上海警备区和各武装部系统对民兵工作的管理和领导，这就企图改变军队系统领导民兵的根本制度，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准备一支武装力量。在“四人帮”覆灭前，他们在上海企图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更证明他们是有预谋的。对于所谓“民兵指挥部”，南京军区、总政治部都是不同意的。1973年上半年，总政治部曾经派人到上海作了调查。

1973年8月党的十大以后，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后，专门找李德生和田维新。王洪文说：“关于民兵指挥部的问题，你们总政治部态度不明朗，《解放军报》也很少宣传，不知是什么缘故。我们三个人谈一下吧。”

李德生给他解释说：“民兵是毛主席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经受过长期考验，作出重大贡献的。民兵历来都是由军区和武装部管，要是不让他们管，另外成立民兵指挥部，涉及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要慎重。”

田维新也表示，猛然改变民兵管理体制不好。

话不投机半句多。王洪文一听很不高兴，拉出要走的姿势，扣上帽子，提高嗓门说：“主席说了，民兵也要改造。现在这种体制是很不得力的。上海的民兵指挥部这种管理形式，已经作出试验。我们认为，改造民兵工作，这是最好的形式。同志，这可是个新生

事物，对新生事物要敏感。”又来一个“新生事物”！

双方没有统一意见。

王洪文乘这次接见的机会说：“你们查一下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文章，不要太远了，1970年8月20日以后的。这就是大事。有一阵，军报很凶。你们不去批，材料摆在你面前！”

张春桥又抓住批极左做文章。本来，“九一三”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批极左，取得明显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对于张春桥在《人民日报》反对批极左，很不满意，私下有不少议论。消息当然传到解放军报社。张春桥责问张志：“迟浩田（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作者注）的谣言是从哪里来的？”他自己回答说：“是从军事博物馆馆长那里来的。这个馆长是从八一厂去的。你们要查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就是下这个决心。”

张春桥说：“我要说一说，这是个原则争论。《人民日报》有坏人，利用批林，批无政府主义，搞了一个版面，上海工人提出反对，这是一场原则争论。《文汇报》在内部材料登了，《人民日报》坚持，也会给你们传的。一直批极左，上海同志不赞成，首先是工人不赞成，我们也不赞成。《人民日报》王若水写信给主席，主席批评了王若水，政治局也批评王若水，这个问题在军报内部会有反映。所谓批极左，就是批真正的左派。不是批我们这几个人，是批主席。”

王洪文接着说：“刚才春桥同志讲的，不是某一句话，是一条林彪路线。”他们把批极左荒谬地说成是“林彪路线”。

张春桥还把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组长廖初江在1971年9月11日出差到广州，同林彪南逃联系起来，说廖初江到广州是为林彪南逃打前站，是李德生把他保下来了。人们都知道，林彪搞《“571工程”纪要》，是要谋害毛泽东，至于策划南逃广州，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才作出

南逃广州的决定。廖初江 11 日出发，是在林彪决定南逃广州之前，怎么可能是为林彪南逃打前站呢？

王洪文、张春桥接连批评解放军报社领导不抓阶级斗争，不抓路线斗争。他们责问社长华楠：“你为什么一句不吭，你自己有错误应该检查，带头揭发。”指责副社长张志：“群众对你很愤慨，要严肃对待，你到报社久，应带头揭。”他们说：“领导上提出两种看法，同意一种倾向性的看法，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初期走资派就是用这个方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孔，实质是在批群众。”他们说：“小将清队有扩大化，当然是有责任的，但责任在林彪，不在小将。批小将批了三年，对黄、吴、李、邱批得这样？（解放军报社）落实政策，把里面的坏人放出来了。”他们认为“现在的党委是应该受到批判的”，“要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

王洪文又进而对总政治部的同志说，你们那里也是党委的问题，包括中层干部，要解决一下。蒋润观（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作者注）的问题，你知道吗？不仅总政捂盖子，到民航去的工作组是保刘锦平的。要带头揭，带头批嘛！

最后，张春桥来了个绝招。他借口军报运动、编报两者不能兼顾，提出“你们不停刊，但不编稿子，不写社论、评论。只登新华社稿子。只登新华社稿子也会出错，哪些登，哪些不登，登在哪，重要的稿子登在次要位置也会错，但毕竟少一些。你们不要放松版面。”于是从第二天起，《解放军报》只能登载新华社电讯稿，不许自己编发稿件，直到 1974 年 9 月，才重新准许编稿。《解放军报》被变相停刊达 178 天，创造了新中国新闻史上空前的恶劣事例。

江青“放火烧荒”，在总政治部的火很快点起来了。王洪文专

门派了参加中央读书班的上海金祖敏、周丽琴、万桂红、单文忠等人进驻总政治部，直接参与批林批孔运动。王洪文还擅自派人到十二军收集李德生的“材料”，被十二军的干部、战士顶了回来，没有捞到什么材料。

总政治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在“四人帮”一再煽动操纵下，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大会连续召开。“打倒大军阀李德生，批倒大爪牙田维新”的标语到处张贴。连续3天的批斗大会，不仅批斗田维新，连李德生的夫人曹云莲也在大会小会上被多次批斗。有人提出要抄李德生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秘书处去人，才把所有文件全部集中到中央办公厅保存起来。

刚刚调来的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徐海涛，原是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时的得力支持者。在张春桥支持下，他造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的反，连连召开批斗会。总政治部甚至有人提出，并正式报告军委，要求把李德生揪回北京批斗。对于这种混乱局面，叶剑英不顾自己也处在被攻击的境地，毅然出面制止，说，东北是反修前线，你们要揪回李德生，就是帮助修正主义。

李德生在第二炮兵五十三基地工作的儿子李南征，公开表示不同意批判他父亲是“大军阀”，经王洪文批准，竟然被二炮秘密押回北京，关在郊区一座营房的黑屋里，白天都要开灯。夏天没有蚊帐，蚊叮虫咬，冬天一床薄被，冻得瑟瑟打颤。一伙人不断对他逼供、诱供，要他“揭发”李德生的问题，交代自己有哪些反对“四人帮”的言行。曹云莲几次给二炮打电话，要求和儿子见面，得不到回答。最后，她不得不请求叶剑英干预，才见了一面。李南征被关押一年之久，找不到一点问题，才不得不释放。

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放火烧荒”，妄图搞乱军队，搞

乱全国，受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毛泽东得知 1 月 24、25 日大会的情况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擅自召开大会和到处送材料，指示不准发大会的录音。2 月 6 日，江青写信再次送去一批“批林批孔”材料并求见，毛泽东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你有事应当找政治局”。3 月 20 日，毛泽东在看到江青检讨和求见的信后，写信表示：“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可是，江青“放火烧荒”的内容，几乎传遍全国；而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只有少数人知道。“放火烧荒”的恶劣影响，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消除。

尽管江青在中央政治局受到批评，但她置若罔闻，依然继续组织“梁效”写批孔文章。6 月 19 日，她甚至亲自跑到天津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大讲儒法斗争，进行蛊惑性的宣传。他们借批林批孔，图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暴露无遗。

在“放火烧荒”中，张春桥拼命地攻击总政治部、攻击李德生。过了一年，1975 年 1 月，他终于当上了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这个总政治部主任，在任内 1 年又 9 个月，几乎没有到过总政治部机关。总政治部的干部大多数没有见过这位主任。

那么，张春桥在总政治部干过什么呢？他上任伊始，就把矛头对着老干部，对着老一代革命家。1975 年 3 月 1 日，他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借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大讲反对经验主义，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明显地攻击重新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老革命家。直到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5 月 3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再次作了批评：“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

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李德生远在沈阳，不知道中央政治局斗争的详情。

三十二、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新的动乱。一时间，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再次出现大字报上街，群众绝食，抢夺枪支、档案，批判领导干部等现象，重新出现类似“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混乱局面。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不好。1974年6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次出现明显问题。在到南方休养以前，7月17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开会。他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的一系列帮派活动：“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而且，他两次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没有向下传达。当天晚上，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武汉休息近3个月，治疗眼疾，后来又转到长沙休息。

“批林批孔”中，各地的“揭发”材料、“大字报”摘编送到中央。毛泽东认为：“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各地大字报揭发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就是说，他对于那些“揭发”，并不看重，但也没有全部否定。八一建军节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毛泽东还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是毛泽东对会议定下的基调。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6月、8月连续两次做了膀胱癌大手术，此时正在住院治疗。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煞有介事地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搬出总政治部的几本《批林批孔大字报汇编》为“依据”，排了十几个问题，在大会小会上逐个批判，要李德生作出“交代”。

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参加的有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副政治委员王淮湘。曾绍山主持会议。曾绍山不了解中央斗争情况，不知道李德生有多大的问题，心中没底。李德生很守纪律，他不便、也不可能做任何说明。会议实际上是刚刚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毛远新唱主角。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39年出生。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牺牲后，幼年毛远新在毛泽东家里长大。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派。辽宁成立革委会后，他出任革委会副主任。

处在那种情况下，李德生只能有节制地同王洪文、毛远新的无理指责作斗争。

小组会从8月26日起，将王洪文、毛远新提出的十几个问题逐个追查、进行批判。每追问一个问题，毛远新都竭尽无限上纲之能事。8月28日、9月1日、5日，还开了几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组会，由王洪文直接来追问李德生。

第一天的小组会，毛远新就以造反派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对李德生说：“十几个问题，只是提了个头，你先讲清楚，其他问题再说。”

小组会追查的是十几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按照当时的记录，不妨一一罗列在下面，看看以中央名义召开的会议上，“四人帮”是怎样不顾毛泽东为会议提出的方针，蛮不讲理、横行霸道、无限上纲的！

第一是所谓“第一个号令”问题。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8日，总参谋部按照黄永胜的口头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部队。“九一三”后，1972年7月的中共中央文件第24号，即林彪罪行之三，公布了这一情况。批林批孔中，有人“揭发”，说李德生参与了“第一个号令”的阴谋活动。

毛远新对李德生说，你是同意“第一个号令”的，是同意不报主席的。李德生虽然很不满意这种不讲理的追问方式，还是耐心地解释说：“林彪的谈话记录传到军委办事组，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我听到黄永胜的传达。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由我签发上报、下发第一个号令。”实际上，在周恩来追查时，李德生还批评了总参谋部机关。

小组会上，一直逼李德生承认“同意第一个号令，同意不报

毛主席”。李德生反复坚持说：“我没有同意；我只是听到传达了，并没有参与处理。”

毛远新在第一个问题上纠缠了半天，没有达到目的。小组会开始“打态度”，批评李德生“态度”不端正，要求他端正对待这次会议的“态度”。“打态度”，是“政治运动”中经常被运用的“棍子”，只要你不承认给你安上的罪名，就是“态度”不好，就要批判你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

第二是销毁黄、吴、李、邱的黑材料的问题。

1969年12月，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按黄、吴、李、邱的授意，写报告说：“凡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统统销毁”。黄永胜、吴法宪2日批上：“请总政治部审批。”刚刚到任的总政治部两位副主任商量后认为，这些是涉及黄、吴、李、邱的材料，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需销毁，应当报告党中央，总政治部没有这个权力。但是这个话又不便明说，于是写上：“应按以往规定办理。”这份报告回到军委办事组后，4日，黄、吴、李、邱又批示：“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自行处理。”此事在清查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罪行时，已经找出总政治部黄志勇、田维新两位副主任签署的不同意烧毁“黑材料”的原件。江青在1974年1月27日向田维新追问时，周恩来已经说过总政治部有过报告，讲清了这件事。

王洪文硬是说李德生同意销毁材料，既是攻击李德生，又可进而攻击周恩来。李德生手头没有总政治部的报告原件，一时真的想不起来。他只好说：“这批材料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销毁了，一是继续保存，一是退回原单位。”

曾绍山说：“问你是怎么批准销毁黄永胜他们腐化的材料。”

曾绍山这么一问，李德生倒想起来了。他坚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一个字没有批，一句话也没说。”

李德生的申辩，引起小组会成员群起而攻之。又是“打态度”，说李德生不检讨，还狡辩，态度不好，起了保护黄、吴、李、邱的作用。甚至无中生有地说，自“九一三”至9月24日，黄、吴、李、邱被停职交代的10天间，总政治部还“销毁了黄永胜的材料”。这是何等荒唐的事！

第三是林彪1970年5月19日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李德生本着严于解剖自己的态度，检讨说：“这是林彪企图拉拢我，控制总政治部。我们当时没有看出来，认为他是关心政治工作的。”他接着作了说明：“但是我们并没有组织向下传达，更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办。后来是由黄、吴、李、邱直接布置《解放军报》宣传了某些观点。”

小组会上纲说，他在“五一九”吹你，你就也吹他。“五一九”讲话，是“为二中全会作舆论准备的”。

为了把李德生同林彪拴在一起，有人竟然说，这个记录稿子，你们修改五次，是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帮你们改的，是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反动纲领的一部分。看来，王洪文、毛远新不仅要把李德生同林彪、黄、吴、叶、李、邱联在一起，还要把他同林立果的“联合舰队”联在一起。

第四是纪念军委扩大会议10周年的问题。

总政治部曾经在1970年初，要求部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后一个决议对林彪的“四个第一”作了阐述。但是当时总政治部起草决议时，“也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

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包含了一些正确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求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很难做到不提学习1960年的决议。而且通过学习两个决议，实际上否定了林彪只承认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提出的所谓政治工作“老一套”。小组会却上纲说，这是为给林彪造舆论，冲击批陈整风，推行林彪路线；不止是推行林彪的军事路线，而且是推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再次逼着李德生就这一活动，交代和林彪的关系。

第五是庐山会议的问题。

王洪文、毛远新为了把李德生同林彪在庐山发动突然袭击连在一起，要李德生交代，在庐山是怎么和黄、吴、李、邱串连的，是怎样对林彪讲话表态拥护的。

李德生介绍，安徽小组第一天讨论，曾经写了简报。李德生讲：“我们的讨论简报，送给总理看后，再也没有上送，就封存起来了。”

在毛远新一再追问下，李德生实在忍无可忍。他气愤地说：“如果你们认为讨论也是表态，我们是‘表态’了。”

李德生这个不软不硬的态度，引起小组会不断追问李德生在庐山同黄、吴、李、邱的联系。甚至讲，李德生在庐山，曾找李作鹏联系过。李德生说明，在庐山，他是和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同志住在一起的，自己住的楼，和李先念、余秋里住的楼紧挨着。而和军委办事组的住地隔得较远，他没有去串连，驻地有登记，可以查到。小组会对此依然不依不饶。

李德生说，我在庐山住在哪里，你们到中央办公厅可以查清楚。

毛远新竟然荒唐地说：“你在庐山的表现，起了炸平庐山，支持林彪集团搞政变的作用。”

第六是解放军报社给总政治部写的报告，准备刊登林彪照片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有关《解放军报》的一节里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当时曾经由周恩来出面处理，是已经弄清了的问题。

小组会上有人说，“姚文元同志讲，这个报告军委办事组讨论过。”其用意是说明这件事是李德生伙同黄、吴、李、邱一起干的。

李德生一再解释，总政治部没有将它提交军委办事组讨论。当时感到登载这个照片没有把握，才想征求张春桥的意见。毛远新恶狠狠地说：“你说没有把握，所以才请教春桥同志，你过去处理那么多事，就都有把握？问题在于是军委办事组让你办的，究竟军委办事组讨论过没有，你应当记得清楚的。”

李德生对于这种不讲理的问题，不能退让，他坚定地说：“总政治部根本没有将它提交军委办事组讨论。你总不能要我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吧！”

第七是1971年召开干部工作会议的问题。

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解决基层干部困难和实现老、中、青三结合。小组会指责这个会“是林彪指挥操纵的，是为林彪上台做组织准备”的。李德生明白，这种“批判”会，总是将没有的说成有，将一般问题上纲到“阴谋活动”。他只好以沉默对待，听任大家“打态度”。

第八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问题。

毛远新开头就说，这应当作为一个大问题。

1970年夏，总政治部有一位副处长到空军参加“三代会”，听

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因为空军搞得很神秘，并不知道做讲用报告的人是谁，他回来向宣传部汇报，只讲空军“三代会”上，除了先进代表的讲用外，还听到一个录音，是一位副部长讲的。所以总政机关当时并不知道讲话的是林立果，也没有看到所谓“讲用报告”。李德生当然就更不知道了。

毛远新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硬说总政治部知道这个“讲用报告”，连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九是“北兵南调”的问题。

1969年3月，发生苏联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事件后，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在东南沿海抓一把，军委办事组讨论过调部队到广东、福建的方案。总参谋部为此召开作战会议，进行布置。李德生有外事活动，只参加了开会时的接见。后来圈阅了会议报告。小组会上，竟然把这个报告说成是同“第一个号令”一样，是个“阴谋活动”。硬说李德生参加了这一“阴谋活动”。

第十是直升飞机的问题。

1971年9月13日，林立果“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拿着林彪“手令”，驾驶直升飞机企图外逃，李德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指挥起飞歼击机将直升飞机迫降，周、于自杀，李伟信被俘获。飞机迫降后，李德生派空军技术人员去维护管理。这也成为一个“大阴谋”了。李德生在会上说明当时情况：“先是派当地驻军和民兵包围，并要求把飞机保护好。由于我在空军，就叫他们把人员、材料送到空军来。后来总理派卫戍区部队看守，缴获的林彪“手令”，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和纪登奎、我一起辨认。这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

小组会追问说，为什么要把材料送到空军来？毛远新竟然无理

指责说：这是“杀人灭口”，是要“销毁材料”。

第十一是“九一三”后“捂盖子”的问题。

“九一三”后，中央政治局分工李德生负责空军的揭、批、查工作，空军揭发的材料许多是经过李德生上报党中央的。这本来是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分工。小组会上，甚至在大组会议上，都说是李德生在参与中央专案组工作中，有意扣压材料，不报告中央，不让追查。他们还责问李德生：“为什么说林彪的秘书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时，毛远新带着作总结的口吻说：“这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而是要联系起来看，是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你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问题。”在毛远新的心目中，李德生已经是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他接着说：“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3年半了，总政治部抓全军政治工作，起到什么作用？不仅没有抓好这个中心，而且吹林彪，为林彪干了很多事情。主席那么信任你，派你到军委办事组、北京军区掺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吗？你起了黄泥巴的作用，糊得更严了！主席叫你和他们划开，你却请黄永胜作报告，帮他们销毁罪证材料。你完全辜负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

在毛远新之后，小组与会人员也追问：“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为什么搞到一起去了？要从立场、感情、路线上分清。”并且提出你现在的认识距离很大。应当是点到的要讲，没有点到的更要主动地讲；不仅原则上承认错误，还要具体分析错在哪里，有哪些具体事实；不仅要讲清事实，而且要讲思想活动，挖思想根子；要害是与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关系。

接下来是第十二个问题，“插手”总政治部的工作。

李德生 1973 年 12 月 26 日从北京到沈阳。不久，总政治部把 1973 年工作总结送到沈阳，请李德生审阅。尽管李德生已经不是总政治部主任，但是 1973 年全年，李德生在总政治部工作了 360 天，总政治部将总结报告送给他，征求他对全年工作总结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这也成为一大罪状。而且说，你已经不是总政治部主任了，为什么还插手总政治部工作？插手总政工作不止这一件。你是想抓住不放。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不是水平低，能力差的问题，不是上当受骗的问题”，“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要从立场上考虑，从世界观上考虑，从思想根源上挖一挖”；“总政治部究竟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

在小组会之外，还发动小组成员，在休息时间同李德生“谈心”，干扰李德生的思考和休息。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江青攻击 1973 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责总政治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几次召开政治部主任会议，批林彪的空头政治，精神万能等极左路线，是“背着党中央干的”；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

姚文元竟然说：“你李德生在 1971 年的 9 月 24 日下午，还和李作鹏密谈了 4 个小时，谈得很投机！”这真是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姚文元的责难，有其不可告人的缘由。在 1970 年初，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有人向秘书长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为“黑材料”销毁。王迪康请示李德生，李德生认为历史档案不能随意销毁。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帮”告状，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住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他只好沉默不语。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大组会上，叶剑英、李先念始终没有发言。李德生意识到，他过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是请示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在庐山的住地，请陈永贵作报告，这样很具体的问题，他们都不便出面澄清。“四人帮”如此猖獗，老革命家们正处于战略守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他们是要借攻击自

己这个“靶子”，进而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叶剑英、李先念不发言，说明他们处境已经非常困难。这次会议，自己是“重点中的重点”，是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靶子”吧。毛泽东不是讲过，李德生你是唱李铁梅的，是陪绑的。当时讲的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陪绑；现在看来，又是作为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陪绑”了？！

大会小会整整折腾了两周。李德生想，自己必须顶住！如果解释说，总政治部的许多工作，都是请示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请陈永贵作报告，是请示了叶剑英的；在庐山的活动，李先念可以作证，等等，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了。

在政治运动中，找个“靶子”攻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不止一次了。当“靶子”，就是要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来，等到时机成熟那一天，事实真相会大白于全党的。我们党历史上有过多次错误批判，只有被批判对象作了违心的检讨，才能告一段落。“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类现象更不少。去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不是作了违心的检查吗？萧劲光司令员不是也作过违心的检查吗？李德生想，在中央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继续顶着，会议收不了场；再追下去，他们还可能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从大局考虑，惟有自己做个违心的检查，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斗争”。

9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他们虽然作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

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 16 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讲得多好啊！

这是叶剑英对李德生的信任，是对李德生的亲切嘱咐。李德生理解叶剑英此时的处境和话中的寓意，也不便向叶剑英做任何表白，提任何要求。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 4 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包括所谓李德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

争的艰巨。

李德生对于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心中非常坦然。我们可以从他历史上的一个经历来做佐证。40年前，1934年9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后，担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四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的李德生，利用部队调整的机会，要求回到战斗班排，干打仗的“老本行”。经过师机关批准，李德生回到十师交通队当班长。

自从1932年西征到建立川陕根据地，经过无数战斗、牺牲，部队里从鄂豫皖根据地来的老兵很少了，李德生被选为师部机关和交通队的党支部书记。陕南战役、嘉陵江战役几个月连续作战，部队没有时间休整，党的生活也没有坚持正常。

1935年6月的一天，在川北松潘县的镇江关，党支部书记李德生主持召开支委、小组长联席会，让各小组汇报思想情况。汇报结束后，李德生作了总结，他说：“现在战斗比较频繁，生活也相当艰苦，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最近几个月，战斗紧张，我们党的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经常了，希望大家以后要抓紧一点。党员分工要明确，汇报要有内容。”

在党支部委员中，有一位是师政治委员叶道志的罗秘书。会后，他向叶道志汇报，说李德生在支委会上讲，现在部队不如过去了。叶道志是张国焘大批撤换四军领导干部时，从三十一军调到十师来，说是为了“加强领导，转变作风的”。叶道志军阀主义很严重，他一听竟然有人说部队现在不如过去，这不是对他到十师工作不满的表现吗？一时怒火大发，立即召集党支部大会，当着全体党员的面，训斥李德生道：“自从我来了十师以后，各方面的工作都加强了，战斗作风转变了，党的工作也加强了，你怎么说不如过去？你这是有意破坏我的威信，不相信我的领导。”

李德生一听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再申辩。然而叶道志根本不听不进去，对李德生的辩解更为不满。他气乎乎地要求党支部讨论李德生的党籍问题。他说：“谁不发言，就开除谁的党籍。”由于李德生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党支部大会上，除了叶道志带来的两个人外，仍然没有人发言。

叶道志下不来台，恼怒地叫人打李德生。

刚刚 19 岁、血气方刚的李德生叫道：“就是打死我，也不能接受你的批评！”

叶道志更加生气，叫人把李德生捆起来，手下人找不到绳子，只好解下绑腿，把李德生捆起来。李德生哪能服气，他参加红军已经 5 年多，从 14 岁的少年，成长为一身正气的青年共产党员，在鄂豫皖时听到过“肃反”扩大化的事，老战士们心里都反感，想不到现在整到自己头上。李德生情不自禁地反驳道：“我根本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你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你对十师领导干部有看法，为什么要整我？”

李德生心直口快，叶道志暴跳如雷，叫人把李德生关进禁闭室。李德生被强行带走后，叶道志竟然宣布撤销李德生支部书记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销班长职务。

李德生在禁闭室内，变着法儿同这种军阀主义相抗争。他时而要求解小便，出去转一圈，时而再要求解小便，又出去转一圈。看守他的战士知道李德生的为人，每次都放李德生出去溜达，暗暗好笑。关了一天以后，叶道志只好放他出来。

叶道志贯彻张国焘路线，连续无端开除了 4 个人的党籍，使得人们都深为忧虑。负责警卫他的交通排，受不了他的蛮横无理，不久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跑到别的部队去。交通排的枪扛不了，行军的时候，只好用牲口驮着走。

叶道志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害怕艰苦，开了小差。

李德生成为非党战士，但是他跟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翻越雪山，辗转于长征路上，没有停顿革命的脚步！

1935年8月，右路军第一次过草地时，李德生依然以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要求自己。穿越草地，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缺少粮食。每个人一口袋炒熟的青稞粒、青稞面，怎么省着吃，也难以坚持到走过草地。大家都是省了又省。李德生省得更多，每次吃饭，他都比别的同志少吃一些，到全班都没有一点干粮时，他竟然还有小半袋干粮。李德生把他这点干粮，掺上野菜，和成稀糊糊，分给全班每人喝上几口。他还帮助有病的战士背枪，帮助卫生队抬担架。经过一周艰苦跋涉，终于越过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由于张国焘闹分裂，1935年9月，右路军不得不第二次穿越草地，回师川西南。在七八天的艰苦行程中，困难更大，大家穿着单衣薄裳，顶着萧瑟的秋风，忍饥挨饿，艰难前进。在宿营时，李德生总是坐在全班的外面，给战友们抵御寒风。有一次，部队在旧城，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同马步芳的队伍打了几天几夜，形势很危急。师长陈锡联派了李德生等3人，冒险冲出重围，找到援军，才同主力会合。

部队越来越认清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纷纷要求北上。鉴于李德生在艰苦环境中的表现，根据部队的需要，和张国焘路线的不得人心，1936年1月，部队在天全时，十师师长陈锡联、副校长王近山将李德生从交通排调到侦察排当班长。1936年4月，部队在瞻化（今四川西部新龙县）整编，交通排和侦察排合并，李德生仍为交通排班长。

1936年7月，部队第三次过草地，每人有二三十斤干粮，但是新战士没有经验，很快把干粮吃光了。李德生和老战士们把自己省下来的干粮匀给他们吃，自己捡一些破牛皮，和着野菜、草根煮了吃。又是20多天，终于第三次走出草地。

李德生虽然在 8 个月之后，1937 年 2 月，经李明科介绍，在陕西泾阳重新入党，只是党龄从这个时候算起，凭空少了 4 年党龄。李德生以大局为重，没有争辩，只要是红军，只要是共产党员，就是最好的理想。他的党籍问题，隔了 11 年，直到 1946 年 3 月 25 日，经过晋冀鲁豫军区三纵队党委批准，认为叶道志宣布开除李德生党籍，是“不应当的，没有理由的，不合党章的规定”，“这是当时在张国焘错误领导下的一系列错误表现之一”，“应当取消叶道志给予李德生同志的处分，并恢复其党籍。”这才恢复了从 1932 年算起的党籍。这时，李德生已经是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打过多次大仗、恶仗。

这个故事说明，李德生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对错误路线坚持斗争，对自己的得失从不计较，是一以贯之的。

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恩来重病在身，坚持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走上主席台时，看到了李德生。李德生是在离开北京一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三年前，1972 年 5 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11 月，周恩来心脏病发展得比较重，医生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他们阅后都同意医生的建议，“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李德生知道周恩来病情很重，又是很不顾及自己休息的，现在见到周恩来羸弱的身体，却挺起精神，顿时激动万分。周恩来也看到李德生依然坚定的神态，他缓步走过去，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李德生，并且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放开。面对几千名代表，两人什么也没有说。此情此景，引起不少代表的注目和感动。

三十三、在逆境中奋斗

各大区负责同志会议之后，李德生于 1974 年 9 月 12 日回到沈阳。

在沈阳市内三经街延安里，有一座大院，院里有一栋两层办公楼，是沈阳军区党委办公的地方。李德生在办公楼一楼有一间办公室。党委常委会议通常在二楼会议室召开。党委办公楼周围几座小楼，住着沈阳军区主要领导。大院西边，有一个小院，是陈锡联司令员居住的院子。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陈锡联的家搬到北京，李德生从招待所搬了过来。

江青“放火烧荒”的讲话，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沈阳。各大区负责同志会议的情况按中央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毛远新改变中央的规定，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将政治局会议内容扩大传达到正军级干部，并展开对李德生的“批判”。李德生在军区党委内依然没有职务。这些都引起一些人的猜测。

李德生对于所有这一切，统统泰然处之。他耐得逆境，耐得冷遇。对于那些批判他的同志，不敢接触他的同志，他后来一直说，他们不了解情况，不敢接触我，有他们的苦衷，可以理解。

问题不仅是有少数同志不敢接触他，就连军区党委常委开会，也开始回避他了。李德生刚到沈阳，是列席所有的常委会的。后

来，有些会并不通知他参加，很少有文件需要他批，很少有文件传给他看。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在一楼自己的办公室里读书，决不把时间白白浪费掉。

李德生对叶剑英的话记忆犹新：“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

只要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依然是军区司令员，当然“该干啥干啥”，而且要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下，干得更好！

他有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浑身精力，有经营东北战略地区的深谋熟虑。党委开会不找他，他就到机关去；机关白天工作，晚上他就到营区看望；机关事情少，他就下部队去。他利用时间坚持读书，不只读《毛泽东选集》，还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使他对于“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多了一点理性的理解。

在处理各项工作的同时，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是他的老习惯了。在北京，他的职务那么多，工作那么忙，他还到总政治部机关各部办公室、各直属单位、总政治部机关宿舍，看望干部、战士、职工和家属，连幼儿园、门诊部、机关食堂、印刷厂等地方，都有他的足迹。至今依然受到总政机关老同志的称道。

在沈阳，晚上时间、节假日，他常常到机关干部的宿舍区去，到郊区机关农场去。沈阳军区机关宿舍不是集中的大院，一个政治部，干部宿舍就分散在十几处。他到干部宿舍，像在北京一样，既不事先打招呼，又不前呼后拥。

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政治部宣传部的宿舍，正赶上两位家属为了一件小事吵架。李德生见了，走上去劝架。他说：“你们天南海北的，能够来到沈阳，住在一起做邻居，很不容易呢，应当友好睦邻相处嘛。”家属们不好意思了，不再争吵。李德生走后，她们问道：“刚才那个干部是谁？”

军区机关的事情，有几位副司令员、参谋长、副参谋长分管，需要他处理的事情不多。李德生就下部队、到基层。他的足迹走遍海岛、边防，走遍军区的团以上单位，许多边防哨卡都有他的行踪。

东北战略区，南北地跨 15 个纬度。北方冬季严寒，常常达到零下 40 多度。部队离不开“三皮”，即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南边不同，冬季最冷也就是零下十多度。机关干部，严冬季节一般是很少到北疆去的。李德生心系北疆的将士们，他常常在数九寒天，视察北疆边防。几个严冬，他几乎走遍了所有边防连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困难，怎么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呢？”李德生常常这样告诫机关干部。

李德生到沈阳的第一个冬季，勘察了沈阳军区周边的地形。第二个冬季，即在北京各大区负责同志会议之后的那个冬季，李德生又到北疆去，深入调查冬季边防部队的战备和生活情况。

1975 年 3 月初，李德生来到大兴安岭中段的阿尔山脚下。在一座大雪封山的山头上，驻扎着一个边防连。李德生提出要去看望，随行的机关干部劝他不要去，说是阿尔山，当地群众称之为“冻死人山”，冬季大雪封山，奇冷无比。李德生说，战士们能在那过冬，我们就不能过去看一看吗？他下了汽车，踏着大雪，到了连队。

在连部，他听说十几里外的一个山头上，还有一位排长带着 7 位战士执勤。李德生一定要去看望。他说，我们已经到了连队了，怎么能少看 8 个人呢？

连长根据他的“经验”，夏日来临，北国山巅，气候凉爽，会迎来部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还从来没有见过上级来人。如今，军区司令员来了，已经使他激动，听到司令员说

还要到前沿排去，他惊诧得睁大眼睛说：“首长，那个山头，正是北风口上，冬防的时候，一切物资都运过去了，到了冬天，车辆没法通行，我们都很少去，首长就不用去了。您关心他们，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说着，递过电话。



1977年，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看望雷锋班战士。

李德生笑笑说：“你都好长时间没去了，我们一起去吧。”连长见司令员决心坚定，只好把连队的拖拉机开来，在前面推开齐腰深的积雪，大家跟在后面，踏雪前进。十多里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时，走得浑身出汗，终于走到那个小小的值勤点。

值勤点上的排长和 7 位战士，已经接到连部电话，大家像过节一样高兴。一年之中，冬季有五六个月。在漫长的冬日里，除了他们 8 个人，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又看不到报纸。只能 8 个人面对面，抬头看天上的白云，低头看地上的积雪，听空中北风呼啸，听山间野鸡咕咕叫。在边防当战士，从参军到复员，有不少人连营长、团长都没有见过，怎么也没有想到，隆冬岁月，军区司令员来到阵地上，大家兴奋地站在门前迎候。

李德生和 8 人一一握手，推开挂着棉门帘的房门，进得室内，只见四面墙上，挂着白霜，刚一坐下，就觉得寒气袭人。原来战士们出门迎接，炉火已经不旺了。李德生从地下拿起一块木柴，添进火炉，用火钩捅捅炉火，室内才稍有暖意。李德生问大家冷不冷，战士们回答不冷。李德生问大家苦不苦，战士们又齐声回答不苦。李德生再问战士们有没有困难，大家依然齐声回答没有。

李德生笑着对战士们说：“不苦、不冷是假的。只是我们为了人民守边防，再苦也不算苦了；再冷，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心是热的。”司令员一席话，一股暖流涌进 8 个人的心田。

北疆边防连队，李德生到过不少了。他熟知，这里路况不好，吃水吃菜困难，只有夏季，才能吃到白菜萝卜。漫长的冬季，蔬菜无法储存，一冬的蔬菜只能放在露天冻个结结实实。冻菜化开后，怎么也煮不烂，是很难吃的，边防连队整个冬季就吃这个冻菜。山头上没有水，要从山下背运冰块上山，化水饮用。有所谓“夏天吃的冬天菜（萝卜、白菜），吃水靠麻袋（背冰块上山），人比汽车跑得快（路况不好）”。现在，战士们竟然回答不冷、不苦，是一种戍边御敌的神圣使命感在支持他们。他是很熟悉连队生活的人，他巡视了伙房、摸了摸战士的被褥，看到这个连队战士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并不少，作为军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于战士们的

实际困难，应该怎么回答呢？

李德生回到沈阳，在军区领导同志办公会上，把他调查边防连队的情况作了汇报，请大家研究如何改善边防战士的执勤和生活条件的问题。他提出，机关干部应当更多到边防第一线去，各个部门应当把更多的经费、物资用到边防第一线。李德生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后来，军区机关逐步给边防连队配发了巡逻车，给没有水源的哨所配发了运水车，给每个北疆哨所配发了取暖用的小怀炉，给边防连队配发了电视机、收音机。再后来，又为边防连队改善了住房条件。曾经有一段时间，沈阳军区机关，兴起到基层连队，同战士们一道过春节的风气。

部队建设中的一个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干部战士的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使李德生感到很大安慰。

李德生有时要到北京开会，除了会议活动，他不去见任何人。只是向叶剑英、邓小平那里打个电话，表示问候。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李德生专门看望了邓小平。两人不提去年会议的话题，而是谈起二野历史，谈起二野几位纵队司令，几位战将，邓小平高兴地说起王近山敢打硬仗，陈锡联胸襟开阔。李德生听了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岁月。

回到沈阳不久，3月，军区政治部传达，刚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3月1日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而就在3月1日那一天，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也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李德生深深感到，江青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计划并没有放松。从1973年底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到“批林批孔批周公”，到“反对经验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不能不为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担心，但是他又坚信他们能够战胜

困难的。

1975年7月，李德生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听了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讲话。邓小平强调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强调高级干部的责任，使李德生看到军队整顿、建设的前景，更加致力于部队建设，致力于东北战略区的建设。他又得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年8月，李德生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但是，好景不长，从1975年9月起，毛远新以毛泽东联络员的身份，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认为现在有股风，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对“刘少奇路线”怎么看。说这股风，比1972年批极左思潮还凶些。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对于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有着很大影响。11月，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德生心中很清楚，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四人帮”这次的矛头是对着邓小平了。

1975年11月，李德生接到通知，和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副政治委员张午、副司令员孙玉国一起，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

李德生明白，所谓批邓，实际上是江青等人批周恩来的继续；所谓“批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批林批孔”、“批经验主义”的继续。

此时，江青乘“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大露“峥嵘”了。一天晚上，毛远新陪同江青来到京西宾馆，她要会见沈阳军区与会人员。李德生得知江青来到，立即叫警卫参谋：“走，回去！”

警卫参谋不解其意，说：“家里正在收拾房子，没有地方住。”

李德生说：“没有地方住也走。你没有听到有人来了嘛。”

他就是不愿意见到江青，避免直接交锋。见了面，按照自己的

脾气，不交锋不可能；交锋，现在不是时候，只能打个“击溃战”。

江青到京西宾馆，是找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一起看电影、吃夜餐，“联络感情”来了。她特地到沈阳军区住地看望，还对孙玉国暗示说：“你不是到总参来了吗？”重演她插手军队、笼络人的故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李德生非常悲痛，打电话向中央请求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外地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进京。他只能在家里挂上周恩来遗像，静静默哀，整整一天，粒米未进。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李德生接到通知，进京参加治丧活动。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9楼，同时到京的许世友住在8楼。两人除了参加悼念活动和政治局会议，大多数时间就守在京西宾馆里。许世友看到9月18日追悼大会的电视新闻，对李德生说：“德生，你看看新闻，你‘李’字笔画少，那个姚文元的‘姚’字笔画多，他为什么排在你前面!?”新闻重播的时候，他指着画面上出现的张春桥、姚文元，对李德生说：“你看，这个王八羔子跳到什么时候为止!”李德生想到的是斗争的时机和策略，劝说：“司令，不要放炮，时候不到。”

在此期间，他们参加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本来大家都很悲痛，“四人帮”却张牙舞爪，许世友气得卷袖子，直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当许世友火冒三丈训斥江青时，李德生拉拉许世友的衣襟。许世友会后问李德生：“你老拉我袖子干啥，我就是要揍她。”李德生说：“现在不能动武，该讲什么讲什么。”

李德生感到斗争的严峻复杂，问题是在这种局面下，应当怎么

办。他悄悄来到叶剑英家中，气愤地谈起“四人帮”的活动，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不小的权力，竟然还在继续抓权。叶剑英沉思片刻，打开身边的收音机，拧大音量，问李德生：“现在全国形势严峻，究竟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李德生一时听不清叶帅讲什么，伸手把收音机音量拧小。叶剑英又把音量拧大，对李德生说：“现在形势复杂，还是开着好。”李德生坚定地说：“还是先抓组织！”叶剑英按按李德生的手，没有再说什么。李德生心照不宣，对于叶剑英的信任，激动不已，他深深明白，久坐易走漏风声，请叶帅保重，起身告辞。

李德生回到沈阳，每天留神各方面音讯。他看到，报纸、电视常常有江青的活动新闻；而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但是他深信，叶剑英在军事上是位战略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战略家。现在，“投鼠忌器”的条件已经改变，他的谋略是会出其不意地实现的。在北京，还有许多老革命家，他们是会支持叶帅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三十四、乱云飞渡

李德生时时想的是，叶剑英关于“抓组织”的话。

怎么“抓组织”？他设想种种方案，比较每一种方案的有利条件和困难。他想起周恩来、叶剑英对黄、吴、李、邱采取措施的周密部署。可是现在的情况，要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他深信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谋略和智慧。

在焦急和担心中，李德生等待了 18 天，终于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大好喜讯。

10月7日上午，李德生接到汪东兴的电话，通报了昨天夜间拘捕“四人帮”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消息，并且通知他立即赶赴北京。

当天，李德生满怀喜悦地乘专机赶到了北京。他首先到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的住地。李德生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连说：“叶副主席，太好了！太叫人高兴了！这是我们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啊！”

叶剑英请他坐下，简要地介绍了“以快打慢”，6日晚上惊心动魄的怀仁堂“会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经过。最后他归结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叶剑英娓娓道来，李德生听了，深深钦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团结了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团结了所有老革命家、老帅、老将军们，运筹帷幄，周密部

署，兵不雪刃，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勇气和智慧。这时的李德生，有一种乱云飞渡之后的无比舒畅。

李德生不忘幽默地说：“叶帅啊，现在不用开收音机了！”

京外的政治局委员到齐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作报告，部署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各方面的工作。9日，李德生乘专机赶回沈阳。



1978年，李德生与胡耀邦在一起。

在沈阳军区党委会上，李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了军区部队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月15日，沈阳军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李德生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有关通知的精神，提出军区部队深入学习、深入揭发、深入批判的要求。他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各级领导要先学一步，领导好部队的学习、揭发、批判。

从中央文件精神中，大家了解了“四人帮”图谋夺取党和国

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了解了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所作所为，也就了解了李德生当时的处境。一切真相大白。在李德生报告结束后，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表达了大家对粉碎“四人帮”非常高兴的心情，也表达了对李德生不屈服于“四人帮”的理解和尊敬。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将在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出来，在西山安排了住处，并且给他转送文件。

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后，有力地领导和推动全党的拨乱反正。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甘渭汉到北京时，见到邓小平。甘渭汉中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委员，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甘渭汉汇报了沈阳军区揭批“四人帮”的情况，谈起批林批孔时沈阳军区对李德生的批判。

邓小平明确地说，李德生有什么问题？1974年的会议，是“四人帮”整李德生和几位大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并且指示：“揭、批、查一定要抓紧，一个‘小螃蟹’也不能漏。”

沈阳军区在1977年12月召开党委五届二次会议，进一步部署军区部队的清查工作，甘渭汉政委传达邓小平有关对“四人帮”揭、批、查指示的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对李德生的评价。

李德生在清查“四人帮”罪恶活动中，非常严肃认真地贯彻党的政策。

沈阳军区揭发了毛远新的罪行和错误。毛远新到北京，毛泽东明确告诉他，到北京不要到钓鱼台，不能在江青那里工作，在那里，只能给江青当奴隶。而他偏偏和江青搞在一起，和“四人帮”搞在一起。周恩来要求他，到北京一定要报告中央。他说：“别管

他。”他甚至说：“解放军也有个改造的问题。”后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有位军区领导同志，李德生不计个人恩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他诚恳帮助，并且向中央反映他的全面情况，使他得以重新安排工作。即使对于在批林批孔中，错误指责过他的领导干部，他也不计前嫌，该使用的使用，该提升的提升。有人对李德生说：“他那么反你，你还重用他。”李德生说：“那个时候，他说的也不一定是心里话。”他就是这样，一贯以党的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

人们认为，在李德生身上，兼备王近山司令员能打仗、陈锡联司令员肚量大这样两个特点。

李德生自己的问题，却事隔了 6 年，直到 1980 年才得到解决。1980 年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文件，为李德生在批林批孔中遭受“四人帮”的诬陷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鉴于 1974 年“打倒大军阀”的口号传遍全国，文件要求将文件内容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文件批转的总政治部报告指出：

“四人帮”为了实现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由江青伙同张春桥接见了陈亚丁等人，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三五”讲话，在军内制造了“放火烧荒”事件。江青疯狂叫嚷“要整一整军队”；诬蔑“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诬蔑李德生同志是“军阀”，“是做坏事的”，为所谓“坏人”“辩护”；指责李德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政委制，是“打掉革委会”，“打掉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此外，江青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把经李德

生同志批准的总政关于批林批孔问题的通知，当作所谓“屁话”批判。“四人帮”制造“放火烧荒”事件，不仅是为了整李德生同志，搞垮总政，而且把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妄图搞乱全军。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党、乱军、篡军的罪恶阴谋。

为了拨乱反正，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政治部决定，为在“四人帮”制造的“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一九七四年九月间各大区负责同志会议上，“四人帮”强迫李德生同志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应予推倒。

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人物卷李德生条目中提到李德生在北京期间，“按照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指示，组织全军批林整风，坚持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1974年批林批孔时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诬陷。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平反。”“在沈阳部队，认真清理‘左’的影响，促进东北地区的军政军民团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加强战备和部队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个条目，曾经经过叶剑英、李先念审阅同意。

红军时期，李德生被错误开除党籍，隔了11年，才得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李德生被诬陷为“大军阀”，隔了6年，得到平反。

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德生除了按党中央的委托，过问东北三省揭批“四人帮”的情况，抓东北地方电网恢复和建设，抓地方病防治工作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东北战略地区和沈阳军

区部队的建设。有几件事情，在全军都具有重大影响，是对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与政治委员廖汉生接见模范军属牟季华。

——建设双拥模范城。1978年10月，李德生和军区政治委员甘渭汉等5位军区领导同志，率领拥政爱民走访组，到东北三省和部分地、市、盟，检讨部队在“三支两军”中的错误，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处理遗留问题。全军区团以上单位，共派出走访组1500多个，召开座谈会3900多次。沈阳军区走访的经验曾在全军推广。与此同时，军区部队抽出人力物力，支援地方建设。又经过几个城市试点，逐步开展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简称“双拥共建”，把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推向一个更高层次，并使之制度化。到1984年，东北各地的“共建点”达到5000多个。出现了佳木斯、通化、本溪等双拥模范城。1987年6

月，国家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召开了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经验交流会。这一活动，至今仍然在全国推行，成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有效方法。

——组建守备区和合成军（即后来的集团军）。李德生和军区党委通过战役集训和战役演习，认为东北战略区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有必要在东北西部建立守备区；有必要将陆军建成多兵种的合成军（也就是后来的集团军），以适应现代作战需要。邓小平1981年春视察东北时，李德生将他的设想，当面作了汇报，得到邓小平的赞同。至今军队的集团军仍然是部队编制的有效形式。而守备区也对于减少常备军，加强边境守备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建议得到很好的落实，对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建立第一个预备役师。怎样实现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1981年，沈阳军区先在辽宁省阜新地区、吉林省通化地区、黑龙江省嫩江地区，各建立了预备役坦克团、预备役通讯团、预备役汽车团。1982年2月，经李德生建议，在辽宁省锦州地区试行组建陆军预备役师，后来又进行齐装满员试点，经过一年摸索，预备役师初具规模。1983年7月底，李德生和军区几位领导同志，同辽宁省领导同志一起到锦州，对预备役师的快速集结、车辆输送、战术演习等，一一检阅验收。预备役师成员既有复员军人，又有青年骨干，经过短期训练，预备役师的战术动作、战斗精神，一点不比野战部队差。大家认为，在平时，这是精简军队、寓兵于民的好办法。1983年8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畔，李德生向邓小平汇报了组建预备役师的经过，邓小平听了，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经验。他说：“组建预备役师是个好办法。预备役好，好！”此后，预备役师、团在全国推广直至今天。2003年8月，在预备役部队组建20周年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表彰

了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认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立足我国国情军情，顺应世界军事变革潮流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完善我军快速动员体制、增强国防整体实力的重大举措。

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设立全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11月，邓小平签发了国防大学领导班子的命令，任命张震为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为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并担任校党委书记。他和其他校领导同志一道，坚持以培养高级军事人才为目标，以教学科研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为国防大学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经过5年努力工作，学校各方面建设初具规模。



1985年，李德生被任命为国防大学政治委员。这是他在1986年1月国防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

1990年4月，李德生退出军队工作第一线。

从1930年2月到1990年4月，李德生在人民解放军中整整度过了60个春秋，从普通战士到高级指挥员，从普通党员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从军事工作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这60年是李德生经受军事、政治斗争磨练和考验的60年，是李德生为党、军队、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60年，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60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更有传奇色彩。



1992年，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解放军三总部领导向李德生敬酒。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李德生历经风雨，经受考验，坚持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同“左”的错误作斗争，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四条回顾和思考，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首先，是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

念。这样，斗争就有了方向和勇气，什么困难和敌人都不在话下，什么个人得失都置之度外。其次，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民。尤其是在胜利的情况下，在高层领导岗位，要有更强的自觉性。第三，要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与人共事，要发现、学习别人的长处；对别人的缺点，要与优点联系起来看，绝不能恶意整人。第四，要学会用唯物论辩证法分析处理问题。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辩证地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才能不犯错误、少犯错误。

一些熟悉李德生的老同志们觉得，这些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盲从，不随声附和，不说大话、假话，不跟错误潮流走，公道正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支柱。可以说，他有一种“拉拢吹捧不能淫，官场浮沉不能移，打击陷害不能屈”的气概。他是靠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政治智慧，经历“文化大革命”这10年斗争的风风雨雨的。了解这些，对于李德生在那个动乱时期的传奇，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

后记

1996年，参加整理《李德生回忆录》，有出版社提出写一本类似“百战将星”式的传记。可以写一生，也可以写一个历史时期。有人建议集中写李德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李德生同志和夫人曹云莲同志希望我们来写。经过回忆、搜集和整理资料，与沈永权、赵骜同志一起策划，研究确定了主题思想、章节设置、史料选择、文字体裁。从2003年2月到2004年5月，几经修改，写成初稿。经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有关方面的编辑、审读、提出修改意见，于2006年9月定稿。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曾经在李德生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鼓励和支持，解放军画报社等单位的同志提供了图片和资料，深为感谢！由于条件和水平所限，缺憾和差错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熟悉情况的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2003年2月—2004年5月初稿

2006年秋，修改定稿于庐山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作者曾任李德生同志秘书，解放军报社社长，少将军衔

- 毛泽东急调十二军，周恩来召见李德生
- 毛泽东为什么选中李德生
- 谢富治说，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不合适。
毛泽东说，你就合适？
- 林彪：“找个‘丘八’管秀才”
- 毛泽东交代李德生，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市郊
- 坐镇空军：监视 256，迫降直升机
- 做好解放 175 位将军的工作
- 解决八一厂的问题，与江青正面交锋
- 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ISBN 978-7-5073-2234-7

9 787507 322347 >

定价：55.0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1793898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引子：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 一、萧望东笑问李德生，你是怎样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当中“混”过来的？
- 二、毛泽东急调十二军，周恩来召见李德生
- 三、平息淮南武斗，毛泽东邀外宾参观
- 四、紧张、紧凑的“三部曲”
- 五、整芜湖
- 六、毛泽东为什么选中李德生
- 七、“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长到了军部”
- 八、谢富治说，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不合适。毛泽东说，你就合适？
- 九、既不批总政“阎王店”，也不叫“新总政”
- 十、林彪说：“找个‘丘八’管秀才”
- 十一、“没有‘五一六’，你抓什么‘五一六’？”
- 十二、毛泽东说，你向他们要，一次不给，再要第二次
- 十三、毛泽东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但指出，除李德生外
- 十四、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 十五、“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
- 十六、毛泽东交代李德生，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市郊
- 十七、坐镇空军：监视256，迫降直升机
- 十八、鲁珉求见，交代谋害毛泽东的计划
- 十九、缴获林彪“手令”和《“571工程”纪要》
- 二十、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交锋
- 二十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
- 二十二、解决好“重灾区”的问题
- 二十三、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
- 二十四、毛泽东派李德生到南京，劝许世友“少喝酒”
- 二十五、江青“拜年”
- 二十六、当选党中央副主席
- 二十七、“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 二十八、解决八一厂的问题，与江青正面交锋
- 二十九、解决解放军报社的问题，再掀波澜

三十、毛泽东说：“你是唱李铁梅的……你是陪绑的。”

三十一、江青“放火烧荒”

三十二、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三十三、在逆境中奋斗

三十四、乱云飞渡

后记

封底